

翠北前談



英·勃脫蘭著
林淡秋等譯

行發部書圖報譯

1939

目錄

序幕 戰爭的前夜

- 一 島國的人民.....一
- 二 警鐘響了.....一一
- 三 仲夏的瘋狂症.....二〇
- 四 「萬歲」！.....二七
- 五 別日本.....三五

第一章 華北事變

- 一 藍溝橋的烽火.....一
- 二 北平之圍.....一〇

三 壯烈的反正.....	一八
四 古都的淪陷.....	二五
五 真是的戰爭了.....	三二

第二章 到延安去

一 繞道山東.....	四一
二 重臨西安.....	五一
三 在八路軍辦事處.....	六一
四 黃帝陵.....	六九
五 旅程的終點.....	七六

第三章 戰時的邊區

一 在延安.....	八五
二 中國的列寧.....	九六

三 國民黨和共產黨.....一〇六

四 共產黨的戰略.....一一六

五 「邊區」經濟.....一二四

第四章 到山西去

一 別延安.....一三五

二 越過陝北.....一三九

三 渡黃河.....一四四

四 山西的戰爭.....一四九

五 退出太原.....一五四

第五章 八路軍

一 政治委員.....一六一

二 到總部去.....一六七

三 朱德總指揮.....一七三

四 教士素描.....一八〇

五 重遇史沫特來.....一八五

第六章 北上途中

一 別總部.....一九一

二 滿目荒涼.....一九七

三 戰鬥中的二二〇師.....二〇四

四 民衆總動員.....二一〇

五 冰天雪地中的旅程.....二一七

第七章 跟賀龍在一起

一 師司令部.....二二三

二 賀龍的一生.....二二九

三 戲劇印象.....二三六

四 蕭克自傳.....二四三

五 新年.....二五〇

第八章 在前線

一 一個舊式將軍的肖像.....二五五

二 日落西山不回頭.....二六二

三 前線巡禮.....二六八

四 憶忻口大戰.....二七四

五 越過日軍的防線.....二七九

第九章 遊擊隊

一 旅司令部.....二八五

二 游擊戰爭.....二九一

三 一個英雄的寫真.....二九七

四 「和平」和「秩序」.....三〇三

五 新的長城.....三〇九

第十章 統一戰線

一 踏途.....三一五

二 基督教徒和共產黨人.....三二三

三 第五縱隊.....三一九

四 漢口交響曲.....三三五

五 香港瑣語.....三四四

尾聲 盲目的侵略家

一 第二年的春天.....一

二 北平在陰影中.....八

三	帝國的建築師	一六
四	東京的五一節	二二
五	不是「朝日」了	一九

校後

序幕：戰爭的前夜

一 島國的人民

「你沒帶照相機嗎？好。沒帶手鎗嗎？好。那麼我們可以上岸了。」那位護照檢查員把他的紙張收起來，向我略微鞠了一躬，表示歡迎我來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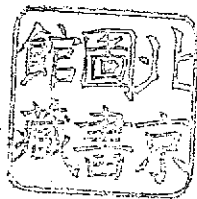
他是一個面色沮喪的人，穿着一套破舊的黑衣服，有營養不足的表徵，鬍鬚像頭伯倫先生的。詢問完畢之後，他的官樣態度顯然鬆弛了，他抱歉得很，竟問了我那麼多問題。這是例行手續……他抓起草帽和傘，領頭走出大廳。

我的新嚮導，在扶梯頂上停了片刻，欣賞着一大盆菊花。「在英國，」他帶着懶惰的神情說，「你們是沒有這樣的花的。」

「什麼菊花嗎？」我提出了一個溫和的抗議。「英國也有的。」

「但那是不可能的。」他用愛撫的手指撫着大朵的花。「這是一種日本花……」

這似乎不值得爭論的，我們和氣地走下碼頭，向火車站走去。狹窄的港口滿是出入的船隻，煙霧縹緲地盤旋在水面上，被漁船的黄褐色的船帆劃分開來。我吸了一口海島上松樹的清新的香氣。



「真可惜，」我的同伴還是愉快地一心想着花。「你錯過春季的花節了，但你還是可以看到萬尾花。」
 「日本」——一提到他的國家的名字，雖然用的是一種不熟習的外國語，也表現出一種愛撫的神情——
 「是『花之國。』這裏一年到頭都是碧綠的，不像中國那樣。中國是沒有樹的。」

我放過他末尾這句驚人的話語。「日本人到底覺得中國怎樣呢？」

他深深地嘆一口氣，好像我攪起了一個痛苦的題目。「我們怎樣說才好呢，日本是希望和中國做朋友的，但中國人不明白這點。他們時常和我們爲難……我馬上浮起了一幅他所看見的中國的景象：雲幕底下，一片陰暗廣漠的大地，一些小鬼一樣的小東西在一個沒有樹木的曠野上蠕動着，向着『朝日』作出無禮的姿勢。我們不過祇想幫助中國；可是那些中國人却是那樣沒有信義。這是很困難的……」
 我們到了車站，我謝謝我的友善的嚮導。他又帶一點官樣的態度向我告別。「那就是你的火車，你的確沒帶手鎗嗎？……不要忘記去遊那些帝國的花園。在這個國度裏，總有些東西可以看看的……」

他是對的。我在一九三七年七月間到達東京，看到比萬尾花更多的東西。

在遼東，人們要越過一股戰爭的洪流來回顧一九三七年的春天——正如歐洲回顧那已被遺忘了的一九一四年的夏天一樣。在回想的時候，很難相信那些平靜的日子是真的。

春天給中國帶來了新生，由於最近一次嚴重的國內危險的和平解決，展開了全國統一的重新希望。而日本出乎中國人的意外，似乎並沒有什麼敵意。在東京和南京間的經常刻薄的交易聲中却出現了一種異樣的寧靜。三月間，一個日本銀行家和工業家組成的經濟使節團訪問中國，帶回一個善意的報告。聽說他們還提議調整華北一些比較顯明的不平等的關係。的確，在這個親善的使節團與日本華北駐軍之間，有過一些糾紛，但那是可以轉圜的。關於這，自由主義的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少將就成爲熱烈希望的集中點。

甚至在北平，這個從一九三一年以來，每年春天都要降臨戰爭的黑影的地方，也似乎不應辜負這些吉兆。我們知道，日軍並沒有在夜間調動邊陸軍大臣林大將的誇大狂妄的傾向，在外務省大大受到阻撓，因爲當時外務大臣是真正開明的自由主義者佐藤。林在位的日子已經很有限了。似乎日本的「溫和派」——太平洋的和平預言家們，時常帶着一種極端的樂觀主義，給這新創的政治集團起了這樣一個名字，——好像快要得勢的樣子。

至少，在這個時候更深切地研究遠東這兩個不和的國家間的關係，是很適當的。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就從華北動身到日本去了。但是經驗豐富的觀察家却在搖頭。「這太像一九三一年了。」歐文·拉第莫爾（Open Lattimore）在我離開北平以前，對我這樣說。「安靜得使人不舒服。我恐怕我們又會碰上

第二個「九一八」了。我們都還記得，日本國內一個短期的自由主義的政府和執對於中國的不斷的甘言蜜語，曾經給那突發的血腥的滿洲事變，奠定了基礎。

驟然地，十年以內決不會有人相信國際間的誠意，日本的外交界，有老鷹，也有白鴿。

從中國經由滿洲高麗直到日本的時候，會想起過去和現在的歷史的教訓。因為漢唐各代的中國文化，是經由高麗半島，流過海峽，傳到那偏僻野蠻的日本。在第五世紀和第六世紀，高麗是中國文化的前哨，又是著名的佛教聖地，那時候，這潮流傳輸得最盛。日本得到它所珍視的全部文化遺產。

五千年前，中國用書籍征服了日本；現在日本却用坦克鎗砲來做答禮。因為現在這潮流逆轉了。日本通過高麗和滿洲發動它在東亞的現代「文化使命」——這是一種進步，但這進步的里程碑，不是圖書館和廟宇，而是用三和土和鋼鐵做成的更堅固的紀念碑。在朝北到日本去的途中，我們更明確地認識了這種征服潮流的漲落。

當時傳來的消息，增強了這種觀點。在大連（這個有現代的船塢，也有古代的馬車的奇異的人工的都市，它是南滿鐵路的堡壘，也是日本威脅香港的北面根據地）我們聽到林閣快要倒臺的最初傳說。在漢城——東方許多中日藝術相融匯的地方之一——倒閣的消息完全證實了。以近衛公爵為首的一個

新政權，博得了海外的歡迎，被目爲「改良內閣」，它決定繼續外交大臣佐藤所開始的合作事業。

但當時新政府也彷彿有些地方不大明確。佐藤本人的位置，給與了廣田弘毅，廣田是一九三六年著名「三原則」（牠們已成爲日本的「東亞永久和平」政策的結晶）的作者，又是同年與德國訂立「反共協定」（註）的有力的外交經紀人。杉山任陸相，馬場——重工業和軍火的化身——任內相，這些名字，就足夠壓倒那雖然溫和，却毫無政治經驗的近衛了。如果我們從它構成的混雜來判斷，這新內閣顯然是來應付暴風雨的了。

這是我到日本時的一般政治情勢。在自由主義者的圈子裏，對於林的敗退，還在相當地高興，認爲他是一個日本的克林威爾，打算廢除議會來統治日本。這種手段，連那有名無實的帝國議會也覺得太燥急了。但是，這些自由主義者們，正如別處自由主義者一樣，沒有組織，而且過份樂觀，他們在新政府中的位置，仍不過是一種希望，不是實際。

費現在的意大利一樣，日本也是一個要應付歡迎旅行者的國家——祇要這個人是游歷者，或是異國文化的研究者。你走進那些無關重要的田園、博物館、戲院，以及大學圖書館裏去，到處都安靜地把門打開來，並且給你一種甜蜜的殷勤。人們對於這點，祇有感激；我在日本的第一個禮拜，是過得够愉快的。如

果空間和時間允許的話，我們在研究任何民族時，大都是着眼於它的文化的。

但是，時間是一個敵人；我到日本來，是希望看到比博物館更多的東西的。自然，不用駕車去游歷東京的貧民區，或在晚上跑到無階梯的娛樂場，淺草公園看看，也可以看到一些真實的動態。要是到下等的遊藝區去看看，更能看出真像，那裏有一些微小的豔裝的動物，在格子後面像老鼠一樣地颯着路上的行人。（這個世界第三大都市的妓女的總數，是很難統計的，她們大多數是被窮苦的鄉下人家賣出來作這種生意的。）

但這仍然不過是真實的邊緣，無論怎樣生動，我們總不能從對照中得出什麼結論來。「我想看看這個國家真實的內部情形，不要光看這些裝飾品。」一天我向一個經濟學教授抱怨了。「我想參觀工廠，跟日本的工人談談他們自己的生活，難道不能夠住到鄉下去，親眼看看那真實的情形嗎？」

那機警的微笑的臉上，突然（有點近乎滑稽）變成一種警告的神色了。「在日本，是不容易去參觀一個工廠的。也許你可以在假期，同一個日本學生到鄉下去，但是我們必須選定地點。同時，警察也要知道你在做些什麼……」

這是在東京一個大學的休息室裏。穿着青色制服的學生們，正在外面的校園裏規規矩矩地漫遊，他們都有一種超乎他們年齡以上的穩重。往常我遭到阻礙時，我就把傅麗達·烏特萊的名字提出來，作為

爭論的起點。『你讀過日本的泥足嗎？』

這位經濟學者，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竟點了點頭。『當然，這本書是被禁止了；但我有一本，是爲了批評用的。她所說的事實，大部份都是真實的，——我甚至可以給他一些更『動人的』材料。但關於那些事實的解釋，却完全錯的。』

『你承認那些事實嗎？例如關於勞動者的待遇，農民的情況等等？』

他吮了吮牙齒，這是日本人在作客氣的辯解時普遍的動作。『我們比任何一個外國人都更清楚這些事情。但是一個外國人所永遠不能瞭解的，是日本人的特性。我承認，女工們在工廠裏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而且工資很低。但這些女工們對於她們的工作是很快樂的。她們接受一種艱苦的生活，因爲她們知道，她們可以用這個方法來替她們的國家服務。』

『你們外國人不能夠理解愛國主義對於一個日本人的意義。不僅士兵自願戰死在戰場，就是每一個市民也肯爲國家的利益從事犧牲，如果那是必要的話。……』

這是日本到處都可以聽到的不幸的詭辯。爲了國家的利益（我覺得『國家』在這裏需要一個更明確的定義），使得那些農民（整個日本的不穩經濟的支持者）陷於赤貧，瀕於餓死；爲了鼓勵工業，政府給與津貼並減低稅率，但同時也降低了產業工人的生活水準。三井和三菱就是一切。

「日本的經濟發展的整個趨勢，是沿着犧牲農民而人工地刺激工業的路走的。這會把你們領到什麼地方去呢？」

教授聳一聳肩。「也許是戰爭吧。這是一種戰時的經濟。自然，我們自己本身並不需要戰爭。不過日本有許多強敵……」

一九一四年的回憶。那時候，德國的教授們也說過這樣的話，現在他們又在重彈舊調了。從宣稱大勝邁牛油，火藥勝過維他命的經濟魔術師戈林將軍的話裏，我們可以得到他們的暗示。這真是一個瘋狂的世界。

在這裏竟毫無所得。不久我知道政治在日本不是一個普遍的話題。但是另一個日本經濟學者（我帶了一個外國朋友的信給他）比較坦白些，我們在東京一家咖啡店的內室裏，關起門來談。我知道這個人的底細：他以前是個革命者，雖然是非常溫和而且學究式的。可是他現在用一種很深重的辛辣的調子說話。

「是的，他們都期望着近衛公爵……近衛其實不過是一個傀儡，這是誰都知道的。他們希望他做一個新的法西斯蒂的首領，但實際按照他本人來說，他並不是一個法西斯蒂。法西斯蒂黨的失敗，是因為他

們找不到一個有名望的首領。

「日本祇有兩種真正的力量——陸軍和海軍。他們在政治上代表什麼呢？陸軍是和重工業緊緊聯結在一起的。他們希望大陸上有戰爭，希望獲得華北的原料和礦產，希望有一個進攻蘇聯的根據地。海軍是以輕工業家作背景的，他們依靠對外貿易，——他們希望向南發展，希望更廣大的市場，希望同中國政府成立一種「友誼的諒解」，於是逐漸深入農村，統治中國的貿易。

「是的，這裏有一個真正的衝突，——一個大商業利益的衝突。那一羣是更強的呢？陸軍。每次都是如此。自從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戰爭發生後，海軍在政治上就失勢了。現在他們正打算捲土重來，但是陸軍仍然在統治着政府。」

「那些反對黨——例如社會大眾黨——怎樣呢？」

他的聲音更加富於義憤的調子了。「這些都是你所謂準法西斯蒂。議會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反對黨。不過現在，自從林下臺後，政黨覺得自己較強了，也許會開展新局面。大片的工業家正在反對新的陸軍預算案，他們以為近衛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但是假使進步的份子不內閣得勢的話，軍部就要有所行動。而近衛也就不能不照別人的吩咐行事。」

他的話，似乎有些道理，因為在斯內閣的第一個月內，竟一點也不活躍。最明顯的是遲遲沒有發表任何關於外交政策的言論。新聞記者們包圍外交部的發言人，也毫無所得。這是一個不死不活，扮着政治鬼臉的月份。

但在幕後，却有些事情正在進行。自由主義者們，滿懷希望，等待着宣佈他們的勝利。而軍閥們，知道時間已經不多，已經佈置他們的計劃了。

(註)這是頗值一掃的。這個反蘇的軍事同盟，不久之後，由於法西斯意大利的加入而增強了。但在當時，日本民衆對他很不歡迎，竟使得廣田內閣走上顛覆的道路。但不到一年，他終於成了日本國際政策的基礎。這具體地證明了日本的政府是如何不能代表國家的真正的意向了。

二 警鐘響了

山裏的河流在楠着樹列的兩岸間清涼地流着。我們的船夫——一個苗壯的棕褐色的漁人，他的短襖和圓錐形的帽子，也許是從一幅廣茂的印畫裏模倣來的，——緩緩地把一隻平底船劃向上流。我們在蓬下的草蓆上，完全沉醉於一種非常舒適的境界裏，這是在這種平底的小舟中才會有的。

周圍的景色，圓形的山和清雅的小木房子，也像一幅彩畫。小房子，被放在小小的稻田中，或者有趣地被安置在山邊。雨後的空氣是很清爽的。

在我們的船的前面，有兩個人拿着一口手網在中流跋涉着；第三個人則帶着一隻鸕鶿爲我們捕魚。當網沉入水中時，這鳥就急切地自動地投入綠波之中。它貪婪地吞食着，撥出水面來，在那搖動的嘴裏有一片銀色的閃光。漁夫敏捷地從它的嘴裏把捕得來的東西溜進他的簍裏。再一次潛水和忙亂，又一次被追吐出來。鸕鶿好像永不知足似的。

我懶懶地看着這無限重複而很少成功的動作，便把它擬想爲一個日本工業的警鐘。這隻鳥，它可曾知道自己是受了騙，捕了魚來是給別人吃的嗎？它爲什麼不能工呢？但是，如果如此，它的主人立刻會把它

餓得半死，逼我做同樣的工作……

「真美麗呵，」一個音樂似的聲音，切斷了我的思路。說話的人，是東京一間醫院裏的醫生，我遇見他，很敬重他那種幹練的專家風度。他這時正蹣跚地仰臥着，草帽歪戴在前額。「坐下來，看這流水……」一種自信的流露。「你知道，所有日本人都大自然的愛好者。因為所有日本人在心裏都是一個詩人。」這是實在的，大多數日本人總喜歡把自己看做獨特。在歐洲已經隨着大戰而死去了的「熱情的」小說，在日本獲得了再生；這是一種最特色的文藝形式。（後來我看過一些日本的戰時日記，牠們一方面是諷諷的寫實的戰事寫照，一方面又掺杂着許多美妙的自然的描述，我感到了驚異。這是羅薩和雷馬克的混合物。）

從船尾端出一種小烤魚來，有兩個農婦在一個炭火鉢上燒着這些捕獲物。我們用那微溫的日本啤酒把它送下喉嚨。

「這些人都是從城裏來的嗎？」我問。沿岸有許多裝飾得很威武的釣魚者，他們穿着各種各樣的服裝，從全套的運動衣到水兵的制服。

「大多數都是的，在夏天的假日常常如此的。有些來釣魚，有些去登山。當我還年輕的時候，我也常常

如此——但是現在我學會休息了，像你那些中國朋友們一樣。中國人總真是優閑的主人。」

另一隻平底小舟掠過我們，駛向下流。裏面滿是藝妓的花花綠綠的和服，顯得非常快活。其中有一個女的，正在激動地歌唱着，其餘則用一種混雜着好奇和不關心的眼色望着我們。兩個穿着城市服裝的男人，女人起碼有一打。

「這又是一種普通的假日的娛樂，」那醫生微帶諷刺地說。「我想一定不是良家婦女……」

兩點鐘後，我們搭運動員的專車，回東京去。歸家的漁人們，在他們膝上喂着他們當天捕來的魚，被陽光炙曬過的青年們，穿着茶褐色的短衣和一雙笨重的釘鞋；也有幾對青年學侶，一首由少男女構成的夏日的牧歌。青年日本，確已過着室外的生活了。在中國，祇有少數城市居民參加這類旅行。典型中國的理想運動，仍然是飽餐之後來一個緩緩的散步。

這些青年旅行者，全都露着肘，灰塵滿鞋，他們隊伍曾經蓋滿了十二哩左右山村的道路。但他們樣子都非常認真，在擁擠的車箱中，很少笑語，也許他們在山上的時候並不拘束，不過現在都恢復他們的城市態度了。一羣沉悶的人們，甚至我的醫生朋友，也穿着他的黃皮鞋，結着整齊的黑領帶，端正地坐着一聲不響了。

在我們下車的壩所——城市的叉口上，賣報盒子的喊聲比平常響得多了。「喊些什麼？」我問我的同伴。

他買了一份晚報。「蘇聯邊境糾紛——俄砲艦一艘擊沉。」他的眼睛，在幾小時以前還是那樣安靜和慈祥的，現在透過他的眼鏡看來是那樣疲乏，困憊。我知道，他的兒子快到服兵役的年齡了。

「我想這是嚴重的，請你原諒我。」他匆匆和我告了別。

「黑龍江事件」莫斯科和世界各國都認為這是不費什麼事就可以很快解決了的，但在當時七月初的那幾天，遼東的天際却像佈滿了戰雲。日本的報紙對於這件小小的事件，用盡了最大限度的誇張和宣傳的方法。這是東京參謀本部的第一步工作。

近幾年來，「滿洲國」和蘇聯的邊境糾紛，是够多了。這是不足怪的，因為未決的邊界長達二千哩，而日本當局又斷然拒絕用仲裁方法澈底解決。但這種事情很少有超過局部以上的嚴重性：作為一種慣例，這只是火煙，光多於熱。日蘇關係的一般原則，甚至可以從這些斷斷續續的邊界衝突上來考察。如果這一方面，或者另一方面（或者兩方面同時）的指揮刀略動一動，你就可以看到亞洲東北部的把戲了——兩個警戒的政敵，大家都想不要被對方佔了優勢。但當遼東前線平靜無事的時候，日本又要製造事故。

日本（我們又得提到中國許多痛苦的經驗，）在執行不常有的溫和外交的時候，是最危險的。

但是黑龍江事件，在日本方面是小小的秘密行動，同時又把牠大吹大擂，牠在日本國內是被看得很嚴重的。我們想像不出比這更大的平地風波。有兩三天，空氣中充滿了電流。報紙出號外，每家商店窗口的擴音機，傳播出最近的發展情形。東京簡直鬧着恐慌了。

「你以為共產黨會轟炸這個城市嗎？」一個可愛的年青女學生問我，她的聲音帶着疑懼，同時又不自主地看着天空，好像預期着俄國黑色的轟炸機飛過明治神宮上面似的。我曾告訴她，這是決不會發生的事。但顯然在這些事情後面，一定還有些別的事情。

後來，這事情像發生時一樣快地結束了，過了一夜，大堆謠言都消滅了。

當然，現在顯然已經明白這一切都是由東京深謀遠慮地操縱着的，——它有兩個主要的目的。第一，無疑是想試探一下蘇聯政府目前的態度，那結果使日本是認為滿意。莫斯科政府用以接待日本大使的深夜拜訪的沉着態度，表示蘇聯竭力保持和平，這是好極了。

第二個目的，是要在日本國內製造戰爭空氣。——這是黑龍江恐怖事件的製造者更重要的目的。這一點，他們是完全成功了。

日本的報紙，完全被軍部，尤其是被更急進的少壯派軍人統治着的。那年六月，他們完成他們的任務了。這種戰爭的緊張空氣，無疑地是軍部要更進一步動作的初步準備。如果說日本軍閥這時已經有意大規模侵略中國，實未必然，雖然也不是絕不可能。因為「大陸政策」在未到不得已時還是主張按照一定步驟前進。當時的用意，大概還在華北再來一個「事變」而馬上有所獲得。但主要的用意，這是向國內證明陸軍在大陸上的重要性——爲了蘇俄的威脅——從而說服議會，必須趕快通過陸軍新預算案。

軍部這一舉動，還有一個原因。雖然表面上也說不很明顯，但當時東京報紙上一個簡單的報道已經充分指示出來了：

「按照內務省社會局調查的結果，今年最初的五個月內，日本罷工及勞動糾紛，總數已達一千三百三十二件，幾乎兩倍於去年同一時期的數目。僅在五月裏，已有二百八十次罷工……」

這是事實——雖然很少引起普遍的注意——勞働界的不滿，已經飛速地佈滿全國。範圍之大，爲二十年來搶米風潮和勞工紛擾所未有。對付上一次勞工風潮的方法是發動滿洲事變，在「爲着國家的危機而統一起來」的老生常談的口號下，嚴厲地取締了任何勞工組織。現在因爲不滿意延長工作時間，工廠加速生產，以及生活程度的提高，一個新的風潮又起來了，於是日本的統治者們，便決定再來一次，激起國民的「愛國心」，轉移勞工們的對內目光。

這是聰明的政治家們的一種舊手段（雖然並非發源於法西斯主義，但已被法西斯蒂及軍人法西斯蒂的政府作爲自己的東西了），『用國外糾紛來惑亂人心。』

在日本的那個夏天，有兩個印象，包含着戰爭的調子，還很生動地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把它記下來，有一種特殊的意義。

鎌倉那座爲「異教徒所祈拜」的大銅佛，帶着那種永恆的微笑和難以形容的和平氣氛。是世界上最大的造像之一，同時也是日本藝術最富有創造力的一個恆久的表徵。但在這個海邊小城鎮的另一端，在荷花池和參天大樹的環繞之中，還有一座油漆得朱紅的戰神廟。

在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聖鶴正在頭上盤旋，我看着一隊穿白色海軍制服的水兵在參拜這個神祇。先是軍官們，然後是士兵們，列隊走進殿裏，從一個跪着的和尚手裏，領吃了一片聖餅和一杯聖酒。他們一個跟着一個地跪拜過了，然後再列隊出去。——有些水兵，微帶害羞的樣子，用他們的手背擦了一擦嘴。但是，他們在這自古以來就是和平的地方，大家都興奮地感到了他們的神聖的破壞使命。……

每個到東京去遊歷的人，都要被帶去參觀那「四十七個浪人之墓」。這是一個富有戲劇性的故事。這些封建領主的家臣們，在爲主復仇之後，都在主人的墓旁切腹而死了。這故事，在現代日本是永遠不

許它變成陳迹，不許牠瀟灑的。石碑排列在一個方場上；每一個都從未缺少過參拜者的名片和香火。一批一批的學校兒童，被起來聽取這個早已死去了的傳說的教訓。

在中央墓前，一個年輕軍官在立正行禮。他的臉是緊張的，毫無智慧，罩着一種狂信的容光……

這些圖畫是浮面的，沒有人以為這就可以包括整個日本。但這確是日本的一面，而且是最危險和最有害的一面。因為這方面的日本，握着九千萬人的命運。

七月初，我住在御茶之水的「文化」公寓裏——一列陰暗的房子，原是東京一個投機企業家受到政府的津貼，為「城市工人」建造的；但不久却變成一種國際會館了。七月八日的清晨，我床邊那架古舊的電話機，響得特別早。

拿起耳機，我聽出了這是一個外國記者的聲音；他對於遠東事件有特殊深刻的研究，我前一天還和他討論過中日的形勢。

「喂，我希望沒有吵醒你。你也許願意知道，昨晚中日軍隊在北平附近衝突起來了。盧溝橋，你也許知道這個地方。」

我突然完全醒過來了。「事情嚴重嗎？」

「還不怎樣。不過這裏軍部認為「異常嚴重」。或許會發展成重大事件……」

參謀本部已經完成他們的第二步動作了。

三 仲夏的瘋狂症

我相信瀝暑是不無關係的。七月和八月，時常是最容易羅染戰爭狂熱病的月份。東京的七月，雨水使空氣充滿了潮濕的蒸氣，整個城市都像一個大鑊在金屬的天空下慢慢煮着，簡直使一個佛敦聖徒也得發火。

空氣中充滿了戰爭的氣息。那些勇武的首領們，以及想從中獲利的死亡經紀人，把這毒素散佈得太好了。兩星期前，報紙，無線電，以及帝國的告諭，都聯合起來，用他們對黑龍江事件的可怕的歪曲，散佈這傳染病。在這種酷熱的天氣裏，病菌迅速地繁殖着。

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東京的那個夏天的經歷。看着一個勇敢的，被驅的民族陷入悲劇中去，是很不愉快的。

曾經被馬林奈蒂(Marinetti)和其他法西斯的舞用詩人讚美過的戰爭本能，也許在個人身上有些遺傳的根，但是要使得全國風從，那祇有利用一種專前細心布置好的強烈的刺戟舉動。人，以前也許是好戰的動物，但現在大家都可怕地認識了現代戰爭的真面目，自然都成爲和平的愛好者了。爲要煽動他們。

放棄那無憂無慮的安詳生活，戰爭製造者們便不能不乞援於那最有力的自衛本能——恐懼的本能了。在日本，武士的戰鬥傳統，雖然被那些以戰爭為職業的人們保留下來，但祇能抓住很少數的民衆。這是一種封建的遺物，往昔時代的旗幟，撫愛它的，祇有荒木大將一流人，他們用「征敵日本」的現代神話把它裝飾起來。但甚至在一個貪婪的社會裏，你也很難驅使民衆去參加一種征服別人的戰爭。所以要使日本民衆離開自己的田地，在異國他鄉掙扎起來福命，僅僅為要支持他們的世襲的壓迫者的傳統，那是不很容易的。武士道在戰爭爆發後作為戰爭意識，是有用的，但它本身決不能發動戰爭。

祇有希特勒在萊茵河瘋狂的氣氛裏沉醉於自己的雄辯中的時候，才說了這樣的話：他要為克爾，要萊茵河流域的煤和鐵，要克里米亞的煤油，俄的鐵路（也是每一個法西斯煽動家的貿易資本），是保衛歐洲和文化，或者可以說反抗「赤禍的威脅」。這種政治上開倒車的確表示，正是那些貪婪國家的卑鄙聯盟，「反共聯盟」的官樣文章。莫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亞和西班牙的暴行，不是為着他自身利益，而是在那裏保衛「地中海的文化」，「舊教的信仰」，甚至「歐洲的和平」——這是絕大的謊言。

這是現世界最熟悉的謊言：一切戰爭都是自衛戰爭，而和平祇在保衛和平的時候才被破壞。

這一切，在今天都不算是新聞了。但在中日的事件上，它却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甚至最惡毒的日本

軍閥，也不敢公開欺騙，設日本有受中國襲擊的危險，——這顯然太荒謬了。日本軍部祇好利用國人對於蘇聯的真正恐怖。

這事本身也是一種人工的杜造。因為國聯本光榮的歷史和歐洲最近為集體安全的奮鬥，向我們證明了蘇聯是站在列強的「和平集團」的前哨的。但是，感謝幾年來政府和地方當局的熱心的宣傳，日本人——尤其是那些以為最易受到空襲危險的城市居民——都老實相信他們的生命和國家，不斷地受着海參崴的威脅，他們始終認為牠是「對準日本心臟的手鎗」。

從這裏很容易達到那第二個神話（誕生不久，但同樣是遠東日本帝國的迷夢的嫡生子）——「亞洲布爾什維克化」，因為這樣就可以把中國也看作「赤禍」的來源。

由於國內痛苦的經驗，現代日本的統治者們知道了馬克斯主義思想的力量，由於無數更好的理由，他們怕加命將軍和遠東的紅軍，還不及怕這種思想來得厲害。但如果承認這些思想是自發的，在任何片土壤——不僅在島國的肥沃的稻田，和苦役的工場——中，都可以獨自生根，那就糟了。這使得那些大日本的建造者們，更便於杜撰「赤色帝國主義」這個名字，——用中傷國民黨政府和政治陰謀，軍事力量等等手段，直接把蘇聯牽聯到中國來。

於是在日本人民的面前，便呈現出一幅中國由於內戰而分裂了的最生動的圖畫，而每一次的破壞

運動，都成了莫斯科的僱員的工作——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變動，直接和日本和太平洋諸國的利害有關，如果「布爾什維主義」得勢的話。但在這傳奇中，也有一點真理，就是中國社會革命的成功，一定要在日本帝國主義崩潰之後，就是在日本的「大亞細亞帝國」被滅之後。但這不過是未來的遠景，也許祇有日本的荒木和南一流人物有時會不自覺地感到。

被歪曲得最厲害的，是把同情「共產主義」的頭銜，加在每一個開明的中國布爾喬亞的身上，他們對於日本的派緊侵略到他們自己的邊界上來，不過提出最溫和的抗議。

我已經看到，人們無須在日本住得很久，就可以看出反華運動的痕跡。甚至在官辦無線電廣播的兒童節目裏，也經常有一些關於「勇敢的日本軍人」和「大逆不道的支那人」一類的說教故事。我覺得，即使在東京一些最樸實的在野人士中，也沒有一個人承認中國應當不滿意日本，雖然中國人有合理的抗日權利。

「你們為什麼認為這是莫斯科的工作呢？」就這樣爭辯着。「中國人對於自己領土的喪失，總要怨恨的，不一定就是共產黨。例如「滿洲國」……」

但這沒有用處的，這已經是一個「解決了的問題」，非常微妙的。「日本人民對於「滿洲國」非常

「敏感」——「敏感」的這種過份的敏感，頗有可慮之點。「日本人民」對於共產主義似乎更加「敏感」。一個外國朋友曾對我表示「同情中國」，他暗示我日本秘密警察的活動。「在這個國度裏，你得當心。」

這種痛苦自覺的感覺，我在這些七月的日子裏，走過東京的街頭，想從行人的臉上看出一點真實的思想來。我不時覺得自己看出了一種普遍的不安，超過私人煩惱的不安。一種新的壓力臨在這個城市的頭上，它的名字就是「恐怖」。

日本人很少洩露出較深的感情（除非他們喝醉了，他們往往喝了三分酒，顯出七分醉）。他們老是隱藏着一些東西，但不為外人所見。在街上，在地下鐵道上，大多數人的臉，都毫無表情，正如你在南威爾士（South Wales）礦區所看到的那些便帽下的憔悴的臉和在任何中部城市的街角上所看到的白色的臉。但也有些人是逍遙快活的，——譬如摩登姑娘，現代日本的蝴蝶，活潑地穿着紐約的時裝，——不過這種愉快，不過是一種傀儡式的、不自然的愉快。

在這裏，到處流過了一股超乎身體疲倦的憂慮和不安的暗潮。

一天下午，我在丸之內的一間飯店裏跟一個青年知識份子談天，他的姓氏，是日本最老最有名望的姓氏。他在外國受過教育，即使他沒有獲得一種外國的觀點，至少在理解問題上跟他同胞們有某種的距離。

「這一切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問他。「聽道報紙都發瘋了嗎？」

他發熱地點點頭。「光是很不好，恐怕真要發生戰爭。」

「政府希望戰爭嗎？」

「近衛公爵是不希望的。我儘巧知道，最近這幾天，他竭力在緩和某些報紙的論調，但他身體很弱。」

「一個微笑掠過了他的薄唇——『有麻煩，他總要生病，真正決定之權已不在他手裏了。』」

「在戰爭中一定要受到損失的工業家，商會等怎麼辦呢？他們都是靠着國外貿易的。難道他們在政治上毫無力量嗎？」

他用精緻的小手做了一種無力的手勢。「沒有人敢說——這是現在日本人民的悲劇。有許多人想反抗軍部的領袖，但沒有人敢發表言人，因為這等於判決自己的死刑。」他的黑眼睛富於表情，充滿憂傷。

「如果真有戰事，你也要到中國去打仗嗎？」

他聳了聳他瘦弱的肩。「自然，如果我是必須要去的話，我並不想去，但我們日本人，有時候很難主宰

自己的生命。」他停了一息，於是很有禮貌地繼續說：

「我想你是同情中國方面的吧？」

「在這件事上，我是同情中國的。我在日本受到很多難熬的待遇，我很尊敬，讚美日本的人民。但我覺得你們的外交政策卻太可惡了。如果長此下去，它會結束日英間任何友誼。」

「是的，這正是我們大多數人擔心的事情。我們寧願跟英國做朋友，不願意跟德意做朋友。但是，我們在現世界上還是一個年輕的國家，一舉一動都依照自己的作風。誰知道結果會怎樣呢？」

「結果是世界大戰，而你們很榮幸地是一個發動者。」

「唉，如果戰爭一定不可避免，就只好讓它去。但請你相信，我們並不希望戰爭。」

他的宿命論是很溫和的，他們聽天由命。我們沒有話可說了。

四 「萬歲！」

事情是七月十一號（星期日）那天決定的。

那整個上午，內閣召集了一個緊急會議，新聞記者們在休館室中騷動着，並且猜測着那些不能想見的謠傳。下午，首相到葉山天皇避暑的離宮去了，和平或戰爭，就決於此行。當天晚上，整個東京都知道了。

東京的星期日的夜晚，有許多吸引人的地方。我同一個剛從中國來的朋友，到日比谷公園去聽音樂。在夏天，他們是在戶外演奏的。這個圓形劇場塞滿了人。

對於歐洲音樂的普遍的欣賞，是現代日本生活中最有趣味的特色之一。我想在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能使這樣多人去聽音樂，而這樣一個樂隊（這完全是由日本人組成的）則簡直不能想像。我曾經聽過東京交響曲，在淮恩格那（Wagner）老練的指揮下，在室內演奏得非常好，我知道他們確是很懂長的。在中國，人們總是聽不到音樂，在東京，則從鋼琴和提琴的演奏會，直到一個能在歐洲的音樂臺上站得住的樂隊，樣樣都有。

現在這位正式的指揮（也是一個德國人）活潑地領導着他們從悲多汶的交響曲奏到里昂諾瓦的前奏曲。這音樂，在那無風的晚上，是那麼有聲有色，周圍籠罩着公園的黑暗的陰影，在雲彩斑斕的天空中，有一道最後的火光。我覺得彷彿是一種致命的預兆。

在休息的時候，有一個人加入我們旁邊一班海軍軍官的隊伍裏。他們退到牆垣的陰影裏去，低聲地交談着。

「要是我能够聽懂他們的話語就好了！」我的朋友說。「又出號外了——聽！我們可以聽見公園外面手鈴的聲音，這是賣『號外』的號號。這聲音從銀座方面傳來，消失在郊外中……我發覺我們重新就坐時，那班軍官已經走了。」

第二個節目是輕鬆的歌劇，和史特老司的曲子——這使我很快不快。「我們先走吧。」我們很快地穿過公園，向着燈光輝煌的市內走去。

我們花五分錢買了一張薄薄的報紙，那上面的油墨還沒有乾透。我的朋友稍稍讀一點中文；我們慢慢地讀出那些熟識的方塊字。我們讀那些標題，我們所注重的就是這個。

「日本派遣軍隊到華北……這些該死的日本字母，我一個字也看不懂。對了，四師團立即開拔……好了，北平完了。那些軍隊一到中國，決不會空手回來的！」

我們沿着林蔭路，直向朝日大樓走去。在橋上，街車被阻塞住了，人們都聚在那裏讀着電訊。這個近代的都市，跟北平周圍那些不久一定要變成戰壕的寧靜的鄉村，高粱的田畝，和泥牆的村莊，是多麼不同啊。這裏人都很靜默而且專心，那些仰起來的面孔，在燈光中顯得呆板，神祕。我覺得這裏少有熱忱的表露；但將來是會有的。

路旁有一個穿着水手服裝的小孩子，面帶睡容，對他父母的遲延不走，很不耐煩的樣子。他快快樂樂地拍着一面紙旗。兩個年青的士官學生，踏着活潑的步子，走過橋去。

那孩子的眼睛發光了，他突然把旗向上一揮，行了一個敬禮：「萬歲！」

那兩個年青的軍人，莊嚴地回了一個敬禮，微笑地走了過去。他們這樣以無限的寬容來對待兒童，是每個日本人的最可愛的特徵之一。這件十分輕微的事情，像災禍一樣映入我的眼睛。

「戰爭開始了……」

我轉向我的朋友：「你明天就回美國去。我也趕快回中國。不然，恐怕要太遲了。」

在日本，國際觀光局裏，一切都混亂了。那極替我定位子的貓頭鷹似的事務員，竭力要保持他的尊嚴，

但空氣顯然很緊張。我同情他，因為辦公處被一羣不安的旅客們包围住了。

「我來了五個鐘頭，」一個快要哭出來的美國婦人告訴我，「想買一個到上海去的鋪位。可是這個賣材說他不知道。」

帶着疲倦的泰坦 (Titan) 神的神氣，那個事務員剛剛把我所有票子都蓋好圖章。到下關的特別快車票，到釜山的渡船票，由瀋陽到北平的特別快車票，在接連不斷的電話暫停之後，他向我保證，我當晚就可以走了。

我剛付過錢，把票子收起來的時候，一個紅臉孔的德國人興奮地闖進來了。

「我要退掉那張到瀋陽去的車票，」他喘息着說，「現在沒用了。」

「爲什麼，」我說，「火車不通了嗎？」

他給我一個呆板的注視。「不。我剛從我們大使館來，軍隊已經接管了這條鐵路。現在旅行已經不可能了。」我相信他的話。如果一個德國人都不能到「滿洲國」去，我要假道那裏的機會也很少了。

「請把我的票子換到天津去的船票，」我把一小疊乾淨的票子交回去。

那事務員有點不高興了。「你得付退票手續費。」

「不過，這件事情大家都已經知道了，你自然也應該知道的。」

他堅持着他的尊嚴。「我們祇賣票子……」

「哦，那麼隨你便吧！但我要到中國去呀。」

這是我早已開始懷疑的事情的起點：——雖然它本身無足輕重，但以後在更重要的例子上却給證實了。日本人的能率是很有限制的。在某種限度內，日本是很能幹的，比中國人能幹得多。打倒他們的，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事情。日軍的參謀工作證實了這一點。如果一切計劃都能實現，那是非常美滿的。但倘若別人不照樣做，那預定的計劃就得全盤崩潰。一般地說，日本是有這種死板板的危險傾向的。中國人的力量就是他們的韌性，這往往也是一個弱點。

在大家沒有被捲入普遍的戰爭狂中以前，在最初那些熱狂的日子裏，日本到處充滿了混亂。但外國人方面，甚至在這種時候，還有一種輕視這整個事件的奇異傾向。

在東京，外國人有兩個經常的消息來源。一個是帝國飯店的休憩室，那裏謠言是很少斷過的；另一個是電通大樓，大多數通訊社辦事處都設在那裏。我永遠不敢在帝國飯店大聲說話；自從二月事變以來，這裏似乎是一個最不安當的透露消息的地方。在那個有椅墊的休憩室裏，人覺得每隻椅子後面都放着一架收音機。

在電通大樓，離開銀座的燈光不遠，我去找一個中國朋友，他是中央通訊社的東京代表。辦公處的玻璃門已經關起來了，當我走進去時，有一打中國學生從牆角站了起來。『劉先生走了——兩天前他回到中國去了。』他們的態度中，有友誼，也有自大，是誇大和不安的交織。

我們談起中國蔣介石將軍這次還要抗擊嗎？這是一個老問題，但我們的意見，彼此都能互相瞭解，這到底也是一種慰安。我覺得我們現在都是宣傳家了，敵方的宣傳家則說着另一種語言。我從來沒有比在日本最後那幾天內更清楚這件事情了。

『我們一定要打，』這是一致的意見。『現在已經沒有第二條路了。』他們目前的處境很不好，他們大都在想法回到自己的祖國去。就是回去也是危險的，正如有些中國學生所感到的一樣。留在日本，是等候逮捕和毒刑；而回到上海呢，在公共租界的楊樹浦一帶登岸，也許會碰到一個更大的危險，——那裏很快就會完全歸日本憲兵統治了。當我離開那辦公處的時候，一個頭髮散亂的青年叫住我：『最好從後面的梯子走，——前門有警察看守着。』住在日本的中國人，都知道謹慎了。

我終於完成了匆促離境的一切手續，而且匆匆向朋友們告了別。我在東京最後的一天，是七月十四日。不久以前，我曾經約好一個日本有名的學者在這一天會見，他是國內少數敢於直言反對軍部統治的人們之一，剛剛出獄。但到了約定時間，說幾個鐘頭，一個電報寄到了我的住處，突病，今日不能會面，至歉。』

我不能責怪他；時事如此，每個人都應當小心。

那天晚上，我走過幾個小丘，經過山野兵營，它是二月廿九日的叛軍的司令部。這次譁變（幾乎發展為海軍和陸軍的公開比武）的最有諷刺味的一點，就是領導這次事變的少壯軍人竟聲稱自己是「被壓迫的日本農民的代表」，好像日本農民要由這條最短的可能道路——為國「犧牲」的道路，來解除他們的痛苦似的。

現在，在這些營房裏，駐軍正在演習他們的「衝鋒戰」。這是一件很特別的事：一種粗野的、毫無節奏的齊聲吶喊，很像義莽的狂吼。中國兵士也常常反覆地用跟這相似的可怕的叫喊，來增強他們的勇氣，但沒有一個兵——更不用說他們的長官了——把它看得很認真。這裏的齊聲吶喊，更為慘厲；這在一個現代都市的郊外，只激起一股極微對敵的氛圍。

後來，我不知不覺地走到蘇聯大使館的所在。這是一所長長的工廠式的白色建築物，高得可以俯瞰東京。被灰色的天空映得分外明亮的屋頂上，飄揚着一面鐵鏈鐮刀的紅旗。我竟忘記了這一天是攻陷巴士提監獄的紀念日。

在火車站上，太陽旗把燈光都遮蔽了。成羣的婦孺在跟開往中國的軍人們告別。這並不是一輛軍用車，但從送行的情形看來，一定有一個重要人物在車上。給我送行的那個日本朋友，顯出惶亂不安的神情。

「再會……也許明年夏天能在中國相會！」

他微微繃起眉頭。「我還沒有被召集。有人說，那四個師團還沒有開拔……但這是說不定的。」他向我說了一句最凄切的告別詞：「我們只好分別了！」

長長的列車，悽悽開動了，開過一片模糊的旗子。月臺上的人羣一齊鞠躬，像風中的麥浪。我撇開這些，轉過身去，打算埋頭看書。

但在到神戶去的路上，那歡呼的聲音，像回聲似地纏住我們。在每一個車站——甚至那些我們在半夜裏經過的——同樣是聚集了帶着旗幟歡呼的人羣。在晨光隱微中，大廠的煙囪和繚繞的黑煙，織成了一片荒涼。但在這裏，也有紅白兩色的旗子在拍動着。

終於到神戶了，又是把我們捲入一陣波浪中：「萬歲！萬歲！萬歲！」我背起我的背囊，走向碼頭過去。這是應該離開日本的時候了。

五 別日本

南嶺丸是一艘不大引人注意的小船，吃水很淺，一望就知道它祇能裝載很少貨物到華北去。我在東京聽說每個船位都定出去了，結果發見我還是第一個到大棧間來的乘客。這裏沒有中國的避難者排列在碼頭上，在甲板上看見的也很少。到我們出到海面，遠離岸上警察的注意的時候，統船才吐出拉的搭客。我這時才知道船上有多少中國人。

我們在正十一點鐘從神戶開船（日本的輪船和火車，跟莫索尼的一樣，很少誤點的）經過那巨大的造船所而駛出港口。在造船臺上，有兩三隻造好一半的船隻，突出它們可怕的骨架。在堤外，內海展開在天光和浮雲的一片白茫之中。

那整個下午，我們緩緩地穿過許多錯綜的小島，大多數都是森林繁茂，直到水邊。這是一個愉快的航行，但你在日本任何地方都看不見遠景：一切彷彿都是秒小得很，除了現代工業的建築。這些島，像是穿着披風似地罩上一層永久的霧。我覺得自己在渴望着華北清朗的空氣和遼闊的天邊。但那些日本人——比萊茵河游艇上的德國人更不知厭倦的愛美者們——却在甲板上喝着啤酒，欣賞着海景，直到那印在

明信片上的一樣的落日的殘輝，消隱在綠色裏，紫色裏。

我們在那天夜晚到了門司。替我們船裝煤的苦力們的有節奏的吭哨聲吵醒了我。這里是日本名勝之一（僅次於富士山的大名，但較易看到）。如果東京的三井大廈和街上的汽車使你忘了自己仍在東方的話，則這里又會提醒你東方的人類勞動力是一切商品中最廉價的商品。

一竄一竄的煤，從一隻微開的駁船上，通過一條工人的活練子，裝到輪船裏。繁重的工作——把裝滿的煤籠挑上那狹窄的跳板——由男人來做，較「輕」的，則由女人們擔任。這部活機器的工作的熟練和準確，是驚人的。那工作的速度使我膽寒。這羣奴隸所以做着這樣機械的傷心的工作，難道真由於「愛國心」，真由於對祖國的責任感嗎？當我看到一個靠得最近的苦力的充滿紅絲的眼睛裏的表情時，我得到另一種解釋。那表情，我在門頭溝一家美商煤礦中的一個中國礦工的臉上看見過。這是我們在人們臉上所看到的最深刻動人的表情：人類的絕望的表情。

利用開船前的幾個鐘頭，我乘渡輪到下關去。到處都是茶褐色的制服；鐵路的終點，擠滿了熱心的羣衆，歡迎和歡送那些到中國去的軍隊。我憂鬱地想：那一定是那四個師團出發了。

我到日本以來，從沒有像此刻那樣感到孤單。我覺得自己有一會兒被一羣喘息的女學生包圍住了，

她們帶着歇斯底里的狂熱，揮舞着旗子，高呼「萬歲！」明天，大概她們要站在街頭，向路人遞過「千人針衣」，他是保護日本兵去完成「建立東亞永久和平」的神聖使命。

當我們起錨駛過海峽的時候，那狹窄的港口仍然響着歡呼的回聲。一些新的旅客上船來了，內有幾個日本軍官。那些中國搭客，又到下邊統艙裏去了。

一個新來的搭客是從天津來的俄國商人，他剛在日本訂好一批貨色預備到中國銷售。他流聲地告訴我：「這次生意糟了。當船駛出港口時，我們一起站在欄杆邊。」

他接着說：「看見那些砲艦嗎？」兩隻新式驅逐艦停在海峽裏，牠確實具有日本造船廠的標誌，但那旗號——彷彿是一種族徽般的裝飾品——我却未曾見過。

「它們是什麼？」

「是暹羅的——剛在日本定造好。這是這些人——」他放低聲音——「活動的一面。」

暹羅也是一根烈風中的小草。不久以前，她是從英國購買兵艦的，但後來她有了新的朋友。小國對於這些事情，大概是不大選擇的。

更向下駛去，我們經過一艘蘇聯的貨船。它是靜靜的，滿是鐵鏽和煤烟。有一面破旗在牙樁頂的旗杆

上飄揚着。二三個水手靠在欄杆上，看着我們從那裏經過。有一個，赤着膊，像一個銅色的巨人；他一動，肩膀上的肌肉就鼓了起來。

「一條舊船，」我的同伴帶着一種奇異的憂愁說，「但那些水手的樣子，却餓得很不壞。」我猜想他是這樣的一個俄國人，為了一個名義或別的什麼關係，他無法回到自己的祖國。

在國外僑居的俄國人，尤其是在東方，分成兩個顯明的營壘。最爲人所熟悉的，是那些「不能和解的人們」，那些「不平的白衛軍」，因爲他們常常被人譏起。他們團集在最後一個沙皇的畫像下面，對於放逐他們的人們，保持一種不可和解的仇恨。他們是歷史上的真正的流亡者，一個一個地死於麻痺劑和伏特加酒；這個階級的殘餘，在他們的本國已經不存在了。

但是在流亡中長大起來的較爲年青的一代俄國人，却很少把他們父親所抱的仇恨放在心上。他們認識父母所過的生活的無謂，認識父母的永遠失去了光榮的美麗的無謂，而對牠們感到厭惡。他們所知道的是，蘇聯在世界各地逐漸增長了力量。他們愛讀一份偷偷運來的真理報，而不愛看他們自己那些圍畫在當地印刷的亂七八糟、不值一讀的報紙。許多這樣的俄國青年，已從東方回到蘇聯去了。但一般地說，他們回國比他們父親以前出國更難一點。

被日本間諜們收爲私人的保鏢——「鐵十字軍」的，是上述前一類的白俄。他們同時還可以在中

國的租界裏替日本做些醜惡的工作，因為一個歐洲人，在中國的租界裏，仍然佔相當的便宜。他們會用任何手段向『共產主義』報仇。但是年青的一代，明知道自己是處在兩面夾攻之中，却始終不分裂他們的陣線。如果日本進攻蘇聯，他們很知道自己應該站在哪一邊。

七月十九日，我們離開山東。雖然黎明時那隻日本巡洋艦的側影，使人想起籠罩在中國海岸的不斷的恐怖，但船上的空氣似乎比較舒服。然而，那個晚上的無線電，比平常更忙了，顯然有什麼變動。那些日本軍官的樣子，更神氣了：他們脫了舒適的和服，硬板板地坐在客廳裏，有支配命運的人的神氣。

我進去找那俄國人，他是什麼事都知道的。『有什麼消息？』

『蔣介石在牯嶺發表演說，』他告訴我，『態度似乎頗為強硬，看來，他似乎真要保衛華北了。』
在三等艙裏，成羣的中國學生興奮地低聲談話。明天我們就可以知道得更清楚了。

早上七點鐘，我們離開大沽灣，雜在一個日本小艦隊中。有七八隻兵艦，和幾隻等待潮水的運輸艦。前面——一片平坦的，一望無涯的海岸線——就是中國。

當我們下錨的時候，一隻救難船駛過來，一個紅頭髮的人在吊橋上，用粗魯的蘇格蘭語求見我們的

船主他迫切地要討一點水門汀去填補一條滯水的日本運輸船的船板。

「岸上的情形怎樣？」我問這新來者。

他愉快地回答我：「昨晚塘沽開火了。北平附近還在打——我想這次真要打起來了。好，這不是白種人的戰爭，——我們不在內，我們可以站在局外……」

他把懸袋水門汀拿上船去，隨意搖一搖手，表示告別。半點鐘後，我們這載得很輕的船，沿着航線，穿過大沽灣，駛到海河了。

我們停泊有點困難，一陣突起的狂風把雨傘吹到河中心去了。兩隻日本巡洋艦守住海口，看不見海關人員。從山海關開來的特別快車進站的時候，車上擠滿了中國的難民。但是，不管怎樣，當我們穿過夏天的鄉間時，田野中直立着十尺高的高粱，楊柳則比日本任何樹木更綠得可愛，我的精神奮發起來了。因為這是一個熟悉的世界。

天津，華北的商業心臟，正在戰爭的黑影之下騷動着。在東站有很多日兵和外國防軍（自從義和團事變以後，從北平到海邊的鐵路線，是歸「國際」管理的。）但是，日本人顯然不喜歡外國軍隊，我們很容易料到此種惡感，牠造成幾次衝突。法兵隊長 Christian 亦遭日本人有計劃的襲擊。

鐵路上海是日本的鐵甲列車和鐵甲車，好像是軍事行動的準備，只等公證人揮旗。世界上還有什麼別的「友邦」能在被侵略國境內這麼容易完成了侵略的準備？百年前就被迫開放門戶的中國，一直無法建立自己的國防。

在天津，也有一班日本浪人上車。這些沒有爵位的祖先的卑微的後裔，都是一些非正式的軍人，他們在中國城市總有明確的職務，跟陸戰隊或日本正規軍合作。穿着商人或遊歷者的服裝，屁股後面掛一把自動手鎗，或者把劍藏在手杖裏，他們竭力裝成市民的樣子。但這是一眼就望穿了的假裝，他們走起路來都有征服者的神氣。

那天傍晚，我們到達豐臺，它離北平兩兩數哩，已被日軍劃為軍事根據地了。在這裏，好像到了他們祖國的臨時邊界一樣，每個日本人都下車了。我們第一次聽到中國人高聲自由談話，好像一下子把一百張嘴都解放了。

列車慢慢地開向古老的京都，不時停靠一會。還不到北平外城的南門永定門，我們就看到中國的軍隊了。在這裏，二十九軍——他們是強壯的華北農民，但沒有精良武器——上來查車，他們的刺刀在座位下面亂着，看有沒有日本人躲藏在那裏。他們那種堅決的神色，使人鼓舞；祇要領意得好，這些隊伍是很有

用的。

我們在城牆下邊漫漫關着，鐵門鏗鏘地從鐵道上移了開去。在真正戰事爆發以前，這是最後一班到北平的列車。

我們到了一個戒嚴的城市。火車終於自由地行駛着，繞過一段彎曲的路線時，我們最先看見的是洋杉和天壇藍色的屋頂，其次是漆得很好看的狐塔，最後則是前門的大城門。大刀和刺刀在一路的城牆上閃耀着寒光。在日本，我很不願意地看見了這最近中國活劇的序幕。而現在，舞臺已經準備好上演，我走到戰爭的劇場了。

第一章：華北事變

第一章 華北事變

一 蘆溝橋的烽火

北平——這以「致命的美」軟化了兩朝異族的征服者的東方弗羅梭司——保留着它一切天媚如花的風采。這個被遺忘的城市，只有少數學生用歌詠和旗幟給以些微生命的城市，確是中國一處最難望其劇烈抵抗任何侵略者的地方。它很久以來一向是一個安樂宮。但是，像一個老是願意現身舞臺的老美人一樣，北平可在那些七月的日子裏，以驚人的熱情，扮演了個最後一個抗戰的角色。

我到時，北平附近已經繼續了兩星期散漫的戰爭。直到那時，我們只聽到了些日本方面的宣傳；現在，關於抗戰開始的情形，人們終於可以從外國觀察者得到一個多少公允的報告了。

七月七日夜間，日軍在蘆溝橋（馬哥李羅遊記中提及的那座大理石古橋，作為夏日盪足和冬日騎遊的勝地而為北平全部外籍居民所熟知的）附近舉行半夜操演時失蹤了一個兵士。因為這恰在永定

河北岸宛平的城外，日軍司令便斷定他的失蹤兵士是被誘匿在城牆裏面。他要求開城門，讓他的部下進去搜查。中國駐軍據理拒絕在這樣一個時候開城門給外國軍隊。

隨後的發展都是隱秘難解的。中國人說那個失蹤的兵士在兩小時之內又歸入了他的隊伍；他們說他事實上正在當地一個妓院裏稍作勾留。（這一定並非僅是一個惡意的造作而已。凡是高興開闢「失蹤日人」在華所生事件的冗長記錄的人，都很容易證明如下的事實：在類乎這些的地方，「遭難者」是照例會出現的。）日本的說法當然是：華軍不給警告便開火，「狡猾地攻擊」他們的部隊。

詳細節是不重要的，因為它們並不真真影響那結局。直白地說，日軍在這一帶舉行夜換，簡直無異尋求事端；而且知道這極的。但第二十九軍可畢竟不為恐嚇所屈服。日軍駐在宛平城外，召來援軍，開始轟擊。中國兵揮着大刀，辱罵着，防守城牆，不平常地富有鬥志。

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和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將軍這時還返他的故鄉去了。（中國官在政治上發生困難時，老是有想起祖宗的妙訣的。）也許中國軍隊因之能比平常稍稍放任一些。宋的副軍長馮治安是一個年輕得多的人，也比他奸滑的老長官更為「抗日」得多。好幾年來都爲了奉命必須忍受任何可憤的事情去避免和日軍發生任何事件而痛心着的全體兵士，是够清楚地知道這個的。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說，日本奉天駐屯軍，他們以前既慣於高壓而無須擔心報復，因而再來一個行動

之後，在蘆溝橋頭可不爲官員委婉的話語所接待，却遭遇了中國軍隊兵士率直的對答。這不是一種政策的答覆：它是中國百姓給日本帝國主義的答覆。

有兩個星期，雙方代表試用手腕和恐嚇，把『和平條件』提出，考慮，拒絕，又收受，像一局中國棋中的棋子一般。同時，絕少有一天不發生某種戰爭行爲而過去的。但關係重大的一點——惟一真有重大關係的一點——是在『交涉』期間，日本陸軍司令在本國頒發動員命令，急遣援軍，在報紙上發動出征運動，這在我離開日本那時便已盛極了的。中國人氣壯得驚人，但同時，中國全部正規軍中配備最簡陋的軍隊之一的二十九軍，關於援軍，或新銳的軍需品，却任何什麼都沒得到。

一個已經危急的情勢之中，蔣介石七月十九日的廬山談話像一顆炸彈一般投了進去。這是國民政府領袖的一篇決絕和審慎的談話，略述中國在任何解決所必須堅持的四個要點——中國在北方須保持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冀察行政組織權屬中國，受中國直接支配；冀察政務會或二十九軍，中國均決不容日本干預。談話的憤激是非常明白的：

「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蘆溝橋。如果蘆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今

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四省……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這恰是北方兵士所期待的。——南京方面必與援助的一個毫不含糊的保證。蔣委員長終於斷然負起了保衛華北的責任。從這時起，關於必然要發生什麼事情，已經絕少疑問的了。

華北的地方官們也許並沒真知道他們要作什麼準備，雖然這樣臨到最後時機而仍然昧無所知，是難以寬恕的。日本軍閥們也許以爲蔣氏的廬山談話是他外交簡裏的最後一枝箭，以爲敏捷的行動會立即粉碎他一切神聖的保證。但是扼要說來，華北的情勢是够明白的。一方面是那人所熟知的「主動」因素日本帝國陸軍，即是一向就只期待着這一天的日本侵略派這個統治團體的富有訓練的工具。而對方，還沒強大，可是情感已經憤極欲狂的，是中國的農民兵士，他們每月一元，糧食最最不足，可是準備爲保衛國家而作戰。

在開端的幾個時期，勢必不是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抗。

七月的那最後一星期中的事件可以簡要地一說。二十一日，宣佈說雙方「軍隊在撤退中」。二十一日，發現日軍一點都沒撤退。宋哲元已經從樂陵趕回來，命令了一三二師去換防「抗日」的一三二師，（這沒有多少分別的，日方立即指出，）他似乎在拖延時間而非「力謀和平」。後來明白：南京方面在這時期

是準備遣派援軍到北方的，但宋可還沒預備歡迎他們，如果他們來到他的河北的話。然而日方不給他一條逃避的路；七月二十三日，他們提出他們的「首次最後通牒」。

接着過了兩天。這兩天內南方發生了最轟動的事件，據說上海「失蹤」了一個日本水手。這回失蹤的日人是一個叫宮崎的，據他自己的供述，是到了一個「不法之處」去；經過一連串驚人的冒險；他從一艘中國輪船上跳到長江裏，游泳到岸上，被中國警察所執，以茶和點心相款待；後來他終於被交還到他自已最不感激的司令的面前。那以後，（人們設想）所留給他的大概只有「切腹」了。

但七月二十六日，日本空軍參加行動，戰爭的真的序幕揭開了。據說，華方在切斷到天津的日本電線；企圖去詳查這種自相矛盾的證言，可又是不大值得的。爲報復起見，日軍向廊房村來了一次意外的空襲，有效地把它炸成了一片瓦礫場。死者都是平民，數目不明。同日，北平的軍官們向宋提出「二次最後通牒」，等於要求全部華軍退到河北以南。

宋把它考慮了一天，隨即宣佈：他認爲日本要求「不合理」，加以拒絕。他似乎命令他全部軍隊「再遭攻擊，即行抵抗」。這樣一來，顯然地，他覺得他的責任已盡。這是北平全部短悲劇中他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積極的步驟。

我們回溯這些事件，並不因為它們內在的趣味，却是因為它們注定了要成爲一個規模要廣大得多的軍事行動的開端。蘆溝橋的事蹟可以寫得有聲有色的，如果我們把它擺在倒坍的城牆和高梁稻的背景上而描寫它，並且把抵敵少數的圍城軍隊，著名的中國大刀畢竟不再徒作裝飾的那些夜間的事蹟細描一些進去。但是蘆溝橋頭地方性的爭執終究是無所謂的。

在另一些情形之下——說說在一年之前的這個時候——它不過是中國的國恥杯中多加一滴而已。事實上，蘆溝橋成爲期待已久的中日較量國力的序幕，爲什麼呢？

原因是不能求之於日方的變動，（雖然我們已打算暗示出日本人民何以此次輕受煽動作戰）却須求之於中國內部在其前九個月中所發生的事情的。歐戰爆發的信號是薩拉其照（Sarajevo）街道上手鎗的一擊；但現在沒有人會認真地主張，這鎗聲便是發生戰爭的原因的吧。同樣，只有對於歷史最皮毛的看法，才會見到現在中日戰爭的開端在一九三七年夏天的蘆溝橋頭。

從頭說起來，我們必須承認日本帝國主義這現象，（現在還有許多人關於它真正的性質和存心方面正在試行欺騙自己。）日本現在的統治者的目的，照田中男爵在蘆溝橋事件前恰十年呈給皇室的那著名的「奏摺」中那麼可驚地略述了的，（註一）爽直是征服中國，最後若臨亞洲。這是一個不愧爲鞅帖木兒的野心；但歷史上亞洲的征服者中，沒有一個曾經配備了這樣致命的武器而出發的。如果我們認

這爲出發點，問題便簡單化了。「日本爲什麼進攻？」這實在無須多問；問題是「中國——這一回——爲什麼抵抗？」

面對着高度的侵略的時期的日本帝國主義，中國人民只有兩條真的行動的路：屈服或是戰爭。中國政府向來想要選擇一條不屈不戰的『中間路』，幾年來已經做到叫它自己的人民相信可以有這樣一條路的。但滿洲之後繼以熱河，塘沽協定之後又是何梅協定，中國各階級這才難堪地明白：這一條中間路原來並不存在，它只是類乎延緩屈服而已。

任何國領袖中那些目光最敏銳的外交家之一的蔣介石將軍，發見他自己處在對於一個政治領袖最不愉快的那種進退不得的境地——當不再有機會去和解兩個敵對勢力中任何一個的時候。好幾年來他希望能避免和日本作戰，希望另一個強國——當然大概似乎就是蘇聯——會從他手裏把戰爭拿了開去。但蘇聯變得更強，日本還不預備去向遠東紅軍挑戰。中國是她直接的目的，成爲愈益明白的了。日本政策的兩個詳細陳述，即一九三四年的『天羽聲明』和一九三六年廣田首相的『三原則』是給中國人的直接警告，叫他們最好接受那無可避免的運命。接着，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內，當日本重又在

（註一）一九二七年七月田中奏摺云：『要征服中國，我們必先征服滿蒙；要征服世界，我們必先征服中國。』

內蒙古活躍的時候，一個最突然的中斷發生了。張學良在西安的事變，和蔣委員長的被他自己一部分的軍隊所扣留，是那些決定國家命運的罕有的純粹意外事件之一。西安事變的結果——即是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間十年中第一次的諒解，中國內戰的終止，和一個「民族統一戰線」的迅速結成——是對中國政府未來的政策有決定作用的。

日本侵略的直接結果，一個政治上統一的中國終於出現了。而這正是日本軍事領袖們所畏懼的事。

把最近七年的歷史簡縮起來，我們可以說：日本目下的侵略中國戰爭，它的最先的那些子彈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間在瀋陽發射了的。中國的民族抗戰，它的最先的那些子彈，並不在滿洲，或上海，或華北前線，却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鋪滿了雪的華清宮的外面發射了的。了解瀋陽、西安和蘆溝橋之間偶然的關聯，就會不瞭解遠東社會力的真實動向的。

一到中國的抗戰既經試驗，證明為真實的時候，日本不得不把一切作為一擲之注，勝則得中國，敗則全完。正如南滿鐵道經理不久以後愉快地宣稱的：「終於，日本遭逢了最後關頭，一個打倒對手的決定點……日本拿起了她的解剖刀。她在這裏要不准許任何外國的干涉。」

七月八日起，有二十天，蘆溝橋事件——保衛這一座悄然過了它的光榮之日，但仍是華北舊文化傳

統的一個象徵的古橋這個轟動事件——吸住，遼東多數人民的注意。對於中國人，它是概括在那張翻印在無數插圖週刊內的流行照片之中，照片上有一個兵士穿着灰色棉軍服，拿着大刀，靠住一個大理石雕欄。如果你翻開同一時期的日本週刊，你就看見別的——藝術得多的——照相：鐵錐的隊伍掩護在高梁裏面，一邊野戰砲在他們背後開放；一隊隊的日本飛機遮黑了華北的天空。這是強弱之差的一個公平的估計。

二 北平之圍

在這夏季的幾個月裏，北平的外圍社會稍見鬆弛。但中國院子裏亮着客燈，遠處的砲聲掩沒了響亮的蟬鳴。這樣照常輪流舉行宴會的時候，現在可發見一個談不完的新話題了：「會不會來一次圍城呢？」

日本使館似乎以為會來的，從出現在它門外的那沙發袋和有刺鐵絲網的山堆判斷起來。但這些防禦設施和集合在日本兵營裏面的那些大砲和軍用車，許會另有一種用意的。日軍把上海公共租界用作專根據地，是從未表示過絲毫躊躇的；如果結果要在城內打仗的話，他們難道不會把北平的東交民巷同樣處置的麼？

恰在日本沙發對面的英國使館，照例保持着它老練的漠然態度。雖然有幾個老居民在俱樂部裏悽然回溯着義和團時代，暗示着一種「中國暴民」的一些無從確知的危害。美國官方開始表示出他們政府在此後幾個月中的對華政策所特有的一種神經過敏的樣子，正在幾乎天天向他們的僑民頒發一些繁複的訓令。美國無線電桿上燈光輝煌大亮，就算是叫全體外僑避入東交民巷城牆之內的警號。

這一切是有相當理由的。中國軍隊在許多街角上設置了障礙物（表示他們無論如何等待從城內和城外一樣被襲攻的）夜裏，街上還有巡查。我交談的幾個學生都充滿了熱忱，以為北平在變為第二個馬

德里，決非不可能的。

北平的保衛，主要是在二十九軍手中。這一支軍隊原是馮玉祥指揮的舊國民軍的一部份，曾經實際上獨立了幾年。它是全中國配備最簡陋的軍隊之一，但它的戰鬥力——如一九三三年長城之役所證明的——可不是可以忽視的。全體兵士和少壯軍官尤其堅決「抗日」，他們有一長串的恥辱要報復。

雖然如果日本傾注全力來攻，北平是幾乎一定無法守住的，但這個決心要保衛的城市，怎麼沒有守上幾星期，甚至幾個月，這卻沒有理由可說。它不像上海那樣處於日本海軍大砲的直接射擊之下。即使攻擊者能夠轟裂城牆的話，一九三二年閩北巷戰的前例可表示出：在那些情形之下，只有輕武器的中國軍隊能成爲非常精銳的。

在人人知道事實如何的現今，上面這些推論許會顯得瑣屑無聊的。劇戰一天之後，正規軍隊退出了城，城內便不再有抵抗，陷入敵手。關於這次可恥的淪陷，我們在這裏提出幾個原因，許是有用的，因爲這些原因正好說明中國抗戰初期的一小部份非常顯著的弱點。

我回到北平之後不久，在一個中國朋友的家裏，我被介紹給一個穿白長衫，肩膀寬闊像一個職業拳

學家的高大人物。他們告訴我，他在哥老會和此外好幾個在中國內幕生活中佔據非常重要地位的祕密會社中，地位很高。他是完全「不談政治」的，無論照哪種現代意義講；但他是一個中國人的代表。

現在——他非常簡單地告訴我們說——他已經在河北南部組織了一萬個農民，他們全是那些祕密會社的會員。他們已在行進到北方來「打日本矮子」。但他們沒有軍器。好幾個星期，他在北平試要從宋及其他當地官員那裏領取軍器，但無結果。現在他就要到南京去，看看在那邊能做些什麼。

許多人民團體的領袖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也同樣受到拒絕。鄉村中的流動部隊，沿鐵路組織成的游擊隊，會使中國的防禦完全改觀的。但在那個時期，對於武裝當地的志願投軍者，任何種類的官方協助都沒有。

馬德里在初受弗朗哥攻擊的那些齟齬的日子，抵敵住在技術上優越的軍隊，因為馬德里和整個西鄉的人民都為他們自己的防禦而組織好和武裝好了的。北平（後來，南京）失陷，多份因為它們只由正規軍保衛。要直到中國新舊兩個首都全已失陷之後，中國政府這才學得這個非常必要的教訓：抗日戰爭必須是全中國人民的民衆戰爭。

現在城牆下面隆隆作聲的風潮，不久必定驟然狂起，這是顯然的。但中國當局依然低估着局勢的嚴

重性。

七月二十六日夜間，大約三百個日本兵，試要強入張儀門。他們自稱日本使館衛兵（已經增加到比辛丑條約規定的數目超過許多）的一部份，城頭上的中國兵，相當鎮定的，爲日軍開了正門，隨即趕快在他們背後關上了門。這小部的敵軍便這樣被關牢在外城門和內城門中間，立即發見自己團圍被圍，而且衆寡懸殊得無法可想。

這樣一個情勢中，確有許多事可做的。中國兵開迫擊砲和擲手榴彈來取樂。日本兵找到一所小廟作爲掩護，非常無用地用機關槍來回報。到早晨，除了屈服以外，什麼都救不了他們，是明明白白的。

但中國司令又顯出足以證明他們誤事的那種致命的無決斷來了。有着天賜的把這敵軍繳械的機會，他們卻不僥倖接受停戰，還讓日軍帶着軍器行進到東交民巷裏去。他們是應該失敗的，這是目擊這事件，把來敘述給我聽的那個美國新聞記者的評語。如果中國兵是屈洛依（Troy）之圍的守衛者，那麼依我們可以設想，希臘人也無需乎一隻木馬了。

就是下一天，宋拒絕了日軍的「二次最後通牒」。當天下午，我在一個來觀光的劍橋大學教授的寓所，他——像我們大多數人一樣——覺得難以學院式的寧靜來看最近的發展的。我們談及裘里恩倍兒

(Julian Bell) 在西班牙的慘死；我記起最後跟他一同坐在他小小的快艇裏，駛行於武漢的湖水之間所過的那些晴明的日子。

『這似乎是很大的浪費；但他覺得他必須做一點事。倘使他留在中國的話，仍會是一樣的。這是同樣的戰爭呀。它要把我們找了出去的……』

一個新到的人——一個法國人——優雅地走了進來，手指弄着一張透明的信紙。『我們的使館召我們大家去。是的，最遲今夜去。』

『你要去嗎？』

他聳聳肩膀。『我想去的吧……』法國人都是實務家，在華北總是消息靈通的。如果他們在召集他們的人民，那是有點意思的。

談話更自由地滔滔出口，雖然各人都有些心神不寧的。『滑鐵盧的前夜……』『是的，但是想北平的日軍吧，他們要把這城市弄成什麼呢！一個「小東京」……』『中國的困難是，它太古老了……』

『好吧，我不離開我的願，』一個慣常歡喜談論的美國教師斷然說道。『我希望中國兵打它一下。』他是那麼熱誠，以致他幾乎潑掉他的混合酒。

這是星期二晚上。下一天早晨，整個北平都被恰在南城外面的隆隆炮聲無禮地驚醒過來。

宋有一些軍隊在城裏，但他的兩個主要屯兵處是在城外南面和西面的軍營裏——一是「西苑」都在北平郊外，日本開首攻擊的，就是這兩個地方。兩個軍營都是死的牢籠，守軍不假思索地立即把西苑放棄。但南苑方面，對於飛機襲擊既毫無掩護，又沒有比迫擊砲和機關槍更為精銳的軍器，中國兵守了一整天的陣地。

城內，從最初告警起，我們便不大知道出了些什麼事。坐人力車和運貨車急急派出去集合外僑到東交民巷裏，許多人都勉強去的，但僑使巷戰已起，那可很容易被截斷在北平的狹胡同裏的。

東交民巷平常的外交式的冷靜，一變而為大陸的銀行假日的熱鬧，誰都沒有猜到過城裏竟有這麼多的外僑。篷帳張在使館的草地上，以前從未有過這麼一個奇特的園遊會的，不整的夏裝儼然有浴裝遊行的樣子。困疲的傳教士們帶了龐大的家屬而出現，俄國舞女們——她們的要求保護，無疑是根據以往的交際——把秋波送與那些美國水兵（他們和孩子們彷彿便是僅有的真正自得其樂的人了）。連全北平最著名的那個隱士也在許多年之後現出了世面，戴着一頂愛德華朝式草帽。許多出生於香港和夏威夷的中國人能够自稱是美國國民，是另一個意外。也許自從義和團時代以來，從未有過這樣目迷五色

的各種民族和行業會集在東交民巷的城牆裏面。

那天一整天和接着一大夜，戰爭在城四週繼續着。東交民巷的大門在日落時關閉，但直到這時仍可以出入的。當然，空氣中密佈着種種難以證實的流言，而中國人在每一架高飛的飛機的兩翼上看見了青天白日。空軍的因素也許有決定的作用，這已經是明明白白的。

那晚上，中國人得到了他們第一次真正的激勵。北平官方的無線電廣播宣佈，說日本在鐵路交叉點上的軍事根據地豐臺和日本冀東偽滿政府首都通州，都已被華軍克復。這消息好得幾乎叫人不能相信，但這決不是不可能的，如果中國軍得到果斷的指揮，在各方面取得主動。在這時期，他們的數量仍佔壓倒的優勢。

對於聚集在一個本地通訊員的辦公處裏辨別流言的真偽的我們許多人，星期三那天的高點，是在一個大家知道是南京政府代表的官員進來的時候。他的面上帶有勝利的微笑。「好消息！」他喜躍地宣佈道。「蔣介石將軍到了保定，他從南方派來了一百架中國飛機！」

人人都幾乎歡呼了一下。如果這消息是確實的，那麼日軍會發現他們最近的勝利要比他們的預計更為困難了。那是中國人樂觀的最高點，在那些日子是總歸預備好往上快算的。我們各還各的使館去睡

覺時時爲機關槍聲和迫擊炮聲所驚醒。但下一天我們知道得清楚些了。

因爲星期四北平醒來，異樣的平靜。所有開火的聲音全已停止，除了河那邊向長辛店去的一種隱約的隆隆炮聲以外。一早走出了東交民巷，我看見灰色的軍裝已經從城牆上消失。城門開着，一小羣人力車在進出。

接着我們拿到了報紙：已是最後一天發刊的北平新聞（Peiping News）宋——含淚而去——已經退出了北平。將由張自忠來接受冀察政務委員會的領導地位，張是變化多端的華北竊面上忠心最難估定的人物之一，他這時做着天津市長，以「親日」出名的。

故都之「圍」恰恰經了二十四小時，在北平的降服和出賣的悠長歷史之中，北平又被出賣了一次。

三 壯烈的反正

北平是全都完了。但就在這同一個星期四——七月二十九日——河北別處地方可多事。出事的兩個主要中心地是通州和天津。

通州在北平之東約十二英里，是運河的舊終點，一九三五年以來因爲作了殷汝耕——一個得到了（如果有人得到過的話）『漢奸』這個最污辱的綽號的中國人——下面『冀東反共自治政府』的『首都』而得到了一些臭名聲的。繞由關東軍所創造了的這一個傀儡組織，是即在一九三五年夏何梅協定爲日人一個新的『華北自治』運動開好了路之後，成立在冀東二十二縣中的。

塘沽協定之後設立的『非武裝區域』之內，這個新傀儡組織自它成立起便有一批精銳的日本駐軍，以通州爲中心。但秩序的維持却正式授之於附設的中國保安隊，保安隊都是在本地招募，由日本軍官訓練，經常受着『反共』教育的。這是日本軍閥希望後來用於他們那些遠大的征服計劃的『反共軍』在華北的一個開端。

冀東政權在它短促多變的歷史中的主要聲譽，是作爲不僅在傀儡政府默許之下而且簡直在它指揮之下進行的大規模走私活動的根據地，華北海關簡直不能對付這個情勢，因爲日本貨物在山海關下

海濱卸下的，可以由陸路穿過殷汝耕的地方而到平津。走私者獲利最大的貨物是麻藥，『滿洲國』製造了，大批運到滿州的海洛英，是由日本帝國主義陸軍的著名先鋒浪人和高麗毒販分派到華北各地去的。

殷汝耕（這是華北在公開歸給日軍統治之前那些怪有趣兒的『寶貨』之一）同他的日籍老婆如此這般地住在北平，只有辦公時間他才留在他的『首都』。雖然南京政府會下過通緝他的命令，宋哲元可是一個太過狡猾的官兒，不會想去執行這個命令的。但宋有他自己的三十九旅的一分隊兵，就駐在通州城外殷地的西界上。而這裏，在去北平的大路上，中國兵隊和日本兵隊隔路相向了好幾個月。

七月二十七日，通州四週開始發生事情，無疑地預料着要大攻北平，日本駐軍的司令限中國兵在三小時內解除武裝。經後者拒絕，就此打了八個鐘頭，日本砲兵把這些只有輕武器的中國兵大轟一場。宋沒從北平派去援軍，被轟得一塌糊塗的中國軍隊中，大約只逃跑了一百個活人。這是通州這齣戲的第一幕。把情勢弄妥帖之後，日軍只留下一小隊幹部駐在通州，便調去參加下一天的大攻擊——即是攻擊北平四週宋部的主要陣地。到星期四早晨，（如我們所已看到，）北平城已在他們的掌握之中了。但在那同一個星期四早晨，——這是這小小一仗中最動人和最意外的反正——通州重又入於華軍手中了。

保安隊爲我們星期三下午在北平聽到，說華軍在別處大勝的那些惡作劇的報告所激發着，他們在冀東各處叛變了起來。在通州，在他們自己的中國司令張慶餘指揮之下，他們給那少數的日本駐軍一個襲擊，並把他們完全殲滅；留在那裏的日人和高麗人（大約有三百之數）也大多被殺。傀儡政府全部的日本建築和辦公處都遭搶劫和燒成平地。從瓦礫場中升起來的煙柱，那一整天都能從北平城頭上看得清清楚楚的。

這是著名的「通州屠殺」，它已成爲日本歷史上一個「凶日」，把英國在「印度叛變」Indian Mutiny）後若干年中德里（Delhi）和康普兒（Cawnpore）那樣的名字跟它聯在一起。

公平地評論星期四那天早上的那些事件，也許是不可能的。沒有人會——作者尤其不會——爲殺戮婦女和平民而辯護，不論殺戮的原因何在。但現在仍有不少誤解關於通州的叛變，這叛變在日本官方報告中是稱之爲「妖怪和獸類」的行爲的。日本報告中所細心地漏去的，是所以引起這次絕望者的叛變的原因。

我們必須記着，所有在通州的日本國民，都是公開地或間接地爲那人人痛恨的「冀東」政權所雇用的。高麗人大多是走私者和毒販子，高麗女人是不幸的，也許又是被迫的，隨軍妓女。冀東整個「日本殖

民地」可以毫不偏私地說是田軍部代理人和其家屬，以及可疑的冒險者所組成的。就是這一批以日本華北駐屯軍爲靠山，以漢奸爲爪牙的少數外國人，他們能把這整個區域控制了兩年，強給了它一種敗壞名譽的和（由於官方發動的私販毒物）貶降品格的異族統治。

對於這整個傀儡政權的憤恨之深，是可以正確地從叛變發生時的狂暴上面測知的。我們不可忘記：叛變的動機，原是日軍除了突然要求無條件屈服以外，別無警告，而向當地中國駐軍進行一次毀滅的轟擊。

那些從星期四早晨通州的大屠殺中脫逃出來的日本人，他們的得全性命，全仗忠誠得少有的中國僕人，他們把日人改裝了夾帶出城，在這裏又是——快過去帶有的（尤以義和團時爲最著稱）那樣——冒了自己生命的危險去盡忠於外國主人。但「政府」官員中只有一個——一個最不應該的——沒有死。這便是那混蛋的嚴汝新，他卑鄙地躲藏在一個朋友家的樓上。他被保安隊拖到了地上，立即被捕（他沒被順手槍斃這事實，證明叛變者中還有相當紀律）而當一切在通州完畢時，他在他自己的車子裏被押解回北平。

這裏有一個猛烈的驚駭在等待叛變的領袖們。他們當然以爲一定見到北平仍在二十九軍的手中，

打算把那大傀儡交給宋哲元，受軍法審判。可是不然，他們到東門却發見它由在日軍命令下行事的北平中國警察把守着，警察不給他們進城。在混亂中，只有殷本人（他最起碼的懲罰是一粒子彈）溜進了城門；叛變者迫於他們同胞的鎗械，或則被懲了械，或則聽其落田逸去，企圖復歸中國軍隊。

這是一個頂頂悲劇的逆轉，對於一個——即使結局怎樣流血——至少大膽地設想和實行了的企圖。那個嚇呆了的傀儡政府頭領也許妄自以為他一進北平城便會安全的，可馬上發現自己在日本使館裏又作了囚犯，罪名是未能約束自己手下的保安隊，這真是一個無上的譏諷。

在那命定的星期四，天津也發生着許多事。日軍在這衙要這城市裏已設有鞏固的防禦工程，而且因有一個「親善」的市長（張自忠兼任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在宋哲元突然離去之後接管北平）他們以為貼鄰一帶不大會有積極抵抗的。但這裏他們又犯了一個嚴重的失算。

因為在天津，通州的事蹟又重複了一下。中國保安隊自動參加鬥爭，跟張手下各部隊並肩作戰，奮力作了一天英勇的戰鬥。他們佔領鐵路的西站，幾乎攻陷主要的東站；一路力衝到距離日本軍用飛機場——上兩天一切爆炸行動的中心點——二百碼以內。日軍的支配天津——一個缺不了的軍事根據地——猶在未決之中。

在星期四夜間，（經天津一個日本官方發言人承認的）日本華北駐屯軍的地位是非常危急。他們和他們四散的部隊失了聯絡（這些部隊過於急切地推前去攻北平），背後這一個突如其來的攻擊幾乎完全出了他們的不備。鐵路已被華軍截斷，華軍只要乘機推進，便會在這時期把日軍一直逐回塘沽。

但是兵士的不願生死的努力又被上峰出賣了。老毛病——不統一的指揮和政治上的不一致——真是太顯然了。亂打了一天。給中國人以夢想不到的勝利的希望之後，天津的正規部隊（像上一夜北平的部隊一樣）向南撤退了。巷戰得精疲力盡，因無助而沮喪的保安隊，便散往四鄉，或者交出了軍器。

二十四小時之內，整個景象都改變了。日軍又做了鐵路的主人翁，能運進那些已從滿洲急調了來的援軍了。被空軍轟炸和密集砲火所糜爛的天津『華界』成爲一片黑煙瀾漫的瓦礫場，在天津和通州一帶留待侵略者做的，只有在東京的至急公文中所得意地稱爲『清除』的那種工作了。這與通州屠殺那樣的『暴行』分別只在於給與那些執行者的規模更大而已。

現在通州中心地點有一個大理石的紀念碑，紀念冀東叛變中損身的二百八十個日本國民。通州和天津的保安隊——這些穿軍服的苦力，他們爲了國家把鎗口掉向敵人，他們一往直前的勇敢幾乎是宋哲元在北方掀起的滑稽化的抗戰中唯一可取之點——這些人可並無什麼紀念物，除非在他們同胞的心頭和腦中。被軍事司令所捨棄，被他們北平自己的同志所出賣，他們像耗子一般被追殺在高粱田裏，他

們的墳上是沒有名字的。

他們敢冒他們自己的政府還不願冒的危險，他們之中太多的人因此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但爲不久便發展起來的更大的鬥爭作了中國人民真正的前衛的，便是他們以及二十九軍的兵士。

他們在那血厚的星期四所盡任務的真正意義——但願日本人能覺察它——是極其駭人的。因爲在通州和天津這兩個「安全」區域中，就從那一批他們已經置於自己仁慈的「保護」之下的中國人那裏，這些侵略者才遭遇到七月那幾天的最猛烈的抵抗。換言之，日人在河北佔據得最長久的地方，中國人的反抗也最堅決。

這對於北平的新的統治者可不是一個好兆啊。

四 古都的淪陷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使宋哲元在僅僅兩天前的反抗之後突然變卦的呢？七月最後那幾天的內幕情形，以及南京北平之間所有軍事保證的正確的性質，我們也許永遠不會全部得知的。中國官方的見解是：宋本來命令不戰而退出故都的。當他不願及此而拒絕日本「最後通牒」時，他自陷於獨立行動了。但卽在這時期，蔣介石將軍也答應給予援助，如果宋能支持二十四小時的話。

彷彿宋哲元對於南京和他自己的判斷，二者都不信任。既然開始大膽進行之後，他一到看見他前途所在的時候，可立即發作中國舊軍閥的那種致命的「臨事感慌」，離開他的職守了。二十九軍爲他的猜疑不決而出了代價。

這代價究有多少，在星期四早晨到北平南城外可以看到的。

南苑的駐軍被日軍攻擊得粉碎。沒有掩護，交通線被切斷，除了原來的「抵抗」號令之外不再有其他的命令，這樣他們星期三整天留在他們的泥濘之內，任受重炮的密集射擊和空軍的轟炸。他們損失的總數是無法計算的，但也許死者在五千人左右，傷者絕少能保全性命的吧。

死了兩個師長，趙登禹將軍和佟麟閣將軍——這是宋所要的榮譽的犧牲。有近千的北平學生屯駐在南苑的軍營裏，未經訓練的武裝義勇軍——才在那個夏天投軍來受最初兩個月軍訓的——受到了猛烈炮火的洗禮；只有少數未死。遇難者中間有馮玉祥的兒子，他是一個年輕的正規軍隊長。南苑之戰最悲劇的形勢，是它的無可奈何——沒有高射砲的華軍防衛着一個並無飛機的飛機場。因為南方沒有飛機派來。

日軍的進攻計劃——後來又用在華北許多城市上的——是把中國陣地三面包圍，留出一條顯然的出路，他們能在那裏埋伏軍隊的。他們這次留的是從南苑到永定門的路。被一天的轟炸弄得粉碎，從軍事司令那裏再也得不到命令的華軍，終於不得不放棄南苑，裝滿了兵士從他們背後的積骨堂胡亂撤退的卡車和軍用車，都受到路兩旁機關鎗陣地的側面射擊。在某一個地點有八百個華軍屍體。歐戰的老兵宿將中，沒有人記得有過這樣的殺戮的。因為即使在歐戰中，任何方面司令的最拙劣的戰術，也不能跟宋所施之於其軍隊者相比的。

日軍在南苑的死亡據說是五十左右，這一回的數字也許是正確的。後來跟參與此役的中國兵談話，真是聽說一個傷心的故事。他們大多數連一個可以向著射擊的日本兵都沒看見過。飛機，射程遙遠的砲轟，和坦克車是他們的軍器，具有最最勇猛的心，拿了來復鎗或手榴彈，對了它們是無能為力的。可做的事

箱，惟有在夜色的隱蔽之下溜到田裏，設法逃入山中。

有幾個單獨的例子，證明二十九軍撤退時會有較好的表現。向西去的方面，中國砲隊把日軍抵擋得很久，能使殘餘的兵士渡過了河。天津的撤退很有秩序，絕少死傷。但整個戰事，從軍事觀點看起來，大抵是可悲的。北方第一回戰爭的榮譽，是壓倒地在於日軍方面的。

以相當篇幅來敘述這次北平的潰敗，似乎是值得的，即使只指出它和華軍後來從它學得的一切的一個對比。戰略的錯誤當然是明顯的；但還在好幾個月之後，正式司令長官們才學得不要在可避攻擊和無所掩護的陣地上集中他們只有輕武器的軍隊。在這時期，雖然宋放曠他的指揮，不履行任何他在責任上所應負的義務，但他仍能撐過面子，不久以後被任命為中國山東前線的總指揮，這是頗有意味的。

在政治方面，北平的教訓已經令人信服——雖然這些教訓，也要直到南京的大災變之後，才真正學得的。當地的中國當局沒有抵抗的真心——他們打消一切想要組織河北民衆來作自衛的努力，而當時候一到，便無恥地讓他們聽天由命去。兵士有抗戰決心，是可以通州和天津的保安隊的例子來證明的；如果北方的農民和工人從他們的領袖們那裏得了任何種類的幫助的話，如果他們甚至拿到那時省政府可以任意運用的軍器和軍需中的一部份的話，那麼那幾天的結果將會非常不同的。

實際上，北方抗戰，在這第一個階段中，沒有得到集合起一個民衆基礎的機會。北平從那最後幾個星期的不安又回復到它照例的「沒有法子」——這一句作爲自暴自棄或冷嘲的意思，許多年來表現華北農民的基本哲學的熟語——的心情中去了。只有在此後的幾個月中，在造成了冀東人民的決心的那些影響之下，從陷落以後最初數星期中開始出現的游擊隊的成長中得到新的鼓舞時，這種心情才經過任何決定的改變。

化了一星期在郊外迅速地進行「清除」工作，並把中國主要陣線向後推到南口這個軍略要衝之後，在八月七日星期日，日軍才正式進北平城。這是一個古怪的儀式。

整個早晨，警察和武裝衛兵爲日軍部隊清道。日軍從西南，穿過那些看不見一個中國人，家家在事前被搜查過的街道而進城。大遊行要舉行於東長安街，——便是中國皇帝設計好在他們紫禁城的門前從東運到西的那條長安街的東段。世界上恐怕沒有其他的首都能給征服者以如此壯麗的一個檢閱場了吧。這裏，沿着大使館的圍牆，在被義和團事件所擴展爲「洋鬼子」的馬球場的那斜坡的另一邊，聚集着北平全部的日人。商人和咖啡館老闆，穿長統靴的浪人和穿藍氈和服的「女侍」——這是一個當地全體的集會，即使不是一個非常可觀的集會。他們也許共有一千個，拿着紙旗，狂呼「萬歲」在那裏慶祝

最著名的「時間」的復仇中的一個。

歷史上只有一個人會率領軍隊侵入日本諸島。那是「大汗」忽必烈——中國和高麗的皇帝，在他壯年時做了世界所會知道的最寬大的領土的統治者。現在，在經過近七世紀之後，島上的人民正在作爲征服者而行進到忽必烈的首都中去。以前有過一次——在解去義和團的包圍之後的日子——日本兵和「聯軍」一道在勝利中行進過這些街道。但那是一個無價值的勝利。現在，是日本一國的勝利。而這一回——他們是否有所知道呢——日軍來長駐了。

慢慢地大遊行現形了。首先來了坦克車和裝甲車，在沿着兩旁植樹的街道上軋軋地前進時，捲除着地氈青。（我記得日軍去年的演習，那許是這次大遊行的練習。一個中國女學生在那猛衝的坦克車下面壓成了肉漿。）隨接來了騎兵隊，那些澳洲大馬，瘦而且醜，在一個中國式的背景上看起來不認得出奇。兵隊本身裝在美國製造的貨車裏來了，車子在樹底下聯結成一長列。在這一列的末尾是那少不了的太陽啤酒車。

這是軍事力量的一個赤裸的炫耀，沒有比現代戰爭的武器更爲醜惡的東西了。這些漆成褐色的坦克車和榴彈炮，對於那些驟烈的大理石橋，對於它們現在對着的那些紅色的淡紅宮牆，是一個侮辱。臂上

繫着顏色鮮明的「太陽」帶子，忙着他們複雜的照相機的日本新聞記者們，會把這看做一個勝利的華麗展密的，在日本人以外的任何眼睛裏，它會顯得只是一種污辱而已。

我和一小羣歐洲人立在王府井大街的轉角上，我們看着兵隊行進進來，心情非常複雜，但現在一個有鬚的日本軍曹叫我們走開。川邊將軍就要來對大遊行演說了，我們須得再立開些……外國人，在這種時節，對於日皇的代表們，是特別缺少相當的尊敬的。

「我們究竟在這裏幹什麼呢？」我們一羣人中有一個問道。『至少中國人還有頭腦，不看這齣戲。』

「喔，我可不知道。說不定有人丟一個炸彈……」

「在北平麼？沒有希望的。來吧，讓我們離開這裏。」

沒有炸彈。北平是太古老，太不結實，太無準備了。北方的人民，對於這坦克車和炮的行列，還沒找到答覆。他們逐漸會找到一個答覆的。

但北平在這恥辱的時刻，似乎又退回去求助於她那些上古的保衛武器：美和冷淡。無力擊退她最近的侵略者的她，至少在這侵略者勝利的時刻，可以把他們置諸度外。

在紫禁城可驚的屋頂上面，（當我轉身開去時）來了一架疾降着的日本飛機，從它經過的地方垂下了一些彩色的傳單。『東亞人民間之和平與協調……』

街上只有幾個人力車夫仰起無聲的臉望着。那些和平和協調的傳單，沒有離理際的，掉下那些金色的瓦筒上去了。

五 真是戰爭了

德國飯店的酒吧間裏，中央一桌上，一羣常來的德國人在擲骰子。在一個隱蔽的角裏，一個法國上等衛兵，對着一杯苦艾酒，和一個正昌飯店的俄國舞女一同坐在那裏。另一個角上——頗為寬外的——一羣穿藍長衫的中國人在細聲談話。他們爲了安全，並非由於愛好，而到這裏來的。

在這夏日的夜晚，門旋轉開來，走進六個日本浪人，腋下佩着自動手槍。他們高興得很。

「啤酒」他們的頭領高聲叫道。發個頭兒，威嚴得像一個太監，給他們斟滿了玻璃杯。角上那幾個中國人已經走避，這幾個新到的人立即把這一角佔據了。他們已經控制了這整個房間。

「這裏向來是一個愉快清靜的喝酒地方，」我的朋友生氣地說。「但我不歡喜跟眼前這些人在一起。你喝完沒有？」

「等着看消息吧，」我提議道。「不久就會到的了。」幾分鐘後，我們得到用打字機打的路透社新聞稿了。

「喂，上海情形好起來啦！中國飛機企圖轟炸日本旗艦……」那是南京方面第一次應用空軍打日本列這比一二八強多了。如果熱鬧始應用他的飛機——」

「——怎樣用法的？」一個美國新聞記者，帶着最新的電報剛好進來。「用眼睛瞧一瞧吧！」這敘述中國炸彈不幸掉在上海公共租界之內，平民因而死傷了近二千人。酒吧間裏譁然了。

「真是中國人！」德國人中有一個向人們說。「他們把炸彈投在離目標恰好兩英里的地方！多蠢的傢伙！」

「但如果這是一個意外事件……炸彈架子被高射砲彈片打着……呢？」

「Acht! (啊) 如果彈架被打着，炸彈便爆發了，Niicht! (不是的麼)！」

「不一定……」

「——爲了比德 (Data) 的愛，別開頭爭論吧。你看不出他醉了麼？」

「喔，不錯……」一半爲了戰事，一半爲了汗熱，大家的脾氣都有點溢發了。我們學了那幾個中國人的絕好榜樣，溜到院子裏去了。

在華外國人的一般感情，一邊慨嘆着青年而無經驗的中國空軍這個最不幸的初次襲擊，仍是同情。的。上海公共租界內掉落炸彈的事情，可不像緊接此事的日機故意襲擊英國大使的汽車的事情，或不久以後轟炸並用機槍掃射上海兩火車站裝滿中國難民的火車的事情一般，引起普遍的憤怒。但它所給與我們大家的最強烈的印象，却也許是一種新的醒悟：現代毀滅的武器能做出什麼事來。僅僅一個炸彈要

一千個人的命。而世界上人口最密的國家之一的中國，全無戒備地招受空襲。我們現在知道我們是一定要遭遇什麼的了。

路透社電畢竟下了適切的註釋：「……討論下午的事件時，一個露齒而笑的日本發言人說道：『現在，真是戰爭了。』」

八月十二日日軍的在吳淞登陸，和八月第三星期中上海四週戰事的迅疾發展，急速而有效地把大多數人的注意從華北前線吸移了開去。這是够自然的，因為上海是外人在華利益的主要集中點，而且那邊奇觀的戰爭動用了陸、空、海軍。自從一九三七年仲夏，直到十一月下旬中國防禦軍終於退出他們英勇不屈地守住着的陣地時，上海時時處於遠東戰爭中的中心地位的。

然而在有經驗的軍事觀察家看來，在任何研究了日本侵入中國的路綫的人看來，上海戰爭只能算是一種聲東擊西。它是一個够可怕的聲東擊西，是給與南京政府在蘇浙皖三個富有的既連省份中的經濟基礎的一個直接打擊。無疑的日方希望他們可以用恐嚇上海的銀行家，工業家和巨大的商業利益這一個陰險手段，而傾覆國民政府的抵抗和加速中國普遍的崩潰。但這並不改變這個事實，即日本一九三七年的直接目的仍像一九三一年一樣在於北方。

關東軍的「滿蒙」政策——它主張總滿洲之後佔領蒙古，並向中國西北作一楔形突入以對付蘇聯——並沒放棄。（在日本正統的軍人頭腦想起來，整個的對華戰爭仍只是和蘇聯「無法避免」的戰爭的一個序幕。）早佔領平津給日軍以在北方再舉行動的一個便利的根據地。下一步一定是襲擊那衝要的南口（內蒙古的出入口）和沿平綏路向西進軍。在發動這些行動上沒有浪費時間，而日本最能幹又最有經驗的司令之一的寺內將軍負起了這個任務。

但南口一個優越的防禦地勢，可以——也確實——成爲難以攻下的地方。如果這時候蔣介石將軍得以自由把他最精銳的軍隊多派幾師到北方，那麼日軍整個襲擊綏的楔形突入便要受到威脅。日軍對於這點是知道得够清楚的，他們也知道：非到他們佔據了大部份的華北平原——至少南至第一條天然防線黃河——的時候，他們不能鞏固他們的陣地。這等於包圍山西山東和至少一部份河南；一個頗爲野心的計劃，如果華軍能把全力用於戰場的話。

日本在這時期必須防備的一件事，便是華軍在北方的一次反攻。因之，用了一種顯見的軍事邏輯，戰事擴展到了上海。

那個八月的上海的聲東擊西之戰是直接有利於侵略者的（這一點給一些人所忽視了。他們主張上海戰爭是華方一個微妙反攻運動，爲了希望使日本在這「國際」商埠和其他西方列強發生糾紛而

發動了的。日軍因爲用了小數的混雜隊伍，在海軍艦隊和海軍飛機的掩護之下在上海登陸，所以能把南京政府作戰和技術方面主要的手段都誘入這一條戰線，並把它們牽制在那裏，同時依照計劃進行北方的攻擊。這一個戰略是想得巧妙的，到九月中旬，蔣介石將軍最精銳軍隊中有三十萬以上都停滯在上海一帶，而日本陸戰隊的顯然不能在上海立足，是遠不及北方勢如破竹的迅速進展來得重要的。

日軍這個計劃的大要，到八月末，已經是明白的了。不論華中方面發生了些什麼事，而大家都承認上海南京二者都不能無期地守下去的。北方的戰爭仍是有主要的戰略意義。非至日本鞏固了華北的根據的時候，任何再向南方的進展可以證明爲虛妄的。

鄰接蒙古新疆的那幾省，形成了一個要害的區域。這一帶都是高原和黃土山地，經濟開發得不平均，人口最雜，一向以中國文化的老家而出名，注定了要在這二十世紀恢復它一些昔日的重要的。這是中國的西北，她到蘇聯的陸地上的橋樑。只要這座橋樑通行，軍需品便能繼續運到陝西省，西北總是華北一個抗日的堅強根據地。

除了它戰略上的重要性以外，還有別的事情使西北在這時有一種特殊趣味。因爲中國共產黨在那英勇的起自南方的「長征」之後，建立起他們的陣地的，便是在這裏，在陝北的荒山之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現在是南京政府治下的一個「特區」，公然對蔣介石將軍反抗了十年的舊紅軍，已經在「第

八路軍」這個欠熟的新名義之下，正式成爲中國國軍的一部份了。但在日本看來，這些富有意義的地位的改變是沒有關係的。西北總是「紅色中國」，一個政治兼軍略目標，無可避免地，當日本軍隊從北平推進想去征服華北的時候，他們一定要遭遇到這些可怕的敵手，曾經被一個日本將軍表明爲「帝國的主要敵人」的。這是一個有趣的力的比試。

戰爭已經過了北平，一夜之間便把我們割淺在日軍戰線後面。在這裏就下去是得不到什麼好處的。除非有人想要研究創設愧儡政府的現代特殊藝術。此外，日本警察不久還會開始問些不堪的問話。曾有一個雜誌名叫「Democracy」（「民主」）的，我和愛特伽·斯諾和幾個中外的自由主義者，都是該誌的投稿人。它是一個溫和的小雜誌，可在日軍進北平城的時候，就此突然一命嗚呼。但日軍（我們推斷着）原來是不喜歡民主的……

在南城下斯諾家那個悅人的曲折的花園裏，我們討論最近時局的變化。夏日的下午被砲火的隆隆聲所震撼，在西山，二十九軍的分散的隊伍依然在定下來抵敵。再向北方，日軍正在大攻南口，湯恩伯部下戴鋼盔的中國軍隊重又防守着長城的古臺。

戰爭在繼續着，中國終於打起來了。但我們可在該吃槍砲的這一面啊。

「我們從這裏到哪裏去呢？」我要知道。

「我到上海吧，我想。」愛特（註一）不大熱烈地回答道。通訊記者們大多已在坐車往南去了；在紐約倫敦，只有上海才有在報上作最大標題的資格。「但我知道我現在心裏要到哪裏去。」

「西北吧？」

斯諾點點頭。我知道他在想些什麼；已有報告傳到了北平來，說第八路軍已奉命開往北戰場去了。紅軍在作再度的行進了，這一回是以日本為對手。這是紅軍四年前在江西開始的一次行進的最後階段。

「現在這不是件了不起的事，」愛特說着。「但將要成爲一件了不起的事的。無論如何，我要預備到西安去。」（註二）音信全無——他的夫人，我知道，這時旅行到陝北去了——「這是另一個原因。你爲如何？」

現在深入內地去，就等於去碰被截斷在那裏的機會。中國的交通正在固定地被戰爭所阻隔，連要跑出北平也不會容易，有日軍在控制西面和南面的鐵路。惟一通行的路是經由山東，現在仍舊可以從天津

（註一）即愛特爾·斯諾的親熱稱呼。

（註二）不格（Peggy）是不及·斯諾（Peggy Snow）——即斯諾夫人密誤·韋爾斯（Nym Wales）女士

的親熱稱呼。

由海路到山東去的。天天有幾千個中國難民從平津到南方去，走的便是這一條迂路。

但鐵道是直通到西安的，而西安又是西北的會合處。

沒費多少時間便決定了。倘使我要多看到北方的戰爭，（這戰爭已經開始，使中國損害很大）那麼要跟第八路軍在一起。

第二章：到延安去

第二章 到延安去

一 繞道山東

當我們從北平動身到西北去的時候，八月已盡，夏雨已過了。

那年的雨，華北各地都下的非常大，好像天對於故都的淪陷也大流同情之淚一般。對於華軍，這等於一個最受歡迎的休憩。日軍的前進，沿着那些物化的皇帝所築『好十年壞千年』的道路陷入了泥中的，告了個意外的停頓。全部機械化部隊牢牢地陷住在黃泥之中，對於少數出來搶救一些他們被毀壞的收穫物的極大膽的農人，成爲了一種奇觀。運河一帶，退着的華軍因爲有了水路，以民船這種新工具便利地移動着。

鐵路仍是日軍惟一有效的『支線』，他們儘量運用它。有南滿鐵路許多資產來助他們，（除了他們從中國車輛中奪去的以外），他們在運輸這事上得到了絕大的利益。兵車，軍需車和醫療車從北方亂蹣着到來——而且在白天到來的，因爲這時還沒有一架中國飛機飛到北方前線去。一批多得可怕的大砲，

馬匹和美國貨全數運貨汽車的貯藏物，屯積在北平四週，以備華北的反攻。

跟這一切軍事活動相對應，每天只有一班客車從北平開往天津。車在天亮時開出，這道好可以在日暮到天津——平常兩小時光景便到了。當它通行期間，它也許是世界上最擁擠的火車了。

我們很早（據我們想）到了車站，預備用盡全力趕這一段路，但第一眼打量到那「天津快車」便有點喪氣了。半個北平好像都在那邊，在我們眼前。「我們爲什麼買了頭等車票呢？」鄰座厭惡地問道。有一節頭等車，但那是留給日軍的。其餘幾節車已經載了大約二千個趕路的人，人還還在迅速地增加着。

「是有一點不必要的……好，還有防衝器（註）和車頂哩。車頂上地位多些，但天氣要熱的。」

我們選定了防衝器，把自己升起來，在兩節三等車之間處於一個險要的地位。兩個車臺都已經被中國難民所佔據，他們帶了合家的包裹定居在那裏。他們中有一個把一袋麵粉擡在接軌上叫我們坐。「那是一個壞地方，」他警告我們道。「火車開動時非常危險的。」他用活現的手勢來表明我們的腿可能有的遭遇，接着好像來步魁似的，抓了一把瓜子給我們。

火車站已經儼如瀟陽了。一個發音重濁的擴音器現在用日文來對我們說話，顯然是爲了那些穿制

（註）防衝器內部裝發條，有彈力性，裝在車臺前後，以緩和火車重輾前後衝撞的。

服的矮胖職員和拿着文書包的方正的小紳士（他們已開始出現）的好處。這些便是北平新的統治者，在帝國的事務上像螞蟻一樣活動着的。

我們準時從正陽門開車，這事把我們的希望提得過份的高。五分鐘後，火車停了，移來才證實還有一連串叫人受苦的停車，這還是第一次。在極其縱橫交織的又路上，一個單獨的引擎在試開到北平去。否則也許是那兩個開車的日本兵不過在把火車玩兒而已。一個鐘點之後，他們玩厭了；引擎在支線上駛了開去，於是我們慢慢地前進。

我們擁擠不堪的車廂上變得非常熱了。但我們至少比車廂裏的人們處境好些，每次車停，我們下去沿鐵路繞散步。我們發現火車末尾有一節關得密密的車，神祕地由中國警察保護着；一個多說多話的火車侍役告訴我們，說那車裏有某一個中國將軍和他的家屬。這個享特權的旅客似乎在中國國營鐵路上有個位置的。我們有些滿意地觀察到當一羣日兵後來上車來時，他們對於將軍的那節專車，並不給與什麼尊敬。

我們穿過的是一個荒涼的鄉間，綠的田野在眩目的陽光下寬廣而荒廢的展開着。但每個車站都有日軍駐着，通常都在屋頂上配置一個守望。於是「他媽的」我們同車的一個旅客不覺叫道，指着車下。我們看見那裏的農民全都離去了。

中國苦力的工作隊，受武裝日本衛兵指揮的，在竭力割下鐵路兩旁的高粱。這是一個警戒方法，仲夏間長城的高粱給與游擊隊和便衣隊一個完美的掩護。對於河北的農民，這是第一次嘗到他們所已蒙受的新的統治。被日軍鎗上的刺刀所威嚇的他們，正在被迫着割平他們自己許多里路的高粱，恰在它成熟之前。這一帶鄉間迷過了戰爭的蹂躪，僅僅要來受一次新的「和平」的蹂躪。

天津，我們在黃昏時穿過一排學校和工廠的瓦礫場而到達了。這一片荒涼中最悲傷的所見，便是本以自由的經濟研究的中心著名的南開大學的殘址。在這裏，侵略者對於在天津四週短期戰爭時的砲轟校舍，認為未足；經砲轟而殘存的，被一批毀壞者弄了個完。有許多未了宿怨要報的日軍，把南開徹底幹了一下。

東站也負着戰爭的傷痕。在這裏，當我們一車精疲力盡的人頭出清到一個欄煞的月臺時，每個旅客都得經過一隊探子的精細檢查。只有兩百碼的地方，把天津的鐵路終點，跟外國租界分隔了開來；但那一狹條敵軍佔領地，如我們所知，已證明了是許多北平難民的遭害處。

現在，當我們看望那車站進口時，日本守軍出現了，帶着一羣中國青年。男女青年穿着鄉下粗衣，他們仍分明保持着那種知識份子的風采。也許是學生們……他們被押帶開去了。

他們是不幸的。我們爲那些女的難過得很。

天津沿河一帶外觀動人的高大的西式建築——五國的銀行、公司和輪船公司——看起來像平素一樣的穩定和繁榮。在一個外國租界裏面，人們是在一個西洋帝國主義的堡壘之內，它在患難的時候使人便於起一種安全之感的。但我不知道，這個堡壘對於日本新的壓迫，究竟能够抵擋多久呢？這些障壁可以很快變得像北平那些被擊壞所包圍的宮殿一樣無效的。

我們到輪船公司辦公處去辦理買票到青島的手續，在這辦公處外面，我受到一個未穿外衣的學生的熱烈招呼，他緊握我的手，把我領到一個貨棧，那裏寄住着幾百個北平大學高中的逃難學生。我們中有許多處境窘得無望；我們有極少的錢，而出租開往南方輪船上的下等艙位的買辦，連艙位票子也在狂討高價。

「你到了南邊做什麼事呢？」我問他們。有十多個不同的回答。有些打算去投軍，但這些裏面最英勇的志士們，却已經跟北平西山一帶活動的第一批流動部隊有了接觸。（有一部流動部隊——這是中國人自己軍佔領北平以來所做的最有膽識的事情——打進西直門附近的地方監獄，釋放了大約四百個政治犯，把監獄庫房中的軍器分發給他們，而在夜色的掩蔽下逃入了山中去。）這是學生們所切望着的那種行動，雖然他們中少有人够堅決的自己來創行。

幾年來，中國學生一向是國內要求積極抗日發言最多的份子之一。人們大抵對他們有一種責難，說他們不過口頭說說而已。但一般說來，我們必須承認，他們非常良好地應付一個戰爭局面。有着比中國社會中任何其他部份更多的責任感，他們在戰爭的這一時期的主要問題，是爲他們熱情的信仰，尋求某種實際的表現。而在以後的這幾個月，逐漸增多地，他們要尋求到這種表現的。

天津的這一羣是可以作爲代表的。他們中大約有一半要趕到長沙「臨時大學」區，或內地新設立的學校去。他們可以在那裏繼續研究。這一個大中學校向西的遷移，將把一種新的知識生活，帶到中國遼僻的省份去。它不會不激起中國廣大的內地的政治覺醒的。但有許多已經決定，他們已讀够了書本，正要設法直接參加戰事工作。動員中國人民來從事對日最後鬥爭的這個偉大任務，擺在他們的面前。它給與這些熱烈的青年宣傳者以一個新的開端，一個在他們同胞大眾中工作的機會，這是二十年代中革命的那幾年以來所不存在的。

這一隊之中有一個瘦弱而神經質的青年，我認識他是以前北平學生聯合會的一個活動份子。他已是再度的流亡了，因爲他的家——一九三一年以前的——本在滿洲。他的臉未到年紀已多皺紋，他的眼中有一種狂熱的表情，但他的聲音現在抑制着，也堅定。我問他到哪裏去。

「先到山東，」他說。「我要在那邊試幹動員民衆的工作。隨後也到山西……你到南邊去麼？」

『到中國陣綫的後方去，』我告訴他說。『我們許會再見面的。』那時我沒知道，在後來的幾月中，我究竟要看見吳多少次。

『天不給我們風暴，』我身旁那個青年教士說道，『否則海上要損失更多的人了。』他本人曾在一艘走中國沿海的輪船上做過大副，所以該知道他在說些什麼。『你讀過康納特（Conrad）的小說颶風（Typhoon）沒有？』

從那為房艙客人防備海盜和下流的槍面旅客而釘着的鐵欄後面，我們下望到這『海口』號船的槍面木板上。在我們下面盤旋着的，是一個人的漩渦，那裏幾百的難民在動臂起重機和絞動機中間尋地位來鋪開他們可憐的窩窩，或築起禦風的藩柵。全部家人傷心地坐在那單個的包裹上，包裹裏藏着他們全部的家庭所有，精力強旺的小脚老婦們，爲了優越的地點大聲爭吵着。因爲艙面每一碼空間都已發賣出去了。

『老中國，』我的伴侶在說道。『老中國——是她最壞的過錯。你會以爲買辦和管艙面的，對於這些可憐的顛沛流離的人們，至少要有點同情的吧。但他們沒有同情的，如果還有可以多賺幾塊錢的機會，當中國人學會爲公共着想，以代替人人爲自己打算的時候，他們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民了。』

他是，我知道，正在回到河北一個恰當日軍進路的鄉下小站，去盡他所能，保衛他自己的中國朋友們。這便是保定有幾個外國教士因而犧牲了生命的那種行動。

「但這些事情一定會在像這樣的一次患難中改變的吧？」

「也許會的吧。這是中國惟一的希望……」

烟臺是遼東半島北岸一個無生氣的小城，是美國駐華艦隊的夏季駐息地。我們在這裏上岸停了兩小時，到海軍青年會吃美國冰淇淋，同時看看山東在怎樣應付戰局。

重見中國國旗飛揚是算一件事的，但我們對於烟臺的防禦得不到什麼好印象。壯觀的沙袋沿海濱大道堆築着，但不很會有日軍或任何別人要在沙袋下面便利地登陸的。同時，當地的兵士們却頭坐在陽光裏，用了最大的無關心搖身體。他們已經幾個月沒領到餉了。

「此地司令官得到防禦烟臺經費二十萬元，」一個外籍居民告訴我們說。「他把這工作出十萬元包給他的一個朋友，拿了他扣下的錢退還了。我想，他的朋友一定是一個建築家，所以有那一切沙袋和水門汀。但寶相是不壞了……」

「他們買了砲沒有？」

「砲臺裏有幾個好的老古砲，但它們許多年前早已鏽了。還彷彿有兩架高射砲，但有人發現照準機，幾乎跟砲身一樣價錢，所以他們只買了砲來省錢。只有砲身，他們當然是毫無用處的。」

又是「老中國」山東省主席和軍事獨裁者韓復榘大家假定他有一支頗有效率的軍隊的，但這不是一個很有希望的榜樣。韓將軍，像他的知友宋哲元在北平一樣，多年來靠著他生成的機智，支吾着日人，但那可不會再幫助他許多時候了。這時，山東仍未遭任何嚴重的侵襲。韓復榘爲他自己博得這個暫時的緩和是够聰明的，但他的聰明，在一切有關者看來，終於是過了頭了。他以叛國正法，以勉他人。

從海起，青島是什麼都沒有中國氣味的。這些紅瓦的別墅使人想起德國南部；德國教堂的雙塔聳起在天空。以前這個興榮的城市什麼都是德國式的，正和俄國旅順租借地和英國威海衛租借地相對。德國人建設青島，造鐵路到青島背後的富庶的省界內去；但日本在歐戰期內奪佔了去，那以後膠濟鐵路便成爲日本的勢力範圍了。

所有日本國民都已從山東撤退，當海口號把我們放下在一個金合嶽涼爽的樹蔭下鋪圓石子的碼頭上。我們乘了馬車，一路得得的拖到我們的旅館去，穿過的街道兩旁排列着日本店，全都緊閉了門，由中國官廳正式加了封的。光是日人在青島的財產，價值約三萬萬日圓。這是上海之外日人在中國最大的

投資。當時火急的問題是：那麼，中國人把它怎樣處理呢？

我們那一天把這問題問青島市長 沈鴻烈，當他溫和地坐在他俯臨海灣的市府接待室裏的時候，中國海軍上將是比中國陸軍將軍來得罕見的，他們往往在政治手段方面，要比在海軍演習方面，經驗豐富些。沈鴻烈不是例外：這位穿一套胖哩噉西服和絲襪衫的臉兒光潤的胖官，幾乎沒有一個海軍人員的氣概，雖然他曾在英國受過一時海軍訓練，但作為一個外交家，他是最出色的。

「日本正從華北和上海兩面侵入中國，斯諾率直地堅持道：『中國政府想要沒收這筆敵方財產不想呢？』

但我們無法使沈上將有所改變，他客氣而不可捉摸地閃避了兩個鐘頭。『中日未曾宣戰，』是他那些回答的主旨。『同時，我們擔保外國投資的安全的。當然，我們說不定會發生什麼事，如果日軍要攻青島……』他妥適地向後坐着，啜飲他的上好茶。

四個月後，在南京陷落後不久，青島以這樣的新聞跳入了報紙的最大標題，即是：那些值價的日本工廠，已被『中國使衣隊』所炸毀。過了不多幾天，就有日本艦隊開進海灣，一隊海軍陸戰隊把這山東港口作了個『不流血的佔領。』青島市長失了蹤，那總之是意料中的。

這個最後破壞青島日僑財產的消息，我是在陝北山中一個偏僻的司令部裏，從日本無線電中聽到

的。東京無線電報告者的聲音因憤激而發了抖，當他敘述最近的「中國暴行」的時候。我那時想起圓滑的沈上將，和他謹慎的正式擔保。在中國人仍握有討價還價的權力的任何情勢中，他們永不會完全吃虧的。

二 重臨西安

但山東在那九月裏是幾乎消沉到了極點。在日軍在河北山西推進着的這幾個可稱休戚的月份中，這一省應該是北方戰事準備最活躍的根據地的。代替了這樣，韓復榘却宣說了些效忠國家的神聖誓言，一事不做。

這一種因循的，甚至故意阻難的心地，反映在濟南省城裏面。韓私下裏打算同樣欺瞞南京和日本；他跟兩方都有連絡，雖然他真能永遠效忠的，惟有他自己的利益而已。他這時，在濟南，身邊召集着一批北方超等的聲名狼籍的英雄豪傑，他們大多數都是他自己帶得着一點親戚關係的人。

當然，有宋哲元，但也有宋的繼任官。那個變化多端的張自忠，他在北平跟日人在一起了一個星期之後，發現步調太急進，坐在腳踏車上莫明其妙地逃掉了。前北平公安局局長石友三當然是屬於同一類的。濟南惟一堅決的「抗日」領袖是于學忠將軍，他是張學良部下策動西安事變的一個主要人物，現在從中央政府受到指揮全權而回到了山東。于正在拚命設法把他自己的軍隊調成一個監督的地位，希望張追韓復榘表明他的真意，但這是一個空望。

這裏的讓步是太大了，像在北平一樣。整個氛圍中發着真實當局方面不忠不勇的臭氣；只有在省城

裏這一批老混蛋全被肅清的時候，才能建立真正的民衆抗敵戰線。當最後的災禍來到山東，日軍從濟南順鐵路直下的時候，韓復榘作了一次最後的爭權的企圖。他把大部份軍隊調出山東向西面而去，希望
在內地某處爲他自己劃出一個新的勢力範圍來。但他被部下軍官告密於總司令部，受軍事審判，槍斃了。
惟一可惜的是：沒有把他一類的人，多多的同謀處置，而且更迅速地處置。

這一切事都沒發生，當我們那年夏天繞道山東的時候：但事勢所趨是够清楚的。在中國某些地方——我們只能這樣希望了——事情一定正在趨向一個不同的進程的。

在山東八月的愉快的貪睡中，我們幾乎忘去了戰爭；但我們在津浦路和自東迄西的隴海路的交叉點徐州，又遇見了它。車站在那一天被日本飛機投過炸彈，大家預料還要來襲擊幾次的。至少，在這戰略上的要城，（爲了這個城不久便要打這次戰爭中最大的一仗的，）有一種軍事活動的新的活躍狀態。戴鋼盔穿茶褐色軍服的中央軍顯得活潑而有很好的配備。

整個的隴海路區域，是一個設防的區域。蔣介石將軍使用了依他德國專家們的獻議而準備好的現代防禦工程，（這種工程日軍知道得極詳細，）而期望在華中來一次大抗戰的，便是在這裏。我們下一天穿過的地帶——歸德，開封，鄆州，洛陽——將成爲日軍最後突破隴海前線之前，整個華北戰役中最劇烈

的戰爭的場所。這時，華方相信他們能够無期限地守住隴海線。當然他們在這裏，比在中國任何別地方有更充份的準備，來對抗日軍進攻的全力的。

我們的火車安逸得很，一天在一次空襲警報時停了一兩次。但還不致成爲那種老愛在每個山洞和隧道裏一停便是個把鐘頭的情形，這是戰爭後一時期所有中國火車的特點。第二天早上，我們到了西安，整潔精小的現代式車站。我們旅途的第一段是完了。

一年之前，西安是中國國外很少人知道的名字。一九三六年末，它因爲作了蔣介石將軍被他自己一部份部下扣留的出事地點，而得到了一個短時期的舉世聞名。但即在那時以前，作爲西北最大城市和中國計劃中「陸都」之一的西安，是已經從幾世紀的沉睡中顯現出來了。它受到南京政府增加無已的注意，已經被現代化和「改進」了許許多多。現在，它是從蘇聯穿過新疆和甘肅的那條長公路的終點，已經成爲一個非常重要的軍事根據地了。

對於我們兩個，當我們下車走上警備森嚴的月臺時，西安都有着個人的憶念。斯諾在大約十八個月前，作了先鋒，到當時西北（未知之地）「紅色中國」去，便是從這個陝西省城出發的。而在一九三六到三七年的那危急的冬季（註一）我和那些「叛徒」在這裏過了大約三個月，那時西安，實質上是被南京政

府密集的軍隊所包圍着的。那時，美國作家史沫特莉和我是西安僅有的外國新聞記者，我們的一些要把那邊事情的真相報告給外面世界的努力——尤其是聯合客串無線電廣播的事情——很不該當的給我們得了共謀的聲名。斯諾，當然，在他訪問蘇區之後，確已在古板派國民黨圈子裏成了一個非常可疑的人物。而西安，除了叛變的那四十四天例外，一向是一個很好的國民黨城市。

我不知道我們這一次要得到何種的歡迎。我們無須猜疑多久。當我們從火車中出現的時候，一個戴鑲齒的漂亮的青年軍官行了敬禮，討看文件。

運氣得很，我有一張由警察政委會加簽可以到西安的護照。該機關現在已不存在的這個事實，似乎不是沒有關係的；我堂堂地通過了。但愛特，他在蘇平之前弄到一張全新的護照，沒有准到西安的加簽。那青年軍官叫他注意這事。

「是的，」斯諾耐心地說。「你看，我們是剛從北平來的。我在那邊弄不到護照啊。」

「爲什麼弄不到？」

「因爲沒有機關簽發。」

（註）西安以每年十二月及次年一月二月爲冬季，故云。

這一個明明白白的解釋，再拿出一張正式的報館卡片，這樣使我們通過了軍人。但我怕的還是文官當局，一點不錯，他們以一個年輕而非常謹慎的特務警察為代表，在柵門邊截住了我們。這裏，報館卡片啦，雄辯啦，空吹啦，全都無效。似乎我的護照會讓我進城，但斯諾得到通知，說他必須坐下一班車離開這裏。

這是在中國常有的那種糾紛之一。我們立在那熟悉的月臺上，毫無辦法地望著西安的城牆。要轉後來開始從他慣常的好脾氣中發起怒來了。

接着，他靈機一動。「下一班車什麼時候開？」他問道。好像要到傍晚才有車的。承認這一層的那個特務員，終於允許我們兩個到城內旅館去，不過必須有他和他的兩個人陪着我們。

我們坐在人力車上得意揚揚的從城門進去，伴送的警察們在我們旁邊騎着新造的腳踏車。一進了城，我們便預計着第八路軍正式的相助了。

西京招待所也是熟悉的這裏——九個月前在那十二月的早晨蔣介石將軍手下人員被捕的地方——我曾經來和那驚人的事變的青年領袖們見面，聽他們關於全國一致抗日戰爭的紛雜而熱烈的計劃。我在這旅館裏住了十多個星期，這些迴廊彷彿是鬼住的一般。就是在這裏，第一次，我感悟到中國人民中一種新的決心。事變那些狂熱日子的結局究有多大關係，現在是比較更明白了。

我們走進旅館的接待室時，那經理像一個言信久闊的朋友那樣問候我。「歡迎回到西安來！」他握手時有一種真心的親切，戰爭已把我們大家聯結得更緊密了。「你是來會史女士的麼？」

「噯，她在此地麼？」因為史女士便是史沫特莉的中國名字。那「過去」重又猛烈地回來了；我最後看見史沫特莉，是在這個旅館接待室裏，當她出發到紅軍那邊去的時候。我以為她仍在陝北「特區」裏。

「不在旅館裏。但她在西安——她兩天前同斯諾夫人一同到的。」

這是愛特所等待的消息；那麼，他的夫人是從延安回來了。「斯諾夫人呢？」

周先生的面上有抱憾的神氣。「她今早坐快車走了。」

我們兩列火車，不過幾小時前，在西安境外交車的。但仍舊來得及打個電報到瀟關，丕格·斯諾那晚上便可以回來了。「你可以帶個信息給史沫特莉女士麼？」我問道，當這一切正在佈置的時候。

那友好的經理是滿臉的笑容，好像從西安事變那些日子中，一條真正的統一戰線已經產生。「當然，」他說，「她住在第八路軍司令部裏，我打電話去請她就來。」

在去年眼見過那麼許多激烈的事變的這間旅館接待室的裏面，我們點起香煙，試着討論計劃。好像

麥特之在此不過由於寬容而已；但至少他已跟他的夫人有了接觸，他們可以一同回上海了。從第八路軍的人員那裏，我們可以得到些關於軍事和政治發展的一般報道。在多知道一些延安消息之前，我還不能決定我此後的行程。

那一刻，門打開了，一個熟悉的人，怪樣地穿着雨衣和遮頸雨帽的，跨進了門檻，後面跟着一個穿軍服，佩毛瑟槍的護衛。這便是史沫特琪。在旅館夥計和我們自己的官方警犬的吃驚的汗視之下，我們彼此問了。

「爲什麼穿雨衣？」我們問她。

「呃，我不要張揚『這個』，」她回答道。雨衣下面，她穿着紅軍軍服。「讓我們到什麼可以談話的地方去。」

我們移到一間房間裏去；我們的特務人員一見第八路軍的護衛，便不知去向，至少是暫時。總之，他是國軍的一份子。

「你剛從北方下來麼？」

史沫特琪點點頭。「丕格和我同劉伯承的幾個部下一起來的。我們一路都騎的馬——這裏下了六星期雨，路上可怕得很。大汽車一輛都過不來。」她在西安就擱幾天，就要坐火車到太原去，第八路軍有戰

地司令部設在那裏。

「延安情形怎樣？」我要知道。

「很好，但軍隊現在都已開走了。你要上那裏去麼？」

「如果我能有辦法去的話。」

「那麼，你得等到天晴，搭一輛大汽車。我可以告訴你，要跑出西安，你會遭一點麻煩的！我們在這裏並不受大家歡迎。」

一切都預示着更多的困難，如果我試要到北方去。下一天，當丕格·斯諾已經回來時，我們大家在一起吃了重聚的一餐。她也是一個入黨的人物，穿着一件藍色中國長衫，正像外國教士在內地常穿的那一種。

「你怎樣歡喜我的旅行裝束？」她問道。

「你成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教士了，但是爲什麼呢？」

丕格輕蔑地皺皺鼻頭。「西安他們是不歡喜到西北去的外國人的。」前次她只有在半夜裏爬出旅館，避開了等着的特務人員，這才去成了的。現在她算是一個教士而回了來，帶着她破綻百出地喬裝爲中

學生的護衛——一個和紅軍一同長征過的粗大的湖南青年，遊行於中國內地，尤其在「紅色」西北的邊界上，老是有點做假面劇意味的。

我們下一天在火車站送走了斯諾夫婦，這使那些依然監視我們每個行動的特務警察無窮安心了。不格的護衛，穿着中學制服羞羞得得，攬着手槍的後面褲袋凸得高高的，被這第二次的分別深深感動了。愛特是回到上海前線，回到「轟動的事件」去，兩軍在那裏相持於爭奪這個大陸上最大城市的惡戰之中。但我們兩人都斷定一點：上海守不來，這次戰爭的下一階段中決勝負的戰場，很可以證明是在我所將去到的那北方的山中。

二二 在八路軍辦事處

戰事初期中統一戰線中的不安狀態，引致了許多困難。也，在西安，對共產黨仍有許多猜忌，是無可避免的。八月中，八路軍正式由中央政府組成，不久以後，就在陝西省城成立了一個辦事處。但直到九月末，由蔣介石將軍公開發表一封信，中國共產黨才被認為合法。我是在那過渡時期中到的西安，那時地方當局對於共產黨及他們的行為的敵視，仍在暗中進行。

我推脫了我的私人偵探（他實在有點討厭）我從旅館溜到第八路軍辦事處去。這是個樂有很大的防空壕的近代建築，主任是一個著名的可敬的白髮老人，樣子頗像國民黨的官吏。他的名聲是林伯渠。他確是一個老革命——早年原是孫中山的黨的最早黨員。歷任政府官吏以後，在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林成了共產黨員，曾擔任蘇維埃共和國的財政委員多年。由於他的慈祥態度及文雅而略嚴正的儀態，他是在這顯然還需要外交的情形下的一個最好的政治協調的專使。

林同志的辦事處是一九三七年的全部政治緊局的象徵。第八路軍（也許報紙上還稱爲紅軍）仍是共產黨之軍隊，在國民政府指揮之下，由中國共產黨組織和管理着。因此，在牆上，列寧和斯太林的照像是高懸着。但這裏也有一張蔣介石將軍的大照片，旁邊就是朱德的黑白兩色的我像——這兩位會作了

近十年的死活鬥爭的軍事領袖，奇異地並列着。對面牆上，是中國蘇維埃主席毛澤東的謎樣的官相。用敏銳的謎樣的雙眼靜靜地凝視着。在一切之上，是不容置議的中國的政治教主，各黨各派都無保留地致敬的人物，民國的建設者孫逸仙博士的照相。

「可是統一戰線是在進展中了，」林伯渠鄭重地告訴我說，「只有舊式官僚，還不願和我們合作。自從軍隊開往山西前線以來，各地的一般民衆，都歡迎我們的軍隊。」

他告訴我一些新定名的第八路軍的動員的詳細程序。自盧溝橋的戰事爆發，紅軍就開始準備這新的更大的戰爭。這時候的紅軍包括三個大部隊，就是在內戰時期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第四方面的紅軍。這些單位中的每一個，都已習慣於獨立行動，事實上，也直到一九三六年末，完成了從南方來的長征，完成了紅軍的大會合時，他們才在西北初次會合一起。因此，除了全軍隊總司令是由朱德任着以外，各單位都有牠自己的單獨軍部。

當接到南京的正式命令的時候，就以舊的各路紅軍爲基礎編成三個正式師——第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一二九師。三師合稱第十八集團軍或是（依暫時而更普遍的稱謂）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天然地，以前中國紅軍的總司令朱德被正式委任作這新國民軍的總司令。由其自己的能力，被稱爲沒有疑慮，最善作戰的紅軍領袖。曾和朱德在江西，湖南和長征中長期合作過的彭德懷，成爲副司令。各師

的新師長和舊紅軍的指揮也大體一樣。一百十五師的師長是林彪，原是紅軍大學的青年校長，是游擊戰術（這戰術由紅軍在內戰中完成）的著者，紅軍中的最能幹的戰略家之一，副師長是聶榮臻。這大概是最有經驗的一部隊了，包含有朱德毛澤東從一九二七年光榮地領導了許多年，又由林彪同樣成功地指揮了多年的紅軍第一軍的核心。

一百二十師，主要地是沿湖南來的第二方面軍編成，仍在可驚的賀龍的指揮下，蕭克作副。這一結合能獲得非正宗的戰術及迅速行動；連在這最流動的中國軍隊中，賀龍還是以能迅速分散迅速集中得到聲譽的。最後，一百二十九師，由舊的四川的第四軍及一些以後加入的軍隊編成，託付與劉伯承——一個最有希望的青年指揮——以富有經驗的徐向前爲副。每師是兩旅，每旅是兩團。

這就是朱德預備送過黃河去加強中國北部的抵抗的軍隊。但是南京的開拔的命令，很久的稽延了，直到八月末，蔣介石將軍才叫他的新部隊，開去山西，和在年老的省主席閻錫山指揮下的第二戰區的其他軍隊合作。這稽延是不幸的，因爲這些有游擊經驗的軍隊，若在八月中開抵山西北部的山區，也許能嚴重地防阻了日軍的前進。

現在，已經是九月，日本人已經佔了大同，而且開始開下向北面及東北面的幾個隘口，兩師的第八路軍（一百十五師和一百二十師）終於到達了戰區，發現他們和侵入者，在一接近的距離內。『在現在的

任何時間，林高興地告訴我，「我們等着第一次接戰的消息。」

我幾乎在西安玩了一個星期，因為雨又落了三天，不能有車去北面是無須問的。這兵站內，除了原有的人員以外，這時住了約五十個到延安去進新辦抗日大學的學生；自從西北的大門開啓以來，已有好幾千有政治思想的中國青年，從中國的各處，聚集到這荒涼的西北來。這數目，對於資源貧乏的延安實在已經太大，所以已經有了一種限制的計劃，用一種嚴格的初步試驗，剔除了大概總要落選的投考者。這些都是來過最後一關的，他們還要在更北點的「特區」的邊界上的一小村裏去通過最後的試驗，其中的多數，充分地利用了等待的期間，專心地閱讀着列寧。

於是一天晚上——這是九月二十五，星期六——我和一位三十歲的獨臂的長征前輩，由泥滑的網球戲中回來的時候，路上遇了一位高興的從總部來的小鬼。他的紅色的小臉上佈滿了熱帶。「大贏仗！他叫着。」大贏仗！大贏仗！他的報告略有不準確，但朱德確來了一個無線電訊：日軍在山西北部戰敗。「死了三千，」他有餘味地重述了一遍。

「這是林彪，」獨臂的蔡心下滿意地說。「讓我們快點去。」他帶寬帶遊地走過泥濘的公園去。兵站旁，歡呼羣衆圍繞住布告版。上面有簡時的敘述：一支敵兵在平型關附近被突襲而崩潰了，平型

關長山、西、東北部，就在長城下的一個小關口。八路軍已守住這個關口。這消息如果確實，自然很有關係。這是表示，兩個月交戰以來，日本兵所吃的第一個真正敗仗。

但是小鬼們毫不懷疑，高興得滿院跑。正如他們素來所相信的一樣，「他們的」紅軍已會到日本人，把他們打敗了。

一九三七年九月最後一星期中的平型關之戰，在幾方面都是可以注意的，不僅因是第八路軍和日軍第一次作戰。這是對中國其他軍隊的一課實際的戰術教程。

紅軍對武器較優的敵人，一徑不主張採取「單純防禦」的「被動」戰略。他們主張：此次戰爭，除了盡力守住關係最大的據點以外，大部該是運動戰。在運動戰中，對開動着的敵人的側面或背後的突擊，可以減輕防禦者在武器上的不利，使長於肉搏的中國軍隊，能和日本步兵作對面的搏鬥。在陣地或長壕戰中，日軍都將得利。但中國人當然可以選擇他們的戰場，而他們的輕兵器的隊伍的較優的流動性，就是他們的最大的資產。

在平型關，第八路軍得到他們的理想的工作。對手是够兇的。城垣中將（後來在近衛內閣中做了陸軍部長）所帶的第五師團，是日本常備軍的著名部隊之一。這師團在衝破南口進入察哈爾後，帶着絕大的自信，進入山西，實際上未遇關口，就失了士氣的省軍的抵抗。

就當高桂滋將軍所領的一部份中國軍隊防守住主要隘口的時候，兩旅第八路軍，潛入了日軍的後方，向坂垣的部隊作突擊的攻擊。沒有認清他們的交通線已被切斷，日軍急沿公路調派援軍，這就被勢力遼強的中國軍隊所透擊，把他們圍困在一弧形的險地中，用手榴彈近攻而將他們消滅。已消滅了敵軍的後援，中國軍轉回主力，攻擊關口的日軍。在這在山間隨走隨戰的戰中，日人無法運用他們的砲隊和機械化軍械。坂垣的總部是被奪獲了，關口完全被奪回，日軍無秩序地退却，損失了人數的三分之一，以及軍需的全部。

這樣一場戰爭，自然算不得決戰；而且自這場悲慘的經驗以後，大概不會再有日本軍官會用同樣不當心的態度，向山區進兵。但在現階段，平型關之役作用也極大。這證確了第八路軍的戰術，給與山西華軍的抵抗以新生命，合起來使日本較明白於他們是在對付着什麼。

由於主動進攻，流動等戰術的發展，向中國的抗戰輸入了一種新因素。第八路軍已在抗日戰爭中立下功勞了。

西安的警察，對我們的行動，恢復了興趣，似乎我是以早走爲是，除非我希望被逼離開。史沫特莉將打火車走，拿着一張軍票照當沒有什麼困難。但是我接到一份由延安毛澤東來的歡迎無線電報，雖然較

北的路邊不會能通車，明天却有一部給養車要用發，帶幾個學生去雲陽。這似乎是我離開延安的最好機會。

這晚第八路軍的軍站，有一個祝捷大會。這個會一部份爲慶祝山西的捷訊，一部份則爲了聽林伯渠報告詳細的戰情。每個人，從周恩來夫人直到最小最孬的小鬼，都聚在這房子中的最大房間裏，蹲在地板上，——地板本身，已經是一種不慣常的奢侈品了。報告完畢，一種非正式而興致很高的歡迎會便開始。

雖然是這樣匆促的一個集會，項目的繁多却是可驚的。因爲這裏，似乎各種的中國方言都有一位北平的學生，唱了一曲由老歌劇中摘出的頗深的古典歌；另一個則用吉他彈了個現代歌曲。一個廣東工人唱了粗莽的沿江民曲，接着一個麻皮老軍人就用竹笛吹了懷憶的江西調。獨臂藝插入來證了一段精彩的「渡過大渡河」的故事，——也許這是紅軍十年史中最著稱的一個插曲。他用中國說書人的一種舒服的態度說着，小鬼和學生們圍睡了眼聽着他的每一個字。此外還有孩子們的舞蹈，和一個動情苗女的表情獨白。（多數是呻訴，在座的人沒有一個能聽懂。）

自然，兩個外國客人，也被請着來個節目。史沫特莉是有很好的嗓子的，就唱了幾曲美國牧牛兒的讚曲。我乞援於足球時代的紀念物，表演了一個新西蘭的毛利人的哈迦舞，這是十分軍事化的受到了極大的歡迎。我說明這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戰舞，也許並沒有解釋得不當。

最後的一個歌很適當，是長征曲。是仿照一最老最美的中國民歌編成的，每一支曲裏，敘述紅軍從南方來的一年征途中的一個月的進展。這是現代史詩中的一個活的故事。

多數中國軍隊——這是軍閥的地盤主義的遺產——都是從各個省招起的，他們的司令也常設法保持他們的軍隊的地方性。在河北、山西、山東，這種舊式省章的弱點，已顯露得極明白了。至於紅軍，在他奔走過半個中國時，從多水的江西，經過紅土層的四川，大雪的西康，到黃土山的西北，在沿途十幾省裏，吸收了許多農民、工人、「抗日戰士」。就在這一意義上，就比較同時的其他軍隊，更是中國人民的代表軍隊。我覺得，在這北方，這「人民的軍隊」也許要改變中國抗戰的全部過程。因為，並不是由於正規軍隊（中央政府才逐漸開始認識）而是由於中國全民衆的武裝的力量。中國可以希望在這一次戰爭中取勝。

四 黃帝陵

「停止！一個簡捷的口令從西門傳過來。『是什麼車？』

這是大早晨，天剛亮後的第一個鐘點，樹木還仍然一株株黑影竄向天空，這時候哨兵的脾氣大致是躁的。我只能聽到不能見到事件是如何地進行，因為我是擠在米包的堆中，緊緊地貼住青車身。在米包的上頭及四周，是大約二十個學生，所以我覺得我許能在人叢中混過去。

「第八路軍到雲陽去的，」我們的護送兵從車上回答。他一定已交出他的證件，因為接洽是一個長時期的停頓。我很怕守衛們要查車，查起來，我就須有很多的解釋了；但是從外面，什麼也看不到，除了學生們的頭。而這些頭，雖不管其中會帶着什麼革命思想，看去是很無罪的。

「好了，」守衛隊似乎滿意了。「開門……」大貨車開動了機輪，於是天空消失於圓的石拱門下。接着汽車開到亮處時，瞥見了一下鐵葉城門，曲簷的城樓。我伸展我屈曲的肢體，高興地呼吸空氣。

學生們安置在他們為長途預備的行李上，在我們急駛於公路上時，熱心地談論。西安的城牆已經看不見，我們是在向歐北的大路上去了。

但是「大路」是一個神話。我們出發時有迸發的歡悅，這對於在中國鄉村間旅行是不適合的，尤其

是在本年這個時季。這歡悅沒有維持了多久，在上第一個過渡時，我們的車的後輪，在泥岸上滑下，一直落到渭水裏面。我們救出了車輛，但是這化了一整個下午。過河後，情形更壞。平均下來，每一英里中間，我們得二三次陷在泥中，再自己拖曳出來。我們到達雲陽——這閒散而有點衰老的鄉鎮，本來是從西安車行幾小時就可到的——是在很倉促的狀態下，在第二天晚間才到的。

我們的學生同伴，留在此地，預備他們的末次政治試驗，我又留下了三天，等待修理道路。到這時，我已展開了一種定命論，對於稽滯不再怎樣抱恨。我給自已以一種習得軍隊日常生活的機會，這種生活在以後數月中和我非常親密。而在這裏，在那裏分佔了一個獨樓的一家農家，我遇到同去延安的旅伴。他們是四個人，是一個奇異的集團。有兩個是黨員，從「外面」回來報告的。其中的一個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的青年，他現在一個省政府中做着秘書。他的緊閉住嘴的姿態，有一種職業外交家的自制的半度，他穿著一件黑色的文官制服，一件深色的外套，似乎從未被亂過。在我們走上旅途後，種種污濁，不適的情景下，孫同志略為和緩了一點，但他從沒有失去他的對於政治的深切而沈着的思考。他使我覺得他是在高度緊張下的一等聰明人，也許在延安過一兩個月的假期於他很有利益。

具有更富的特點并較易接近的是第二個共產黨員，他曾是彭德懷部下的紅軍指揮，顯然是一個行動的人而不是一個政治家。他的名字是張明——雖然我不大信這是他的真名字——至於他是在上海

做甚麼的，我迄未發現。他具有勇敢而活動的體態，穿着件破舊的皮短衣，戴着頂呢帽，依着健兒式在做口皮袋上繫了一支槍。他記得很多的故事，具有高度啓發而又實際的頭腦，而（由我們在幾次顯明的場合所發現）是一位有點天才的廚手。

另兩個年紀要大得多，是南方幾省派來訪問延安的代表。一位是大學教授，一個舒適的瘦小人，留着稀的中國式鬍子，穿着學者們慣穿的藍長袍。他是一個研究日本的權威，永遠帶着一隻黑皮包，從不讓它離開眼前。在我們中間，似乎他最感到我們所遇到的原始生活狀態的苦難。他一點不隱瞞他的不歡喜簡陋生活，因而有一次在一間沒有什麼可生色的當地飯館中，那位多才的軍官弄出一盆了不起的辣子雞來時，他像對兄弟一樣地擁抱了張明。

第四個人是全部中最難估計的。他穿着打球衣，戴着奇特的瓜瓣帽，有一種愉樂的世界人半度，且似乎確曾游歷過歐洲的多數國家。他的態度幾乎是過度修飾，而他的談話，是極自然地談着美術和文學。起初，我以爲他是什麼學術機關中的監督，不過他有和中國學者不同的高岸風度和雄壯體格。後來發覺他是一個某省將軍，百萬富豪。延安，似乎頗有些奇異的訪問者。

很奇怪，在雲陽我聽說我們可以坐小汽車到北面去。確實，是有部現代的美國式的蓬車，原是張學良將軍贈送的禮物，這在陝西農家倉房的土牆裏，實是一個非常奇異的夢幻。但是時一考察這低座的車身

及已出毛病的彈簧，使我覺得這對於我們所要走的那種道路是完全無用。幸好司機和我抱同樣的見解。終於我們坐了一輛大的道奇軍用車從雲陽出發，車上裝了許多給延安制服廠應用的舊縫紉機。（這是使我們極不舒服的。）

去陝北的門戶是金匙關，從此地起一直到河套及蒙古全只有山村。這關口是一個著名的盜匪窩，自然，我們又在這裏滯留了幾小時。叫一個衛兵在山腰偵察，我們就出力拖出車子；然而除了一隻山鸚，高高地在雲中飛過以外，並沒有見到更危險的景象。在我們還沒有走完全匙關的時候，雨又下來了，於是我們又在路上過了一夜。

第二天早，一天明就暗而有風。我們已離開平原，高地的路乾得快些。張明用專家的鼻孔嗅了一嗅風，預言道：「今年不會再有雨了。」

「你熟悉這個地方嗎？」

他淡笑了一笑。「我在這裏的多數地方都打過仗……」

這似乎有點可靠；因為他知道每一個鄉鎮和村莊的名字，而且他是一個真確的氣象預報者；在十一月下雪以前，不會有過雨。

翻過第一個山頭，田野更見開闊些，鄉村沿着我們的路疏疏地散佈着。罕有的堡壘，有些不過僅是積

敗的殘蹟，高聳在黯澹的山脊上；我們所碰到的農夫，是黧黑的山民，用黃土層高原的步法走着路。在齊村（譯音）——一座小的山鎮，鎮上的灰色牆壁險阻地接上一座碉堡和一座黃瓦的廟宇——我們遇到我們第一隊駐防隊。

這是老的紅軍，男和女都還穿着黑制服紅領帶，和黑色的高頂帽，釘着紅星，這個曾經是全國東西南北的地主和收租者的恐怖。這是因為還不會有足夠的政府制服，分給開拔到前線以外的軍隊，同時這些農民軍人爲了多年的習慣，留戀着這個徽章。孫告訴我，由於愛着這會爲之奮鬥了多年的紅星，許多第八路軍的正規軍，仍把舊帽子翻轉，戴在新的青天白日徽的帽下。據我所注意到的，這裏一般士兵，仍說「我們紅軍」；至於在延安及前線，我只聽到說「第八路」這個新名字。

這些荒涼的小山，也有他們自己的曠野的美；但是，縱然是在一雙不開心的眼中，他們也吐露着一部歷史。我會經留意到，我們所經過的一些廟和石碑坊都有年代久遠的外觀；不過大致地說，中國不大有用耐久材料造的建築，所以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建築并不多。在靠近西安的平原上，仍然有漢代故都長安的城牆的痕跡，我會以爲，這些以及後漢諸帝的陵寢，怕是中國的最老的真確的紀念物。可是現在，當我們渡過一條小河，走入另一個多灰的小鎮，有一座小山的山巔上立着一座勢必頹敗的廟宇，這時候那教授

從慣常由旅行引致的昏睡中醒了起來。

「這是中部」他一面用不做作的與致考察着景色，眼光因一種真誠的考古熱心發起亮來。看「他指點着給我。『那裏是中國的最老的墳——黃帝陵。』」

在廟宇的屋頂及散落的石拱門後面，聳着一繞圓錐形的小山，飾着一些山松。他的線條，大致是對稱的，使人想到一個大陵墓的形狀。傳統地，這是中國人認為第一代皇帝的埋葬的地方。

黃帝，堯，舜，這模糊的「最初三帝」久已由古賢教人熟悉，被認為是中國歷史的開始期的英雄人物了。最近的研究，忽然發現這影影，不僅是傳說中的幾個人名，因而證實了文字的記載。在這三位神話性的「三帝」中，黃帝也許是最真實的一個。且有很多證據，足支持他的傳說的地點指證。若是我們能接受這點，那末這中部的陵墓，是最早的現存紀念物之一了，時日至少可上溯五千年。

那是從這些西北高原，第一次的中國大移民，沿着黃河，南下入河南沃土，東越山西山地，傳布了那在夏商甯剪發的本生的中國文明，由於歷史的奇異巧合，在這些數不清的羣山中，中國共產黨——一個最後產生的現代共和國，二十世紀的新中國的先鋒——又發現他們的現在的家。

今日所存的第一期的中國文明的最早記錄，是甲骨，上面刻着和今日相同的在中國堅持地行了四千年的象形文字。可是就在黃帝陵的影子前面，我從一個陝西農民——中國的沒有時間或傳授以學會

那艱深古典文字的幾百萬農民中的一個——手中取得了一份唯一的、定期出版的拉丁化的中文報紙。這是在延安發行的新華日報。

『你能看嗎？』我問他。他的皺痕在微笑中更增加了，

『自然我在陸軍學校中學會的。這裏面敘述日本帝國主義強盜侵入了中國，和中國人民新的統一戰線』

一個農民能在兩個月中學會了讀拉丁化，若是他要想對舊式文字同樣的能力，至少要兩年多。似乎是一種新的知識，正從老西北流出去，還預備使它對好幾千的長袍學者，發生影響。

五 旅程的終點

陝北也並非盡是荒涼的原野。過了我們費盡艱辛才越過的一條山脈，我們的路就引向一片肥沃的台地，田隴很整齊地分割着，上面罩着樹蔭。在柔和的斜陽光下，和那些切斷黃土層的深谷對照起來，是一片可愛的風光。在遠處，一座頗大的城市的城牆和城樓，已經可以看見。

『洛川，』張高興地說：『終於我們可以舒服地過一夜了。因為我的朋友正在此地帶兵。』

由於在適合耕種的區域中心，洛川是西安和陝北特區間的最大的城市。在紅軍到達西北後的幾個月中，這地方被看作紅白兩區間的非正式的分界。這是西安事變前的夏間，張學良和紅軍領袖們初次會談的地方。現在，洛川，是所謂統一戰線的地方，由陝西省當局和共產黨聯合統治着。但是這城市，——和我們所會經過的那些城鎮一樣，——是由第八路軍衛戍着的。

張明的朋友——『陳同志！』——原來是一百二十九師的一個旅長，眼很靈活，有一種青年的敏捷衝動的季度。他用不拘禮節的款待，讓我們把他的總部自由享用，說他三天前便已盼望我們了。我注意到陳旅長穿着藍的中國陸軍的正規制服，不帶一點品級的徽號。但在他的胸袋上，他也帶着個銀白珠翠的金屬質的五角星徽，上面有着個描金的騎兵像，註着『一九二七——一九三七』的年代。這是我第一次



在延安通路上

“小鬼”的队歌



看見這一種星徽——第八路軍的唯一裝飾品。不久，我發覺，不管這佩帶者的年齡多大，這每和負責的地位有關。這表揚了在老紅軍中的十年的活動。

「你認識斯諾嗎？」這是陳的第一句問話。這是用他的中文名字發問的。我回答認識，這青年旅長就非常開心了。我發覺，在西北，斯諾是最著名的人，在他以後，也有新聞記者訪問過陝北，但不曾有一個留下這樣的印象。斯諾和史沫特莉——她在赤都還停留得更長久些，——是僅有的兩個「外國朋友」，被每個人知道名字的。以後的訪問者被用各種代表的稱呼叫着，不完全是好名稱。我是被稱為「英國記者」，（這至少還是特稱，因為以前來過的大都是美國人，我則是第一個到達延安的英國訪問者。）

這旅部裏，最強調的是年青這點。我看來，沒有一個軍官，是超過三十以上的；每個房間裏，又都擁聚着小鬼，這軍隊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有這些娃娃來加入。這旅裏的小鬼們，似乎比平常的更好奇得多，而我的容貌，（同其他的「大鼻子」的一樣）似引起了他們的驚異。這也許是不足異，因為我穿着短褲，又有一星期沒有修面了。

在我已經偷聽見一個小鬼和他的同伴討論了那個問題以後，一個小人鄭重地向我問道：「你多大？」
「二十八，」我回答說，依中國辦法，加了一歲。

「是和陳司令同年，」他很有興趣地報告我。我發現他自己是十四歲，已經加入了紅軍三年。他曾經過長征，所以他有理由自以爲是個前輩。

每一個和中國紅軍（或是第八路軍，因爲在新旅隊下同樣的組織仍繼續着）接觸過的人，總覺得對於這些小鬼或（給他們正式名辭）「少年先鋒隊」有該加以贊美的地方。他們是很奇特的，會見他們，就好像會見小說中的不可信的吹噓小兵及搬炸藥小童一樣，他們的青年的奮發力，對於一個較我們的世界更爲冒險的世界，是極爲珍貴的。

這些穿制服的從十歲到十六歲不等的兒童，可以在這軍隊中的每個部份中看到。有許多本是孤兒，更多是逃出家庭，或工廠的，在那工廠裏他們是在作學徒或被敗落的家庭賣了身的。雖然他們的無窮的高興，足以鼓動全軍隊的普遍良好的精神，但他們絕不是僅視作福星的。他們有他們的正規職務，作偵差及傳令兵，并且時常組成情報，宣傳等工作的特別服務隊。在旅行劇團中，他們常參加很多，而他們的教育也永不被長期疏忽。一到他們有資格自己揹一支槍的時候，他們就可以參加實際的戰爭，而在戰爭中，他們是自己證明是完全無畏的，由於極端年青的無保留的不自覺的信心。

只有曾經知道一點那古老中國的城市汗血作場，及鄉村實業中的對於童工的普遍的殘忍的剝削的詳細情形的人，才能真實地讚賞那在這些國民革命中的最年青的鬥士身上灌輸了自由以及責任觀

念這種奇蹟。他們的無窮的快樂，決無依賴的獨立，是孔教社會中的一種新現象。這是首次，生長於世界上最多壓迫的國家中的最受壓迫階級的孩子，能够選擇他們自己所將過的生活，而且發覺他們已和一個遠超過家族或鄉村的束縛以上的運動相合一。他們是屬於他們所贊成建築的新中國的。現在古老的中國再也不能認領他們了。

洛川恢復了我們的精神，但旅途又把我們弄疲了。我們會抱很大的希望，預備當天到延安，但是到了一個名叫道左鋪的小村時，知道因為山崩，有一塊大石把前面的路攔住了。除了等用炸藥把它炸開以後，什麼車輛也無法通過。這終於成爲殺手棋。我們只有放棄掉車輛。

張明——我們這羣中的最會找機會的人——找到了最近的軍站，打電話到延安去討馬匹。我們準備第二天在甘泉——約在五十里北的一個城——會到他們。我們可以雇驢子運行李，自己走過那中阻的路。

第二天，我們上道以後，我覺得倒幸好和車輛脫了連繫。至少，我們可以合理地確定，我們可以用腳走到目的地。最好的機器，也是會失誤的；在中國，則是非常容易失誤的，因為它有許多困難要相鬥。而且在此間旅行，和在其他亞洲的國度旅行一樣，真正的愉快是走路，變成那些來來往往，無論冬夏，沿着飛塵或凍土的大路走的人的行列的一部份。

在中國路上是很難得行人絕跡的。脚夫、騾夫、叫買、鋪鍋以及磨刀人，形成了常用的一部份；此外則還有和尙、強盜、游民，以及普通的旅客。可是在這幾天的去延安的途上，則是以特殊性質的團體，形成一種禮的旅行。我們雜進一羣學生中間，他們是從西安一路走來，去進陝北公學的。穿着法蘭絨及藍斜紋布的女子，也男子樣地大步前進，行李都打成一個小包裏；一位在他們一起的褸脣青年告訴我道，這是爲「抗日戰爭」預備的「磨練自己」的程序中的一部份。他們預計在他一度到過的延安是沒有多少舒服的（這是非常正確的。）

「你是共產黨嗎？」我問這一位青年學生，他是華北的一間教會大學的畢業生。

「不是，」他坦白地說。「以前我不屬於任何政治組織。但現在，我們現在從事於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我們中間的許多人，都覺得頂好只有向第八路軍學習。延安的領袖們有偉大的政治經驗，而且特別精於游擊戰術和民衆動員。我們到西北來學習這些東西。」

「在蘆溝橋時期，你在什麼地方？」

「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効工作。但是在南京，什麼也沒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屢屢總是叫我們在一個辦事處裏等一等，於是明天再來。很多人是這樣走掉了。這樣的方法不能幫助中國；我們都想得實際訓練，到人民中間去工作。於是我的一個在延安黨校的朋友，寫信給我，告訴我新設的陝北公學，

自統一戰線以後，已有許多學生進來了。我沒有告訴我家裏到那裏去，却坐了火車到西安來。」

這簡略的敘述以及敘述時的腔調中，都有一種堅決的切望。在這些青年的政治的瞻禮者中，頗有許多人生的材料。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害怕到此地來要捐錢去上前敵；他們在別處是不會得到一錢的。他們多數都痛苦地感到，他們的訓練缺乏。

「以前，我們的生活是太安逸了，」我的青年的談伴接着說。「我們訓練了我們的頭腦，但沒有訓練了我們的身體。現在，到延安，我們將得一種新的訓練，并找一點真正對於抗戰有益的事做。」

這確是在蘆溝橋後一個月內中國國民政府的弱點，費了好久的時期，才現實地較為接近戰時動員問題。其結果之一是許多投劊者，尤其是那些同情於激進方面的，在別處碰到失望之後，自然要轉向西北方面來了。這是非常矛盾的，在大都市及革命的南方，民衆運動是延滯了。而在這更原始，更政治落後的北方省份，最先受到戰爭影響，第八路軍最能自由活動的地方，一種純粹的民衆抗戰最先發展開來。

甘泉，這有太的城垣的潤色頹壞的城市，終於不久就到了；我們見到馬已經到了。我們在一間唯一清潔的旅館住下來，暢快飽吃了饅頭及張明的得意傑作，晚上，在市場上看一個旅行劇團演奏秦腔。一夜的好睡，把每個人的好脾氣都恢復。——連那身體不好的教授，他在一天的進行中腳吃了苦，又會兩次摔下了

驢子到早上，我們都有點激動，因為延安只離開了六十里了。

可是，看了看馬，那省將軍決定再等貨車；也許因為他覺得被人看見騎着這樣的劣馬，大失面子。這些馬自然并不漂亮——是一羣平凡的小駒馬，附着無可歸類的鞍轡。帶牠們來的衛兵，一再爲這些馬抱歉；他說，一切好馬，都已經上前線去了。這幾匹已經是留下來的中間的最好的。不過，凡這幾隻，都還能夠跑——他保證地說。

結果證明不錯。北方小馬的外貌，是最易使人迷誤的，這些堅強的小牲畜有着幾乎難以置信的體力。牠們的最快的步子，也不過儘是快走，算不得跑，但是牠們能繼續好幾個鐘點。由張明騎着一匹看來皮氣壞的栗色馬領前，我們毫不耽擱地上路。已無須再過嶺，我們取了上面的一條海路。邈來的一重重的羣山，排成一條狹谷，一直通到關口。在關口上，一座守望樓和一座更塔聳立在青天中。

終於到了延安了，我們的馬，因爲回家奔，無須我們催趕。我們用最好的蒙古騎風，衝下峪口，逢津渡時，踏得水濺濺。在兩邊山的崖巖，都塗着大標語；在此地，似乎座座山都賦有了生命，我們走過幾羣武裝農民，在這理想的游擊戰區，作經常的演習。由一個狹的山凹，傳來了機關槍的杳杳響的回響；栗色馬就直衝向前面去。

「慢走，慢走！」教授無效地要求着；他仍然抓住那用繩子扣繫在肩上的皮包。但是這沒有用處。最後

的半英里是一盤野外馬賽，衛兵狂呼着在前面開路，開心的農村孩子搖着手歡呼。我略瞥見在河邊有一所空場，場中穿着落色的藍制服的兵士在玩着籃球網球；又瞥見高的危崖上露出廟宇的屋脊。接着我們急衝過一條壕溝，馳下最後一個斜坡，終於到達了——多少還算是一起，而且有着和馬隊進軍一樣的喧鬧——延安的堆壕下面。

等候着的人勒住馬的韁，同時我們躁過了腳，並拍去了衣上的黃塵。張明進城後就不見了，但一個青年軍官從周圍的人叢中跑了過來。他停下來向我們行了一個旋身的總禮，同時現一個歡迎的滿笑。

「同志們，歡迎！你們騎得這樣快，一定疲倦了。請進來喝杯茶。」

第三章：戰時的邊區

第三章 戰時的邊區

一 在延安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延安這樣風景如畫的中國城市。一眼看上去，延安正像一幅宋人山水似的神奇。它伏在懸崖峭壁之下，位於兩條大河合流的要道。在西面，一帶雉堞參差的城牆陡峭的蜿蜒而上，一直伸到一座突出的山巒絕頂。在那裏有一座瞭望臺控制着附近海浪似的羣山。這個居民稠密的城市就建造在山谷的絕底，它的東面是河，城牆是緊接着水邊建築起來的。在河的對岸却又是陡立的山崖，那上面點綴着一些破廟和一座孤另另的寶塔。

幾世紀以前，這城市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演過相當重要的角色。現在的城牆還是宋朝的遺物，那時候「北方的夷狄」常常從蒙古高原衝過長城南犯，延安就是宋朝抵禦這些異族的前哨。但是延安也和西北的許多其他城市一樣，近代不斷的遭受接連連的內戰和宗教戰爭的破壞，所以當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安安穩穩進入這城市而且在那裏建立起他們的政府（現在變成「陝甘寧邊區政府」）來的時

候，延安不過是一個剩了空殼的山城而已。

在共產黨未來之前，陞守延安的是張學良將軍的部隊；在那時候共產黨還被稱爲「赤匪」，而張學良正是政府委任的「勦匪官」，雖則他並不大熱心於這種工作；那時候的赤都是在保安，這是在延安西面的約百餘里的一個縣城。一九三六年夏天，斯諾氏首先訪問所謂「赤匪」的著名領袖們，就是在這個地方。在這時候，延安正處在紅軍的包圍之中。那些駐守部隊對於他們的可怕的騷人非常恐懼，他們大規模的鞏固城防，修築城牆，在城外的羣山上建築了許多防禦工事。

但是紅軍從來沒有進攻延安，這原因據後來有一個紅軍指揮官告訴我是，「延安有一團人扼守，就可以抵擋一軍人了。」延安的地勢和天然屏障再好的地方，即使在西北許多軍事要隘之中也是少有的。直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也就是紅軍和東北軍之間由來已久的停戰狀態發展到最高峯，東北軍自動撤退到陝南去的時候，共產黨才正式佔領延安。

我們到延安——當地還有人叫它府州——的時候，它作爲邊區首府已經差不多八個月了。這城市已經迅速的獲得簇新的生命，人口激增了幾乎三倍（這時大約近三萬人），商業也繁盛了起來，在原有的各種商店之外，沿着灣曲的大街各種貨攤接連的編成一線，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商業的繁榮了。兵士，抗大學生，陝公男女學生，他們的青灰色的制服和陝西本地人的棉襖和羊皮外套混雜在街頭。延安

雖小，却的確有它的首府氣象。而且從政治上說來，它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中心，因而在統一戰線之中起着日益增加的作用，所以也許可以算得中國的第一重要的城市了。

我們被極優待的留宿在延安「外交部」的「招待所」裏。不用說，這外交部的屋子是全世界具有這種尊稱的建築物之中外觀最簡陋的。那裏有三間來賓宿舍圍住一個小小的院子，那些床就是普通的磚炕，上面鋪着粗劣的毛毯氈褥。但是一切地方都非常清潔，刷得雪白的牆上裝飾着現在大家都熟悉的列寧和史太林的肖像，還有用幾國文字寫着革命口號的彩色紙條。我們到了之後，立刻派來一個武裝哨兵在門口站崗，我想這大概是替南方代表們裝裝「場面」的吧。

我把我的介紹信交給那位年輕的「外交部長」吳亮平，他是一個似乎很善於外交詞令的人。他用流利的英語向我道歉，請我原諒延安給我們的「薄待」；隨後他請我跟別的代表們還有一羣官吏在合作社飯店吃飯。在那裏，照中國傳統的方式，款宴了我們，很豐盛的菜簡直使我不相信從前聽說的延安的飲食怎樣清苦的話了。

「你們常常吃這樣的菜嗎？」我想知道個究竟。

吳君搖搖頭，隨後低聲的告訴我：「不是的，當然不是的。這些菜只是給客人吃的罷了。你們既在此地，你們就會得到我們所能供給的最好的食物——這是中國待客人的習慣。但是我們自己却不吃這樣

的東西。」後來當我熟悉了延安的日常生活之後，我就知道這話是絕對真實的了。這些共產主義者當然不是禁慾主義者流，他們像一切中國人一樣，假使能夠有好的東西，他們也要享受的。但是因為陝北的物質條件的苛刻的限制，所以在延安所謂「普通飯菜」祇是不發酵的中國麵包或高粱飯，帶點大白菜，也許難得有一樣葷菜而已。這是全延安的普通情形，政府人員也是一樣，除非必要時有什麼宴會，才吃着一頓好的。

我們在延安的第一個早晨正是紅軍大學行畢業禮同時又行開學禮的一天。我們大家都被請去參加。吳同志老早就來找我，提醒我這件事。

『今天毛澤東要去演講，』他對我說。『像今天這樣早就起來，在他是很難得的。』我會聽見過毛澤東有磨夜的習慣，他夜裏工作到很遲，所以要將近正午才起身，這是成爲慣例的了。

紅軍大學是從事於紅軍各級人員的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的學校，它是中國共產黨老早創辦的正式機關之一，它的最初的固定地址是在江西瑞金，就是從前蘇維埃的首都。但在這一時期之前，以及這一時期之後，就是當共產黨被迫退出江西的時候，紅軍大學都是隨軍開拔的「流動學校」。也許除了一黨一校以外，對於紅軍的發展上的幹部訓練，盡了最大力量的就是紅軍大學了。

現在它的校舍是一所廟宇，那裏從前是一個中學。這廟很大，但是房屋有點朽壞。大門口掛着大旗，貼着反X的標語，還有幾張英文的字夾畫的宣傳品。其中一張寫着「歡迎外國友人」，旁邊是一幅畫腳線條畫，兩個外國裝束的人，一個帶一頂平頂帽，抽着雪茄，另一個帶一頂十字花的便帽，臉上有一個不能辨認的東西，也許是一隻眼鏡。

「你看，你是被歡迎的呀，」當我停下來鑒賞這幅傑作的時候，吳君帶開心似的輕輕對我說。

「多謝。但是我想你們的畫家也許只會畫些帝國主義者的諷刺畫吧。今天要我演講嗎？」

「我們歡迎你講。講些關於國際情勢的吧……」

大院子裏大約有五千的軍校學生和教官一排排的坐在鋪了石板的地上。在他們頭上飄揚着交岔的國民黨青天白日旗和他們的斧頭鐮刀紅旗。這種罕見的親密和諧的情形無疑是統一戰線的副產物。演講臺裝飾得異常動人，寫着幾種文字的標語，其中還有中國革命者癡愛的世界語。一幅寫着「反法西斯侵略的國際和平陣線萬歲」的大旗特別激動我們。

集會還沒有開始，我們穿過一羣女生向前排走去，她們穿着束帶的制服，活潑而伶俐。我們走過的時候她們一直向我們微笑着。我的位置已經預備好，那是一條板棹，隨後又是免不了的老例。一個人送上一杯茶來了。那茶杯是個有柄的瓷杯，已經有了裂紋。我的邊旁忽然有一個高高的，略微有點駝背的人站起

來向我伸出了手。我看見在那褪色的藍布軍帽下面有一付銳利的，繃起來的眼睛。

『毛主席，』吳說。

從前，一些外國記者往往不加思索的根據一些謠傳把毛澤東這位中國共產黨的最著名的領袖描寫成一個精神錯亂的幻想家，或是「害了不治之症」的狂熱病者等等，而現在，人們已經知道毛澤東並不是這樣神祕的人物了。但是，也許是過去的謠傳給我的殘餘影響還沒有肅清的原故吧，我總覺得這次最初會見的印象是有點出於我的意外的。我覺得要把他這種溫和的，不拘束的態度，仍然年輕似的相貌，還有點學生似的謙恭，總而言之，要把這種孩子氣的，玩皮的，非常逗人的溫和氣質——跟那些所謂「鐵一般的布爾塞維克」，中國紅軍的戰鬥的領袖等額東西調和起來，是不容易的事。

『請坐好不好？』毛澤東用他那濃重但是愉快的湖南土話說，『抽一支菸吧。』他在他的解開的棉大衣裏摸了一下，拿出一包溼漉漉的「老刀牌」來。『會開完了之後我們可以談話了。』

在這時候號兵們吹起集合號來了。軍校生都跳起來立正了。我的眼光越過這些一排排的熱情的年輕的臉投到遠遠的地方，那裏是延安城河以外的青山，晨霧未消，山峯隱現，一座寶塔矗立在山巒，被陽光照耀着。任何銀幕導演也不會設計出這樣美觀的革命的背景吧。在我們頭上繡着黃色斧頭和鐮刀的紅旗和蔚藍的天互相輝映。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男聲和金鳳聲似的女聲混合着。自從我到中國以來，還是第一次聽到大聲的唱「國際歌」。

略為介紹了一下，軍校的教育長羅瑞卿就請毛澤東演講。毛澤東顯然有點捨不得似的把香煙頭甩掉，也沒有什麼禮節就走上了講臺。簡單的行了一個禮，他就自然的，迅速的講了起來，帽子撤到頭頂上，兩手插在背後。

我盼望着一些煽動家的雄辯的慣技，但是並沒有盼望到。毛澤東用他的家鄉土話在講，而且不斷的活潑的運用一種農民式的笑話，他的字句非常具體和直接，甚至那給我們斟茶的十二歲的「小鬼」都能懂得。他從來不用超過他的聽眾的水準的語言，這是他的特性。他的演講的語氣和所用的熟語幾乎是不可能翻譯的（因為他對於土語和「口頭語」的智識是無窮的），我靠着吳君的幫助，費了相當力量才把他演講的大意速貫起來。

「同志們」他說，「四百餘年以來，中國還沒有遇過像現在這樣嚴重的外患，中國人民正和日帝國主義者作生死的鬥爭。正是在這危機的時期，我們紅軍大學第十三期畢業同時新班開學，這種意義是非

很重要的。

「紅軍大學的一切的努力都應該直接爲了抗日鬥爭。雖然全國有許多軍隊，但是我們人民革命軍因爲過去的特殊經驗，應該特別致力於抗日戰爭，爲了戰勝日帝國主義，我們必帶一個真正革命的政洽方針。但是這樣的方針却還沒有被我們全國的軍隊一致認清。

「我們需要至少有一個軍隊具有這樣的革命方針來作其餘軍隊的模範。八路軍就應該做這樣的模範軍。不僅在英勇精神和紀律上應該成爲其他武裝部隊的榜樣，而且應該在羣衆工作上，在組織人民到革命戰爭中的工作上……」

「同時，我們也需要一種新的戰略。舊的戰略，每一個軍隊都是有後方的，保持着軍需給養和交通線的，但是假使我們和廣大人民有完滿的合作，我們就不需要後方了。八路軍在山西西北部和日軍作戰所以能夠獲得勝利的原因就在這點。日本強盜越想多佔我國土地，就越給我們多造成了工作的地區。

「日本軍隊的坦克、鎗械和飛機比我們多了許多；但這不是說我們就不能和他們對抗。我們希望將來我們會有更多的坦克、重機關鎗和飛機，但是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們還可以作戰的，甚至步鎗也沒有，也不要緊，假使我們和廣大民衆有完滿的合作的話，用木棒和石子也可以作戰的！

「任何軍隊，無論裝備是怎樣好法，總有它的弱點。我們的任務就是從實際上發現出日軍的弱點。那

末，只要我們有機巧和決心，我們就能把它打個落花流水。」

接下去毛澤東就解釋八路軍的「三條規律」——嚴格服從命令；維護工農利益；只有漢奸和親日派的財產才能充公。「記好，」他說，「即使是農民的一個山薯也不能拿，因為你假使拿了一個就想再拿了！這是中國有些舊式軍隊的弱點，他們不能永遠尊重人民的權利，因此就不能永遠和人民建立良好的關係。沒有這種親密的關係，這些軍隊就不能好好的作戰。」

「我們都知道孫中山先生的遺囑上說過，革命雖然奮鬥了四十年，但是還沒有成功，這原因就是全國的民衆還沒有覺醒起來。『喚起民衆，』這正是孫中山主義的真精神，也是馬克斯主義，以及一切革命政黨的眞精神。我們的黨和我們的軍隊必需保持這樣的中心原則：第一，集中我們的軍隊最有效的打擊敵人；第二，分播我們在羣衆裏的政治活動，澈底的喚起民衆，爲祖國的自由解放和民主革命而鬥爭。」

「爲了喚起民衆支持抗戰，就必需改良大衆的生活。必需廢除苛捐雜稅，減輕大衆的經濟負擔。應該發給給人民，讓他們組織游擊隊和別動隊，協助正規軍。假使辦到這樣，我們就可以隨時隨地四面八方來打擊敵人，即使敵人從外面把中國封鎖起來，我們還永遠能够包圍敵軍，切斷它的後方，消滅它各個孤立的單位。」

「我們只要能够組織起這樣的大衆戰（兵民戰），日本軍隊很快的就會失掉鬥志，掉轉槍頭向着

他們的指揮者了。所以，這就是我們當前的任務——反對投降和妥協，堅持持久戰的方針，爭取全國人民的完滿的合作！」

另外幾個人演講完了之後，也就散會了。我們於是就移到另外一個院子裏去野餐。關於這事，軍校教育長早已當眾宣布過。這頓聚餐要花費邊區政府二百塊錢。教育長是爲了畢業同學馬上要上前線就把這頓聚餐算做送行這種原因，才贊成這樣的浪費的（平均每人合到兩毛錢的餐費）。爲了歡送畢業生上前線去，這天晚上還有一個特別的戲劇表演啦……

我和我的同伴們是坐在一席圓桌上，在坐的還有毛澤東和洛甫，一個帶眼鏡的，從前做教員的人，他現在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執委會的祕書。英還沒有上來之前，毛澤東就不拘束的吃起紅辣椒來，他「空口」吃着，非常的津津有味。『在英國你們吃這東西嗎？』他問我。當我着重的給他一個否定回答的時候，他却說，『真是不幸！對於一個湖南人，不吃辣椒，任何東西都沒有味道了。』

這是一頓不拘禮節的便飯。那些軍校生的胃口顯然是很不錯的，雖然這樣的大嚼，也許會使他們受用不了的吧。毛澤東問我許多關於國際情勢的問題，那時候正是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發表了「封鎖侵略者」的演說之後，曾經有一時有些英美合作制裁日本的希望。『英國工人運動怎樣呢？』他很想知道

這，我就告訴他關於倫敦的羣衆大會，關於援助中國的決議。『是的，』他說，『但是他們能够推動英國政府採取比較積極的政策嗎？』我發現這些延安的政治首腦，雖然從地理上說是在這個偏僻遼遠的地方，但他們却熟知世界大事。『我們可以得到一切無線電的消息，』據洛甫說，『而且沒有問題的，日軍軍事消息也包括在內。』

甚至吃飯的時候毛還是不斷的抽煙。這一點——還有他對於辣椒的癖愛——也許是他僅有的壞處了。邊區政府對於他抽香煙的耗費是特許的，他所愛抽的牌子就是『老刀牌』。當我們吃完了飯，在一種中國式的宴會之後都有的過飽的感覺之中休息的時候，毛就拉過一張紙來，由吳亮平加以一些指點，用英文寫了幾句給我。

『答應償付大洋五百元，』他命令我，『在一百年之後。』我就依他的意思簽了一張字條給他，他一面站起來告辭，一面慎重的把這字條摺好放在口袋裏。

『假使真的有人來討這筆債，』他正輕輕的告訴我，『那時候英國的國庫也付不起這筆款子的了——要是照中國式的利率計算起來的話！』

二 中國的列寧

並沒有像『十月革命中的列寧』似的人物指導着混亂的困苦的中國革命過程，但是這複雜的歷史過程的每一連續的階段都產生了它的代表的領袖們。我們爲了認識今天在中國正起着作用的各種社會力量，記述一二這樣的人物是有用的。因爲，正是靠了這些社會力量的合作，中國抗戰的實力和中國人民的整個前途才有最後的保障。

孫中山先生作爲國民黨的創造者，又是永遠追求着『自由的，民主的中華民國』這個目標的理想家，他被稱爲『中國革命之父』是完全應該的。從滿清帝國最後崩潰的暴風雨時代直到一九二五年『反帝』的大革命的前夜，這位天才的，永不休停的理想家的英姿顯著的，動人的，映在全中國人民眼中，孫中山先生的社會理想和政治主張的奇特的混合，也許正是時代的特徵，那正是龐雜的革命理想剛剛開始尋求羣衆行動的表現的時代。但是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無論如何指示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原則，而且是用中國人民容易了解的字眼揭示出來的。

中山先生死後發生的北伐大革命，勝利的開始於一九二六年，而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因爲內部的分裂而中途停頓了。國共分家之後，九年以來，中國便陷於悲苦的內戰之中。

假使說中山先生是個理想家，那麼蔣介石將軍真是一個十足的實際家了。

這九年的時間，對於中國人民真是個苦難的時期。內戰踵接，日本加緊的侵略，使中國喪失了許多土地。中國共產黨爲了承繼和完成一九二六年的大革命，採取了「紅軍和蘇維埃運動」的政策。

中國的蘇維埃運動，局限於內地數省。爲了生存不得不和具有極大優勢的重隊作戰，但是竟獲得許多驚人的成功。可是，共產黨人認爲革命的目的不是他們的單獨行動可以達到的。照他們的理論看來，中國革命在達到社會主義的轉變之前必需經過兩個革命階段：「反帝革命」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變重革命任務，照他們看來，在一九二七年因爲國共分裂沒有能夠完成，現在必需國共重新合作才可以澈底完成。

最後，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比一切政治理論都更爲有效；一九三七年國共重新合作了，在抗日的共同目標之下。國民黨因爲是優勢的在朝黨，當政的，自然的居於領導地位，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全國很快的組織了起來。這裏必需指出，國民黨的政治傾向在戰爭開始的幾個月仍然是保守的。國防政府的領袖蔣將軍恢復了十年前北伐時代做總司令的革命地位。他知道，既然抗戰的國策已定，就必需倚恃政治上較爲前進的份子以求人民大眾的支持。但是他手下還有若干份子，對於暴風雨似的抗戰時代的支柱——統一戰線，還不免有點「勉強追隨」的樣子。

國民黨和共產黨「重新合作」起來的，奇怪的，間接的（道地中國式的）方法，給一般人留下了許多沒有回答的問題，特別在抗日戰爭已經爆發之後。中國共產黨對於這次戰爭的感想如何？他們的戰時綱領是怎樣的？和國民黨的有什麼不同？這做了十年冤家重新合作的兩黨能合作到若何的程度？紅軍的戰略和戰術如何？如何跟其他友軍合作？

我來到延安就是爲了要從共產黨自己的嘴裏得到這些問題的回答。這些回答從我和毛澤東多次的半夜進行的晤談之中得到了。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最權威的發言人，是不用說的。所以在下面幾頁我廣泛的引述了他所發的言論，這些言論分析了戰爭爆發不久之後的中國政治軍事的總形勢，可以作爲共產黨的代表意見。不管怎樣，共產黨總是今天中國的一種巨大而重要的勢力，而且他們的影響似乎還在與日俱增。

而毛澤東則不管共產黨的地位如何變化，他總會是他們的一個領袖。

我晤會「毛主席」是在他自己的住宅——一所小小的藏在延安的懸崖腳下的窑洞裏。我們常常從晚上開始談到深夜，在我們對坐的桌子上點着一支蠟燭，它把我們的影子奇形怪狀的投射在弧形的屋頂上。房間裏堆滿了鐵的公文箱，無線電消息不斷的送來，他在回答我的問題的問題中就披閱它們。吳

亮平做我們的翻譯，而毛澤東還要堅持——由於他一貫的對於事情的仔細——我所記的每一句話都要重新譯成中文給他校對。

「在戰事真的爆發了之前，」毛說，「共產黨就再三警告過全國，對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日方所謂『和平解決』一切日方好聽的外交辭令，都不過是掩護備戰的煙幕。我們再三指出，爲了發動一個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必需加強民族統一戰線和實施革命的政策。」

「我們說過，一切問題之中最重要的，是中國政府採取民主制度，這樣才能動員大多數人民自動的參加抗戰……戰爭的爆發和發展證明了這種分析的正確。」他接着從許多最近的共黨文件裏引用許多字句，這些全部着力於一個中心問題，這就是實現一個「全國範圍的全面抗戰。」

當我問他什麼是這個戰爭的主要的政治意義的時候，他就分析日本侵略的兩重威脅：第一是威脅中國自身的生存，第二是威脅西方列強的經濟利益。「我們看到日本對於我們的威脅，所以中國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份子都覺悟到必需團結起來拯救中國的危亡。因此戰爭爆發以來統一戰線是更加進步了。另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向列強挑戰，企圖把他們取而代之，因此在中國有經濟政治利益的列強已經漸漸採取一致的態度對付侵略者了。當然這不過是個開始，但是前途是不難預見的。」

「你覺得中國現在的外交政策應該怎樣呢？」

『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該有一個決定的原則——推動一切國家結成反日本侵略的「和平陣線」。國際形勢，至少在道德上，是或多或少有利於中國的……但是國際和平陣線的綱領應該不是空文，必需見於實行才對。』

『對於中國最重要的是英美的政策。這兩個國家特別被東方和西方的法西斯侵略者所威脅。到現在為止，英美雖然說了許多好聽的話，而他們的政策實際上幫助了法西斯侵略者。這是因為只說不做的原故。言論失去了行動的支持，實際上是給法西斯國家以便利，客觀上幫助了他們。世界各法西斯國家現在正威脅着各民主國家的生存，應付這種挑戰的聯合行動是必要的了。我們所提議的和平陣線，不僅對於鬥爭中的中國是必要的，對於各民主國家的生存和安全也是一樣。』

對於日本在華行動的目的，毛澤東認為那是很簡單的東西：『併吞』全中國。他估計華北和揚子江流域是直接的軍事目標，但是毫無疑問的，日本不把全中國變成他的殖民地決不肯善罷干休。

『中國的抵抗到目前為止產生了若何的成效呢？』我問。

『關於這個問題，』毛說，『我們必需較為充分的談一談目前中國的力量和缺點兩方面的情形。』

『一方面，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抵抗已經獲得很大的成績。第一，這個戰爭是抵抗外來的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這是本質上革命性的戰爭。第二，這個民族解放的戰爭使四分五裂的中國獲得了政治的團結。』

國共合作是這新團結的基礎。第三，中國的抗戰喚起了國際的同情。因為現在的抗戰，全世界對於中國過去的不抵抗主義的輕視已經改變了。

「戰爭的耗費已經開始影響日本了。根據德國人的統計，日本戰費的消耗已經達到每天二千萬元數目，關於人力的消耗，雖然沒有統計，但是我們知道那是多大的數目。過去，可以說日本沒有費什麼大力就奪去了東北，但是現在，日本決不能不經血戰和大量消耗就佔據一點點中國土地了。在中國持久的抵抗之下，日本帝國主義最後就要發生危機而內部崩潰……」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隱諱事實，在過去幾月之內，我們的抗戰發現了許多弱點。

「第一，最重要的，還是中國的政治的弱點。全國各省各區都相當的參加了戰爭，這是真的。但是全民族一切份子都參加戰爭這一點，却還沒有做到。廣大羣衆還沒有從過去的政治束縛之下解放出來，所以他們還不能參加戰爭。抗戰還沒有成爲一種『羣衆戰爭』，而這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假使沒有羣衆的特性，是永遠不能勝利的……」

「第二，還沒有團結全民族的共同綱領。當然，中國各政黨已經空前的團結了起來，但是這種團結還沒有達到必要的程度。一切政治犯還沒釋放，壓迫國民黨以外的政黨的事還沒有完全消滅。政府和人民的關係，軍隊和人民的關係，長官和士兵的關係，都仍然很壞。不團結而分裂的現象仍然存在。這是一個根

本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能解決，談不到抗戰的勝利。

「第三，除掉這些政治的弱點之外，軍事上戰略的錯誤也是有些地方淪陷和敗退的原因。過去許多戰役，其中最大多數是所謂『單純防禦』。這樣的戰鬥方式是不能獲得勝利的；要獲得勝利，就必需採用與前大不相同的政治和軍事政策。

「這就是抗戰以來我們所得的教訓。」

毛澤東對於戰爭初期的種種現象的批評，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誠懇的。顯然，他着重的並不是指摘了。『缺點』而是堅持他認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張是很充足的，當我問他如下的問題的時候就明白了。

「照你的意思看來，要勝利的抵抗日本必需怎樣的條件呢？」
他把回答分成兩部分，政治和軍事。

『在政治方面，』他說，『首先要使現在的政府成爲一個真正的統一戰線政府，應該有各階層的人民代表參加，這個政府應該是民主的，同時又是集中的。人民應該有言論，集會和組織的自由，應該有武裝起來抵抗侵略者的權利，這樣才能使這個戰爭成爲羣衆的戰爭。』

「而且爲了發動抗日的羣衆戰爭，不僅需要給人民民主的自由，還需要真正的改善人民生活，必需減息減租，廢除苛捐雜稅，實施一個社會改良的綱領，特別要減輕農工的經濟負擔。對於抗日軍人的家屬應該有特別優待的條例，政府應該維持他們的生活，保障他們經濟的安定。其他特殊的問題，像難民和失業者的問題，也必需解決。要救濟戰區難民，援助水旱災民，失業者和停工店廠的資源人力必需好好的利用，來增加生產和支持抗戰。」

「只有施行這樣的辦法，才能引導人民一致的擁護抗戰，使這戰爭成爲全面的，澈底代表着全國人民的戰爭。」

「對於這樣的綱領，我們知道有人會說：『假使減租減稅，改良羣衆的生活，那末政府稅收就要減少，戰時的財政就更困難了。』對於這種說法我們可以這樣回答：『我們的原則是羣衆的生活必需改善，而同時，政府的稅收也必需增加。』這句話是否矛盾的呢？」

「並不矛盾。我們要實行有錢出錢的原則，因此戰費的負擔主要的落在富有的人們身上。每個中國人，不論直接還是間接，都得參加在這戰爭裏。那些只有力可出的，就出他們的力；那些有錢的，就要出他們的錢。我們知道，假使改善了人民大眾的生活，國內市場和商業情形就會活躍和進步。工商發展的結果，政府稅收就要增加，那時候政府就獲得了更好的經濟的和財政的條件，進行抗戰了。」

『在軍事方面必需大大的改變現狀。最重要的是改變『單純防禦』的方式，採取主動的攻擊敵人的戰略。舊式軍隊應該改成新式。應該在自由組織民衆的基礎之上改變強迫徵兵的方式，運用政治動員的方法。指揮必需統一，紀律不良和與民衆隔閡的情形必需改變，應該建立一種自覺的紀律，應該對於民衆秋毫無犯。正規軍的作戰應該和民衆的遊擊戰配合起來。』

『所有這些政治的和軍事的問題，共產黨所提出的綱領上已經指出過了。這些政策都是合於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和總理遺囑的精神的。只有把這些政策實現出來，我們的抗戰才能勝利。』

關於共產黨的『十大綱領』毛澤東說了很多。但是他的意見的概要從這裏所引的談話裏已經可以充分明白了。最耐人尋味的也許是這樣的事情，這位曾經被國民黨認為死敵的毛先生非常誠懇的提出的許多實際的意見，其中每一句話都可以從孫中山主義找到根據。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所要求的不過是要國民黨把他的綱領上早已規定但是久已忘掉了的政策實行出來。

『國民黨已經部分的實行了民族主義，』毛總結他的談話，『這可以從抗日戰爭的實現這一點看出來，但是民權主義還沒有實現，民主主義也沒有。因為這種原故，目前的戰爭裏面發現了嚴重的危機。』所以，在這危機的戰爭時代，正是國民黨更深認識自己的孫中山主義並且實行它的時候。假使現

在還不把它實行，以後他們就要悔之不及了。」

時間已經很遲，給我們倒茶的「小鬼」打着呵欠，正和我差不多的想睡覺了。但是毛澤東似乎毫無倦意，只是因為還有一束電文要看，他才請我們暫別。我和吳向他告別的時候，他送我們到天井裏。

「你一定要再來，我們還得多談一點。你不知道口令嗎？那末我派一個人送你回去吧。」

在那漆黑的天井裏我們握手分別，毛澤東還在那裏站了一會兒，用一種泰然自若的姿勢仰望着蒼天雲霄的懸崖。隨後他就轉身進去，澈夜不停的工作在等着他，但是他沒有絲毫疲倦的神情。

三 國民黨和共產黨

在另一天夜裏——也是這樣的十月的夜——吳和我對坐在這同一的桌子旁邊。這沒有生火的窑洞裏很冷，我就把一條毯子圍在肩頭上。吳把兩手捧着把瓷茶壺。毛澤東隨便的躺在一把躺椅上；這是他的唯一的奢侈品，是內戰停止之後得到的。他不斷的吸了無數的香煙使我懷疑他是否想藉這小小的火星取暖。

我們談的是「民主政治和統一戰線」的問題。我對於一個國家在戰時建立或維持一種民主制的政府的可能性，表示了一點懷疑。毛澤東却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意見，他認為這種制度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政府的最妥善的形式。「我們需要的政府必需澈底是代表制的；但是另一方面，行政權必需是集中的……」

「你是不是指的像「戰時內閣」那樣的制度呢？」我問他。

「不，」毛說，我們一點也不是指的這種。一般說來，有兩種戰時政治組織，一種是民主集中制，另一種是絕對集中制。無論那一種都是戰爭的性質所決定的。

「歷史上的一切戰爭可以從性質的不同分成兩種——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例如第一次世界



毛澤東氏

大戰，是個反革命的戰爭，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帝國主義國家強迫民衆違反自己的利益作戰。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像英國就需要勞特喬治內閣這樣的東西。勞特喬治禁止英國民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任何表現這種企圖的羣衆組織或集會都被禁止。雖然名義上還算議院政府，但這議院只是奉命投票和通過戰費預算的東西。議院就是帝國主義的。因為政府和人民對於戰爭的主張不同，一種絕對集中制的政府是需要的了。日本現在的政府正是同樣的情形。

「但是歷史上却還有革命戰爭，像法國第一次大革命的戰爭，蘇聯抵抗國外干涉的戰爭，和現在西班牙的人民戰爭等類就是。這種戰爭的目的在政府和民衆雙方都是一樣的。因此政府決不怕民衆會加以反對，這種戰爭根本就是建立在民衆充分的支持和同情之上的。政府的基礎也是建立在民衆自願的支持之上的。政府不但怕民衆，而且要激發他們，鼓勵他們發表意見，使他們能夠自動的積極的參加戰爭。」

「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是完全受民衆的支持的。政府和人民雙方有相同的戰爭目的。爲了必需民衆充分的參加，戰爭才能獲得勝利，所以中國需要民衆集中制。一九二六年的北伐是革命的戰爭，它的勝利就是靠民衆集中制得到的。」

「假使戰爭的目的吻合羣衆的利益，那末政府越民主，戰時組織就越完善。所以政府不用害怕人民

會反對戰爭，相反的，最可怕的是人民的冷淡和不起來。戰爭的性質決定了政府和人民的關係。這是歷史的錢題。」

「那末，在中國實現這樣的政治制度要有怎樣的條件呢？」

毛澤東用手指拍拍額頭，這是他的習慣。「這一點，當然是靠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合作。」

「最近十五年以來，國共之間的關係是中國政局的決定的因素。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兩黨的合作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勝利。一九二七年以後兩黨的分裂造成了十年來的不幸局勢。對於這個分裂我們是不能負責的；我們是不得已才抵抗他們的壓迫……」

「現在是到了第三階段了；爲了民族解放和抵抗日本侵略，兩黨必需在這已定的國策之下澈底合作起來。由於我們不懈的努力，這合作已經樹立。現在的問題是兩黨研究和採取一個共同綱領。在這綱領裏，建立新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個重要部分。」

一切問題都最後歸結到國共合作這基本問題上。但是——至少在戰爭進行着的時期——共產黨的地位總是穩固的。中國政府裏還有某些份子頑固的反對他們，妒忌他們的日增的影響力；但是蔣介石將軍很知道和共產黨軍事政治的合作對於戰爭有怎樣的價值，他一定會阻止任何公然的「磨擦」。他像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守護者。

在共產黨一方面，他們做了許多的讓步，避免右派的誤解。讓步很多，以至有些人認為他們已經放棄了『共產主義』。關於這還有共產黨將來的政策的問題，毛解釋的時候，力說他們的讓步是有一定限度的。

「我們爲了締結民族統一戰線所作的讓步，」他告訴我，「那是有條件的。就是說，要國民黨實行如下三點：

(1) 發動解放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

(2) 實現民主制的政府；

(3) 改善人民生活。

「是在國民黨承認這三點的基礎之上，我們才作許多讓步！就像改編紅軍爲國民革命軍，歸南京指揮，改蘇維埃區域爲中華民國的『特區』，取消反對國民黨的政策，停止沒收土地，分配土地的政策；這些都是爲了消除中國兩大政黨之間的敵對行爲而作的努力。另一方面，國民黨也承認了共產黨、八路軍和陝甘寧邊區的合法地位。

「這些表示我們爲了全民族的利益而作的讓步的限度。國民黨中有些份子還要我們作這限度以外的讓步，取消我們在邊區和八路軍裏的獨立領導。但是我們這種更進一步的讓步對於抗日鬥爭是絕

對沒有利益的。

「共產黨忠心的和其他黨派合作建立統一戰線，而且努力於它的鞏固和擴大。這種態度和政策，是真正馬克斯主義的，是爲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也是爲了全民族的利益。」

「共產黨提出了「民主共和國」的口號。這裏面所包括的內容不是二三年或是四五年就可以做到的。這必然是一個長的過程，到最後中國的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進就會實現。沒有問題的，這樣一個共和國必需工人階級的充分合作才能建設起來。」

「有什麼可以阻止，」我問，「現在的民族統一戰線遇到一九二七年那樣的命運呢？」

「有四個主要的因素，」毛回答我，「可以保障現在的民族統一戰線。他們是如下的：

「（一）中國人民在過去十年之內學到了許多教訓。他們記得所受的痛苦——所有的悲哀，不幸和經濟困難都是一九二七年民族革命陣線分裂的結果。他們記得差不多十年的內戰。

「中國人民不會讓這種事再發生了；他們不會讓整個社會中某一小部份人們把統一戰線拆裂開來。假使某些份子還想破壞統一戰線，人民大眾就要拒絕支持他們。人民要爲統一戰線而鬪爭，因爲他們知道只有統一戰線才能實現民族解放。

「（二）在一九二七年破壞統一戰線的份子也受到了十年來的教訓。他們一定知道那次對於統

一戰線的破壞給了國家民族嚴重的傷害；而且他們也知道，中國人民已經警告他們，決不容許誰再破壞統一戰線了。

『(三)中國共產黨十年來也得了許多的教訓和經驗。共產黨要用一切努力以維持和鞏固統一戰線，施行一種有效的民主的政策，鼓勵羣衆充分的參加。』

『(四)目前的國際形勢對於統一戰線比一九二七年有利得多，它不會讓中國的統一戰線很容易的破裂。國際形勢要求中國統一戰線更鞏固和更擴大起來，參加到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的世界和平陣線之內。』

『所有這些因素結合起來保證了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線，使民族解放的目的和三民主義的實行可以順利的實現。』

『照你看來，戰爭的經過情形大概是怎樣的呢？』

『戰爭的過程決定於客觀條件和戰爭的具體情形。我們相信戰爭是長期的。因為需要相當的時間來動員日本民衆反對他們的帝國主義者和法西斯黨徒；也需要相當的時間使國際形勢變換到更有利於中國的勝利；尤其主要的，改進中國自己的國內政治，也需要相當的時間。』

『最後這一點，是個長的過程，在這期間中國人民要學習初期吃敗仗的教訓，要改組陳腐的軍事和』

政治制度，爲了戰爭勝利，必需把它們組織在羣衆的基礎之上。這個時期成功的渡過之後，就是日本法西斯蒂和軍閥們自掘墳墓的時期了，我們相信，到那時候國際形勢，也一定轉變到更利於中國的方面了。

「所以，我們對於初期的吃敗仗並不失望；我們決不容許任何悲觀主義或失敗主義的空氣發生。我們要承認戰爭是長期的事實，而堅決的和勇敢的準備最後勝利的條件。我們深信，在兩三年之內中國勝利的條件就會建立起來，然後我們就可以看見日本帝國主義總崩潰的一天。」

「你覺得日本發生革命的可能性如何？」我問。他把頭點了一下。

「近幾年來，日本法西斯匪徒和軍閥給日本人民的嚴厲的壓迫，使日本革命勢力的一切活動都受到壓制。所以從表面看來，似乎對於戰爭的反對很少，似乎日本人民大體是支持戰爭的。

「但是實際上，日本法西斯蒂不過是在自尋死路。越是嚴酷的壓迫人民——而戰爭越是持久，壓迫就必然越是增加——革命的反抗的力量就越是強大。因此戰事進行下去日本的革命運動就會頑強的生長起來。但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第一個條件還是日軍的潰敗和中國人民的英勇的鬪爭。」

「在現階段，日軍部份的勝利正是日本軍國主義崩潰的先聲，就像中國初期的失敗正是新的策略和最後勝利的先聲一樣。日本人民會歡迎中國人民的勝利和日本軍閥的失敗，因爲這樣的結果會給他們造成加緊革命鬪爭的空前的好機會。」

「中國革命和日本革命是不可分開的；許多地方都是互相關連的。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日本革命運動的成功是和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緊運緊繫着的。」

在毛澤東對戰爭問題的全部分析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於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前途的極度的信心。這種信心甚至相當的從他的性格上表現出來。因為毛澤東常常被一些在華外國記者（幾個遇見過他的是又當別論的）描寫成一位「極端派」一位復仇的「階級革命主義者」所以在我的意料之中不免當他是一位出色的宗教狂，這種印象甚至可以從刊物上的他的照像造成，他那長長的頭髮和馬馬虎虎的裝束都似乎證實那種傳說。

但是稍稍熟悉了這個人之後，他那靈和藹的性格和談笑風生的興緻，就足夠消除這一類的任何成見了，說句老實說，我在中國所遇見的一切人中間，毛澤東的頭腦的冷靜和穩健是無比的，這一點打動了我的深心。和他談話的時候，任何人就立刻會感到一種巨大的智力，一個異常優越的頭腦，活潑而穩健的沿着有條不紊的思想的線索移動着。而且，這種卓越的智慧配合着對於任何問題真正實際的了解，和對於本國人民的深刻的認識。毛澤東激盪是中國式的；他從來沒有出過國，而且永遠是盡最大的可能和他的同胞接近的生活着，特別對於中國的農民和工人。他的政治理論的卓越，無疑是由於他的天資，訓練很

深的頭腦和驚人的強健的記憶力。他是一個無所不讀的讀者，一個有多方面興趣的人，但他也有非中國式的地方（至少，對於中國的知識份子而言是非典型的），這就是他的絲毫不苟，他的持久用腦力的本領，和他雖然專注於當前的工作而不會迷失最後的目標的顯著的才能。

我可以說，毛澤東具有超羣出來的，足以代表中國式的最好的精神特徵的精明和韌性。就是這種原因使他在這一向充滿了機靈的政治投機家的中國成爲一個成功的政治戰略家。因爲他這種才能是在一種有訓練的，合乎人道的意志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這種情形在中國是少有的）。由於這種偉大的意志和卓越的能力的結合，所以把他和列寧比擬也不是完全不適當的吧。

蔣介石將軍從那危機四伏的西安事變中安然脫險回到南京之後，有一個傳聞的故事。這大概是無稽之談，但是——假使裏面含有若干事實的話——這故事正可以從另一方面顯出蔣將軍人格的偉大。朋友們祝賀蔣將軍脫險，同時自幸他們自己又可以受到他的領導。總司令就提醒他們說，他是不能無限期的，永生永世在政府裏領導的。

「假使我也許因爲生病也許因爲別的不幸的事情而不能在位，」他說，「那末，你們想想看，我贊成誰做我的承繼者呢？」

在一番習慣的謙恭的躊躇之後，他勉強強硬的，他們到底提出了一些人名，其中最被推許的，是蔣將軍手下，一位最活躍的青年將領陳誠，但也有人說是汪精衛，孔祥熙，或國民黨中其他某某老輩。

「不是，」對於每一個提出的人名，蔣將軍都這樣回答。「照我自己的意見，我的承繼者應該是——
白崇禧！」

這是有趣味的，因為白將軍（北伐時代他是蔣的參謀總長，他是中國最有才幹的將領之一，是無疑的）在南京政府剛成立之後，就和總司令意見不投而遠去廣西，和中央一直有相當的隔閡的。

可是，假使因為白崇禧的名字被蔣將軍提出而吃驚，那末聽見以下的話，更不知要怎樣了。

「第二個人選是誰呢，假使白崇禧不算的話？」蔣將軍又問他們。誰也答不出一個字來。「第二人選」總司令靜靜的說。「我提議毛澤東。」

我當然不能保證這故事的全部真實性，但是，它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假使蔣將軍真的把這兩個十年來的政敵提出做自己的後繼者，那顯然是他們的才能使他欽佩，他承認他們也是偉大的政治家了。（從這裏可以看出蔣氏不偏不私的精神。）

而且事實上，不到一年之後，白崇禧從廣西率軍北上了，現在在華中襄助蔣將軍指揮軍事，毛澤東也由南京政府正式委任，爲了保衛性命交關的西北和延長華北的抗戰，在延安指導着八路軍的戰略。

四 共產黨的戰略

中國紅軍在平型關以及晉北其他戰役獲得驚人的成功，那原因是怎樣的呢？這支軍隊在內戰時期創造了出色的記錄，這是真的。但是有些軍事觀察家解釋這一點的時候總歡喜把它的原因歸於國民黨軍隊的缺乏決斷，而不歸之於中國紅軍有若何善戰的特性。他們認為，中國紅軍對抗那些三心兩意的「勦匪軍」是可以的，但是要對付裝備和訓練都很優良的，現代化的日軍是決無希望的。

可是，戰爭的開頭幾個月就證明了相反的事實。從技術裝備和軍需供給的觀點看來，八路軍的情狀非常困苦，甚至華北各省軍隊的情形也比不上。但是當這些軍隊在侵略者氣焰之下節節敗退一蹶不振的時候，八路軍却馬到成功的獲得了勝利。

當然，這裏面並沒有什麼神祕：合理的解釋是，不僅這個農工軍隊具有堅強的戰鬥精神，而且他們的指揮官對於這種防禦戰爭的戰略的意見，是根本不同的。這個戰略，毛澤東在蘆溝橋事變的一年之前，就已經概略的講過了。（註：參看斯諾的西行漫記，第三部，第三章。）現在這戰略在抗日戰爭中實際的執行起來了，它已經不僅是一種有意義的理論，而且是在戰爭過程中起着作用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了。

「你可以告訴我一些八路軍的情形嗎？」我問毛澤東，這也是那個十月裏的事。「現在八路軍已經

和日軍作戰起來了。」

毛澤東表示對一個局外人談軍事問題也沒有什麼勉強。他拿出了許多軍事地圖，北戰區的軍隊移動的情形。「爲了戰略關係，」他說，「我們的軍隊把山西作爲中心，已經獲得了許多次的勝利……從此以後，日軍顯然將在華北碰到更頑強得多。」

「關於戰略和戰術的問題，我們可以說，八路軍所取的行動還不是其他中國。」

我們是在敵人的側翼和後方作戰。這樣一種作戰方式是和簡單的陣地防禦大不相同的。

「我們不懷疑使用一部份防禦兵力做正面的陣地戰的必要；當然是需要的。但是我們的主力是在敵軍的兩翼，執行側擊和包圍，把握住主動地位而襲擊孤立的敵軍。」

「只有運用這種戰術，我們才能保全自己的兵力而消滅孤立的敵軍單位。而且，在敵軍後方行動的軍隊是特別可怕的，因爲他們能够破壞敵軍的根據地和交通線。即使是和敵軍作直接的陣地戰的軍隊，也不應採取單純防禦的「消極的」戰略，而應該盡最大可能的運用反攻。」

「中國軍隊近幾月來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採取了錯誤的戰略和戰術。八路軍所取的作戰方式可以叫做「獨立自主的流動游擊戰爭。」從根本說來，它和過去內戰中的作戰方式是相像的，雖則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我們可以考察一下戰爭現階段的一般軍事情形。目前的條件對於中國軍隊的大眾結集和集中是不利的，而對於散開我們的兵力成爲流動的單位是有利的。因爲戰事所及的地域是如此廣大，所以我們需要儘可能的從敵軍的側翼和後方突擊失掉掩護的敵人。

「中國軍隊總數是很大的。除了一部份用作主要陣地的防禦，一部份散開執行游擊戰爭之外，主力部份應該完全用以襲擊敵軍的側翼。

「任何戰爭裏面的第一個原則就是保全自己和消滅敵人的實力。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現在我們就必需採用獨立自主的運動戰，再配合着游擊戰術的充分運用。任何不活動的、消極的、機械的戰鬥都應該廢除。假使有足夠數量的軍隊運用這樣的戰略，再配合着八路軍的游擊戰，那末勝利就會在我們掌握之中了。」

在後來幾個月，人們可以常常聽到關於這種「運動戰」的可能性的談論了；
 國一些精銳部隊在上海附近打硬仗而受了嚴重損失的時候，這種戰略還是很新
 論正如他慎重的說明的，並不是主張放棄必需防守的重要地方。但是我想，他認爲
 企圖扼守那失掉掩護的，在日本軍艦的火力之下的防線的英勇防禦，從軍事觀點說
 大多數外國觀察者也會同意於他的吧。

「八路軍的另一個重要的、有意義的特點，」毛澤東繼續說，「就是它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有三點。

「第一是軍官和士兵的統一。這裏面包含，清算一切封建主義的殘餘，廢除「打罵制度」，這一點許多地方軍隊在戰爭爆發之後也還沒辦到——作者，）建立自覺的紀律，實現全軍隊一致的同甘共苦的生活。就因為這種方針，所以我們的軍隊的團結的程度，是無比的。

「第二是軍隊和人民的統一，這是我們的軍隊的永遠不變的方針。我們必需保持和一般民衆最大限度的密切關係，而且無論如何永遠不侵犯他們的利益。因此民衆才肯支持我們，和我們一同工作，給我們傳遞消息，保守祕密。和人民密切合作是我們軍事勝利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不僅如此，我們還要進行宣傳工作，組織和武裝民衆；我們必需減輕人民大眾的經濟負擔，嚴厲打擊那些危害軍隊和人民的漢奸賣國賊。這樣，軍隊和人民就能在一起工作，軍隊每到一處就總被民衆當做朋友歡迎。

「八路軍的新人員的募集不是靠強迫的徵抽，而是靠對於民衆的政治宣傳和組織。用這樣方法來動員羣衆是很有趣的。

「第三是對敵宣傳和優待俘虜。這種工作的意義是因爲勝利的獲得不是全靠自己軍隊的鬥志，還要靠敵人軍隊的沒有鬥志。雖然這工作的效力現在還不顯著，但到將來它就要佔比較重要的地位了。」

「我們可以說，日軍對於八路軍總是特別害怕的。最近華北日軍司令官發表一個宣言，裏面說我們要『赤化』，華北聯合外蒙和蘇聯以至『赤化』日本。所以，他們說，要採取特別手段對付『可怕的八路軍。』」

「但是我却不怕日軍司令官這種威脅。雖然華北的大部份已經淪陷，我們並不失望。我們堅決的集合兵力保衛山西，還要收復失地。八路軍要和其他中國友軍合作，堅決的支持山西的抗戰。對於整個抗戰八路軍這一因素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對於華北的戰爭。」

「但是八路軍的作風和戰略可以被中國其他軍隊採用嗎？我想知道這一點。」

「雖然八路軍具有上面所指出的那些特點，因此使日軍特別害怕，毛澤東回答說，『但是當然，它還不能在抗日戰爭中居於左右大局的地位。數量上它是太有限了。現在是國民黨的軍隊在抗戰中居於決定的地位。』」

「但這一點，並不成爲其他軍隊不能採取八路軍的優點的理。國民黨軍隊原來是具有現在八路軍這樣的精神的——那是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時候，在那時候共產黨幫助國民黨組織新式的軍

隊。在開始的時候只有兩團人是新組織的，但很快就由許多軍隊圍繞在這兩團的周圍，就打败陳炯明，獲得了第一次的勝利。

「後來這個軍隊擴充成一軍人，又有更多的其他軍隊受着它的影響。接着就開始了北伐，這個時候軍隊裏充滿新的精神。軍官和士兵之間，軍隊和民衆之間，都建立了密切的關係，一種勇敢的革命精神充滿全軍。軍隊裏建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的組織——這種制度是中國軍隊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九二七年以後的紅軍和現在的八路軍繼續採取了這種制度，而且把它加以極大的發展。

「在大革命的時代，戰爭的戰略和戰術是和政治精神相配合的。那時候不是一種消極的，機械的戰略，而是積極的，進攻的。因為這種原故，北伐戰爭得到多次的勝利。

「目前的抗日戰爭也需要像這樣的一種軍隊。這樣的軍隊並不需要有好幾百萬，只要有這麼幾十萬人就可以保證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了。」

在「紅軍」時代共產黨的強有力的武器之一就是對「白軍」的宣傳。至於對外國軍隊，人們會認為這種活動一定要受到很大的限制。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却都是諄諄不倦的宣傳家，我們可以斷定他們決不會放棄任何機會的。

「你們對於俘虜的政策怎樣呢？」我問毛澤東。「對於日本的士兵怎樣呢？」

「從根本說，」他回答，「和過去十年來紅軍所取的政策是一樣的，俘虜要解除武裝，但無論如何也不可以加以侮辱或虐待。我們向他們解釋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共同利益，於是就放了他們。」

「當然，對於軍官和士兵，下級軍官和上級軍官，我們是加以相當分別的。普通士兵，被壓迫階級出身的，特別是被日帝國主義者驅迫來和我們作戰的內蒙人和滿洲人，我們待他們像朋友和同志。假使誰和我們一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就歡迎他留在我們隊伍裏；那些不願意和我們在一起的，他可以隨意回到他原來的地方去。軍官也是這樣的待遇；但是那些指揮侵華戰爭的，支持日本軍閥主義現行政策的高級軍官，我們就得把他們拘禁相當時候，讓他們有時間了解和體會自己的錯誤。那末，假使他們承認了錯誤，我們也就釋放他們。」

「但是從日軍的傳統和紀律看來，」我質問他。「這種政策可能獲得一些效果嗎？被釋放的俘虜一回到他們的隊伍裏就會被長官殺死的，這樣一來，全部日軍還是不能了解你們的政策的目的。」

「越是多殺被釋放的俘虜，」他自信的說，「越是引起日軍對中國的同情。對於最近山西戰事中捉到的俘虜我們已經實行了上述的政策。以後還要繼續施行。」

「日軍司令公開的宣稱要用毒氣對付八路軍。即使他們這樣做，我們也不會改變優待俘虜的政策。」

我們已經向國民黨提議要其他軍隊也採取同樣的政策。這也是認清真正敵人的一種方式——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却不是日本人民。

「日本人民和被壓迫的日本殖民地的人民，他們即使被送到中國來打我們，但是我們和他們並沒有什麼過意不去，這些人民是我們的朋友。不願意歸隊的俘虜，都可以留在八路軍裏服務。假使將來在抗日戰爭的戰場上出現國際縱隊，他們就可以參加進去，拿起武器和日本帝國主義鬥爭了。」

在那時候我認爲他所說的這些都未必實有其事，不過是毛澤東忽發奇想，一心情願而已。但是後來，當我遇到了日軍俘虜而且和他們交談之後，我的想法就開始改變了。而在我離開中國的時候，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組織的蒙古人，滿洲人，還有日本人的軍隊已經在華北成立了，而且實際的參加了戰爭，和中國游擊隊肩並肩的戰鬥着。

五 「邊區」雜寫

我在延安總共住了差不多一個月——超過我預定的時間有三個禮拜光景，一方面那種幾乎教人受不住的留客盛情難於推却，一方面這忙碌的小小山城對於外國過訪者實在有許多有興味的地方。雖則軍隊都開拔到前線去了，但延安還是充滿了戰時的景象，嘈雜忙亂像一個蜂房。

有一些重要的改變足以看出「邊區」和從前的「蘇區」的不同：在政治上，這種不同是，現在一切階級都有選舉和參政的權利了。這年九月裏剛剛完成了一次全區的總選舉，這是在普選制的基礎上進行的，從下級選到上級，從鄉代表會（註）區議會，縣議會，到邊區政府。對於地主的歧視已經不存在了，充公財產也不進行了。人們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說，邊區的政治是全中國最接近於真正民主政治的了。

這是一個戰時政府：爲了適用「一切黨派和階級的人民都應該參加抗日鬪爭」這個公式，所以賦與一切階級以政治權利。賦稅也依照戰時的標準修改了。現在舉辦了一種「救國公糧」，這是種像單一

（註）鄉代表會是直接選舉出的，這些代表再互選區代表，多少依照蘇維埃的原則進行，選舉票數的比例是這樣：鄉大約每二十選舉人選出一個代表，區每一個代表大約五十票，縣每一個代表大約二百票，所以邊區政府每一個代表大約是一千五百票。

稅的制度，依照人民每年的收入徵求。「稅率是從全年總收入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邊區政府的主席告訴我。「極窮苦的僅能生活的農民免稅，大多數農民繳百分之一，生活較爲優裕的繳百分之二——三，「中農」的平均稅率大概如此。一年收入在百元以上的繳百分之五。向地主租田耕種的農民只要繳稅率的一半；擁有多量土地的大地主繳稅率的雙倍。」（註：在改制之前，「邊區」本部實際上已經消滅了大地主制度，所以現在是沒有什麼大地主的。但是還有些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的所謂「聯合戰線區域」裏面，仍然有擁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這當然是一個草率簡單的賦稅制度，但是它適合地方政府的需要；軍隊的給養當然是前蘇區的一筆主要開消，但現在是歸國民政府直接供給了。

不論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邊區都顯得是中華民國的一個「進步的實驗區」。西北人民的經濟水準雖然低下，但是農民的生活程度已經大大的改進了。他們的大多數有了自己的田地，農村合作廣泛的組織了起來，高利貸廢止了，利率由政府規定，商業雖很活躍，却沒有人能賺額外利潤。共產黨帶他們的邊區爲戰時中國的「模範區」，這種模範的作用特別表現在教育，羣衆組織，和政治訓練這些上面。

就因爲這些地方，延安顯得十分出色，特別是和我這幾個月來所看到的中國其他地域對照起來。在這小小的首府一處，就有許多學校，除了軍校抗大和黨校，還有一個陝北公學（相當於大學程度）一個師範學校，一個無線電和工程學校，一個大的女學校。在延安，還有一個邊區師範學校在訓練着教育計劃

裏預定的「一千個學校」的教師。這是和幾年前共產黨在江西所行的差不多的，一個雄心勃勃的努力。在邊區，一切計劃中的，以及已實現的學校裏（包括許多訓練農民的短期班）都熱烈的貫徹着「抗日」的教育方針，特別着重在非常事件的防禦訓練。物資的缺乏是邊區經常的難題，但是所有的教育用品，從最小的鄉村小學到抗大，都是免費供給的。

羣衆動員，多方面的進行着。他們的精神足以打破陝北艱苦的物質條件的束縛。青年和老人，婦女和兒童，都爲了當前的鬪爭組織了，訓練了，武裝了起來。男子和婦女組成了「抗日自衛團」。青年們有「少年先鋒隊」，甚至兒童也有「兒童團」的組織。任何一種武器，從現代的槍械到舊式的刀或矛，都被運用了；簡陋的兵工廠和工場日夜的工作着，「就是用它的全部軍力」。我聽見毛澤東有一次在一個農民羣衆大會上說：「我們相信日本也不能征服我們和佔領我們的邊區。」

在這裏要把西北共產黨領導的區域加以詳盡的描寫是不可能的，對於它（在蘇區時代）期滿已經有過多方面的記述，我不過是想把它在統一戰線之下適應戰時狀態的一些顯著的變化指示出來。我不能夠離開延安而不記錄一些延安城內外的生活所給我的印象——這些生活和舊中國的對照起來是這樣新鮮而刺激，我寫下它們來的時候，無論怎樣也壓制不住熱情的激動。

假使有誰相信日本人的鬼話，那當然認爲延安——所謂「亞洲的布爾塞維克」的老家——是中

國的大多數人的污點。可是我却只能這樣說，我所看見的是一處大多數人都勤苦而滿意的工作着的地方，在這裏幾乎每個人都顯得年青，在這裏人類的最高熱情可以獲得正當的發洩。生活是照中的標準。看來也是簡陋和樸素的；但是我覺得延安是安身的好地方。

禮拜天是一般的「休息日」，是訪會朋友的日子。它是那些辛苦工作的共產黨員一個禮拜也許只有一次可以和妻子在一起的一天。

在中午的時候，合作飯店裏每一張餐桌都擠滿了人。我們走進去的時候，一個帶着紅軍軍帽的小傢伙正爬在天井中央。這是毛澤東的兩歲的兒子。廚子頭用一雙油膩的筷子夾了一隻大蝦子從廚房窗子裏送給他。小毛就歡天喜地的拿去了……

我們被招待和另外一羣吃客坐在一起——他們裏面有一些年輕的軍校生和陝公女生。一看上去很不容易分別他們的男女。制服是一樣的，女生也剪了很短的頭髮，帶着一樣的布軍帽。在陝北，裙子和長旗袍是看不到的了。

「你對於中國婦女有什麼感想？」一位顯然是男女平等主義者的女士問我。她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畢業生，現在是黨校的教師。

『不要理她』在桌子那一面一個大塊頭男子用法國話說。他是政治局的一員，正是——我偶然知道——她的丈夫。『她不過是憑你捧她們婦女幾句而已。』

但是那位發問者却不肯聽了這些打趣話就拉倒。她繼續談着中國內地的婦女的地位，談着室裏媳和穩足……

中國婦女在社會上一向就有很大的勢力，就是現在，她們比起日本的婦女來，已經『解放得多』了。但在延安婦女所以成爲一種社會勢力，倒不是因爲『老太太』們在家庭裏權力之大（人們會永遠記得中國曾經有過母系家族制度的。）在這裏是，婦女參加了軍隊，參加了政府，參加了教育。她們現在已經找着結婚之外的出路了。

在陝北那樣蹙腳的地方，很少的城市裏是有書店的，但在延安倒有一另，是在一條小街上。它還有玻璃廚窗哪。裏面的書和在上海四馬路一帶所看到的很不相同，那位青年經理向我們力說，他們的貨色是『有選擇的』。

桌子上陳列着許多標準的中文雜誌，大部分是過時的個把月的，這當然是因爲戰爭的原故，而且中國的交通是向來不大可靠的。還有許多中文的新小說，教科書和地圖，也有一些英文的，德文的，俄文的書。

籍。有一張桌上陳列的是延安新中國出版社出版的平裝書籍，大部份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標準著作的翻譯。在雜誌中間我發現了一個熟識的封面：民主，「我們在等這刊物的最近幾期。」那位經理說，「它在學生中間是非常流行的。」

我告訴他，他得長久等待下去：民主在北平死掉了，當日本人到那裏的時候。

在東門外有一座動人的石拱門，這是運動場的大門。預定在這裏舉行的每年一次的紅軍運動大會因為三個月之前的開發命令停頓了。這運動場裏有跑道，跳遠和跳高的沙池，六個籃球場。在這樣涼爽的十月天氣裏運動是特別當令的。

我和一位軍校的教官打了許多盤網球，他是那些內戰時期衣不解帶，身經百戰的指揮官之一，假使他拿的是大刀或馬刀而不是網球拍的話，也許手法會純熟一點的吧。但是他們是這樣的人，越是不會的事越是專心去做。再過一年的話，延安的網球也許會進步到中等程度了……

少先隊請我們某夜晚上到青年俱樂部去。我們發現那俱樂部是設在浸禮教會堂裏面。集會廳是個禮拜堂，這是座中國式的建築，有一座鐘樓可以俯瞰附近的地方。「那些傳教師呢？」我問。

「他們不肯回來，雖然我們叫了他們幾次。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房子了。去年冬天我們把這禮拜堂的屋頂完全修過，因為它塌了……」

那沒有地板的泥地上，在一檔一檔柱子中間擠滿了農民的小孩子們，還有一隊就要開到前線去的兵士，節目單上特別揭出兒童團的農民舞，她們穿着彩色的襯衫，頭上都繫了一條紅手帕。軍校的戲劇團也有二齣表演，裏面有一位非常非常漂亮的女士（她的綢旗袍是屬於另一世界的）主演重要的唱歌部份。兩手被綁着，象徵中國；她用那訓練得很好的，唱中國舊戲的嗓子唱出全民族的痛苦……

「現代主義者社（譯者按：這社似乎沒聽說過）想不上演這個戲，」基姆——我的陪伴，一位高麗革命者——湊過來和我耳語。「他們說這是舊式的，而且是布爾喬亞的。但是毛澤東却贊成它，所以這戲就沒有刪掉。」

那位女士唱歌的時候，滿屋子的人寂靜得沒有一些聲響。我想像那些逃之夭夭的牧師們假使在座的話，也會着迷的吧。」

沿着河邊，在陽光的照耀之下，一帶山坡在活動着。那是紅軍大學的突擊隊員們正在掘那些黃土，要掘成無數的窖洞做他們的新家。（日本飛機來偵察過了，全延安就要鑽到地下去。）羅瑞卿他從前在江

西的時候在一次已經記不清的戰事裏幾乎被砍掉腦袋，因為受了傷，所以現在說起話來有聲無氣的他帶着一點驕傲指引我們看那緊張活躍的場面，又簡略的告訴我們最近要建造一所避彈地下醫院的計劃。那些突擊隊員在緊張的工作中，而且互相競賽。女生們和男生們一樣的勞苦工作，每一隊都努力想把自己的隊旗插在對手的旗的前面。（大概是隊旗記工作成績——譯者）這是中國的史達汗諾夫運動者……

一個身材苗條的，穿制服的黑髮青年從我們身邊經過，臉上冒着微汗，面色鮮紅。

「你認得她嗎？」基姆問我。

「不，我怎麼會認得她……」

「她就是昨天晚上那齣戲裏唱歌的女士。」

關於延安我有許多的熱愛，却也有二二指摘。我決沒有忘掉「邊區」的物質的艱苦和財源的缺乏，但是我總覺得運用同心一致的熱情和創造力來克服物質條件的努力，還是不夠；雖則這裏的熱情和創造力已經是中國其他地方少有的了。也許是我誇大了此地這種放任主義的派頭，但這未必是如此吧。

但是對於這種枝節問題都也不可忽視。在舊日，人們往往攻擊共產黨太過放任男女關係，一切的政

擊之中這是最爛調，最通行的。我記得從前有一次在江西，一位官員給我看了一張前蘇區的「離婚證書」，那上面很草率的註明離婚理由：「和丈夫的階級不同。」而且據說這位女子當天就和別人結婚了。這件事因此成爲那位官員大罵「共產黨沒有道德」的材料。

一天下午，我和基姆在爬山，那山是「抗大」校址所在地。我們看見那校舍後面的廣場上有這麼兩千人在一座講臺週圍聚集着，都是穿藍制服的。「怎麼回事呢？」我問，「羣衆大會嗎？」

「不是，」我的同伴說，遲疑了一下，「是羣衆審判。」隨後，他告訴我這個故事。在當時，這事情還沒在報紙上宣佈，第二天由於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就在新中華報上詳細的發表了。

大約一個禮拜之前，就在「抗大」校旁這條河邊發生了這個悲劇，有一個年輕的陝公女生，她是最近才到陝北的，她是一個媚人的女子——也許這是她的最大的壞處吧——她很美麗，有許許多多的追求者。追求者羣之中最熱烈而堅決的是一位紅軍大學畢業生，三十歲的年紀，現任團長，他是一個「老八路」，有十年的戰鬥經驗，和模範的革命歷史。

幾個月以來，他的愛火狂熱的燃燒着。他三翻五次的向這女子求婚，但是她——她只有十七歲——却冷淡得古怪，似乎是她對於被追求比結婚要歡喜得多。一天晚上他又去找她，他們就一同出去了。而第

二天早晨就在河邊發現了她的屍首。

這是一個情殺案，但是相當嚴重。這位青年上校立刻被懷疑了。但是他最先還想否認，自稱「實不知情」。而他的新擦的鎗却洩露了他的秘密。當他被捕之後他就供了出來，他和她爭吵過，他要求明確確實的說一句：行還是不行。但是她不說，於是他發瘋似的開鎗打死了她。

事情是很明白的；在歐洲的報紙上，這種事情——雖則是不同的意義——常常可以讀到。我的興趣是在於處理這事的「陝北方式」。

被告拘禁起來之後，「抗大」和「陝公」就放假一天讓學生們研究這事件的詳情，隨後——就在我們從山上看著他們的這個下午——由死者的以及她那愛人的同學們大家公審這個案子。

「陝公」的大部分學生，還有幾個和死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都認為死者也得負相當責任，主張對於那青年上校爲了他的革命歷史從輕判罪。但是軍校學生的全部，主張判他死刑。他是一個共產黨員，而他的責任是特別重大的。那些推舉出來的辯護人互相爭辯着。

最後，因爲他開始企圖抵賴這一點，到底被判死刑了。假使他坦白的自白的話也許可以免於一死，受一次警告和降級的處分。但是他却不忠實。由羣衆表決死刑之後高等法院的法官正式宣判，大約在我們爬過那小山之後一個鐘頭，那軍官就被鎗斃了。

「他是可憐的，」基姆悲傷的說；我知道他個人的同情是在那一方面。「但是黨的紀律是不能忘掉」的。

「虛偽，信命，和徇私」——這中國式的三位一體的寶貝，現在在許多方面仍然根深蒂固像在腐敗的前清時代似的——在延安却被堅決的全部推翻了。單這一點，就足以證明共產黨的革命不是含糊的。

（譯註）關於這悲劇的詳情這婆羅話也許有錯誤的補充。最重要的一點是，據當時內地某一二型紙所載，兇手是自動出首的。但並沒有因此釋放了他，因為所謂的紀律固然不容許放他，而且因戀愛殺人是不沒有寬恕的理由的，關於這悲劇的經過極劇中的陝北也有記載，最好參看一下。

第四章：到山西去

第四章 到山西去

一 別延安

在十一月初，延安已降初雪，我和它告別，開始第二階段的旅行，到前線去。我的暫時目的地是太原，但這時候太原正受着從保定向南推進的一隊日軍的威脅，他們佔領了石家莊的鐵路交叉點，進攻晉東娘子關的要隘，又獲得了勝利。娘子關的失守使晉北華軍的側翼失去了掩護，因此太原方面不久就要撤退，是不可避免的。

最安全的路線似乎是從東面渡黃河直接進入山西，再讓戰局的發展決定將來的行蹤。這真是所謂聞道而行，但是秋天的天氣是正宜於這樣走偏僻小路的旅行的，而且從陝北到黃河渡口甚至到前線司令部，八路軍是都有聯絡的。我把這種計劃和吳亮平同志討論。

「我們可以給你馬匹和衛兵。」他說，「還有給朱德的介紹信。」他匆匆的寫了一張便條給延安的參謀長，「他們會照應你的。」

這位參謀長對於照應我是勝任愉快的。「一匹馬和一匹驢子，」他一面寫着，一面說着。「你歡喜騎那一種就騎那一種——但是我勸你騎驢子。你有軍服嗎？沒有那末把這張條子拿到軍服房去領吧。你還得領一件大衣，冬天在那些山裏是很冷的。」當然他是對的，在一個中國戰區裏西裝並不是很安全的裝束。在內地是不大有外國旅行家的，假使被人誤認我是日本人的話，我倒不大願意。

我走到一個陽光充足的院子裏，那裏滿耳朵是縫紉機——都是舊貨——的軋軋聲。一個一個很長的房間是有許多束着圍裙的女子——其中許多是釋放的政治犯——正勤苦的給她們的軍隊做着衣服。一個工人來量了我的尺寸。「你的軍服今天晚上可以做好。」我不禁有點吃驚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走出延安多禮的外交部，集合出發。我的衛隊是十二個步兵，他們都是正式哨兵隊的兵士，另外還有兩個政治警察局派給我個人做隨身衛兵的。他倆是陝北青年，他們的土話我一點也不懂；他們對於毛瑟鎗比彬彬有禮的談話要熟練的多。那些兵士是中國各地來的人——江西、貴州、四川都有，他們的首領是湖南人，一位二十五歲的青年的老資格。

我後來知道，八路軍是無論到什麼地方沒有不武裝全備的。我們這一隊全部穿着棉軍服，帶了預備替換的幾雙襪子和兩雙鞋子——有的人因為習慣的原故寧願穿草鞋走路。每人有兩個手榴彈，身上束着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長的子彈帶。但是他們的來福鎗都沒有刺刀。

我覺得把這種武裝和我在華北看見的日軍的武裝比較起來，是很有興趣的，日本兵背上的包裹就是照歐美軍隊的標準看來也是太重的。當然，這因為日本步兵大多是坐汽車行軍的原故。他們身上捆捆紫綵的各種零件比一個中國磨刀匠的還要累贅。他們穿着長統皮靴行軍，靴底上大多釘滿了鐵釘。而且每人一頂鋼盔也是少不了的。一看上去他們都打扮得很整齊精緻；無疑的，在檢閱的時候，或是在平坦的大路上成縱隊開步走的時候，他們是出色的新式軍隊。

但是我想像他們假使是在晉北的羣山裏或是在像我們現在所經過的田野裏的情形。那些捆捆紫綵的東西——也許每一件都是很有用處的——就變成吃不消的累贅了。靴子在山路上是滑的，特別在冬天，北方高原上到處是冰和雪。所以後來有一位參加過雁門關戰役的軍官告訴我：『假使我們和日軍同時向一座山頂上爬去，』他得意的說，『我們到了山頂上，他們還沒有爬到半山腰哪。』這是當然的。

無疑的，假使在曠野作戰，或是爭奪某一據點，就是八路軍也要吃暈的，因為日軍的機械化裝備佔了絕對優勢。但是這種戰鬥正是八路軍——這點是它和中國其他軍隊不同的地方——所儘可能避免的。他們行軍敏捷。這種極大的流動性比野戰砲隊對他們更有用處。

走過了那座新造的大橋——這是共產黨的工程學校的得意的成績——我和最後的延安的同志握手告別。『我本來希望你能够等到十月革命節（十一月七日）之後再走的，』基姆戀戀不捨的說。『但

是在山西你可以看到更多的事了，」另一位同志說。他是廣東共產黨的一個組織者，我知道他想到前線去，但是却被留在延安。翻譯日文電報，心中是暗暗有點抱怨的。

我以極大的惋惜告別了延安。我在那裏感到溫暖，在那裏受到了令人難忘的款待。我知道，對於許多中國青年，這陝北的一個小小山城的價值是無比擬的。它是一個象徵，象徵一種從許多年的艱苦萬狀的戰鬥裏鍛鍊出來的領導。這種領導，中國正需要它。

二 越過陝北

從延安東行，穿過延水流域，旅途是容易的。很幸運，在我們動身之前惡劣的天氣放晴了，陝西北部的晴朝使人愉快。太陽升得高高的時候，我們幾乎感到一點溫暖了。

一上路我們這一小隊立刻採取了軍隊的隊形。三個人走在前頭像斥候似的，帶領大家爬山越水抄小路前進。我和大隊在一起，騎了一匹灰色小馬，騾子馱着行李跟在後面。所以不聽那位參謀長的忠告，不騎騾子而騎馬的原故，主要的爲了我的「自負」。馬是比騾子高貴一點的獸，而且我，那匹騾子是個特別討厭的傢伙。我的隨身衛兵像影子似的跟在我後面，而再向後一百碼，是兩個托了鎗的兵士做了小型的後衛。

最初我對於這種小心的警戒感到有點好笑。「你們怕土匪嗎？」我問衛兵的隊長（不過幾個月以前他們自己也是被一些人稱爲「土匪」的。）但是他正正經經的說：

「這些山裏是真的有匪的，」他着重的說着，「有字。」你不知道就在延安境外三十里的地方曾經有土匪襲擊周恩來的專馬？我們把這班土匪解決了，但是也許還有另外的。而且，爲了紀律的原故，我們隨時警戒着。是應該的。」稍後，當我看見了一些別的中國軍隊在山西的情形之後，我就懂得他的意

思了。

我們在路上碰到幾次結隊的山民，武裝了鎗和刀。但是在陝北看見武裝的農民是很平常的事，因為全邊區都有游擊隊的組織的。縱使其中有真的土匪，他們也不敢冒險和我們這精銳的小隊抗衡等事的。

在這十一月初頭，田裏除了棉花之外各種穀物都有。農民們在農場上忙着打穀。雖然雨水不調，但是收成很好，今年冬天不會缺乏糧食了。當然照那種看慣了綠油油的稻田或是佈滿了樹林的牧場的眼光看來，陝北這些山地是很貧瘠的；但是這種土地也能夠維持那些勤苦耐勞的，在山坡上或是黃土山谷的邊上辛苦耕種的農民們的生活。而且在沿河的一帶，放牛羊的牧場也有一些。

在陝北到處都可以看到黃牛。人民把這種牛用來做一切的工作，而那些黃牛對於負載東西也和耕田一樣的熟練。陝北這地方在別的方面可能很是貧乏，而家畜和人口的百分率却比中國其他地方的也許較大一點。驢子，騾子，和駱駝在路上是常見的，馬雖然不大看到，但這是因為幾乎全部都徵發到前線去了（我的衛兵們的話使我相信我這種意見）。

陝北的村莊幾乎是除非你已經走到了它的旁邊，否則不能看見它，因為它們大多數是凹在山谷裏的。居民都住在土洞里，這在戰時倒是以使得他們免除了空襲的危險。這種土洞往往被人嘲笑，我不能不對

它加以辯護；我在這種洞裏睡過許多多次數，我可以保證這一事實——它們比華北一般的鄉村房屋好了無限。它們清潔，夏天涼快一點，而冬天又較為溫暖，在那和土洞一樣長的大炕底下裝了煙管，把灶裏的火引過來使它溫暖。而且，雖然只有一個大窗子，但是光線已經充足得很了。

我們動身後第一晚就宿在這樣一個村莊裏。共產黨的口號有一個是「不侵害人民的利益」，現在我有機會可以看一看他們實行得怎樣。這裏是邊區範圍之內，軍事人員免費借宿是合法的，但是他們徵求屋主的同意租了我們宿夜的房間，而且用法幣付款。這晚上的情景真是動人的，他們跑了一整天，這種辛苦已經是許多國家的正規軍隊吃不消的，而且從清早吃過東西以後一直沒有再吃，但是宿夜地方決定之後，他們立刻自己動手打掃房屋，煮晚飯，切馬料——非常高興的做着所有的工作。我們到這裏的消息傳出去之後，村裏一半的人都擁到院子裏來了——有幾個人顯然有點驚慌的盯着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外國人儘看，大部分是和那些兵士混在一起，談着戰爭，談着屠家過日的事。這裏有女孩子們和年輕的女人們，假使是別的什麼軍隊的話，他們老早慌慌張張躲到最密的秘密的角落裏去了。而且老是有入帶了些禮物送給兵士。老頭子們往往是請兵士抽煙，有一兩個小孩子羞答答的送果子給他們。明天清早洞裏和院子裏都打掃得乾乾淨淨，兵士們照數付了費用——傳統的討價還價仍然是有的。

軍隊能夠獲得當地居民堅決的擁護，從純粹的軍事觀點看來，究竟有多少意義，只有了解黨軍的力

量的人才真正知道。我會經在河北看見過某部中國軍隊因為缺乏和農民的合作所受到的致命的影響，那時候日軍沿着交通線長驅直下，經過居民稠密的鄉村沒有受到任何的反抗。但是他們假使在這地方就得碰到不同的接待了。

我們從一些土岡上翻過，避免沿着河灣要多走一段路，隨後就到了延長城。這城的地勢和延安差不多，城牆的一面高聳在山上，一面沿着延水——這河就是延安城外的那條河。我們在延長留了許多時候，我參觀了那裏的全中國唯一在開工的油井。在油井那裏一羣張壯的工人歡迎了我們，我看見他們仍然帶着潑紅星的便帽，顯然是還沒有來得及掉換的原故（軍隊也是如此。）機器是極舊式的，但它工作着，供給陝北點燈的煤油。

從延長前進，我們沿河走了一天多。這一段河岸很狹，水流深而急，有幾處有瀑布和深淵。我們的路有時簡直是懸崖上的『鳥道』。有幾座橋很危險的架在奔湍的急流上。幸而我的小馬走起來平穩得像山羊似的。唯一使它爲難的是路上的冰或雪，這些小雪使我不由自主的，不愉快的想像到從岩石上掛下來的危險的冰柱。

兵士們老是一面走一面唱，他們所唱的歌曲名目繁多。他們這一個軍隊總是自己編歌來唱，有些歌

是根據紅軍所經過的各省的民歌改編出來的，地方特色非常濃厚，而且在音樂本身和歷史意義上都頗有價值。有時他們唱的是在上海和西安也常聽到的『民族解放』的進行曲的斷片，但是有時又唱一些歐美人比較耳熟的歌國際、歌馬賽，或是快樂的同伴。我抱着一種奇妙的心情聽着這些鄉下人的喉嚨，熱情的洪亮的，帶着各種不同的土音唱這些歌。

這天晚上我們宿在河岸旁邊一座懸崖上的一個堡壘裏，明天過來我們就離開河道鑽進了羣山之中。雖然早晨的寒氣非常冷峭，每一根草上都結了厚重的霜，但是我們爬了一程山路走到一塊平地上之後，大家都被汗浸透了。天氣是很晴朗的，登高四顧，風景非常壯麗。在東邊，是一疊一疊的山峯，一望無際；在它們南頭却是一帶更高更大的山，青而帶黑的伸展在太陽光下。

『看見嗎？』我的衛兵說，一面用手指着。『在那邊就是山西。』

三 渡黃河

遠遠的在我們前面，羣山的海突然分成兩半，那地方正是黃河走到渡口還有一天的路程。衛兵的引領把地圖研究了一下，我們於是從一帶黃土高原前進了。

黃河，從它的發源地西藏（按應是青海）羣山到山東平原的海岸，平分了中國。它是所謂『中國的災星』。但也是（如戰後所證明的）中國的意外的幫手。在歷史上黃河仍然是一個未解的謎。從它的利益同時從它的禍害兩方面看來，它是中國一切河流之中最典型的中國式的。沒有外國兵船威脅它那易變的河道；這奔騰的泥水含蓄着一種原始的力量和一種難消的怨恨。在夏季和冬季它的脾氣尤其惡劣。大約一年之前，我曾經渡過黃河，從平靜的山西走進在內戰的陰影之下的陝西。現在，我又要從那次涉冰而過的多風的禹門口以北大約三百里的地方，渡河走進山西了——但是現在它已經在外國軍隊的鐵騎之下。

一時是多人的烈日（雖然這是十一月了），一時是刺骨的冷風，一整天我們就在這兩者的輪攻之下，走着那奇奇怪怪地盤旋在危巖上的小路，和一些架在兩個山峯之上只有三尺寬的天然橋樑。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廣闊的曠野，一看上去真是滿目荒涼的景象，雖然決不是沒有居民，只是那些稠密的小村

落都沉在山谷底下，不深入山谷就不能看見。我們向一座最高的山峯上爬去，那上面凸立着一堵城牆和寶塔，也許是一處中世紀的堡壘。

走近一看，那只是一個廢墟，裏面有兩個兵士向我們好奇的張望着，大聲的向我們叫着他們的糧食總共不夠我們一頓吃的，從這地方向東一看，山西的羣山清清楚楚的顯在眼前，一帶綿延的山脈從我們脚下的高原伸展出去，盡頭是一座模糊不清的山谷，在那裏奔流在晉陝兩省之間的黃河依稀可辨。

但是還有二十里路，他們告訴我們：而時間却是黃昏了。

『今天晚上我們不能渡河了，』我的衛兵的首領說。今天真太辛苦，連我這些結壯的同伴們也疲倦了。離開延安以來，我的小馬第一次脚步顛簸了，而那匹驢子，這麼暫時的一歇下來，却就不肯再動一步，使那馬夫用盡了種種呼喝勸誘的術語才算成功。我們決定投宿在第一個走到的村莊裏；而大約一小時以後，我們就找到一個村莊了。我們繞過一座山崖，突然發現自己已經置身在一個陷進去的山壑裏，這裏面有這麼二十家農場聚集着。當然，我們又受了一次友愛的歡迎；在那裏渡過了這次旅行中最舒適的一夜。

第二天早晨，霧籠罩着羣山，而且風變成了南風。但是我們動身很早，現在已經在下山了。最後當我們到了山脚的時候，太陽却又掙扎着從雲層裏透出一些光來。我們向下一看，前面是一條寬闊的水帶，像一把刀似把羣山劈成了兩半，這就是黃河。

走完了最後的山坡就到了河岸，附近是一個村落，稀鬆疏疏的幾家石屋和窑洞。這一段河道筆直的有六七里長，不到一里闊，而闊度很均勻，這裏水勢很大而急，但是這麼大的水奔流着却沒有多大的聲音，真是真怪。三條跟河岸平行的，由一串巨浪組成的水線，從山上看像是微微的波瀾，靠近一點看像是海邊上洶湧的狂濤；這些巨浪是在那河床較淺的地方產生的，但是它們——跟海邊的洶湧狂濤不同——不向前推進，而幾乎像是靜心的保持着不變的形狀，使人發生一種奇異的寂靜的感覺，這種不變的整齊的樣子完全是河流的速度所造成。

這裏不是一個正式渡口，我們所坐的船是八路軍的兵士看守着的。這船是新造的，但是和中國一般的船一樣還是古式的，也許自從所謂「洪水時代」以來中國的船就是這種式樣了。我們費了許多手脚，屢出它艙裏的積水和把它詳細檢點一翻，於是用拉纜的方法把空船逆潮向上游拉去。

拉了五六里的路程，船老大才表示滿意。我們就把這笨重的大船拋錨在一塊大石附近，於是上船。上船是很費手脚的，但最後，我們一羣和差不多一打的驢馬，還有二十左右的其他乘客，倒底緊緊的擠在船裏。四個強壯的士兵搖櫓，兩個船夫掌着粗長的篙子，於是我們出發了。

等到船離岸稍遠駛在洶湧的波濤上的時候，它就像風中的落葉似的亂搖亂抖起來；我這才體會出我們是處在怎樣的境地了。好像火車窗外的東西那樣，河堤迅速的向後滑過，我們剛才上船的地方，一會

兒已經落在後面很遠了。但是船雖即前進得非常迅速，要斜向對岸一點兒，却很不容易。搖船的人很命的搖櫂，一面粗聲的，押韻的唱着。

隨後我們碰到了第一條浪線，沉重的船傾側在水上，搖盪得像一隻小船。我的小馬被我把握鐵帶緊了，但是那些騾子——大半身上還驮着東西——起初暴躁不安，隨後就狂叫起來。幸虧我們是撐得這樣結實，除非跌到水裏，簡直沒有移動的餘地。河水不斷的打進來，而每次我們的船撞上一個浪頭的時候，那迎面吹來的狂風就把一些冰冷的浪花搥到我們臉上。

這是我所經驗過的最驚心動魄的一次水上旅行，騾子驚惶的亂踢船板，使我有了一會兒擔心牠們會把船踢破，這種使人嚇得發顫的危險情形，我們經歷了三次，就在渡過那三條浪線的時候。其實全部的航行不過一刻鐘光景，但却像時間長久得永遠沒有完結。我們到達對岸的時候，又經過一次幾乎使船翻掉的震動。船已經幾乎被急流帶着航完了這一段直的河道要轉灣過去了。

「你害怕嗎？」我的衛兵幫助我從亂嘈嘈的船裏走出來，一面問我。「很害怕，」我着重「很」字說。但是這種危險的渡河，在他們軍隊裏是很平常的，軍需品就是這樣經常的輸送到山西。我對於中國軍隊的運輸工作的尊敬，大大的提高了。

在山西這一邊，也是一樣的陸階的羣山；在那些山上這裏那裏的點綴着一些碉堡，這是圍錫山在一年以前所造，用來抵禦現在和我在一起的這些人的（指紅軍）。在現在的情形之下這些東西不免令人發生感觸，就是後來圍自己向我指點那些堡壘的時候也是不免的。被稱為「匪股」的這一支軍隊——在一九三六年他們曾經渡河入晉——現在（那些堡壘的牆上仍然有一些反共的標語殘留着）却被視為保衛山西的軍隊了。

有若干象徵提醒我們現在是在另一種權力範圍之下了。我們宿在一個小客棧裏，就有一個當地的官吏來問我到什麼地方去，問我的姓名來歷，我告訴他是從延安（這種字眼假使在西安的話，仍然會引起深重的猜疑的）來的之後，他就微笑起來，好像他知道這是當然的事情。於是說：「啊，是的，八路軍是我們很好的朋友。」隨後他請我和他一起吃茶，好像藉此保證我們的關係是友好的。

我急於知道一些消息，但是他告訴我很少。晉北局勢很壞，他說，省政府已經搬到晉南去了。好像太原已經沒有法子保守了。

太原失守了——我後來知道的——就在我們渡過黃河的這一天。

四 山西的戰爭

我們聽說太原失守，是在到了第一個八路軍在晉的根據地之後，這是我們到山西幾天以後的事。爲了顯明的理由，我下文對於一些地名和道路要保守相當祕密。山西的戰爭是還沒有完結的。

太原的失守，大大影響了我的計劃。我離開延安的時候，希望一直走到太原就可以在總司令部裏會到朱德和彭德懷，但是現在却沒有這麼簡單了。

「這裏發生了些什麼事呢？」我問這根據地的指揮官。

我知道了從十一月初以來山西戰局的大概。日軍的計劃是很明顯的：儘快的佔領太原，把這裏作爲根據地再向南推進，沿着廣闊的汾河流域突破山西的中心。這個計劃的第一步已經完成了，只費了很短的時間。日軍在山西所遇到的僅有的堅強抵抗，就是八路軍在晉北的戰鬥和衛立煌的軍隊在忻口的戰役。

在九月裏，在他們還沒有佔領石家莊和切斷正太路之前，大隊的日軍曾經從晉北分四路前進，合擊太原北部的華軍。就是在這一帶地方八路軍初驍身手，平型關和雁門關兩仗，給侵略的軍隊吃了開戰以來第一次的敗仗。在十月中間，八路軍把這四路日軍中的三路和他們後方的聯絡都切斷了，差不多五萬

日軍在太原之北戰略上陷於包圍之中。

晉北華軍的實力足以消滅這被圍的孤立的日軍；日軍唯一的希望是從山西東部迅速的開到援軍好獲得新的聯絡。中國軍隊方面最要緊的是守住正太路，假使不能守的話，就應該退一步守住娘子關——這是中國最天險的關隘之一。假使娘子關失守，晉北被困的日軍就得到了解放，而且可以長驅直下太原。於是八路軍在羣山之中奮鬥出來的成績就會喪失了許多。

在回答我的問題的時候，那位指揮官苦苦的掙笑着，常常說『不大好』這一句話，使他的笑和藹了些。他是一個頑固的老戰士，在胸口的口袋裏面還帶着紅軍的五角形的紅星。

『你知道，在中國歷史上娘子關從來沒有在戰爭中被佔領過。』他說。『我們會經請求政府派生力軍來；我們要求派四師兵來保衛山西和防守太原，我們聽說兩師桂軍已經派出來了，但是他們却沒有真的開到這裏。』

『實際上，却把在平漢線苦戰了幾星期的兵調到了娘子關。娘子關就由這種兵隊把守。所以當敵人堅決進攻的時候，他們就潰退了。』

『因此太原就決不能保守了吧？』

「這倒也不盡然。但是山西有一些部隊的戰鬥力是不很大的。」我覺得他的外交辭令倒也不壞呢。
「你知道。」他繼續說，「日軍自以為攻擊的力量很強，足以進退自如，儘可以不必注意交通線的保持。所以假使在正面把他們抵擋住了。八路軍就可以切斷他們的後方，從背後夾擊他們。我們已經很成功的這樣做過許多次了。」

「從後方襲擊日軍是很容易的。你聽說過我們在陽明堡破壞了敵人二十四架飛機嗎？我們的軍隊從一個日軍從來沒有懷疑和偵察過的高山頂上，監視那飛機場有幾天的光景。最後我們看見來了許多飛機——二十多隻。這天夜裏我們就襲擊了。」

「我們派了一團兵；一營人去截斷飛機場和別的地方的聯絡，一營人施行攻擊，他們也有一營人守着機場，我們由農民指點渡了河，出其不意的襲擊了他們，很容易的破壞了那些飛機，在敵人疏忽了跟後方的聯絡的時候，這種行動是完全可能的。」

「八路軍曾經打過大仗嗎？」我問。「我所謂大仗是指密集的陣地戰的意思，這種仗打過沒有呢？」
「只有頭上幾次是的，」他回答。「雁門關和平型關的兩仗是很大的。隨後在南輝和洪應泉我們也作陣地戰。這都是還有可能制止敵軍前進的時候。現在我們不集中軍隊了，只是分成流動的單位活動。用突然的襲擊給敵人最大限度的損害。」

「就是雁門關之戰我們也不是簡單的防守陣地，而是在白天撤退引誘敵人，在夜裏進行攻擊，我們從經驗知道跟日軍作陣地戰的時候，敵人總是用轟炸機隨後就用砲隊；最後是唐克和裝甲車。我們要落後的技術裝備來抵抗這種火力，那當然要受重大的損失。」

「現在八路軍決不打固定的硬仗，我們要發揮流動性。現在我們的戰術是深入敵人的後方。因為我們跟人民的良好關係，所以我們的糧食問題和交通問題從來沒有發生困難；到處有民衆和我們合作，幫助我們。所以我們能够佔領在日軍後方的許多城市突擊敵軍包圍和消滅孤立的敵軍，或者假使不能消滅他們的時候，就在他們的援軍沒有開到之前撤退。」

「太原既失之後，將來會怎樣呢？」

他聳聳肩膀。「中國軍隊正撤退到晉南去。也許在隰石或是什麼地方他們會再抵抗一下；但是我想他們是不能夠制止日軍的主力的推進的。此後山西的戰鬥主要的大概是流動的游擊戰爭，這是很可能的。」

後來我知道了山西華軍（除了八路軍）的詳細情形之後，就明白他所說的了。許多的華北地方軍隊都沒有冬季軍衣，沒有鞋子。他們的月餉大約是每人六塊錢，每月的伙食就要去掉五塊，所以實際上常常是只拿到六七毛錢一個月。

但是八路軍似乎精神煥發得很。他們並沒有任何空想的樂觀，而是現實地觀察戰爭，一心一意的準備着長期奮鬥。對於他們，真正的鬥爭還不過是剛剛開始。

我知道縱使日軍達到了潼關，山西的戰鬥是還不會完結的。因為八路軍儘有在全省各處建立起游擊根據地的可能。已經有了三十縣，在那裏八路軍動員着和武裝着農民，這表示一種新的，人民的抗戰，已經起來了。

『你要到前線去嗎？』這根據地的指揮官曾經問我。『好的，我們要送你向南走一段路，以後你就可以和羣衆組織聯繫起來。我們的『前線』現在就是整個山西，這一點，日本人不久就會明白的吧。』

五 退出太原

這小小的山裏的市鎮上，只有一家飯店，在我們的卡車要向南方開發之前，我就趕到這店去「塞」一頓提早的早餐。我們坐在內裏的一間房裏，一對蠟燭幽幽的照着，房間裏冷而陰沉。另外有一個客人獨自坐在一張巨大的圓桌旁邊，這種桌子顯然是供鄉村式的宴會之用的。這人是一個中國軍官，他的制服汗穢而破損；他正在吃麪，那種狼吞虎噬的神情，就像他已經一個星期沒有好好吃過一頓了。

他看見我們走了進去，就賊頭賊腦的不安起來；但是看清我的衛兵是什麼人之後，他又恢復常態了。我的衛兵們對於「我們是第八路軍」的自我介紹，是永遠不猶豫的。

「呵，八路軍！你們在北方打得很好哪。」

他是剛從太原來的。參加最近這次戰役的人，我所看見的他，是第一個。這次戰役使他到現在還是驚魂未定，逢人就急急忙忙的訴說着。

「我告訴你，那真可怕。我們從來是連人也看不見他們。只看見飛機一次一次的來——澎，澎，還有大炮；我們被炸死了幾千。還有唐克，還有裝甲車……」他的眼睛恐懼地閃着。

「他們」現在在那裏？」

「他們已經佔領了平遙——那裏比太原還被炸得厲害，也許他們已經到了汾陽。我告訴你，我們是後有法子對付這班鬼子的。」

他吞完了第三碗麵，悲傷的打着呃，也不招呼我們一聲，就走出去了。顯然的，他的膽嚇破了。

「你覺得這人怎樣？」我問我的衛兵，那人講話的時候，他一直坐在旁邊莊嚴地聽着，把手裏的鎗按在膝上。

「喔，他是對的，真是對的。不過他害了「恐日病」，紅軍是不怕日本的唐克和大砲的，我們知道怎樣對付他們。」

他——只是十七歲的青年——這種老練的口吻是很有趣的。當然，他是對的，共產黨的軍隊，由於內戰時期對抗優勢技術條件的敵軍的豐富的經驗，是決不會像一些其他部隊那樣打硬仗的。但是那位軍官的蒼白的，萎靡不振的臉和失神的眼睛煩擾了我這一整天。

我們一走到向晉南去的大路上，就看見了許多悲劇的景象，我們這地方是在華軍防線以內，離前線還遠，所以那些向南移動的軍隊是不必就心口軍的山砲的。但是那些軍隊在更近前線的地方曾經被轟炸和機關鎗連續幾小時的掃射，所以本來應該是有秩序的撤退，却使人看上去幾乎像一次潰散了。

各種各樣的運輸工具擁擠在路上，一堆的塵土瀰漫在空中。一路上，像我們坐的車子那樣的軍用卡車，向南的也有向北的也有人與物組成的這一大羣——大車，騾馬，走着的人——主要的是向南移動，像潮水一般，有少數單位是有秩序的——一隊騾子拉的野砲，一羣騎馬的軍官，一隊「七十五」速射野戰砲部隊，但是最大多數是零亂的，在路上蹣跚的走着，有時候使汽的抽着那些拉着塞滿了人的車子的，可憐的牲口。

在這路上可以看見各種各樣的制服和形形色色的帽子。有些帶着在一邊綴着青天白日的，德國式的鋼盔，有些帶着英國式的「白鐵帽子」（就是鋼盔）；有些是皮帽子，有些又是草帽，還有些簡直光着頭。有許多穿着翻領的大衣，但另外的却還穿着夏季的軍服，或是把一條破軍毯圍在肩頭上。浸浸血的綁腿布在塵土裏拖着；我在路上並沒有看見受重傷的，但是疲乏萬分的兵士我看見了許多。

沒有誰想把這個行列加以整飭，或是教這些沒精打彩的兵守一點秩序。最後，我看見一隊兵很鎮靜的，有秩序的休息在路旁燒早飯，他們的鎗整齊的架在地上由一個人看守着。我心裏只才感到了一種解放。「是我們的人，」車夫告訴我，當卡車駛過他們的時候，他們舉手向我們友誼的敬禮。他們是向北開拔的。

最糟糕的是那些可憐的散兵，從前線下來失掉了部隊的聯絡，他們的全副武裝現在是只剩了一把

刺刀，或是一排子彈了。但是有少數還沒有把鎗失掉，不過樣子也是難看得很。我們的卡車上雖然有二十多個人，却似乎還沒有載重過份，但是爲了一些外行所不能明白的原因，機件稍爲有點損壞。所以我們不能讓那些可憐的蹣跚着的人上車，因爲假使上來一個立刻就會上來二十，那末車子開不到幾十步就一定出毛病了。

但是跟那些心緒煩惱的士兵來解釋這種機器上的複雜問題是不容易的。最好的辦法是迅速的開過去一句話也不要解釋。但是在這種擁塞的路上要一直開快車是不可能的。我們一慢下來就有人要求上車，我們的車夫就得費盡唇舌和他們勸說。

一次，一個固執的兵士跳上了卡車的踏腳板，無論怎樣也不肯下去。車夫採取了消極抵抗，拒絕開車。他們爭執着不得解決，我打算着我得出面做個調解人似的說幾句話了。正在這時候，忽然從我們後面起了一聲鎗聲，一顆子彈從我們身邊幽幽的穿過。這是那惹事的人的一個朋友做的事，他這舉動未至太過火了。

立刻，我們裏面跳出了兩個人，開鎗的人被繳械了。「衝上去！」有人這樣喊；我的衛兵們拔出了鎗。好像一個不幸的意外事件要發生了。

但是衛兵隊長插了進來。「不要這樣，同志們！」他堅決的說，「我們不要拿掉他的鎗，否則他就要受

處罰的。」他拿過那鎗來，扳一板鎗機試試鎗是否真是空的，隨後還到車子外邊給那被繳械的人：「這鎗是給你打日本兵的，不是給你打中國人的。」他簡單而沉重的說：「假使我們能夠的話，怎樣會不讓你們上來呢？」接着他收小一點聲音對車夫說：「開吧——快！」

這個小小的意外很使我吃驚，因為，即在這樣亂嘈嘈的行程裏，大多數的人還是保持着良好的耐性。但是使我遺憾的是一種不好的紀律，許多軍官，照我看來是完全和他的士兵脫節的，他們自己舒服的騎在馬上。很不幸的，我對於山西軍隊的第一次印象就是如此。我現在才明白了在延安所常聽到的那種議論——中國的軍隊制度必須加以改造。這是真的，許多地方部隊是要大大改造一下才行；最重要的，士兵的生活必需改善，而且要用種種方法提高他們的抗戰的自動性。

一整天我們向南前進着，所經過的大多是山路。這裏是一輛翻在路旁的貨車，跌成了一堆廢物；那裏是一輛被遺棄的大車，沒有了車輪。有一次我們的車夫跳下車去察看一堆打破的石油罐子，居然很高興的揀出了兩聽半聽頭的機器油。有一個很長的時間，一輛小汽車走在我們卡車的前面，很荒唐的滿載着許多逃難的老百姓；突然，在一座山岡上，那車子裏的乘客像受驚的貓似的從兩旁亂竄出來，不一會兒那車子烘烘的冒起火來了。

當我們從一座由小船搭成的浮橋上開過了一條河，看見了平陽的城牆和寶塔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平陽城似乎很平靜的伏在廣闊的平原上。但是走進它的城牆，我發現出它的擁擠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通過那些軍隊，騾子，雜民和駱駝的沸騰的浪潮，最後我們走到了八路軍的司令部。

一下來，我當做我們弄錯了地方。在一間舒服的會客室裏，我會見了這地方的指揮官，他文弱而年青，漂漂亮亮的穿着一身卡其布軍裝，腰裏帶了一把裝飾用的「中正劍」(Ching Kai-shek's small sword)。我第一次看到八路軍是在延安，我看慣了毛澤東的褪色的藍布軍服和「抗大」教官的雖然整潔却也褪了色的服裝，所以這位指揮官的打扮使我疑惑起來。但是那種坦白的，不拘禮節的招呼，和門口有一羣「小鬼」的老例最後使我相信了。這是八路軍，祇是它的形態已經完全改變。我得弄習慣它。

第五章：八

路

軍

第五章 八路軍

一 政治委員

整天以前，平陽（當地人叫做臨汾）還是省政府的中心。但這剛纔已經移到南方的「一個未知的地方」去了。沒有人知道閻錫山——那個終於碰到滑鐵盧的多謀的老政治家——已到何處。這城市當時事實上是在軍事和「愛國運動」的統制之下。

「你一定要看看這裏的羣衆的組織的，」一個第八路軍的青年軍官提議說，「但你必須先看看周鳳來。」

我這次並未見過這位「亂黨」（斯諾是這樣的叫他）雖然我們以前曾在西安相處過一月，那時候他的掃帚，由共黨的新「障線」擁護着，會成爲搭救蔣委員長的生命的主力。周氏常在政治緊張關頭出現。我知道在過去的數星期中，他在山西的羣衆組織中十分活躍。

有一個人活潑地走進房來，他穿着樸素的黑色中山裝，確實是一個令人敬畏的人物。短短的頭髮和

鬚髮使他很像羅拔士 (D. H. Lawrence) 的畫像——一種被周氏的豐富的活力所提高了的印象。這樣的人如果不是一個革命家，就一定是一個藝術家。

他的態度是活潑愉快；他的兩手演着靈敏急劇的手勢。他操着流利的日常英語，但略帶法國的語調，或以一個法國字完成語句。(註) 黑色的眼睛充滿着生氣和活力，每當開始說話，兩眼就發出光來。他有天真的美麗，他有表示演說天才的權力。

『工作的進行如何？』我問他說，因為他當時是這樣的忙。我覺得或許不會再有問他的機會。

『政治的動員嗎？還好。你知道，我們在晉北曾有過一個在羣衆中工作的很好的機會。這是當像那樣的——當有了真的危險的時候，他們就給予我們以組織民衆的自由。但那時候是太遲了——日軍就到來，佔據我們已在開始工作的區域。現在我們必須把民衆運動擴展到整個的山西，這樣當日軍到來的時候，我們就將有真正的準備。』

『自太原失陷以後，這裏的情形如何？』

『是的，這是一個真實的危機——太原的佔領，和上海的佔領。現在日軍希望把華軍逐到黃河以南，

(註) 周恩來曾在巴黎留學兩年，爲一九二一年在那裏組織的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之一 (在中國組織共產黨的數月以前)。

然後宣稱華北的戰事已告結束。你知道，他們已經通過德國大使提出了「和平解決」的條件。在中國，看到日本的前進而沮喪的，以及過分依賴英美的助力的某些分子，以為現在我們不能在華北抗日了。」

「在這裏繼續作戰的機會是什麼？」

周氏皺了一皺眉頭。「當然，我們必須設法在黃河以北保持一些正規的軍隊。蔣委員長是贊成這一點的——他剛纔已派遣了更多的中央軍到山西來。但最要緊的却為加強中國的軍隊，並發展羣衆的運動。這裏有些軍隊是十分沮喪——他們已受了深切的痛苦，而且因為人民不起來支持他們，他們遂已有許多人逃跑。」

「我們必須改善中國士兵的生活，組織並訓練華北的民衆。這就是政府必須以支持和軍火幫助我們的地方，軍隊埋怨民衆不會起來——但這並不是民衆的過失，這是地方當局的過失，他們不肯應許人民自由動員。一部分，這也是舊式的軍紀的過失。你已經見過這裏的某些軍隊的情形，他們怎能盼望民衆來歡迎他們！」

「但是在華北抗戰有許多有利的地方。例如一般的地形適宜於游擊戰。這有，即使日本人能够佔領這整個的區域，他們也沒有足夠的軍隊。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問題。華北有三百以上的縣城，日本人即使在每一縣城駐一聯隊軍隊，也決不能把它們統統治領。而且，他們如果這樣做，那對於我們有利了——我

們能够挨次消滅各別的聯隊。

「正如我所說，我們希望某些中央部隊留在黃河以北，這樣，北方的戰事遂不致成爲單純的游擊戰。如果他們留在黃河以北，第八路軍就能成爲抗戰的脊梁。只要我們能够動員并武裝民衆以和他們合作，日軍就將看到，華北的戰事決不能在「像他們所想的短期內」結束。」

這是顯然的，組織華北民衆抗戰的主要的任務將落在第八路軍的身上。但有些事情還有賴於地方政府和省政府。在臨汾——留在華人手裏的山西省的最大的城市——官方性質的愛國團體正在逐漸取得合作。合作的程度，如周氏已經說過，是和日軍前進的危險適成比例。

「我當介紹你一個學生，帶你去巡視各愛國團體，」周氏對我說。我歡迎這個意見，因爲我自己的華語的程度當然不够取得詳細的消息；我早已決定，必須找一個操英語的游伴。在政治的根據地延安，語言並無困難，但在軍隊中，譯員很少。我早已希望在臨汾能有機會結識一個學生，和我同上前線。

所發生的事完全是命運的巧弄。因爲周恩來所介紹的譯員原來就是兩月以前我在天津英租界見過的東北學生吳君。他比以前更消瘦更憔悴了，但却以極大的熱忱向我招呼。他和幾個從北平來的學生在臨汾組織了一個學生會的支部，并在那裏辦了一個唯一的報紙。

吳君把我帶到當地的主要民衆團體的總部，這些民衆團體當時都異常活躍。它們都是官方的，或半

官方的性質，這——在山西——意思就是，它們都受着蘭錫山的公開的或間接的支持。它們有「戰區民衆革命動員委員會」，「犧牲救國同盟」，「敢死隊」，「少年先鋒隊」等等。一切都是志願的運動，都有政治訓練和軍事訓練的部門。

這些響亮的名字聽去並不陌生。這種運動我曾在中國見過很多，它們迅速地產生，也同樣迅速地消滅，能造成什麼效果，大可使人懷疑。但吳君不停片刻地對我說：「這所有的集團都有第八路軍的顧問和指導員。」這樣，就不同了。在此種導師之下，志願軍和游擊戰將並不純然是教本和理論；中國共產黨在民衆組織上的無敵的經驗已使他們成了這困難的技術的專家。在現時的中國，除他們之外，再沒有其他的人具有這門困難的技術。

戰爭的危機已在山西造成了一種局面，使最堅決的，最有經驗的分子必然能站到領導的地位。關於誰是這些分子這一點已不容有兩種意見了。周恩來每天在臨汾及其周圍向民衆大會演說。各組織員每天向鄉間出發，那裏待做的政治動員工作甚至比舊官僚所留戀的都市中更多。我們能夠看到，這個運動正在擴展和推廣到遼遠的山區，并以滿洲義勇軍更優良的組織和準備，一直進展到滿洲，在這些區域中，抗戰定能繼續到底。

臨汾使我們知道了一些已在完成的工作。我看到吳君極願接受邀請，在我的旅行的第二階段中充

任吾人。他在報館中的職務將由別人代替。他就把最後的便服——他唯一的所有物——換了棉衣和
大衣。數天以後，在即將變雪的淒涼的細雨中，我們就向西北的第八路軍總部出發了。

一一 到總部去

在日間，同蒲鐵路——一條通過山西北部和南部的狹軌路線——是靜默而荒涼。但是倭日本的轟炸機回轉根據地的夜色和晚星，卻把它喚醒到一種新的活動。

我們一團人所到的那個小站是十分寒冽，受着從覆雪的山上來的寒風的侵襲。風雨燈，電炬，以及一道從機關車裏來的紅光，就是這場面上的唯一的光線。在這些情形之下，以及在三四條傾軌上擁滿車輛的混亂之中，要把一列火車連接起來真是一件比中國的棋子還要複雜的工作。小型的車頭時時發出沮喪的叫聲，好像是在抗議。

差不多有一小時，我們和移動的車子做着捉迷藏的游戏，想找到那輛把我們帶到北方去的車廂。這是一個討厭的游戏，因為我有一堆行李，其他的人有幾堆帶到第八路軍總部去的地圖和文件。只要一個人叫一聲，說他已經找到了車子，我們就都從月臺裏到轉轍點和軌道的迷宮之中。當走到這地點的時候，我們老是只看到一段空的軌道，以及一個兵士在一列在夜色中消失的車輛後面，以流利的湖南語叫喊。五分鐘後，這列車在另一條路線上回來了，於是，我們就須從頭再來一遍。

最後我們都爬上了一輛車子——一個避風的有福的蔭庇。我們準備在那裏過夜。外面，車子仍舊來

來去地駛着。移動的黑影好像是奇形怪狀的影戲。許多到南方法的難民，把衣服裹到眼邊，擡在無頂的貨車裏，每個車廂都裝滿了凍僵的人。我不知道他們已在那裏等了多少時候，也不知道還要多少時候他們才能到潼關渡河，以進入安全的境界。

我們那輛有軍用記號的，門口有崗位的三等車已被這些不幸者圍住了。他們緊抱着槍救出來的一切所有，趕着車窗說：『這車子是上那裏去的？』到北方去的，』公兵簡短地回答，接着就引起了驚人的反響，『到北方去的？』這語音含着無窮的意義。

北方就是指太原，指軍隊，指前線，尤其是指日本人。這些『不向中國人民作戰只向中國軍隊作戰』的新的侵掠者已經選定了表示友誼的方法，這方法最後終於明白了。我已從難民的口中聽到在晉北幾處大批的鄉村，在『敵對』區中殺戮大批的青年的故事。這些並不是謠言和恐嚇，而是從親眼見過這些事情的人們那裏來的現實的故事。

這一切事實的效果，在戰區中，是明白無疑的，在南方，我曾經問這一個老農，他對戰爭作何感想。他就喃喃地訴說。『是的，我們知道有戰事了，因為有這許多兵士來來去去！這不是打共產黨的戰爭，就是打南京政府的戰爭。』那些已經見過紫綉襖色軍服的侵掠者的，或已經見過翼子上有紅色太陽的轟炸機的人，腦子中就不致有這種混亂了。

周恩來在一條狹狹的走道中不息地來回踱着。這位我曾在臨汾見過的，黑鬍子的，穿黑色中山裝的，是政治委員，現在是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了——鬍子修的很光，穿了國民黨軍隊的藍色的制服。這改變在這樣多才的一個人物中，並不使人驚奇。周氏看上去更年輕了，或許已少了一些獨特的風格，但仍舊不失是一個實行家。

「你對這個戰爭的沉寂意見如何？」我問他說。因為好幾天來，日軍並未前進，也很少轟炸。

「或許日軍正在休息，」他評論說，「當然，他們要鞏固在太原的地位；」而且他們一點不喜歡這裏冷的天氣。還有，或許他們的飛機恐懼着華北在西安的新的集中。」

「然則你不以為他們將在太原接兵不進嗎？」

「一點也不，他們一待交通穩定，天氣晴朗，就要到這裏來的。當然，他們自己的軍隊的內部，或許有某些困難。」

對這一點我很驚奇。因為如果有人能知道敵軍的情形，這就是第八路軍了。周氏對我說，他們已得了某種「發見」。

「在平型關的幾具日軍屍體的衣袋裏，有日本共產黨的宣言，叫他們反抗自己的軍閥所造成的對

戰的戰爭。你知道，我們已從日軍那裏俘獲了許多日記和記錄，其中有些是明白表示反戰。

「其中，我們有日軍第五師團長板垣將軍的衛士的日記。我們到總部的時候，你就能够看到它了。這日記有許多地方指出了在華日軍的下級軍官和士兵的心境。他們並不知道到這裏來的緣故。他們怨恨這國家和氣候。他們吃不下當地的食物；他們無論走到那裏，都是些荒涼的村落。他們曾經有過劇烈的戰鬥——劇烈得出於他們的意外——他們真的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你怎麼能和日軍接觸呢？」我問。

「當然，我們已經捉獲了幾個俘虜，我們極願向他們解釋我們對待日本民衆的友善的政策。俘虜日軍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們已經聽到過中國人殘殺俘虜的話，因此即使他們已經受傷，他們也將作戰至死。但是第八路軍對待俘虜的特殊的政策是逐漸生效了。我們在政治部中有一科，專門預備日語的材料和口號，向敵軍散發。而且現在我們正在開始教士兵唱日語的歌曲！」

我們談到周氏於十五年前到過的巴黎和倫敦——在這個毫無陳設的三等車廂中，只懸着兩枝洋燭，照得見玻璃上的濃縐的花樣。周氏像他的許多國人一樣，喜歡寓居法國而不太喜歡寓居英國。但他對於英國的習俗充滿着好奇，而且他徹底了解英國的遠東政策——我以為。「即使到現在，」他說，「你的政府尚未看到日本在華的真實的危險。但將來，他們一定會看到的。」他對於英使受傷的「意外事件，」

以及日本侵入長江和華南的英國勢力範圍的「嚴重威脅」作了一次清楚的分析。

我們最後到達了一個以山爲掩護的小鎮，這裏，除了間或有一個巡邏兵以外，是黑暗而無生氣。周氏親自領路，走到第八路軍的總部，那是在後留的一個棉商的屋子裏。我們走進去的那個院落十分空曠，有一個蓋沒了的金魚池。在一個牆壁厚得像地牢一樣，寒冷也像地牢一樣的房間中，我們找到了磚坑。就在上面胡亂睡了些時。

當衛士叫醒我的時候，院落中已充滿了冬日的慘白的陽光和馬蹄的聲音。在對面的房間中（那在隔夜是空的，）現在已起了語聲和笑聲。出汗的馬正被牽向後院；他們已整整地行了一夜。周恩來隔着金魚池向我快活地招呼。他招我走進一個房間，那裏有半打穿軍服的人圍住一張圓桌子。正在大嚼菲薄的中國早餐。

「讓我來向你介紹，」他說，「這一位……」——一個短短的，毫無架子的人物從桌子邊立起身來。我感覺到了一次友誼的握手，以及一張目光炯炯，皺紋很多的棕色的面孔——「就是朱同志，我們的總指揮。」在這房間的另一面，一個魁偉的人揮着他的筷子，頻頻點頭。「那就是彭德懷同志。」

十年以來，這兩個紅軍指揮的名字——朱德，於一九二七年領導南昌暴動，并和毛澤東首先組織中

國的蘇維埃，彭德懷在共黨所有的領袖中以最兇悍和最「厲害」著名——已使中國的布爾喬亞驚惶莫名。現在，作了第八路軍的正副指揮，他們是華北抗戰的最有功的領袖和最有望望的民族英雄了。

在這期間，我就沾沾自喜，或許我是和他們握手的第一个英人。「請坐下來，」朱將軍含着滿嘴巴的粟米飯客氣地說，「喫一點早餐。」



揮指總軍路八：德朱

三 朱德總指揮

中國的將軍們，除著名的馮玉祥之外，對於軍服問題，常是很考究的。近年來，連時常穿著普通軍服的馮大將軍也已飾上了金色的綵線和肩章了。但朱德，穿著樸素的藍色棉軍衣，披著笨重的短呢大衣，戴着藍布的軍帽，看來很合他的身分——工農的軍事領袖。

自一九三七年以後，寫這位非常人物的文章已經很多，他曾經在南方做過一時的軍閥，吸鴉片煙，有好幾個小老婆。他到德國之後，就決心戒絕鴉片，加入了共產黨，並回到中國領導紅軍十年，造成了這樣驚人的成功。這樣的人，我們以為一定是一個威嚴的人物，他或許可以威嚴凜凜的坐在馬上，成為空前的大軍軍的領袖。但是沒有其他的軍官能比朱德有更少的英雄氣概。

他的毫無架子的外貌就是他完全自然的，毫不虛偽的個人的謙恭的表現。在這一點上，我以為，朱德和毛澤東是一個有趣的對照。毛氏雖然不拘禮節，却有一種知識的權力和卓越的威儀，這使他在任何大會中都能顯出不同，但朱德却能於片刻之內在人羣中混過他自己。（這是他歡喜做的事情之一，而且那事情，在他的驚人的事業中會有好幾次證明極端有利。）有人批評他的親自冒險的惡習，他最得意的回答就是：如果他的總部遭受襲擊，他就能扮一個苦力逃出。『沒有人會知道他。』司令官和下級士兵完全

相似的事在其他的國家中是少有的。這一點或許已使朱德在平民中成了最可愛的領袖。

但是如果以為朱德的謙恭的外貌就是平庸的表示，那就是最大的錯誤。對這一點，他自己的功績以及他的事業的範圍就是最現成的答案。但這是真的，他的成爲軍事指揮和政治領導的特有的才能並不露在表面；我們首先看到這些才能是在屬下對他的信任之中。所有他的屬下（其中有從俄國軍官學校畢業的有爲的青年）對他的判斷和經驗都有極對的信任。我以後會和朱德相處多時，因此認識了他保有現在的地位的原因。我們初次和他見面時，很難看出他是一個革命家。我從未見過他發過片刻的脾氣，也從未見過他規避了所担任的工作中的困難。但是當我們看到他的行動，和認識他的毫不動搖的忍耐和決心的時候，我們就開始懂得，爲什麼應有許多傳說集中在他的名字的周圍。

就在這第一個早晨，在早餐一小時之後，朱德走進我的房間，在床角中坐下。「你喜歡和我談話嗎？」他謙和地問。「我有一點空的時間。」

他的邀請是這樣的懇摯，竟使我放棄了虛僞的禮節。「請你說一點北方的和第八路軍的戰事。」我說。

朱氏滿意地含笑，這樣，我們就起頭了。「正如你所知道，」他開始說，「日軍是想佔領山西全省的，以前北方的最猛烈的戰爭就在山西。自他們佔據平綏路以後，敵人就迅速向大同移動，然後不停片刻地通

過北方和東北方的各口直下山西。在這前線上，日本人用着他們的華北軍，一部分關東軍，以及最精銳的第五師團。在我們的弧形中——那就是來打山西的——他們這時共有五六萬人。

「他們分成了好幾線自北方前進。第五師團於九月下旬首次向平型關進攻。這裏就有一師第八路軍神不知鬼不覺地抄到了日本軍團的後方，我們就出其不意地向他們奇襲。我們抄到了他們的司令部，俘獲了許多地圖和文件，還有許多軍需，我們擊潰了兩聯隊的援軍，並前進到平型關。日軍向北潰退，損失了三千以上的人。」

「請再說一點關於戰爭的事情，」我提議說。

朱德有些躊躇不安了。「我們的勝利有兩個主要的理由，」他說，「第一，這是山地戰，因此敵人不能用坦克和飛機；還有，因為這是奇襲。第二，我們有其他的正規軍的合作和幫助。」

「我們一開始就和敵人的步兵交戰。因此他們沒有機會使用砲兵；他們連機關槍也不能使用。這是一場山地的流動戰，我們的軍隊比他們的靈動得多。我們看出，日軍並不喜歡這種戰爭；他們以前只學會了依賴坦克和重兵器，沒有坦克車和重兵器，他們就很不感不便。我們用手榴彈把他們殺死了許多。」

「但是雖然他們被擊敗了，他們仍舊作戰到底，一個也不肯降服。爲什麼呢？因爲他們知道，如果失去槍械，他們就要被自己的司令官處死；這是第五師團的軍律，它也應用於和日軍共同作戰的滿蒙偽軍。」

部分也因為他們恐怕於被俘後爲華人所殺。日軍自己時常殘殺受傷的華軍，他們一路已經殺了許多平民，他們恐怕中國人向他們報仇。

「我們的兵士不會說日語，因此當日軍不肯降順的時候，我們不能以宣傳感動他們。我們對這一點很感不快。此後，我們就特別努力向俘虜解釋我們的政策。」

「這是第八路軍所經歷的最劇烈的戰鬥嗎？」

「不；我們也有過比這更劇烈的戰鬥。但這次是我們抗日的最顯著的勝利。」

「這第一次日軍的攻掠山西已經遭了挫折。『戰爭的第二階段怎樣呢？』我問。

「敵人直接從北方沿其他的路線前進。他們已經頑強地推進到忻口。中央軍和晉軍扼守忻縣。這裏就起了惡戰。南京的軍隊打得很好——他們堅守了三個星期。我們很欽佩衛立煌將軍在忻口的抵抗。

「同時，我們的軍隊迅速向北移動，去切斷敵人的交通線。正如你所知的一樣，我們克復了雁門關。不久，我們的軍隊獨立行動，就切斷了日軍的三條路線——自大同到雁門關的路線，自蔚縣到平型關的路線，以及西方的自朔縣到寧武的路線。」

「在這時候，已向南方前進的日軍遭了嚴重的困難。他們不能取得給養，因為道路被我們佔領着。運輸軍火的車子不得不中途折回。他們沒有汽油的供給，因此不能運用機械化部隊。曾有一時，日軍真的到

了絕望的境地。」

這是山西戰役的輪廓，正如我們所已經知道的一樣。但因朱德的重述，一面用一隻被香烟燎黑了的手指在展開的地圖上指出軍隊的移動，這輪廓就得了一個新的證實。

「但那時，」朱氏繼續說，「日軍又沿平漢線南進，並佔領了石家莊。這裏，他們的第三〇師團就分兵迅速沿正太線向娘子關進發。這時候，我們又想切斷他們的後方，但我們的移動得太遲了一點。娘子關以前的軍事重鎮陘縣毫無抵抗地陷落了，因此華軍就很難守這個關口。

「但在娘子關附近，我們的軍隊又和第二〇師團有過劇戰。他們的人數有二三萬。我們的軍隊小得很多，而且一點沒有人幫助；其他的軍隊已向太原撤退了。但是娘子關以南，我們又擊敗了一大隊的日本的步兵，並俘獲了許多的軍火和給養。當我們還在這裏作戰的時候，日軍已沿鐵道前進到太原，不久就把攻陷了。」

「我們總共估計起來，直到目前為止，敵人在山西戰役中的死傷至少有三萬人。中國人的死傷當然很重，但在現時，他們的軍事地位並非不利。日軍現在必須等待從北方運來更多的軍火和給養；而且請你記住，山西的北部和東北部現在是佈滿了第八路軍。」

「你對於日軍的戰鬥力有什麼意見？」我問。朱氏滿意地點點頭。

「很好，」他說。「他們很有訓練，武器比我們的軍隊優良得多。他們用着機械化的武器——坦克車，鐵甲車，和飛機——當得到機會時，於他們大有便利。他們善找掩護，射擊準確，把武器保護得很好。」這篇對敵軍效率的率直的讚語很使我驚奇。

「但是，」朱氏接續說，「他們也有很決定的弱點。有一個弱點就是他們的步兵。我們已經看出，日本的步兵在獨立動作的時候並不十分靈動。他們的交通和給養全賴機械的工具。如果這些被人截斷，他們就陷於真實的不利。他們不能像我們一樣利用畜力運輸或人工。他們不能利用山地，而必須走最容易的最平坦的路線。」

「當我們攻打日本的時候，我們設法避免他們的優點，並揀選他們的弱點。因此，我們常在山中作戰，而並不常在平原作戰。而且，我們有民衆的幫助，我們已把民衆組織並訓練成游擊隊，以騷擾敵人的交通線。」

朱氏再向我指示當時第八路軍在山西、河北和察哈爾的地位。「你看，」他含笑說，一面以手指從這處到那處地指着，「在他們進軍的主線以外，日軍一點不會佔據什麼。我們的軍隊深入在他們的後方，而且——因着河北的義勇軍和游擊隊的合作——實際上已佔據了他們所通過的整個的區域。我們無須顧慮後方，因為我們是在自己的國土中作戰，無論到那里，民衆都支持我們，給予我們以食物和幫助。如有

必要，我們能够仰賴日軍本身來供給軍火，因為他們的子彈是配得上我們的來福槍的。因此，你可看到，在華北繼續作戰，是有着光明的前途。」

他摺起地圖，起身要走了。我知道他很忙，不便再阻留他。但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

「你——以前中國紅軍的總指揮——有什麼話要對外國說嗎？」

朱氏的和藹的態度首次變成了嚴肅。「是的，」他說，「有一句話要說。你是知道日本目前在華的軍事行動的藉口的——他們是在反「共」。他們用了這個宣傳以使得他們的侵掠行動合法。

「你知道的，這個宣傳是多麼荒謬。你知道的，第八路軍並不爲了中國共產主義作戰，而且聯合所有其他的軍隊爲了中國民族的獨立作戰。我們連何國民黨的軍隊，正在爲了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作戰。請你把這句話告知所有的友邦，使他們不致輕信日本宣傳的「反赤」的謠傳。」

我覺得朱德說這話的時候，是誠摯的。我所見過的中國共產黨員，無論在他們自己的區域中或在軍隊中，都充分擁護這個主張。至少，從他們的一方面，對「統一戰線」是並無危險。在中國新出現的就是這政治的統一。如果它能持久，那末，所付的代價就不能說是過大。

四 教士素描

那天，總部又選到一個郊外的鄉村裏去了，那裏有一部分軍隊應從前線開回。在我們的臨時寓所中，氣候很冷。當吳君對我說在這小鎮中有幾個英國教士的時候，我就提議去作一次訪問。在臨汾的內地教會醫院中，我曾經首次遇見過幾個歐洲人。大多數教士都已經撤退；只有一位加拿大籍的醫生和一班護士留在醫院中做着英勇的服務，並療治着許多不住的傷兵。

在這更北的地方還有另一國教士繼續供職，這真是一件驚人的事情。我和吳君穿過幾條大街，走到教堂的圍地裏。我的衛士很懷疑這全部的程序就握緊了毛瑟槍站在大門的外面。他很瞭解和外國人的「統一戰線」，但不知道利用機會。

在這小教堂中，我們有了一個小小的發現：原來這是星期日了。（在軍隊中所有的日子都很相似，我寫日記時只寫日期而不寫星期幾。）早晨的禮拜剛將做畢，我們就等在一個充滿積雪的院落中，聽着歌唱的聲音。這是一個奇異的經歷，在這冬日的，受戰禍的村落中，聽到有基督教的和平諾言的音調。山西的農民在那個冬季裏將有多少和平，我很懷疑。

禮拜完畢了，我們就作了自我的介紹。一位頭髮斑白的老教士和他的妻子，他的妹子都竭盡友善地

歡迎我們。我對他們仍在那裏這一點表示着驚異。

「爲什麼不呢？」這勇敢的傳教師回答說。「我們已在這省份裏過了四十年，我們不願爲了日本的緣故而輕易離去。」他閃爍着灰色的眼睛。「你要曉得，在這教堂上面我們有一面大英的國旗來教訓日人的飛機——他們好像是需要它的。此外，我們還有信心……」

我原本是想來看看英文報紙的。但他們十分客氣。

「當然你應當在這裏吃飯。你的朋友也是如此……這樣看來，你是和第八路軍在一起的。去年把我們禁閉在這裏的就是那些人，我對你說，他們當時把我們嚇得要死。但是請你們從寒風中走到裏面來。」

在一九三五年的冬季和一九三六年的春季，紅軍曾經渡過黃河，遍歷了山西的大部分，南京的軍隊只在數小時以前剛才趕到，解除了省城的危急。這「流寇」當時被視爲全國的大患（雖然，曾有一個青年軍官對我說過，「如果我們當時攻佔了太原，日本人現在就不會在那裏了！」）但時勢已經變過了。

「你現在不懼怕「紅軍」了吧？」我問主人說。當我們坐在烤羊肉和蔬菜的盛席上的時候。我吃了軍人的糧食——一日兩餐的饅頭和青菜——已經忘記了世界上還有這許多的食物。

「噢，現在我們不怕了。我們寧願他們留在這裏，而不願其他的軍隊留在這裏。他們真有紀律。啊，那個共產將軍朱德——」

「你或許喜歡聽到，他昨天就住在那邊的街上。」

「真的嗎？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但是，如我方纔所說，當共產軍於今年夏季開過山西到前線的時候，你知道他們曾在候馬駐紮過一時嗎？」

我點了點頭。「且說，我們在那裏有一個小小的教堂，那就是朱德駐節的地方。我們的政友都叫他「朱老兄」——他們不知道他是誰——而且都喜愛他。直到他離去的時候，他們才發現他們無意中所接待的是誰。」

許多年來，在中國的傳教士是反對「赤匪」的最敵對的分子。當記起這一點的時候，我們就能體味這贊語的充分的力量了。在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期間，我看到那些已經和共產領袖會談過的，已經在他們本區中見過紅軍事跡的教士開始轉變態度了。中國共產黨於那年年初所宣告的政策轉變已得了事實的證明，並正在開始產生效力。他們放棄對「外國帝國主義者」的仇視，并宣告尊重除日本人以外的所有外人的生命和財產。

在華教士的贊語是有點價值的，因為他們是在華外人社會中非為實利的唯一的部分。正像他們公開斥責日本軍閥的在華暴行一樣，山西的教士一致稱頌第八路軍的紀律及其對平民的模範的行為。而

且他們也深知八路軍的戰鬥的力量。

「是的，共產黨是知道克服日軍的正確方法的唯一的軍隊，」我的主人率直地說。「我們對他們改善農民生活的黨綱並沒有異議。只要他們不反對宗教，我們就有很多的共通之點。」

「但他們是反宗教的嗎？」我提示說。因為我——新從延安回來——覺得自己已有充任就我所知以解釋共產黨政策的資格。「現在中國有了抗日的統一戰線。我以為共產黨決不令歧視任何具有潛力的同盟——無論是甘肅的回教，或基督教。基督教和共產黨既能在法國或西班牙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挑戰——在中國為什麼不能呢？」

但這裏我們的主人躊躇起來了。在過去不幸的事件這樣的多——紅軍對教士的綁架和虐待。這一切都是熟知的論據，我也不想把它重新掩沒起來。我自己的信仰以為這些故事大多數都言過其實；無論如何，現在這已成了過去的節目。

在這友善的教堂中。我看到了一九三七年十月以前的英文報；首次得悉不列顛的輿論一致反對日本轟炸不設防的城市。我們很抱歉地向主人道別。

「如果你們重回這裏的時候，你們務須再來。」

「我們一定歡喜來的，如果那時日軍還不到這裏……」我看到，他們以許多的宗教小冊送給了吳。

君：這好做，雙方宣傳的路已經開放了。他們最後的告別是親愛而又誠懇。「我們當時常爲你祈禱……」

這羣年老的外國人爲什麼留在正當日軍前進的要衝的教堂裏呢？我知道，真實的理由是想盡他們的力量來保護他們的教會學校中的幾百個青年的中國學生。現在感激和忠誠的聯繫正在這中國的危急關頭逐漸形成。在將來，他們決不會被忘却的。

數小時後，在一隊騎兵的前面，我們騎馬通過鄉野，向着新的總部進發了（我騎着朱德的坐騎——一匹速率驚人，脾氣惡劣的栗色小馬——算是特殊的光榮。）

五 重遇史沫特萊

在我前面騎馬行走的就是政治部的主任——任弼時。他正和朱德及其參謀部從北方回來。他所穿的連頭巾的茶褐色大衣——像我們後面的兵士所佩的馬刀和服裝一樣——就是這些頑梗的騎士已使日軍受了印象的證據。彭德懷所坐的是一匹外國種的良馬，恐怕是南方的混血種；他們都叫它「大江馬」，把它當作奇物看待。雖然第八路軍已經俘獲了數百匹敵人的馬，但我看他們都瞧不起它們，說它們是拙笨而又難騎。我所見過的幾匹真的是毫無神氣，它們真的比不上中國的良馬。

我們是佈置總部的先遣部隊；那枝已經越過呂梁山的軍隊要到半夜以後才能到來。我們騎行得很快，穿過着錯綜曲折的小路，想在黃昏以前趕到這個村鎮。但是當我們的隊伍走過一道石拱門，進入一個大小尚可的村鎮的街道上的時候，天色已經逐漸轉黑了。

我們進去的那所屋子以前一定是屬於有錢的地主的。一年以前，當紅軍佔領那裏的時候，他或許會為了安全起見。現在他的兒子——一個太原的學生，也是一個少年先鋒隊的隊員——却真誠地歡迎我們了。任君的第一句話就是有特性的：「我們是第八路軍，你叫人民不要懼怕！」村長是一個當地學校中的教師，他笑談迷地供給着住宿的地方。村民對軍隊的歡迎是顯而易見的。

吳君，我的衛士和我同住於這地主的屋子中的一個房間。我們從未有過這樣舒適的宿處，無怪吳君說這是「新娘的新房」。這是一個美觀的房間，窗上糊着紅紙，壁上有驚人的壁畫，畫着一個中國的主婦保育着許多子女，把一隻石榴給予最大的一個。在這房間的每一角子上——一件有趣的事實——以紅紙條掛着一副小小的弓箭，這是驅除一般的邪祟的，特別是驅除使夫婦不和的惡魔的。這樣一個家庭的頭腦很可非議，它的子女們正在受現代的教育，而且它在後院有一架收音機——一件在中國鄉村中從未聽過的奢侈品。

軍隊的主力於那天夜裏到了，代理參謀者——左權和先鋒隊剛在吃飯的時間趕到。我們就坐在一個女神的像前吃着鄉人供給我們的熱氣騰騰的麵。然後，一面吃——左權一面報告了一個消息：「美國新聞記者史沫特莉」將在那天夜裏和大隊一同到來，駐紮在附近的村落裏。

我知道這就是那個史沫特莉，兩月以前，我曾在西安和她會面。此後就聽不到她的消息；但這裏在我上前線所經過的地方，她却已從前線回來了。她已經作過了一次能使餓餒較少的老兵精疲力竭的危險的旅行。

可是，第二天早晨，我們發現這位認真做事的人物並沒有疲竭的容色，她正在一所農舍的室內打字，

在門口好像已撥聚了一半的鄰人，有的把鼻子貼住了窗隙窺視。「你好像成了一個景緻，」我在互道寒暄之後說。

「我知道，」史沫特莉憤慨地說。「他們把我當作一個日本的俘虜」（她穿着一套茶褐色的普通軍衣）「或一個俄國的參謀人員，或一個馬戲班裏的角色。但我對這也看慣了。」

她會隨軍走到太原，呂隨林彪的師團在娘子關以南作戰，會隨軍隊穿山越嶺，於昨天夜裏走到我們的鄉村。和她在一起的，有一個中國的新聞記者兼譯員，叫做立波，還有一個東北的青年小說家舒慕，他的沒有祖國的孩子是一篇東北流浪者的敘事詩。這兩個青年的中國知識分子會隨軍隊步行過許多的路程。

以後，我讀過了史沫特莉的最近六星期來的日記——「戰鬥時期」（註）——一個中國農軍的英勇和耐苦的歷歷可繪的故事。他們竟以最笨拙的武器和最不充分的給養，獲得了反對日本的軍事機構的驚人的勝利。這是「長征」和過去的紅軍戰史的一部很適切的續集。不過這次，共產黨是和國民黨的軍隊反對着共同的敵人。那個鬥爭的臨末的幾章還不會寫成。

（註）這日記以打回老家去的書名在美國出版。

第二天，在向東數里的一個鄉村中，我看見了兩個第八路軍的俘虜。他們交叉着腿坐在炕上。席子的清潔的程度遠不及日本的標準，但他們好像很快活。一個是普通的兵士，以前是無線電的工人；另一個是大阪的商人，曾在正規軍中做過兩年的隊長。他們自備飯食，可以自由和任何能說日語的人談話。

聽說這軍官在初被俘虜的時候，是很「頑強」的，但現在他好像順從着第八路軍的方法了。我和他談話，通過着「敵工部」的一個譯員，要想探出他對戰爭的意見。

「當戰爭開始時，我適在東京，」我對他說，「我以為日本的人民並不要對華作戰。軍部和報紙把全國驅入了戰爭，你以為如何？」

「他說他完全和你同意，」譯員在譯畢這番話之後，帶笑對我說，「正規軍是軍閥爲了戰事而練成的，他們起初對戰事很高興。但此後發到中國來的新兵却並不經過同一的壓力，他們都已公開表示不滿。他說，我們應該組織一個國際的運動，以反對日本的軍閥。」

這好像數星期的「待遇」之後的應有的答語，我自己確信，從這日本人的熱誠和友善的態度看來，他所說的全無真話。那位無線電工人對於這話自始即無異議，他一被俘虜，就承認他到中國，不過是爲了動員令的強迫。他已在公共的會議中發表過反對戰爭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演說。這裏我終於看到了

共黨對待俘虜的政策，這政策之收效當然好像是應該的。這軍官再三對我說到第八路軍的「和愛」。這一點我自己也已經看到了。他自己的看守者遞給他的飯盤和香煙就是明白的證據。而且我知道，我的訪問並未有過事先的佈置。

這遭遇使我想起了中國在「人道的因數」的鬥爭中所有的優長。日本坦克車的司機人，日本飛機的炸彈裝置人，雖然或許能避過敵人的子彈，但決難避過宣傳的力量。現代戰爭的最可惡的技術無過於操縱這技術的人手。一想起在日軍屍體的衣袋裏所抄出的共黨的宣言，對於這戰爭究能支持多久這一點，我又發生懷疑了。

第六章：北上途中

第六章 北上途中

一 別總部

在網絡着電話線的龜槽槽的巖舍之中——朱德的總司令部即設在這裏——我們剛吃好了點心。第八路軍往往選擇一個小村而不選擇一個縣城，去做他們的根據地，這裏就是典型的一例。他們也永不失却與民衆所發生的親密關係，這就是他們成功的主要祕訣。

又因爲日軍已經開始轟炸介休以前，這就引起了他們合理的戒備。左權對我說：「我們又要在這一個兩天內遷走了。」而朱德總司令部也不可能在這同一個地點留住到一星期以上了。

我們吃完了我們的小米飯和椰菜（在本軍中，甚至總指揮也並沒有別的飯菜），又把停雜來的日本咖啡來過口。這咖啡是他們特意預備起來，表示着敬我的意思，這是我在最近幾星期以來第一次嘗到的了。一喝了咖啡，立刻使我獲得了提出我以後的去處問題的勇氣。

我自離別延安以來，已經有一個月了，我在延安所計劃了的第一階段的旅程是完成了。我已鬆勁達

了戰區，而且會見着本軍的主要軍政領袖了。讓我再去考察一下戰鬥中的軍隊本身吧。

「到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够北上到前線上去呢？」我想知道。

「你想上哪一個前線去呢？」朱德很溫和地問我。共產黨人，從來不是像中國其他的許多當權者一樣，他們並不對旅行者加任何不必要的麻煩，這事情是十分使人心神愉快的。「我們是可以送你到我們任何一個師司令部去的呢。」

主要三師的一般的所在地區，我是很知道的，其中的兩師，正是在日軍的後方。到這些師部那裏去，並不是特別容易的事，尤其是像這樣官於流動性的部隊，「師司令部或許是變動得很不可捉摸的。然而，史沫特利剛會從林彪師部裏回來，因此，在我看來，一一五師是不必再去了。留下的就是賀龍領導之下的一二〇師，他們是已經北上而開到綏遠一帶在跟日軍奮戰着了。」

說到賀龍——據傳這人只要身在任何一省，他便有在一個月內成立一枝新軍的能力——或許可以說賀龍是一切舊日的紅軍領袖中間最神通廣大的人物了。他以前在湖南組織過第四方面紅軍，曾以四枝步槍開始打天下；南方五六省，關於他的傳說很多，簡直使他變成了現代中國的羅賓漢。副師長蕭克也算得是一個神話中的人物。他們二人的合作，該是極有希望的。

「我很想到賀龍那邊去，」我說，「如果你能够辦得到。」我的意思，就是指一種往西北去的牛車上

的長途旅行。

「可以，可以，」參謀長說，「我們正要還歸去——你就不妨在那貨車上搭一程。不過，你總得預先找好一個替你通譯的人，否則我看你自己必須先學習說湖南話呢！」湖南土話，在北方人是非常難懂的。

「你去到那邊之後，你蘇非住過一冬不可。」

我是準備在那邊過冬的，於是，吳似乎也並不加以反對。朱德對於我們的決意，像慈父一樣地笑了。

「當你見到賀龍的時候，」他笑着說，「請代我問他一聲，他在北方捉到了多少虱子了！」這是總司令部常開的玩笑，因為賀龍的軍隊是虱子最多的一師。

我們本是希望在第二天的早晨出發的，可是日軍在臨汾的一次轟炸，阻滯了貨車的開行，於是我們便空閑了一天。我趁此參觀了「敵入部」，餽贈香煙給我們的日本俘虜，他們是感激非凡地收下了。我一方面爲這些俘虜的友善的真情所感動，一方面又記起我數月前在日本所身受的好意，於是我對我的總導員說，日軍在華北的暴行，實在是難於想像的。

「跟我來，」他很簡單地說，「讓我去把我們俘虜的日方文件指給你看。」

這真是我們在山西的小村上所看到的，一批奇妙的文件，有兩位日本留學生譯給我們聽，並且加以解釋。其中大部份是在平型關從第五師團的師部那邊俘虜的，計有地圖，軍事情報，政治文件，以及許多

的日記和個人的遺物。

說到個人的遺物，那是十分怪異的。日本人對他們女同胞所縫製的「千人針」，抱着很大的信心，似乎認為神力無邊。還有各種各樣的小金盒和小皮袋，繫在頸間的絲帶上面，那裏寫着文句，祈求和平與神佑的禱詞，間或繪着些佛像。這些東西，大部份是從日兵遺屍身上取來的；在一個套子上，被子彈射穿了一個洞，這正是沉默地說明了它本身的冥頑不靈。而且，這更證明了恐怖心理的存在（恐怖心理也就是所謂「地震心理」）或許正是使日本人心神不安，並使它表示出許多突然的和令人不快的事情的起因吧。

文件的本身，就是一個博物院；許多文件，尚未完全譯成中文。通譯者便把鉛筆劃出的一二段落，指示給我。這些都是軍事情報。

一個文件，是描寫着在懷來所俘獲的三十名華軍。經過一度審詢之後，五名是被剔出，押赴司令部去了；其餘二十五名，據簡單的報道，說是已經被斬首。另一個情報，則描寫着日軍佔領山西西北部，啓根村（譯音）的情形。情報中說：「因當地人民對皇軍不敬，故已從該村提出了三十個青年公開執行槍決。」此外，同性質的其他文件，還有很多。

日本軍事當局，對於這種一貫的恐怖政策，並不嚴守什麼秘密；他們早已在僞滿實行了好多年頭，而

且認為成績一定圓滿。可是在這個政策之下，從來不把這可恥的事實公開發表。歸根結蒂，這個政策的最顯著的結果，或許就是滿洲義勇軍五年來的英勇奮鬥和華北新的人民自衛軍的突然生長吧。正如馬爾洛，（註）有一次會寫着的話：受難的人羣的親近者，往往變成優秀的革命者。

在這一大批所謂『人類的文件』之中，有一篇使我感到了極大的興味，於是我費了一日之間餘下的功夫，在通譯者的幫助之下，把它譯成了英文。這是一本日記——裝訂得很美觀，繪印着簡明的地圖的——寫這本日記的人是第五師團長板垣將軍的衛兵，這是據周恩來告訴我的。這個衛兵是在平型關陣亡了的。

跟他的許多同胞一樣，也許這位年青的日本兵當初也是歡迎戰爭的，以為這戰爭可以給他『大顯身手』的機會。（如果用另一成語翻譯出來，那就是『在世界上弄一個地位。』）我把祖國的運命在我的兩肩上面負擔起來，當他接受動員令的時候，他曾經這樣表示。但是他和他父母妻子作別的一段，則是用真摯的情感描寫着的，並且預示着訣別的信念。

從這本簡短的日記——八月二日至九月二十四日——裏面，我們很容易看出寫作者的幻滅心理

（註）André Malraux 法國現代最前進的老作家之一——譯者

正在逐漸地潛滋暗長。他在九月初的日記中，會描寫到追悼南口陣亡日軍的情形：「哦，勇敢的朋友，你是長眠了。這雖則是光榮的死，可是你的遺屍畢竟將變成小小的棺木中的白骨了。我把自已來跟你比一比啊……」後來，當他開抵前線而目覩着受傷的人馬，流水似的移向後方去的時候，他曾經自問，我能够想像到其他許多的日兵也在口頭發問：「哦，我們究竟是爲誰忍受苦難呢？」這部日記，多半是因爲作者有富於吸引力的人格關係，使人留下了一個動人的真摯的印象。他離開日本時雖說是很堅決，然而在華北參戰了只一個多月光景，他却已經心心念念地想到家庭，想到東歸了，而今呢，他是永無歸去的一天了。

次晨六時，號角催醒了我們，那時天還剛朦朧亮。在冰凍着的院子裏，等候着一隊騎兵——共六名，他們將護送我們到公路上，去搭乘開往北方去的貨車。他們都是些強壯的騎兵，佩着脫手一擲的馬槍，騎着粗毛的小駒。

當一小隊人馬踏過平鋪着的大街的時候，任弼時正在從總司令部的門口向我們揮手送別。「冷得很！」他很高興地叫喊着。但是在羣山中跟賀龍在一起，却會比這裏更冷呢。

呂梁山的雪峯上面的太陽的第一道光線，也正使人提醒到了冷不冷的問題。

二 滿目荒涼

清晨，我們騎馬沿着山脚下的小丘，走向儲藏站去，我們是準備在那裏選擇一輛貨車首途北上的，一層輕霧籠罩在山巒上面，並且有一層冬天的烟嵐瀰漫着整個平原，到處都被樹林或者被向全村報告時刻的鐘樓所切斷着。這霧並不是不受歡迎的，因為牠供給了一種烟幕，遮住敵人的空襲視線。

在黎明後不久，有六架飛機排成隊形，穿過霧層向北飛去，它們一定是中國的，可是南京空軍似乎還沒有在北方前線上顯明的出現過，所以我有點懷疑，一位指揮官——四川的矮胖的騎兵——說，那是蘇聯的空軍，來參加對日帝國主義抗戰的。在那時候，日本與蘇聯開戰謠言的空氣是很濃厚的，因為遠東紅軍司令白魯徹上將的演詞中，曾發出一種事先的警告，日本方面也就決然地撤退了他們一部分軍隊到北方去。

對於這一點，或許還有其他解釋：剛從太原撤退的第五師團，在山西戰役中，已經遭受了很嚴重的打擊。同樣的，我希望我能夠知道在偽滿方面所遭遇着的光景。我們到了賀龍總部那裏，大約就可以知道得多些了。

我們從這一村到那一村的道路，是用紙條黏在石頭拱道上，或是插在黃沙黏土的土臺上。第八路軍

的政治動員，在這整個的區域內，是很活躍的，我們陸續的經過一隊隊士兵的隊伍，或者聽到召集村人去開羣衆大會的鑼聲從霧中傳來。有一次，我們邂逅到長而散亂的新兵的隊伍——粗壯的農夫穿着黑粗布的冬衣，年輕的人們更是傲然地攜着那日本式的皮袋或水壺這一類的戰利品。在這支軍隊裏，這些戰利品，是到處都有的。

差不多正午的時候，我們到達了我們的目的地，——一個小丘附近的山洞式的村落，那裏有六輛掩蔽着的貨車藏在一叢樹林下面，大約一個鐘頭以後，我發現我自己很危險地緊貼在最高的一捆冬大衣上，沿着開往汾陽去的大道上，向北疾駛而去。

自從我沿着這條路向南來，隨着華軍主力從太原撤退以後，到現在剛巧是兩個星期了。他們這些分散着的軍隊和驛車，至今還在來，可是比從前的秩序好得多，並且沒有從前那樣的慌亂了。因爲日本是在平遙停止了進攻——他們究竟在等候援軍呢，或者還是因爲一些國際複雜的關係，那倒是另外的一個神祕。

山西的軍隊，似乎在那裏利用這個意外的休息，離開敵人愈遠愈好。這兩天我們是在這條路上，我們是向北方去的唯一團體。對於我呢，它是觸發了我對整個事業的一點興趣。我們的貨車，裝着冬天用的制

服和六個衛隊，一直向戰爭的前線走去。那些別的——行進中的整團隊伍，帶着運糧車以及輕砲隊的砲兵——也許已經施行了一種巧妙的戰術移動；但是看起來，他也不像是可以特別加威脅於日本軍隊的。

在十二月裏，用做運貨車經過山西的山道上來旅行，那是很愉快的，可是也有不舒服的地方。動身之初，我們便已經被淹沒在黃塵裏，那些黃塵最不舒服的飛入了眼和鼻孔裏，可是冷——我們一穿過這主要山區，沿着在雪山之間的結冰的河流而行的時候——比黃塵還要難受。第一天，黃昏後，我們所到達的士兵駐紮處，是簡陋得很的——在非原始時代的西方人看起來，他是似乎有無法描寫的鄙陋和骯髒——可是它還很和暖；這就可以算是唯一的優點。當這鄙陋住所的主人發覺到我們是「第八路軍」時，他就堅請我們睡他的炕，而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就睡在地板的草蓆上面。

第二天，我們辭退了一個女搭客，我在一輛貨車的車室裏，找到了一處地方。那個開車的，是一個老朋友，我會經和他同到延安去過。他是一個亂攪的青年，他在這山道上的技能，以及他在全世界都已冰凍着的冬晨，發動他的引擎，是會經得到我這不相配的讚佩。我現在有理由來從新證實它，因為現在走的這條路是够艱險的。許多的橋樑已被大水沖掉，還有許多，也已經部份地被撤退下來的中國軍隊所破壞了。

在那整個的早晨，我們沿着我們的路一直向北走去，繞着堆滿凍雪的深谷的危崖，或者費力的跋涉過多石的河床，我們是很平穩的扒山。在這不毛的山上，一個人是不及照顧到其餘同路的人們的，可是使得我很奇怪的是，這樣長久的時間內，我們却僅僅遇到些兵士，那時是正當我在第三（山西）旅防守着的山村裏駐足了幾分鐘的時候。還有，除了藍制服而外，旁的服裝就沒有看到了。

「這些村莊上的人可會發生了什麼事？」我問，當我重新上路的時候，才發現食糧竟買不到。「日本人可會來到過此地的嗎？」

開車的那一位搖着頭，他平時愉快的神情已經變成很嚴肅了。「不是日本人，那是第三旅！除非我們能到達我自己人民的區域內，我們今天夜裏恐怕要得不着食糧了。」

起初，我還以為他是在開玩笑。隨後，我才開始明白了。

又化上了五個鐘頭，我們才穿過了一個荒涼的鄉村。我們已經橫過一條分界，來到了一個該當已經很繁榮的流域。在下午的黃光中，這地方是十分美觀的，可是農田却空空地分佈在山間，也沒有炊烟從密集的村莊裏升起。我們所經過的房屋都沒有了門窗；每一塊門板都好似已經拆毀下來充作燃料了；那些村民已經好像一個人一樣地離開了此地，並且帶着儘量省得下來的乾糧而去了。那是真的，此地不會得

到食糧，除了那聚集在田野裏的雉鷄而外——那些雉鷄，比在英國競技園內所能看到的還要多些——牠們很自由地在啄食那些新近撒下的穀子。

這是一片完全荒涼的景象，當一個人實感到這是中國軍隊工作的時候，那就格外地慘澹了。

我們走到一個像這樣荒涼無人的村莊，便停下腳來再問路徑。在一條大街上，只有我們馬達的嗚嗚聲，突破了這沉寂的空氣。陶器的碎片是散落在周圍，很奇怪的一個畜類的骨架，直到蹄骨的皮都已剝得乾淨，在這路上橫成一個弧形，這很雄辯地表示着那位剛繞過境的人是在以什麼樣的異味充飢啊。

「老鄉！」我們的衛隊很高聲地喊，他們憤怒的聲調是很明顯的。終於有一個老頭兒，搖搖擺擺地走來——這個廢墟上的唯一居民——蹲在我們前面的雪地裏。

「不要害怕，這是第八路軍。」我們這一團人的領導者說，這老人露着無齒的微笑，搖擺着頭，有人給他一支香煙，他帶着明顯的快樂燃着了這枝煙，雖然第一口煙就引起了咳嗽，害了他的肺。從我們軍隊駐紮的第一個村莊到此地，又是五十里了。

在路上，我們遇到那些完成着破壞工作的撤退軍的後衛隊。這些人是典型的山西農民，配備着好好

的武器——它們有許多自動步槍，他們是真正戰鬥隊伍的原料，假使他們能夠獲得適當的領導和訓練，可是他們的官長騎着馬遠遠的離開他們，搖擺着不相稱的步行用的手杖，他們穿的皮外套和士兵們的棉制服，剛形成了一種不愉快的對比。

「此地的人民的走散，是糟糕的事，」他們中間的一個告訴我們：「因為人民都走光了，所以你們不能買到吃的東西。」

「是的，可是這些人民為什麼走的呢？」我們的指揮官情不自禁的回答：「這是你們的軍隊使得他們這樣的。」這個長官一聲不響地騎着馬走了。

我們用着有折頸之虞的速度來走過這最後一段路，因為除非我們能達到第八路軍隊，我們將要在這一夜享受冷的舒適，我們最後看到的，是守着這路上掘好坑道的第三旅的兩個哨兵，這個坑道，對於我們的貨車的通過，是有着困難的。最後，經過了這已經到來的夜，一片友誼的光明也臨頭了。原來我們已經到達了我們士兵的駐紮地了。

酒館裏上好的食物，村民的熱烈歡迎，過夜的二間暖室——所有的事物都含着光明的意味，我們是並沒有失望。我已經發現到這些字「第八路」——「八路軍」——在山西省的農村中，是一種魔術樣的公式。可是我從來沒有對它的工作，看得這樣地清楚。

一個人也許應當特別強調這個事實，就是第三旅是一個獨立的省防軍，而不會和其他的國軍取得聯絡；從各方面的報告上看起來，他們是山西訓練最不夠和紀律最不好的軍隊，可是此地倘用戲劇化的眼光加以觀察的話，人便可看到中國舊式軍隊最習見的弱點——就是他們對於普通人民幸福的無情忽視。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弱點，」吳沉痛地告訴我，「我們現在正是在打擊這一弱點了。」

不久，我們將看到另一個制度所做的工作是怎樣地不同了。

三 戰鬥中的二二〇師

我們愈走近前線（汾陽在這時候是中國的前哨），路政方面便覺得愈壞。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的貨車與汽車的殘骸——戰爭所浪用了的殘骸。我們自己的車夫和機械跌進每一個廢墟，正像殭尸鬼一樣，尋找剩下來的零件來救護自己；但是在大多數情形之下，引擎是被移開了。在中國沒有任何一樣有價值的東西是被拋棄置得很長久的。

我們的哨兵正努力地守着敵機，因為我們是旅行於明朗的日光之下，同時是在遼廓的鄉村裏。但是天是非常明朗，甚至於沒有一點雲來破壞它的青色。我們的車夫對於這點似乎不大注意。他低聲唱著，常常是同一個調子，第一句大概是「我的蘇州小姑娘呀」，但是其餘的我却一點也不懂了，或者那些也正是老調子的反覆吧。

我們穿過錯雜曲折的小村，到了西邊的路上，在那些小村中僅有善意的嚮導者——是自動地和我們一道來，——才能給我們指點路途。雖然這個區域是比我們前天經過的荒涼的城市更靠近前線一點，但是每一個村莊都被佔據了。並且我們所停留的第一個地方，一隊第八路軍正駐在那兒，擠滿了些鄉下人——男的、女的和女孩子們。他們許多人都帶着滿籃的食品。

『是不是所謂「集」？——不是一種中國的市場？』我驚奇地問。吳無意地露齒而笑了。『不。他們聽見第八路軍到了這兒，他們知道現在他們將要太平了。』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實，同時是我離開總都以後看到的最受感動的一件事。

在這個村莊上，我第一次和第一百二十師結識了。在雁門關之役以後奉令開到西邊去，他們現在佔據這個由北到南大約一千里的區域，艱辛地從事於動員農民的工作。在這擁擠的街上，許多農民已經被組織起來，穿着義勇流動隊的紅藍制服，他們的來復槍，有人告訴我，大部是由第八路軍從北方的山中搜集得來，在那個地方這些槍械是爲中國其他軍隊所丟棄了的。

招待我們吃飯的隊長，是一個從湖南來的強壯的青年，直立着，穿的是他那會在別的戰役中看到過的舊黑制服（但是沒有紅軍的領章）賀龍的軍隊，在大同失守以後奉令到前線上去的，沒有等得及把我今日所見到的各軍隊所穿的新制服發下來。我們的貨車帶了些新制服來，但是他們許多人已經從另外一個來源，找到他們的冬衣，並且非常舒適地穿在皇軍的茶褐色的羊毛軍服裏面。

『你對於這個作何感想？』我們的東道主問，同時他給我檢察一枝日本的自動手槍。『另外的一枝又怎樣呢？』——他從牆上拿下一副超等的德國望遠鏡，和一副裝在一個精緻的皮箱裏面的「概望望遠鏡」。『只要予以時間，第一百二十師似乎都可以完全從他們敵人中把自己重新配備起來。這些特殊的

戰利品僅僅才有了一個星期，是從一隊不小心地冒險深入了平遙以南的日本騎兵那裏得到的。

『你覺得此地的人民怎樣？』我問這個年青的隊長。

『好極了！我們在這裏就有一百個遊擊隊，他們已經開始獨立自主的行動了——他們昨天在村上捉到一個漢奸，他是想準備歡迎日本人來的。』在我們的軍區中——這就是爲種種實際的目的而作戰的山西的西北部——『我們已經有一萬人組成遊擊部隊了，並且我們立刻可以使它發展到加倍，假使我們有充足的軍械的話！』

直到現在，這還是第八路軍的一個大問題。我不得不想到所有在到南邊去的路上所看到的武器——常常一個人帶着兩支輕機關槍。也許他們以後可以把這些派用場，但是要求很緊急，在這兒，軍械供給的問題也許將變得更加困難。假使需要的話，新的隊伍可以被從戰利品中供給，因爲在山西北部的山地中，這枝軍隊很可以使敵人成爲『軍需品的供給者』，像從前常常在內戰中所做的一樣。但是許多有價值的時間，或許將在這種過程中消失了吧。

那天午後，我們又上路了，上了那貨車或許可以通過的最後一程。同時我第一次瞥見那些將要繼續處於流動戰和游擊戰當中的鄉村。綿延的山脈向北面和西面伸展着——那些山現在是蓋滿了雪以及至少在以後三箇月中堅凍而不融的冰。那是熟識鄉間地形和不需要擔心食物供給的流動部隊的理想。

地域。同時，在同樣的特徵之下，它對於日本那種新式軍隊，完全倚賴機械運輸的軍隊，却就會發生極大的困難。日軍唯一的好處，就在他們有飛機；但是所有的農村是分散的，他們大都具有窖洞，並且在羣山的懷抱中有着充足的障礙物來掩蔽整個的軍隊。

日本人在忙着擴張鐵路到太原，使他們可以直接運軍隊和給養來。但是他們需要像關東軍那樣的，一技軍隊來保持他們所獲得的一切，然後他們才能够孤獨地完成征服整個農村的企圖。

在這些山地中的一個村上——一個避風的地方，土牆排列成一排在山腳邊——我們的貨車把所載的東西和我們一同停放在那兒。我們消耗了那個晚上在一個團部中。

何平英將軍是一個矮小的活潑的人，他常常戴一頂皮帽和穿着一件青的沒有袖子的披肩；直到當我準備握手的時候，我才發現他的右手是已經斷掉了的。他的談話——和他的軍官以及大部分他的部屬一樣——率直而有爆發性，帶着特有的湖南口腔。這些都是紅軍中的「老戰士」，他們曾經參加了十年內戰的工作，雖然除了將軍本人而外沒有一個是超過三十歲的。他們的食物和他們儀表一樣火紅的，因為沒有一個湖南人能吃一確沒有放過大紅椒的食品。我想，我對於這個也將要吃慣了，假使我再留在這裏和這一師在一道住下去的話。

這位獨臂將軍，以如畫的語言和左手完滿的手勢，形容給我聽雁門關的戰役。「這個地方是我們

在做的地方，」他說。『在兩邊高巖當中，一個上山的斜坡上，有一個路彎。起初，我們使四十輛日本貨車在那兒中伏，用手榴彈破壞了大部份——殺了大約有三百個敵人。後來，當他們的飛機到達的時候，我們才退却下來。』

『第二次，大概有六十輛卡車來了，由三輛坦克車領導着。但是在前一天晚上，我們早已把橋梁破壞掉，所以他們一起都停在一道。然後我們從上面和下面同時攻擊，破壞了大概有一半車輛。』

『後來，他們把他們的部隊開來，用五百名步兵做護衛。但是我們襲擊了他們的衛兵，同時用機關槍實行了全線攻擊。總計，在此次行動中，我們殺了五百個日本人——這是他們自己醫院中的報告！同時，我們自己却只有不滿一百名的傷兵。』

這是第八路軍戰術的一個典型的例證，——攻擊敵人於不利的時候，盡可能的打擊他們，並趁着日本援兵尚未到達的時候，便退到山裏去。同樣的作戰方式的事件，是在敵人交通線上無限制地繼續進行着。

在很早的既經以後，我們在雪地裏打籃球，由獨臂將軍作裁判員。我實在不得不讚美這一團——他們的大部份，和所有的『幹部』都是南方人——使他們自己適合於北方的寒冬天氣。在長征時期，他們也會穿過雪堆和越過西康的高山，而山西的冬天更不會使他們害怕。這條他們所守的山路，是這一個區

域中最冷的要隘，但是他們却歡然地接受了，因為他們對於比這更苦的生活，也是很熟悉的。他們的戰鬥力是無可置疑的。

這個山村經常地回響着來復槍的聲音。起初，我想也許是散兵受困了，或者是別的軍隊的逃兵，他們在這山中是很多的。但是經我一問，那個青年軍官才露齒大笑起來，說：「不，那是我們的義勇軍！假使他們不學習射擊，或是在山頭上舉烽火，他們是不高興的。他們是很好的。」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一隊載運着冬服的騾子前面登程了。那是令人痛苦的寒冷，我們在山的陰影下面行動着，但是當一架日本偵察機慢慢地嗡嗡地飛過我們的頭頂，而紅太陽在機翼上閃着光的時候，我們倒要感謝山的陰影。在太陽光下面彌着白雪，我們的騾車隊，便將成爲一個明顯的目標了。

直到中午以後，當太陽已經把路上融化了一點兒的時候，我們才大膽地騎上我們的小馬，走了稍長的一段路。我們終於到達了離石——繁榮的縣城我似乎沒有再比看見離石的城牆更受歡迎的了。此地是中央軍駐紮的地方。但是第一百二十師也有一個供應站設在一所古廟中，並且就是在這裏，我們在這許多日子中，才第一天真實地享受到溫暖的天氣了。

四 民衆總動員

任何在中國內地旅行的人，他一定要習慣於許多就延，而以自由的波希米亞人的哲學去學習安於就延，最好是在旅行着而不是達到一個地方地，由於貨車和拖車的動物的缺乏，我們在這個縣城裏竟停留了四天。

在這中古式的城牆內——哈孟雷特（註）的一幕舞臺佈景，背後是一幅蓋着雪的小丘的幕布——山西村鎮裏的正常生活是被戰爭的侵入所破壞了，這和它的願望是略為相左的。日本侵略的唯一堅確的明證，是一架偶然高飛着的飛機，和當地貨幣的劇烈跌降。可是從傳單的黏貼到羣衆的集會這些愛國活動，都很明確地表示着。這裏是羣衆動員的中心，所以很多的委員會已經從太原移到這裏來了。

各式服裝和制服的錯亂的混合，擁擠在許多石頭鋪成的陝隘的街道上。駐在此地的正規軍是中央軍的一師和西安事變後改組過的楊虎城的陝西軍的一部分。可是還有許多義勇軍的集團，穿着各種不同的服裝；許多學生的組織者在穿着皮短套，戴着皮帽，看起來簡直像是政治人員的樣子，許多女子義勇

（註）Hamlet——是英國莎士比亞的名劇之一。——譯者。

勇軍，比西班牙的模型還要入畫些，穿着她們藍袴子，漫不在意地配帶着她們掛着的來復槍。

我和我的衛兵無論到什麼地方去，我總是受到一種寧人的反覆敬禮的歡迎，以及像微風一樣的謠言——「俄國人他是和八路軍在一起的。」我相信，我能被認為白魯徹將軍，而在日本新聞特務的報告中，我也許可以發現我是這樣的人物過的了，在這些地方所僅見的外國人，都是穿着黑袍的牧師和傳教士，就是英美烟草公司發展營業的代理人也從沒有深入過這裏，因為固錫山在他的「模範省」以內是有一種實際的紙烟壟斷。從一般人正希望着蘇聯援助中國的流行見解上看來，那是不用驚奇的，一個穿着軍用外套的外國人，是會被輕信為一個蘇聯參謀人員的。

「你希望去見到些遊擊隊長嗎？」有一個早晨，在第八路軍駐紮的地方，他們問我。「你不妨到靠近此地的一個村莊上的民家武裝團的辦公處去。」

「我接受了這個邀請，我同翻譯員沿着河流出發了。寒氣是突然地散開了，黃沙黏土的小丘間的空氣，是像春天一樣地轉為溫暖了。從土壘式的田野裏滴下來的雪，像結成了層塊的冰，無力地沿着溝澗，表現出冬日麥類的第一次抽青。

我們隨着電線走上小丘，經過了一座廟宇，那裏有一隊農民正在操練；一走到下面的村中，到處牆上

和門上都有五彩的標語。在此地，一座房屋式的山洞住宅裏，我們是受到了「民衆武裝團」的主要組織者的歡迎。

一個渺小的標誌，是在一身不合式的灰色棉制服上，他佩着一隻印有臨時製的義勇軍徽章在他的袖頭。——「陳同志」——如我所期望的，他是從延安來的。他們在這種工作上無敵的經驗，往往使共產黨員們成爲每一個民衆動員組織的幹部份子。但是那兩隻伸出來歡迎我的手，都曾經被來復槍的子彈所傷害，同時在擦傷了的袖口下面，兩隻手腕也是已經瘦得像棍子一樣的了。

我猛憶起我在山地中曾遇見過的那位獨臂團長，他是主持着整個區域的最重要的職務，使他和年青的政治人員聯系在一起工作的，全然是體力以上的東西。由於同樣的決心，第八路軍——從器械上說，它是中國軍隊中配備最不周的軍隊之一——却首先用正面反攻的戰術去迎擊日軍，我們知道，這些人無論受怎樣的苦難，是決不放棄他們的戰鬥的。

「你在此地工作了多少時候？」我問陳，因爲我不久就發覺到此地不是一個地方的面是全省的總部。

「還來得不久——大概三個禮拜吧。當太原撤退以後，圍錫山，希望我們到南邊來。但是看起來，留在這兒，組織戰區民衆，對我們似乎更好一點。所以當劉將軍走了以後，我們便到這兒來了！」

他告訴我一些關於西北民衆組織的詳細情形。那裏不缺乏人力；主要的困難是在獲得槍械。『在太原，閻將軍起初幫助我們，同時給我們一千枝槍。但是這不夠供我們已經組織好的游擊隊用。我們單單在這個區域中，就得使用一萬枝槍。』

『你現在怎樣處置的呢？』

『現在，我們有三種方法得到槍械：第一，民衆有他們私藏的武器——並且有得比你所假定的數目更多；其次，這裏小丘中有幾千散兵；我們逐漸地從他們那裏搜集槍械。第三，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願意幫助我們的地方長官，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儲藏中奪得槍械。』

『通常你怎樣找這些地方長官呢？』因爲這是統一戰線最困難的問題之一。要叫舊式的中國官吏穩然地接受把他們區域中農民武裝起來，這一回事是並不容易的。

他淡淡地扮了一個鬼臉。『他們的運氣改變了爲了我們，頂好的地方就是沒有那種官吏留下了的地方。我們和民衆之間決沒有困難。但是這些地方警官常常和義勇部隊聯絡，有時候，地方官吏也自動地幫助供給我們槍械和給養。』

『例如，在這個城裏，我們先前和地方當局有過一個很好的關係。但是當日本人從太原撤退了一部分軍隊，同時沒有立刻繼續他們在山西的進展時，這些官吏們便變得不大友善，甚至於對我們的工作也』

加以阻礙了。

這是關於沒有統一戰線的政府而要實行統一戰線綱領的困難之一個老故事。我後來所觀察到的農民和義勇部隊，操練並且實習游擊戰術，是僅僅乎希望爲他們自己的家庭和家族來和侵略者而抗戰。這些是中國廣大的潛力的儲藏，是無限制的更有效的戰鬥的人力，在這些山中，他們比任何正規軍知道得更清楚。同時仍然有許多地方當局，似乎是不願意把槍械發給這些可能拯救華北的僅有的民衆手裏去。

「但是假使你想知道此地有怎樣的事實，」陳曾經說，「明天請來參加這個城裏的民衆大會。」所有的愛國團體，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將要有代表出席了。那是一個正式的反日示威運動。」

第二天中午，有五千入光景，集合在市府前面的廣場上，集合在明媚的冬陽之下。或許有一半是武裝了的——中央軍帶着簇新的配備，義勇部隊，有些穿着制服。女兵們到處夾雜在他們的行列中間；農民帶着些破槍，長矛和鋤頭。這些民衆幾乎全是農民，和少數穿長衫的「先生們」以及穿着樸素黑衫的店員。作爲一個外國旅行家的我，被給了一個臺上的位置，傍着高桂滋將軍，高級的中央軍事指揮。在正式

開幕儀式舉行之後，接着就是國民黨黨歌「三民主義」和在孫中山遺像前面三鞠躬大會開始了。

演說者和聽衆一樣，也是各式人等都有的。名單中，第一個是高將軍——一個很有禮貌的矮小的人，他說得很謙和，但是沒有什麼特別強調的地方。接着是楊店城的一個部將，然後就是地方縣長。這是節目中的所謂「官吏部份」。接着是義勇部隊而著名的民衆團體的代表。

在此地，我簡直不能不感覺到，我們是到了正務了，陳傑華（譯音）代表「民衆武裝團」而演說，在臺上做成謙卑的姿態；但是他有一個足以穿越羣衆而直到街頭的大聲的喉嚨，同時吸引着新鮮的聽衆在他們的隊伍當中。簡單的，直接的，用他的擦傷的手做着熱烈的手勢，他說到此次戰爭中的危機，以及聯合各集團各部門來保衛山西的需要。這是一種大衆演說的方式——一點沒有煽動性的技巧——那只有在大家中才可以學到的，而他正是其中的一個老手。

但是這天特出的演說，却是出於一個生平第一次登臺的山西農民。起初，有些人嘲笑他的儀態，嘲笑他的多喉音的土白，但是這一位平民却侃侃地講述了每一句字句。因為這是他們懂得的一種語言。

這位演說者並沒有什麼技巧。「侵略者已經來到此地，搶奪我們的土地，燒毀我們的家庭了。」他怒吼着。「誰說我們不能打日本矮奴和他們的走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一切漢奸！」當他舉起握緊着的拳頭的時候，汗從他的頭髮裏中滴下來，在他自動的宣講之後，那些羣衆便高聲地喊着口號。

演說過後，就是露天演劇，那是一種生動而有效的宣傳方法。在排演兩齣戲的中間，我便和高將軍作很有禮貌的談話。『你對於這個會有什麼感想呢？』他問我。

我是正在對這一位將軍或已遺忘了的形勢享受着某一種諷刺意味。這個會比別的任何事都來得猛烈地提醒了我關於不到一年以前的西安民衆示威運動。在蔣介石將軍被劫持以後，這種集會在西北方面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在那個時候，高將軍和南京方面的其他指揮官，已經陳兵在陝西的邊境上來攻擊『叛亂者』了。

『那是很好的，』我對他說。『如果你能保持政府和人民的統一戰線，中國就能抵抗任何侵略。』可是，很明顯的，整個戰爭的前途是必須靠在『如果』這兩個字上面的。

五 冰天雪地中的旅程

到北方去，和到賀龍總部的路，是要穿過許多結冰的山中，這時正是佈滿了東零西散的一隊隊的散兵——他們是從正規軍私逃出來的，其中大部份已經被迫而流為土匪了。我們所裝載的冬季制服和大衣將成為這些褻褻的冒險家試想攫奪的目的物，同時爲了保護那運送給養的騾車和牛車，強有力的衛兵也就很需要了。

最後，我們上路了，八路軍的一些兵士，做我們的先鋒，還有一隊無用的當地義勇軍在車傍進行着。我想那一定進行得很慢，我看見這很長的護送隊，從這域起，沿河掃蕩而下。騾車所走的速度是相當滿意，但是那頭牛却慎重其事地不慌不忙地進行着——『不躁急，不休息』（Ohne Hast Ohne Kast）比牛更慢的東西，只有駱駝了；但是在我們完成目的以前，我們是靠着這不着緊的畜牲，作爲是在冬天的條件之下運送一切笨重行裝的最好的工具。他們走得很慢，但是很穩，並且可以不停地連走九小時。

吳，我的衛兵，和我在許多車子中的一輛車內一堆制服的頂上找到了座位。睡在那裏，確是十分愉快的事，太陽光照在你的眼瞼裏，（因爲明朗的天氣是繼續着吞視那一刻一刻的土囊似的小丘慢慢地在山谷間展開。風是很長的吹下去，但是並不冷。

我們整天的前進，經過了一個風景區，那是完全布留核爾（Browhal）化的，在遠處是藍色的雪山，空禿禿的楊柳沿着冰河長着。在薄暮的時光，我們到達了邊區的小鎮，並且在當地酒店的房子裏，找着了一個兵士分註所。這屋子是暗暗的，並且充滿着強烈的白乾——一種最強最易發生問題的中國酒——的氣息。但是我們的主人都是十分殷勤，爲我們熱着最好的酒。

運輸官是負責我們的輸送品的人，他大量地愈飲着，同時觀察到「地方愈窮酒愈好。」就一般的情形而論，這大概是真確的，因爲在這山村中，有幾個莊子，白乾差不多是農民們所能尋到去，酒在他們自己的唯一的東西。在他們所能消化的東西之中，這白酒和充滿着每一隻碟子的紅辣椒，確然是禦寒的堅強堡壘。

那晚，兩位軍校學生來到了我們的住宿處。我被他們敏銳的智慧的表情所刺激着，但是當我明白了他們是屬於第九（教育）旅的時候，也就不再驚奇了。這是山西軍隊中一個特種政治訓練班，他們曾經獲得某種的榮譽獎，他們曾召集過關於散兵問題的會議。

在繼續的公開討論中，幾個榮譽獎是給予了。「將正規軍全部南移，是錯誤的。」有幾個人指着說，這是指中國軍隊突然從太原以北堅強山脈中後撤而說的，那裏曾經堅守過三星期，以抵禦日本的攻擊。「即使太原失守，少數的幾個旅團仍然能够留在那邊的山中。但有一部份山西軍很無秩序而不奉命

令地隨意撤退，那是罪無可道的。」

就在這次後退中，許多逃兵從他們的部隊中衝散，並且開始搶劫鄉間的財物。你也不能責怪他們。一位年輕軍官告訴我：「他們沒有政治訓練，並且也沒有一個長官注意他們的遭遇。即使在他們是省防軍的時候，他們也是常搶劫的——他們現在為什麼反不搶劫呢？他們現在是沒有飯吃啊！我們已經看出我們所重編的那些小隊的散兵，當他們在受政治訓練的時候，他們是多麼迅速地被感化着啊。」

「是的，」運輸官說。「去年當我們紅軍到達西安的時候，許多人民起初很恐懼。但是當兵士們幫助他們割禾打穀的時候，他們才明白我們是他們的朋友。所以在今年，我們經過他們那區域而開赴前線的當兒，全鄉農民都擁到我們八路軍這裏，送了食品來，並且自動地替我們提行囊。」

這年輕的山西長官們重實地點着頭：「八路軍是『人民的導師』，」其中的一個用在過去幾個月中很普通的一種成語說：「在我們的軍隊中，也正需要同樣的訓練。」

次日，當我們經過一個縣城，去見那位縣長的時候，我們在同一問題上，又獲得了另一材料。「最近我們這裏有一批散兵，」他說。「一部份正規軍被派去包圍他們，但是這正規軍按兵不動，直等到散兵攜贖逃過之後，他們竟來到這裏，並且要我賠償他們被散兵所偷去的東西，這是『官匪』對土匪了，我真不知

這究竟是哪一個更壞哩。」我對這樣坦白的態度，不禁爲之驚奇，那是在常時所想像不到的。但是這畢竟是戰爭，在遇着實際戰爭的時候，一批講情面的老傢伙，已經被肅清了，當然的，氣氛是煥然一新了。

第三天到了，我們是進入了地勢更高的鄉間了，路是愈變愈壞，——不久，僅是羊腸小道了。我們已經設法再去多雇幾輛驢車，同時這發幾部車子回去，那些留着未去的，是仍舊跋涉在冰轍之中，或是在半凍的山澗裏。冰的溶解——這使我們的旅程非常地愉快——並沒有改進路的情況。

於是副官忽然若有所感地說，「駱駝」，當時我們在一個小山鎮裏遇到了一羣笨拙的駱駝。最後我們是到了「駱駝鄉」了。我覺得我，已到了北方。於急急忙忙地去雇一批新車。

關於駱駝隊，至少對於西方人是有異樣的吸引力的。這些牲畜有牠們冬季長毛的外衣，這給牠們不少的莊嚴，一個是白駱駝，有一種特別勇猛的辯性，但是不能否認牠是美麗的，牠們咆哮，反抗着，因爲牠們的背上，是裝載了大量的行裝，同時我們僅留下了三輛驢車，繼續我們的行程。

但是那三輛驢車是證明我們的摧殘。一輛是在過河時倒壞的，其他一輛車輪發生了問題。看上去好像有不能再支持十里路程以外就要壞掉的樣子。在這樣的情形之中，當開車的人很悽然地搖搖他頭的時候，運輸官（這至少和他在任何軍隊中的人一樣）很急切地咀咒着。突然，從先鋒警備隊發出了一聲

鎗響，一長隊的軍隊和車輛，橫過雪地，向我們走來了。

『散兵！』吳好像演劇一般地說，同時我自己也很衝動，因為很可能遇到什麼意外，但是我的衛兵却已敏銳地注視到了灰色衣服的小隊，而帶着譏笑地說，『不，那些也是我們的！』

『他們已經有車子了，』運糧官說，他是這樣的愉快，他已忘記咀咒的事了。師部已經前來營救我們了。現在是可以一路平安地前進了。

在我們全部車輛裝載完畢，並且重行出發以前，已是暮色蒼茫了。在月光之下，我們騎上了小馬前進，到達我們的宿營地點，那些馬是爲向賀龍將軍致敬而帶來的。

在我們的前面，是一帶半明不暗，神祕奇譎的山脈，明天，我們一定要打那兒經過的。我們在巖山中前進，閃爍的白光環繞着我們四週。同時星也是燦爛地照在頭上。

最後，我們走近一個小山村，這裏的農民拿着準備好了的來福鎗向我們詢問。這是八路軍的區域，顯然的，這裏有很多的流動部隊。在門裏，我瞥見許多武裝的農民，對着木片燃燒的火爐坐着。這裏的人民是有組織的並且是武裝的，所以散兵已不再成爲嚴重的問題。在我們的前面，一位青年穿着義勇軍服裝，跑來指示我們夜間的宿所。

「好，這是最後一天了！」次晨，運輸指揮官保證我們說，當時我們正聚集在狹小的街道上，天色還剛破曉。最壞的路仍然展開在我們的面前，但我們是準備好了一切，有一串騾子不載東西，把一切物件都載在一隻騾背上。

我立在河邊上，檢閱着貨車走過那邊，第一個走來的是騾子！在牠們的鞍子上鈴兒丁丁地響着；接着走來了莊嚴的駱駝，牠們的佩鈴，慢而深沉的聲調，很有節奏地響着。這綿延的陣線，從山谷中走進了小丘。『預備好了嗎？走啦！』我們沿着冰凍的路率領着我們的小馬前進。『今晚，你們可以到達賀龍的總部了。』

我也想，現在，差不多是這個光景了，連停留的日子在內，計算起來，我們在路上已經兩星期。兩星期沒有消息——南方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的了。

是的，是有事情發生的。我們到達師部的時候，剛正聽到了南京失守。

第七章：跟賀龍在一起

第七章 跟賀龍在一起

一 師司令部

在狹窄的門口，運輸官突然獲得一個衛兵的敬禮。一陣真誠的歡迎聲迎候着他。「進去，」吳在我背後低聲說道。

我發覺自己已在跟賀龍握手了。

這一次，一個紅軍司令官滿足了我最強烈的期望。我根據關於賀龍的記載，曾把他想像作一個「夏伯陽」，但這裏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真正夏伯陽。一個圓圓的頭，頭髮很短，配在有力的肩膀上；眼皮浮腫得古怪，眼睛在沉靜中幾乎露出悲哀的神色，此刻却燃燒着有傳染性的愉快；一張飽滿的嘴巴上橫着一道黑線。他全身表現出一種無止息的活力，此種活力在那突如其來的南方人的手勢中，在那被囚的豹子一樣在房內走來走去（賀龍決不能靜坐得很久）的大步中透露出來。他的外貌正如他的本質：一個天生的農民領袖，一個遊擊戰的大師。

我坐下來，面前照例放着一杯茶。賀龍把一隻裝烟草的東西向我一推——這是一個鉛做的很精緻的東西。「日本貨」他大笑起來，燃起他自己的烟管，愉快地噴着烟。「我們還有許多這一類東西。」他從一個角落裏拿出一隻燃燒彈的彈殼，遞給我。在這金屬的圓筒上有着已的標記。

「我們爲你預備了一點飯食，」賀龍說。一會見後，師部別的人員都來吃飯了。中國人的介紹總是有點無謂，其中總有些不熟悉的稱呼，但我終於把這一羣人分別清楚了。他們提供了一些奇異的對比。

蕭克是副師長，簡直跟賀龍一樣出名，我會把他想像爲跟賀龍一樣的人物：四十歲左右，有粗魯的司令官的顯明特點。但事實上，他却是一個二十八歲（他在歐洲很容易被人看作二十歲）的消瘦的青年。他有長長的睫毛和文雅的容貌，很像一個穿軍服的詩人。簡直不能相信他是經歷了十年內戰的老將。我在報紙上好幾次看到他的「死耗」。

本師政治工作的領袖是關向應，也是一個消瘦的青年，頭髮蓬鬆，有一小簇鬍鬚。他是滿洲人，有東北流亡者的急性子。另一個「政治委員」是甘泗淇，他自我介紹時說自己的綽號是「費斯基同志」。他外貌粗俗，臉龐像一輪滿月一樣放射着幽默的光輝，但包藏在這當丑角的神態裏的，是一副機警精明的頭腦。這是由他在蘇聯的多年政治研究所養成的。此外還有參謀長周士梯——廣東人，以前是十九路軍的師長。他身材很高，聲音深沉，態度極端沉着，我猜想他的頭腦是本師最冷靜的頭腦。

他們大多數都是湖南人；說話快而激烈，充滿了奇異的咒罵。兩星期後，我跟這些南方人一同旅行的時候，我已經聽慣了他們的言語，看慣了他們暴躁的態度，正如我吃慣了他們的紅辣椒一樣。但在這師部裏，我們却生活在一種裝着電流似的氛圍裏。彷彿時刻有人大聲歌唱。

我們初到的那個下午，我們喝了一些白乾（甚至還有類似外國麵包的食物，特別為我做的）之後，賀龍在沒有完全散席以前，就跳了起來，命令一個衛兵把馬領來。「你會騎馬好極。」

我已經在風沙疾捲，雪粉撲面的情況下騎了大半天的馬。但這彷彿沒有關係。「你無論如何要看看我的馬，」賀龍固執地說。我們沿着狹窄的街道，走入空曠的田野。風已靜下來了，黃土山間的天氣，清明而又寒冷。我們後邊市鎮的頹敗的牆垣被冬天的夕照染成了粉紅色。

賀龍像一個學童一樣，沿着結冰的漢面奔跑，看他是否吃得消他那並不很豐的饗章；幸得沒有發生災禍。「英國的河流也結冰的嗎？」他問。

「有時也結冰的。但跟這裏不同。」這裏一定有三呎厚的冰浮在水上。

馬夫們領着馬來了，賀龍用一隻批評的眼睛把馬打量一下。這是兩匹從日軍俘獲來的戰馬，牠們生長在比這裏更溫暖的氣候裏，顯然耐不住華北的寒冷。「他們不喜歡冷，」賀龍說。「這一匹病了，不能奔跑。但那一匹很健全——試試看！」

我覺得這跟我的體面有關，就跨上這栗色的大馬，路彷彿很長。我原想作短距離的奔跑，結果却跑了長長的距離，但我顯了顯並不怎樣高明的騎士的本領以後，終於把他騎了回來。賀龍帶着贊許的神情旁觀着。

他自己的馬是一匹來自雲南的小牡馬，有美麗的斑點，很像小小的阿刺伯馬。據我所見，八路軍大多數馬匹都很能耐久，但也沒有特出的地方。賀龍却有一羣較爲優良的馬匹。這原是意料得到的，因爲他是紅軍第一支騎兵的組織者。

我們在暮色朦朧中回到師部。賀龍每走十二碼路，總要停步向一個對他行禮的士兵談幾句話；他告訴我：他幾乎認識本師每一個士兵。一個鬍鬚灰白的老兵走過他的身邊，這位快活的司令熱情地拍拍他的肩膀，直率地詢問他的私生活。「他五十八歲了！」賀龍說，用指頭說明這個老兵的歲數。「他跟我在一起已經九年了。」

雖然本師的主力是由湖南人和湖北人構成的，但也有一些外族的份子。我們經過一個敞開的門口時，賀龍突然衝進院子裏喊道：「蠻子！一個穿軍服的矮笑的少年回答他的呼喚。

「蠻子是西藏人！賀龍告訴我：他是長征時在西康加入我們的。他會唱歌！會跳舞。唱！蠻子！」

蠻子懇切地唱起來——一種乾啞的顫抖的歌聲，不時被有力的喉音打斷，奇異地唱出雪峯和冰川

的景像。他接着爲我們跳了一場喇嘛舞，最後又用一枝中國毛筆吃力地寫了一些藏文。我猜想他是從寺院裏逃出來的。

回到師部，我正在一羣「小鬼」面前揩拭着我的打字機的時候，「慧斯基」突然衝進房來。他簡單地報告道：「無線電英語播音！」

在近旁的一間房子裏，一羣人擠集在顯音機的週圍。「我們聽得最清楚的是東京的廣播，那位『學生技師』帶着抱歉口吻告訴我：『南方各電臺的音波被日本人攪亂得太厲害了，只有長沙例外。東京用中英兩種語言廣播。』」

這總算又跟外界發生接觸了，即使消息不會有利於中國。但我們一會兒後所聽到的消息，簡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本日下午兩點鐘，」聲音愉快地報告道，「日本皇軍開進南京城……皇軍艦隊克服了一切障礙，由揚子江直駛南京……據報，華軍潰退，遺屍六萬……」

吳把這消息簡單地譯成中國話，關搖搖頭。「只有在日軍佔領南京城以後，才有六萬死屍。」但這消息依舊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我指着顯音機（他此刻說着「日軍勝利的原因在於天皇的德澤」一類的話）說：「從該調聽來，

那應該是一個英國人。賀龍聳肩膀，好像不勝抱歉似的。但稍稍停了一會之後，另一種聲音用真正的北京話繼續說下去。

「媽的狗屎！」賀龍喊道。他對着顯音機搖着拳頭：「漢奸！一個中國人竟在敵國的首都廣播自己國都淪陷的消息！這是難以相信的事，但這無疑的是一個中國人。這流利的聲音繼續說下去；無線電員帶着冷靜的面孔記下廣播的詞句，

「你想這消息靠得住嗎？」吳問我。

「恐怕靠得住的。這是一種國際廣播，不能完全說慌。」

賀龍在房裏踱來踱去。「南京完啦！」他說。「南京完了。但我們會把他收回來的！」

不一會兒，他又聚精會神地跟一個年紀最小的新兵下棋。

一一 賀龍的一生

賀龍的生活史在中國十二省內都已變成了傳奇，但在外國，簡直還不大有人知道。朱德是留學生，毛澤東一向具有國際的聲譽。但賀龍——他遠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以前，就成爲農民軍的領袖——却是一個土匪出身的人物，他的真實生活的奇妙簡直不下於傳奇。牠幾乎像是從水滸傳裏摘錄出來的一章。

下面是幾個插話。牠們湊在一起，構成一幅中國革命的輪廓畫。

在民國以前和民國最初幾年中，賀龍的活動地區是在南方。賀龍剛剛生在新舊世紀的過渡時期；他的家族是湘西桑植的貧農。那裏的農民在本省督軍的暴政下，在苛捐雜稅（賀龍家每月必須付五元捐稅；中農家每月必須付十五元）的重壓下，不斷地受着痛苦。賀龍十八歲時就在當地領導一次農民暴動。這事情發生於一九一六年，正當中國最有野心的政治家袁世凱企圖稱帝的時候。賀龍把當地的農民和民團組織起來；有一天，他們趕走了八縣的縣長。由於隣近區域的援助，他的部隊立刻擴充到十五萬人，大部份武器都是土鎗、大刀和矛槍。

北洋軍閥派了一萬正規軍來對付這支農民軍。經過了幾天決死的戰鬥後，農民軍被衝散了，而北洋軍隊就作了一次殘暴的報復。但在桑植，當他們正要燒燬賀龍自己的住宅時，天空突然下了一陣大雷雨，

而這個「天啓」嚇壞了迷信的北洋軍官們，使賀龍及其家族避免了更進一步的懲罰。（大概從這一事件發生之後，南方的農民羣衆就認為賀龍是一個「神聖」的人物。）

接着雲南、貴州和四川等省聯合反抗北洋軍閥，賀龍成爲一支獨立農民軍的司令。他部下許多隊伍的編制還是滿清時代的「綠營」制，而所有武器也是最落後的老式刀鎗。他們在山中跟北洋軍隊作戰的方式往往是從山頂滾下笨重的木頭。但這樣打了幾年之後，和議成立，農民軍被解散了。

他到湖南省會長沙活動了一些時候，策劃政變，跟「同盟會」取得密切聯繫。當時長沙罩滿了政治陰謀和暗殺的團氣氛。有一次，賀龍被駁與暗殺長沙幾個北洋代表的任務，他喬裝警察，走到衙門，只有幾個他以前的部屬才認得他。他在長沙被捕，一星期後設法逃出，回到湘西，組織了三十萬左右的農民，宣布獨立，而且訓練部隊，企圖佔領整個湖南。

但在常德，他又被捕，他的部隊突然失蹤，好像由於魔術所致似的。幾個朋友把他保釋出來，他毫不氣餒，決意入鄂。他在桑植的家裏，有十桿來福鎗；他叫幾個弟兄帶着這些槍先走，自己同一個小孩子留在湖南。

賀龍和這小孩子用廚刀武裝自己；他們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奪取幾桿鎗。他們碰到八個兵正在護送一個卸職縣長，其中有兩個落在後面，一個所處的地位很不利，另一個正在吃東西。孩子襲擊第一個兵，賀

龍賀最後一個，他們就這樣得到兩桿來福鎗。他們過後又設法獲得兩桿。

賀龍及其同伴們就用這些鎗桿向北打過七縣，最後到達湖北橫杭（譯音）他又成爲一個獨立司令。當馮玉祥在湖南打吳佩孚的時候，賀龍跟王子平取得合作。當時軍事領袖們的派別，使中國歷史的專家也感到迷惑；不過一般地說，大致可分爲南派和北派，前一派是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派』，後一派是『反動派』（當時獲得列強的首肯，由列強公認加以支持。）

賀龍從小就是一個革命的叛徒，一向屬於南派，而在那一時期的他忠於孫中山的理想和主義。但他確信革命軍隊應該由某一政黨來領導，同時覺得同盟會在許多方面都不能勝任這一業務。一九二〇年，他在寧遠上讀了前共產黨領袖之一陳獨秀的文章，他認爲這是『他的社會思想的轉彎點』。

此後又發生了三年的戰爭，四川，貴州，雲南和湖南的軍閥結成『剿匪聯軍』，抵抗北洋軍閥劉湘和吳佩孚。那時候，賀龍的任務是封鎖揚子江上游。照他自己的說法，這是他第一次跟『反日活動』發生關係。

雙方軍火的供給量一天減小一天。這時賀龍（他率部駐在揚子江流域的撫州）得到報告，說日本送來一輪船的彈鎗接濟北洋軍隊。當賀龍從南軍一個間諜得到這消息時，那艘日本輪船已經停泊在十里路外的長江上。他率領三十名士兵，內有一羣婦女，到了那裏，他們全體喬裝苦力，身內暗藏着手鎗。他們

假裝賣菜，坐在小船裏，駛近輪船，設法跨上船去。

他把弟兄們分布在各個有利的地點，於是發了一個信號，他們成功地獲得了這艘輪船，雖然船上他們自己的間隙受了傷。這個間隙告訴他們軍火藏在那裏，賀龍及其隊伍帶着兩個日本軍官離開了。賀龍把這兩個不幸的俘虜拘禁了兩年，向日本政府索取二十萬元的贖身價。

先後有三個日本領事訪問他，談判釋放俘虜的事情，但賀龍說這兩個日本人是北洋軍閥的間諜，一定要二十萬元，他結果獲得十萬塊錢，和日本政府永遠不變的惡感。

從這時直到一九二六年的北伐，賀龍沒有脫離過戰爭，碰到各種各樣的遭遇；剛在北伐軍離開廣州以前，他接到國民革命軍的任命。他在武漢加入革命軍，參加湖南的戰爭，開始跟共產黨人保持着密切的工作關係。他後來率部入贛，跟朱德一同領導南昌暴動，第一支紅軍就是在那時組織成的。「左派」的革命軍南向廣州行進，賀龍就在這時加入共產黨。

在廣東失敗後，他同三十名左右的革命黨人逃到香港，接着又到上海，賀龍和幾個同志奉命到蘇聯研究軍事政治。但當時南京政府和蘇聯的關係極度緊張，外交關係已經斷絕，從中國到蘇聯沒有直接路線。有些同志提議假道日本，賀龍反對這種主張：日本當局太熟悉他了，而且當日本領事們訪問他時，他會對他們說，他如果到日本去，「一定是率領軍隊同去的。」他因此提議自己重往內地，在他所熟悉的兩湖

四川和雲南等地組織紅軍。

一九二八年又到武漢，他從當地共產黨領導四桿來福槍。這幾桿槍在賀龍是够用了。他在幾個月內招集了一隊非正規軍，沿着長江上游實踐遊擊戰爭。這一部隊後來變為第四方面軍，第二年他跟政治工作人員周逸羣在兩湖組織了另一支軍隊，他後來成為紅第二方面軍，在內戰時期和「長征」時期一直由他自己率領。（這支隊伍就是目前第一百二十師的基幹。）

賀龍加入共產黨以後的生活史，實際上就是中國紅軍和中國蘇維埃運動的歷史，他結束於一九三七年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結成的時候。雖然近來外國人也很知道這段歷史，但他有許多方面依舊不爲人們所熟悉。江西和福建的中央蘇區在「圍剿」時期是够出名了；但有三年歷史的兩湖蘇區却不大有人知道，牠其實就在武漢的門口。直到一九三四年，賀龍沒有離開過這個蘇區。

這個蘇區的歷史的確很富於戲劇趣味的，這裏只能寫下牠的少數幾個插話。兩湖蘇區圍繞着紅湖不時爲揚子江的洪水所蹂躪；一九三一年，本區蘇維埃政府設在幾隻船裏，船繫在倒塌的房屋的棟樑上。但這近水的特點，發展成了一個驚人的不大有人知道的業績：建立了中國第一支抗日的「紅色海軍」。日軍佔領滿州後，中國蘇維埃公使向日本宣戰，但他們最大的困難是找不到實際他們宣言的道路。江西蘇區被封鎖在南方的深山中，沒有機會跟日軍接觸，但賀龍和湖南紅軍的領袖們奪得一些大砲把

牠們組成兩個砲隊，從岸上轟擊揚子江上的日本船。

不幸他們從岸上不容易辨別經過船隻的國籍，他們因此決定組織自己的艦隊。他們奪得兩艘招商局的貨船，配以鎗炮。「列寧號」和「逸羣號」在揚子江上游豎起了紅旗。這「蘇維埃海軍」創造了短短的光榮的歷史。當紅軍被迫從兩湖南退的時候，這些船隻終於被放棄了。

賀龍部紅軍的另一獨創的業績，就是組織了紅軍第一支騎兵。一九三〇年，中央軍用騎兵進攻湖南蘇區，賀龍及其部隊以伏兵擊敗進攻的軍隊，用大刀配在木棒上攻擊他們。他們俘得近千匹馬，就以這些馬為核心，組織了一支非常堅強的騎兵。紅湖的弟兄們都是熱練的騎士，能在馬背上打仗。據賀龍說，他們能站在馬背上放鎗，用馬刀斬殺也能獲得同樣的效果。從此以後，兩湖紅軍每一團都有騎兵隊，他們發覺騎兵有絕大的效用。有一次，紅軍主力被包圍在紅湖的兩旁，騎兵游過湖面攻擊敵軍的後方，克服了極度危急的關頭。

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主力紅軍從江西出發長征的時候，賀龍及其部隊開入貴州，他在這裏第一次碰到蕭克。他們從貴州穿過雲南、四川和西康，在西康碰到第一方面紅軍，賀龍又得與朱德直接合作。從貴州穿過西康的四個月中，他們每天行軍，最後到達甘肅，各路主力紅軍於一九三六年十月間在甘肅大會合。賀龍和毛澤東的第一次會見是在陝北。

這是一十五年戰鬥生涯的輪廓，此種生活終於把這個天生的遊擊戰領袖領到「抗日戰線」上去。這是畢生獻身於革命鬥爭的紀錄，但賀龍自己却認為加入共產黨以後才開始他的真正革命生活。

賀龍有策劃政變的天才，有組織和領導中國「窮人」的天才，他在任何環境下都能成爲領袖和活動人物。但他在中國紅軍所領導的十年土地革命中找到了他適當的地位，在這裏，他的獨立領導能夠自由發揮；在這裏，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在政治上重新受了一次教育」。最近的生活是他整個生涯的一部份。

很早以前就向日軍挑戰的賀龍，現在率領一軍人馬在華北前線活動，而且迅速地組織新的隊伍，把所有精力都獻給抵抗外來侵略的戰爭。越過他的「軍區」，有路線通至綏遠，另一個可怕的遊擊領袖馬占山將軍正在綏遠重整他的騎兵，同時又傳言有路線通至滿洲，滿洲全體民衆只在等待着叛變的信號。

人們覺得，當日軍最初確定征服華北的「掃蕩計劃」的時候，他們沒有把某些事物估計在內。

三 戲劇印像

一個長大的房間，沒有天花板，一根根的木柱子一直連到樑上，這從前也許是一個穀倉，也許是什麼發財的地主的馬房；在一頭，是一座泥土堆成的臨時舞臺，掛滿了旗幟和五顏六色的標語。這是一個冬天的夜晚。房間裏冷得難受，而且充滿了抽煙的煙霧，使空氣變成了青色。但是誰也不管這些。他們結結實實的擠在一排排的板凳上，或是沿着牆一排排的站着。灰色的軍裝和山西農民的發臭味的皮大衣亂雜着。還有無數的孩子在裏面……

這是一個晚會，是『士兵俱樂部』爲了慶祝當地的一個游擊隊的成立開的。

我們走進去的時候，大家的注意正集中在布幕前面的一盞從樑上掛下來的汽油燈上。一個穿黑色制服的機器匠正站在一條板凳上對付着那盞燈，他的周圍是一圈仰着的臉，對着那一閃一閃的燈光發急。這些臉都是些普通的中國農民的黃臉。這真是一幅粗線條的象徵中國革命的寫真畫。

那汽油燈出了毛病，一時陰沉沉的要熄。一時又噴出耀眼的火焰。那些急壞了的觀眾不斷的提出一些意見作爲幫忙。『再打些氣，同志！』……『你們弄了一盞日本貨的燈來了』……『行啦』……『危險』……

「走狗」那點燈的工人咬牙切齒的咒罵着那頑強的不聽調度的燈，一面專心專意的修理着，顯然對於那些批評者並不注意。隨後，他的額頭隨着燈頭雪亮的照耀起來了。在一陣歡呼的合唱裏，他關上了燈罩：「行了！開始吧！」

政治局委員「羅斯基」走上了舞臺。他的圓圈險放着光，嘴裏一口湖南土話，他是非常熟悉開會儀式的。「現在開會。向抗日的戰士們致敬！向農民游擊隊致特別的敬意！向蒙古來的兩個同志致敬！」他接着簡略的報告了最近的戰況，這是從無線電廣播裏得到的消息。國際上的發展也各方面都報告了一下。士兵們緊張的傾聽着這些消息，農民們最初有點莫名其妙，但是後來他們的理解却一步一步的增加了。還有另外一些演說：這新成立的當地的游擊隊有一個代表出來講了一些。他是一個大塊頭，穿着不整潔的軍服，帶着游擊隊的袖章，十足的本地話，簡直一點也不懂它，但是他的老嫗們却聽得津津有味。隨後一個蒙古人，穿着拖拖掛掛的羊皮衣服，講了一些綏遠的游擊戰的情形。他的圓溜溜的頭在燈光下閃着黃光。

屋子裏是擠得結結實實的，但是在一陣掌聲中，當地的行政長官只得拚命的擠出一條路走上臺去。他講得很短。隨後，樂隊奏音樂了。這樂隊是雜湊起來的，有三弦，有笛子。「這曲子叫標上燕」吳在我旁邊說，表示他是熟悉的。臺前的幕返人的動着。

(這褪色的布幕是有革命歷史的。它上面綴着紅色的斧頭、鐮刀和五角星，它在別的戰爭時也出過風頭的。在它上面還留着一橫排黑色的大字：「第二方面抗日紅軍」，不過現在多了一面青天白日旗號了。)

哨子尖銳的叫了一聲，幕一閃的拉開了。表演開始了。

像平常一樣，第一個節目是兒童團的跳舞。這些孩子（他們的年齡是十歲到十五歲）是一切宣傳人員裏最熟練的表演家。他們大多數是隨着「長征」從南方來的；有的從湖南，有的從貴州，有的從四川。他們會經由一位在現代歌舞劇的老家研究過的人指導，訓練過幾年。

「國際舞。」這舞曲開頭是憂鬱的鄉村風味的音調，結尾是國際歌。表演這舞蹈的人（是一些所謂「女孩子」，穿着紅色的短裝）是真正能夠抓住這曲子裏的戰鬥的情緒的；她們的年青的臉上透露着悲劇的緊張的表情。在中國別種地方你決不能夠看到像這樣動人的，嶄新的現代舞蹈。

第一齣戲開始了。背景是倭敵人佔領之後的上海閘北——一個工人的家裏，聚集了許多工人的朋友們，在談着他們生活上的危機，他們要不要，特別是能不能和侵略者作戰。

日本憲兵由漢奸陪着來搜查這屋子和裏面的人；他們懷疑這工人的大兒子是便衣隊。但是其實他是一個不抵抗主義者。他的母親大聲的爲他辯護着。但是她的辯護一點沒有用處，兒子還是被他們拉去

了。（這裏使觀衆對於不抵抗的人發生了嘲笑。）

在街上這被捉的人掙脫身逃走了，但是又被捉住，於是日本憲兵把他狠命的打，打到要死才放了他。朋友們圍着這臨死的人，他還在伸訴着他的冤枉。『我並沒有反抗他們——但是，我是應該反抗的啊！兄弟們，爲我復仇。』

工人們拿起了他們的鐵錘，斧頭，木棍，跟着一個中國偵探走了。他們大伙兒參加了游擊隊。

這是不成熟的但是有效的宣傳。生怕還有人不了解這戲劇的意義，因此一個政治組織者還出來簡單的向農民解釋了幾句。這是八路軍用戲劇宣傳的方法。

又是兒童團的跳舞。這是一個比較活潑輕鬆的節目，名字叫『國共結婚。』男孩子們穿着美觀的青夾白的裝束，女孩子們穿中國農婦的衣服，拿着紅手巾。這個舞蹈表示親密合作的意思，最高峯是『工廠商學兵』都參加了統一戰線；還有兩個兵士——一個穿着中央軍的軍服，一個是帶着紅星軍帽的農民自衛隊——一同舉着槍瞄準了民族的敵人。這不僅是有力的，適合而有趣的政治宣傳，而且是一幕動人的『表演』。

也許對於一些樸實的觀衆，這一類的表演還太新式，太現代化，所以接着是一些比較舊派的東西——京戲調頭的歌唱，還有流行的陝西『秦腔』，這有點像倫敦的遊藝場裏的東西。在表演鬧歌的中間

是全體合唱，聲音大得震動房屋。

隨後又是一齣比較長的話劇，這算是中心的一齣，因為它的主題是武裝起農民來參加游擊隊。日軍要來了，村莊上的人聚攏了商量怎麼辦法。他們買了香燭點起來，向菩薩訴了一頓苦。他們中間有很少幾個小工匠，還有一個私塾老先生，他的言論還被眾人非常尊敬；大多數都是農民。

他們只有很少的一些武器——大刀和長矛，年老的村長帶來了一把舊來福鎗，這是他們這一夥人僅有的現代武器。隨後消息傳來，日軍已經到了前面一村了。

又是那同一的問題——能不能和敵人打？正面的意見和反面的意見都有，兩方面互相爭執着，很深的表現了農民氣質。隨後來了一個哭泣着的女孩子，敵人暴行之下的犧牲者，於是爭論的形勢立刻改變了。大部分人都憤激起來了。「但是這東西有什麼屁用呢？」一個農民喊着，把手裏的矛擡在地上。

「我會教你知道它的用處，」他們中間最勇敢的一個針對着他說。他把那香案上的紅色桌圍撕下來臨時做成一面旗。「我們有一把鎗，還有大刀。我們可以在夜裏去襲擊——我可以領你們走一條小路。我們可以從矮鬼那裏弄到鎗！」他們於是組織了起來出發了。

另外還有一些表演，中國觀眾的習慣是歡喜連看五六個鐘頭戲的。兒童的農民舞最多。有一個是做「反漢奸」的諷刺劇，非常滑稽有趣，漢奸的角色是這劇團裏的「明星」扮演的（他在跑到紅軍的

隊伍裏來之前，是陝西某銀行家的一位小少爺。這戲全部都非常有趣味，但是嚴重的問題也不放過，而是用很活潑很有力的方法表演着。

明天這「劇隊」就要到隣鎮去，他們曾經在北戰場的各處地方活躍過。我們在無邊的天幕下步行回司令部去。有誰在唱着，這歌是我在延安的時候聽見人唱過的，那些辭句是馬賽曲的模仿，但是調子却更激昂，更熱烈：

「我們是被壓迫的民族，

我們需要戰爭！

打碎我們的鎖鍊，

爭取和平……

兄弟們！武裝你們自己，起來！

到綏遠，到太原，

到山東，到河北，

到前線去！

驅逐兇惡的敵人

出中國去，
用我們的血爲和平而鬥爭！



八路軍一百二十師副師長蕭克和本書作者合影



八路軍一百二十師師長賀龍

四 蕭克自傳

我勾留在賀龍的司令部裏的時候，和那位出色的青年副司令蕭克做了特別要好的朋友。蕭克是一個動人的人物，也是我在紅軍裏所遇到的，個性最強的一個將領，他的頭腦很敏捷，鋒利得像一把寶劍，在他那纖弱柔和的外貌裏面，隱藏着一種大得怕人的力量。他往往歡喜帶了一堆圖表躲到自己的房間裏，直到第二天早晨出現，眼框深陷着，他做成了一個複雜的軍事計劃，這計劃要使他的同僚們研究上幾天。蕭克是少數記日記的紅軍將領之一，他曾經記錄了自己在「長征」中的經驗，這浩大的記錄（據吳告訴我）還是文字上的傑作。

當我詢問他的詳細歷史的時候，他的膏生氣質却又被引起了。假使我是對賀龍提出這種要求，那他一定會滔滔不絕的敘述他從前在湖南的那種傳奇式的生活，那些有趣的奇談是只有專寫綠林好漢的小說裏才可以看到一二的。但是蕭克——像處理一切問題一樣——很嚴肅的回答了我的要求。「我寫一個概要給你吧。」他說。第二天他就交給我四五張公文紙，上面寫滿了很小的，美麗的中文。「這是我的小傳，」他很簡單的說。「我希望這是正確的。」

在這裏我把他的文章不加改動的翻譯出來，它不僅是典型的，共產黨的聖經，而且是中國這一代的

歷史。但是時代的進展如此的迅速，像蕭克這樣二十八歲的青年，而能够抓緊時代，從時代學習豐富的東西的，還是很少的。

「我生在湖南嘉禾縣，直到一九二一年，我的父母一直是當地的一個小小的鄉紳——每年都在當地行政機關裏佔有一個小小的位置。在軍閥內戰的時期，政府強迫徵收各種苛捐雜稅，而地主和大戶又非常殘酷的壓榨農民。湖南又受了幾年的災荒，因此農村經濟幾乎全部崩潰了。」

「這期間發生了一些社會變化。失掉了土地的貧農一百二百的成羣結隊起來反抗政府和搶劫財主。這種原始的農民暴動當然沒有進步的階級領導，但是因為社會不安的總形勢，所以往往能够發展到幾縣大的規模。我的大哥也被這農民叛亂的狂潮捲進去了。」

「政府派了軍隊到我們家鄉來鎮壓叛亂。農民的領袖們被政府收買投降下，因此叛亂就被鎮服。我的哥哥被告密了，於是被捉去殺掉。我的父親也被送進了監牢。在第二年（一九二二）軍隊到我家搜查了前後四次。我們損失了四——五百塊錢——這是我們所有的一半以上。」

「因為這種原因，我的二哥只好停學了；隨後在一九二三年，我的家庭更窮下來了，他們就教我也停學。但是我堅決的要受教育，打算繼續在本地的初級師範讀書。經過了極大的奮鬥才湊滿了我的學費，爲了省錢，我的衣服，鞋襪，都用最粗劣的料子做成。我的零用是一年也不到一塊錢。」

「因為我的大哥被殺以及我的家裏被軍隊搶劫了幾次，我對於政府和有權勢的地主就深切的仇恨起來。在這時候我的學校裏發生了一個學生運動，我也是其中的一個領袖。政府和鄉紳當然照例支持那些保守的教師而壓迫學生。我當時就覺得一切地主中間實在沒有一個好人。」

「在這時期中（一九二三——二五年）我有一個表兄在廣州大學讀書。他常常給我關於三民主義和革命理論的書。我讀孫中山先生的全部著作，讀了馬克斯主義和達爾文主義，七十二烈士傳，宋教仁傳。從此以後，我對於孫中山先生發生了堅決的而且有理性的信仰。在這以前我對於他的崇拜不免有點盲目，有點像幼稚的英雄崇拜。」

「一九二一年以來，我對於廣東的革命軍就有了熱烈的同情，急切的關心着他們的成敗，有時我整夜不睡的看報，尋覓關於他們的消息。一九二四年廣州的革命浪潮又高漲起來的時候，我決定去加入革命軍。但是直到我的學校課程完結之後才實現了這心願。」

「最後，一九二六年的正月裏，我畢業了。我的學校離我的家十五里，我不告訴家裏我的計劃，借了七塊錢就單身到廣州去。那是嚴冬天氣，而我的衣服非常單薄，我的行囊裏只有一雙鞋，一雙襪和幾本書。這些書是教育心理學，大綱，孫子，曾國藩，胡林翼的軍中語錄和中山主義的理論。費了九天的功夫到了韶關，從那裏搭火車到廣州，我到了廣州之後想進黃埔軍官學校，但是招生的時間已經過了，所以我加入了國

民革命軍當了五個月的兵。

「一九二六年的六月，在蔣介石將軍的領導之下，北伐開始了。先鋒隊很快的佔領了長沙，逼近了武漢。這時候我在第五後備隊裏有了一個位置。一九二七年三月，葉挺的一師駐在武漢，我在裏面當一個下級教官。二次北伐打到河南的時候，我那時是一個連長。就在這二次北伐的兩個月中間，我讀了共產主義ABC和共產主義的計劃（三年以來我就一直是共產黨辦的領導雜誌的讀者了。）這時候我成了共產主義者。

「我回到武漢不久，我們這一師就開發到九江和南昌去了。我從共產主義者的立場研究了當時的總的政治形勢，後來就和朱德參加了南昌暴動。我們的軍隊在廣東失敗之後，我逃到了廣州，然後回到我的家。

「在家就擱了兩三個星期，那正是要過舊曆新年的時候。新年前兩天，我聽到了朱德帶兵到了宜昌的消息，宜章離我的家有三天的路程，我和我的二哥——他是贊成我做共產主義者的——說了一下就動身去了，沒有告訴我的父母。一天之後我到了一個好朋友的家裏，他告訴我朱德走了——沒有人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在失望中我又回到了家裏。

「我的母親眼睛裏含着淚對我說：『去年新年你不在家和我們一起過節，現在新年來了，你却又跑

了出去！她哭得很傷心，但是我的心中仍然想着朱德和他的軍隊。

「過了元旦，我就又聽說朱德是在八里堡（譯音）離宜章沒有多遠的一處地方。我和兩位朋友商量決定了去找他們；兩天之後我們動了身。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後，我到了我父親的一個好朋友姓蕭的地主家裏。這地主是很反動的，但是他沒有懷疑到我，而且爲了我父親的情面待我很好。

「在他家裏我遇到一些被紅軍從宜章驅逐出來的大地主。我穿了一件黑色的學生裝，準備和他們好好的交際一下，因爲我想他們會知道朱德最近的消息。我造了一個謊話，對蕭說：「我去年離開廣州的時候經過宜章，把一些行李留在那邊的棧房裏了。現在我能不能去取那些東西呢？」

「你稍爲等一等，」有一個地主說，「我的偵探就要回來的。那時候你就可以知道種種消息了。」不久這地主的偵探回來了，他說朱德從宜章退走了；他又詳細的把「共匪」的各種活動報告了一下。我和主人告辭動身。兩天之後我到了一個發生過農民暴動的村莊，就參加了湘南的暴動。

「這暴動之後，我開始訓練遊擊隊和這一區域的地主的民團作戰。我率領的一隊大約五六百人，我們很被當地的民衆信任和支持，我們在湘南建立了一個蘇維埃政府，它支持了三個月。一九二八年的四月，白軍從廣東和貴州向我們進攻，朱德帶了他的農民軍隊從耒陽、連州、永興、資興退到了井崗山裏，我們的遊擊隊沒有接到撤退的命令，於是被敵人截斷了聯絡。

「我們集合了五百個人，武裝着各種來福鎗和土製的砲，想打到山裏和大隊聯絡起來，苦戰了五六天。很幸運的遇到了毛澤東，他帶了一隊人剛剛攻擊了汝城回來。這是一個愉快的會合！我們一同衝進了山裏，找到了朱德的軍隊。此後我就做了朱毛的助手和學生。我從他們學習了革命的計劃、理論和方法，這不但是那時候，現在我還跟他們學習，將來也要跟他們學習。」

「一九三二年的秋天，革命軍事委員會派我到了湘贛蘇區。這是我第一次獨立工作。一九三三年我們的軍隊打敗了王夢德、陳光中、彭位仁和李覺的軍隊。和中央紅軍合作着，我們粉碎了第四次圍剿，鞏固了湘贛蘇區，使它成爲江西的中央蘇區的強有力的左手。」

「一九三四年正月，我受命北上，我們的軍隊在沅水、澧水、和信水一帶活躍了兩個月，我們回來的時候打敗了王東原和陶廣，很有效的給蘇維埃政府防禦西面的攻擊。」

「八月裏我又接到另外的命令，教紅軍第六集團軍離開湘贛蘇區，衝過湘南和貴州東部，和賀龍同志領導的第二集團軍會合。我們執行了這個命令，在十月裏的時候，我們不但已經在那不毛之地會合了我們的軍隊，而且做了朱毛主力軍的先鋒，那時他們正向北推進走上抗日的前線。」

「我們的軍隊會合之後就開進了湘西，打敗了陳繼承（他盤據在湘西已經幾年了），建立了湘鄂川黔蘇區。當時政府就派了湖南湖北的全部軍隊和一部分中央軍來進攻這個蘇區。但是經過了六個月

的戰勝，「白軍」進攻完全粉碎只得撤退了。這是自從朱毛從揚子江上流渡江北上以後紅軍的最大勝利，在中國的革命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

「在這次戰役進行的時間，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簽字了，日本侵略者佔據了河北和察哈爾。全民族被奴役的危險空前的嚴重了，我們第二和第六軍於是響應中央委員會的號召北上抗日。」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們離開了湖南的蘇區，通過湘西，貴州，川南，和雲南，我們渡過了長江，在新疆會合了第四方面紅軍。隨後我們跨過了草原高山，通過甘肅南部到了陝甘寧邊區，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月紅軍三大主力在陝北的偉大的會合。我們又能够在中央委員會的直接領導和朱毛的直接指揮之下了。現在，在新的政治形勢之下，我們參加了光榮的，民族革命和解放的戰爭。」

「過去十年來我完全在黨中央委員會的路線和計劃之下工作着。我是一個徹底的「國際主義者」而且堅決不拔的信仰着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方法。在十年來的蘇維埃爭鬥中，我是這鬪爭的浪潮中的一份子。這浪潮是這樣的偉大，它把我的生命鍛鍊成現在這樣。」

「自從我接受了黨的領導以來，我只希望着我的生命能够和廣大羣衆的生命調和一致。我只希望我能够成爲齒輪上的一個牙齒，推動羣衆作更大的鬪爭。現在以及永遠，我願意做一個徹底的國際主義者，做一個朱毛的好學生，和我們的廣大羣衆共同爲民族解放而鬪爭。」

五 新年

一九三七年的開頭充滿了吉兆，短促的然而非常生動的西安事變是和乎解決了，國內有統一的希望；但一九三七年的歲尾却湧起了滾滾的戰雲。我們從晉北山區的師部裏看見（像在一張地圖裏看見的一樣）侵略軍沿着揚子江流域擴展着，北入安徽，南沿華南的平原推進。一九三七年的聖誕日跟前一年的聖誕日不同，牠在中國不再是萬人歡呼的日子了。

在歐洲，戰爭的局勢多少有些平定下來了，至少暫時總不會爆發戰爭。日軍在華中及沿津浦路一帶實際主力進攻，從山西調去大批軍隊。他們似乎暫時以保守太原和繼續擴展正太路的範圍為滿足，暫緩向南推進。當我於十一月間到達山西的時候，人們原以為日軍非南進不可的。

但，像每天傳到師部的消息告訴我的那樣，日軍發覺自己要保持到太原的交通線，非常困難。日軍在太原北面僅僅佔領幾個主要縣城，他們雖然有幾條大路可通，但得受散布在各處的八路軍和志願軍的流動部隊的不斷襲擊。這些遊擊隊一天活躍一天，他們甚至到達太原四郊，他們的活動範圍北達大同和蒙古邊界。日軍固然可以在白天攻擊他們，「磨礮」他們，但一到夜間，立刻在重砲的掩護下，退回城內。現在日軍更聰明了，不再深入山西山區追蹤捉摸不定的「匪徒」。

同時，在一九三七——三八年的歲末年頭，從別處戰場傳來的消息一天壞似一天。杭州被侵略軍攻陷了，據日本無線電報告，已有組織蘇浙皖的「臨時政府」的消息。但這一切雖使這些官庶省份內的中國資產階級驚心動魄（日軍的用意原來如此），而同時却又加強了中國民衆的抗戰意志。日本軍閥的「恐怖」戰術是一種殺人自殺的武器，南京及其週圍區域的命運就是明證。日軍的恐怖手段比中國政府的愛國宣傳更能激起中國農民對侵略者的反抗。

閩閩坐落在戰區的山東，還沒有發生過十分猛烈的戰爭，這原是不可思議的事，但現在山東却引起了人們十分的注意。青島日本工廠的被毀（從日軍在中國其他部份的行動看來，這一着是避免不了的）引起日軍進攻濟南，佔領濟南的行動。日軍的直接目標是要完成津浦路日軍的大會合。蔣介石將軍已在津浦臨海兩路的交叉點徐州週圍集中了中央軍的主力，據人們的估量，在此後幾個月，在德國軍事專家指導下，最容易才築成的中國「興登堡防線」的後邊，將發生最猛烈的大戰。

這一切消息聽來彷彿與中國很不利，但同時也有一些使人樂觀的消息。南京的失陷最後一次向中國政府證明：尤靠正規軍單獨抗戰是不行的。中國政府公然宣布：此後將更廣泛地開展遊擊戰，各地民衆將自動武裝起來，組成自衛部隊。此種作戰方式限最初幾個月的抗戰完全不同；這一點比前線陣地的任何變動更有決定意義地標出了中日戰爭新階段的特點。

同時政治改革問題也被認真地考慮着。因為這些都是中國共產黨開始提議的，日軍就說這一切都是共產黨和蘇聯出的主意。政治改造的一股趨向是雙重的——一方面提高戰時政府的集權，另一方面促成政治更民主化和改善民衆的生活。

一月一日，國民政府有了某種變動，實現了改組政府的第一步。蔣介石將軍辭行政院長職，由孔祥熙博士繼任；有幾部合併了，幾個最著名的「親日」官員辭了職。這實際上不過是一種非常溫和的變動，不過是真正改組政府的初步。但這一步做得很對。中國的局面彷彿真在變動着了。日軍愈速勝，中國愈在更實際更嚴肅的陣線上作長期抗戰的準備。

我原來希望在前線過聖誕節，但他們一定要我在師部過新年。在中國，拒絕別人請客是最不恭敬的事，甚至在最不講究舊式禮節的八路軍裏也沒有例外！我於是又在師部留了一個星期，他們招待我是最客氣不過的。

在舊年的歲尾，我們這小小的山鎮籠罩着節日的氛圍。街上出現了紅紙旗和彩牌門；我預感到我們得參加許多宴席。我對於中國的平常家飯是吃慣了，但中國宴席上的酒食，對於外國人却需要最壯旺的胃口。

新年的最初三天是一種普遍的節期，許多兵士都從外邊的哨所來參加宴席。這顯然是中國人結婚

的季節，再加上新年的慶賀，我們在中國笙簫鼓樂的不和諧的聲音中過了好幾天鄉村的觀宴生活。這一切祝宴的唯一不幸的後果，就是一天晚上，一個兵士（他供出自己喝了三斤白乾，不管什麼酒，喝了這麼多總是要大醉的）亂跑亂打，在鎮上開槍。除了浪費一些藥彈，大騾疾喊一陣，沒有別的損害，但這個罪人却被解到政治部去「受訓」。我在本軍裏就只看見這麼一次醉酒事件。

在我自己方面，我不久也忘記了我們參加宴席的次數。縣長請我們，我們又回請縣長；本軍區的最高長官和我們間也同樣交換着宴席。給養部、軍醫團、演劇團，以及其他半打機關團體，先後請師部的人員，最後由師部大規模地回請他們。當這些宴會告終的時候，吳和我喝了太多白酒，黃酒，紅酒，吃了太多海菜，遮心，外地來的魚，以及其他中國的美味食品，我們竟覺得自己無力作越過鄉野的吃力的旅行。這好像本軍決心要用三天的飽食來補償他們平日的清茶苦飯似的。

「我們需要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我向參謀長請求。「明天可以到前線去嗎？」

「當然可以。」他回答。「我們跟旅部接洽好了。明天早晨馬會預備好的。」

大清早，小小的馬隊集合好了，預備出發。有六名「特快騎兵」——師部的信差，護送我們；他們看來好像能夠踏着非常堅穩的脚步。我們把被褥安置在鞍上，把幾件梳洗的用具放在鞍囊裏。這是很愉快的旅行——特別是在這個季節。

「在這裏攪得太久了！祝你們幸福。」

「再見！我們大家等你回來過舊曆新年！」

「如果再要請客，我就不來了。」我私自決定了主意。小馬沿着狹窄的街道馳驅，馬蹄上的冰條像敲響板似的響着。東門外展開着冰凍的河流；山谷的彼面是一片連續的小山。馬的呼吸發出淡淡的烟氣，晨風襲穿了我們的羊皮褂。

我們騎上山區。我們終於到前線去了。

第八章：在前線

第八章 在前線

一 一個舊式將軍的肖像

因爲有一排黑壓壓的柳樹遮蔽着，從遠處望去，簡直無法看見那個城市。只有一段城牆才望得見，就是爬上峻峭的山面的那一段。那兒一座有雉堞的望樓俯臨山谷的壕壘和山上的要隘。

我們騎着疲乏的小馬，穿過結冰的河面，進入友愛的柳林的蔭庇中，從幾百個煙囪吐出來的藍色烟霧，像蒸氣一樣在灰色的石牆上浮漾。赤裸的林間充滿了鴉雀的聒噪。

到了城門口，一個值班的警士向我要名片。這質樸的舉動，這熟悉的黑制服和圍着白條子的制帽，都使人想起一個被遺忘了的和平世界。

我們找尋八聲軍的營所，穿過一條街道，看見挪威的國旗不調和地在一所中國的屋頂上飄揚——這是一種多少有點人間味的祈禱，要求保護一所被遺棄的教會。我們的營所是在一所學校裏，儼然懸掛

着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組大門口圍集着武裝的農民，有五十名左右的遊擊隊員正在前面的山坡上操練；這說明這裏也像別處一樣，八路軍並沒有浪費自己的時間。

一個工作過度的軍官帶着粗魯的湖南態度，給我們一種友愛的但不拘禮節的迎接。『辛苦，』他簡單地說，意思是告訴我們在這裏是找不到什麼特殊的舒服的。但他替我們掃除房間，使我們可以下榻，而且大聲指示外面的廚房預備晚餐。

這時本城是由山西第一師騎兵防守的，我寫了一封信給該師師長趙承綬將軍。當時剛剛來得及去拜訪他。

『他是什麼樣人？』我問八路軍裏的人。對方聳着肩頭。

『舊式將軍。但他現在比過去好得多了——他竟要求我們借給他幾個政治教育！他跟大多數山西將領一樣，正在改組他自己的部隊。現在我們彼此關係攪得很好。』

山西的將領，我還沒有碰到過一個，所以當我同吳君出發去看趙將軍的時候，心裏有一種捉摸不定的感覺。但在路上，我們碰到一個從他司令部來的兵差，他帶着十分週到的禮貌把我們領到本師參謀長的寓所。我們留在那裏，交換着親愛的瑣談，直到那位大人物完成了接見的準備。

這一次，我們像帝皇一樣被六個戴黑皮帽的兵士護送到一個堂皇的入口，趙將軍親自在門口用一

個很神氣的敬禮迎接我們。

他的確是個動人心目的人物，像彌陀佛一樣地放射着和藹的容光。當他微笑的時候——他時常微笑的——一小簇黑鬚就融化在絕大的和悅的神情裏。他的體格是福爾斯塔夫（註一）型的，近乎中國人的榮華富貴的標準。我不禁聯想起綽泰。（註二）我甚至在這寒冬的氣候也不禁想道：看他流汗是多麼有趣呀！

他的服裝也像他的禮貌一樣動人心目。他的帽子和青色外套的兩袖都是黑羔皮的，他飾着紅黃兩色的將軍的領章。棕色的花緞褲子裹在軟軟的皮靴裏，褲腿的邊上扣着鈕子（新式派頭）。他的一切有點像滑稽歌劇裏的角色，但的確很漂亮。

趙將軍雖然具有軍人的品質（要把這位尊尊處處的人物跟艱苦的戰役調和起來，也稍稍有點困難），但依然是一個無懈可擊的傳統的中國式的主人。他把我們領到一間熱得過份的房子裏，給我們沏茶呢。氛圍氣裏是那樣的充滿了彬彬的禮貌，我簡直不敢提起戰爭的題目。當我最後冒險提出幾個直捷的問話時，他的答話並不怎樣使我看重。

（註一）原名 Falstaff 莎氏比亞的劇本裏的人物，身材肥碩。

（註二）原名 Chaucer 英國古代詩人。

談話完全變成單方面的了，因為我發覺自己老在說話。但至少有一點，將軍說得很認真：我覺得這並不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從此次戰爭中已經知道了許多事情，」他向我保證道。「我自己」——他一手放在自己的胸脯上——「已經變成另一種人了。我們中國人必須改變我們的老式戰法，必須從我們最初的失敗學習教訓。現在我們確定了新的原則：不要光用軍隊防衛各地，要組織當地民衆來保衛他們自己的家鄉。我們目前在山西就是這麼幹的。我們從八路軍學得了許多東西。」

他顯然是個舊派將官，他這個供狀是很值得人們注意的。

當我們起身辭謝的時候，我們的主人是大大被困擾了。「你們當然要在這裏再停一天吧！讓我們可以招待招待你們」我說：「我們想馬上趕到前線去，決定明天早晨離開這裏。回頭也許可以再回這裏住一天。」這最後的提示變成肯定的諾言後，主人才讓我們離開。

回到八路軍的營所，剛吃完簡單的晚餐，一個代表團來到了，其中包含本縣縣長和民衆動員委員會的代表。他們是照常來聽取關於「國際情勢」的消息的。他們也許把我看作報導國際時事的權威，這原是最稱心的事，然而要憑尚未證實的零星的無線電消息來分析極端複雜、瞬息萬變的國際動態，這又是多麼困難的事。但我儘可能地講了一小時光景。最後代表團告辭了，臨走時還爲我唱了一隻愛國歌。

「他們彷彿是很認真的。」我在他們離開後說道：「其中有一個人特別厲害。」我是說那個民衆動員委員會的祕書，他會向我發出幾個很難回答的問話，關於小協約國，關於多瑙河問題，關於羅馬協定。營所的司令官癡笑起來。「是的，」他說。「他是共產黨員。」

已經度過了很長的一天日子，我們正在炕上打開我們的被褥，這時來了一個穿軍服的兵差，他報告一個驚人的消息，說趙將軍來拜訪我們。「到底爲什麼事？」我歎了一口氣。「在這個時候？」

「中國人的禮節，」吳怪頭怪腦地告訴我。果然不錯，幾分鐘後，將軍親自到了，他重新要求我們「再休息一天。」做他的客人。他打發了自己的護兵，摘下帽子（在八路軍，個個人老是戴着帽子，不管出門與否。）坐在我們所能找給他的最好的位子上——這是一條板棹，他在將軍的重壓下怪危險地喇喇作響。在蹙腳的房間裏，只有裝着生油的燈盞裏的氣味惡濁的燈心，發出一點亮光，這跟這位服裝漂亮的客人似乎很不調和。但他堅決對抗這種環境，坐在那裏彬彬有禮地談了半個鐘頭。他最後送給我們兩聽高價的紙烟（這是超過歡迎以上的情誼了。）而在我們堅決答應回頭再來看他以後，他才離開。這感一來，我覺得簡直無可如何了。

約莫過了三星期（比預定時間稍稍早一點。）我們在山上作了一度吃力的旅行後，重又回到這個城市。趙將軍非常愉快，因爲可以藉這個機會重新獲得他那好客的令名，他請我們吃了一頓，以資紀念。

我們坐在一張光滑的檯子跟前，檯上放着銅燭臺——這是我幾月來所看見的最文明的東西。每樣菜都燒得十分講究，配合得十分適當，有來自廣東和四川的美味佳肴。甚至還有鮮魚，將軍在這種時候從哪裏獲得鮮魚，倒是一個謎。這無疑是我在中國所享受到的最講究的筵席。但我們的主人還是連連爲他道歉。中國的烹飪術，如果運用得法的話，恐怕是全世界最好不過的了。

在席上，趙將軍顯出了自己的本來面目，談着閻錫山（閻氏是他的親戚，也是他童年時代的友伴）談着他在大同專爲接待外國賓客而建造的特別房子。餐後，他帶着專門家的知識（他談到戰爭問題時，就缺少專門家的知識了。）津津有味地談着養馬的事情。最後當他知道我們把幾匹馬都送回去了（我知道前線非常需要馬）的時候，他一定要把他最好幾匹馬和一個騎兵借給我們，使我們完成最後的旅程。那天晚上，護兵們拿着燈送我們回寓，我覺得自己好像參加演出了某個中國舊戲的一幕。「你對趙將軍的印象如何？」那個政治教官閃着眼睛問我。

「他好透了。但他也打仗？」

這位八路軍的教官嬉笑着。「有時也打仗的。聽說日軍佔領大同以後，他鎗斃了他的第三個姨太太——說這是她的過錯。但他的騎兵很不錯；他的政治思想也在進步着。我們的統一戰線裏有各種各樣的人物。」

義的事。一點不錯，趙將軍的言談舉動都說明自己相信中國舊式軍隊有改造的必要。這一點到底是很有意

二 『日落西山不回頭』

當我們穿出東門，進入疾掃着寒風的某河流域的時候，冬日黎明的第一道紅光照映在城牆上。即在正月，要是風勢不猛的話，在山西旅行還是吃得消的；但要是風刮得很厲害，光景就變得十分難堪了。這一天正是那樣的日子。

我們的道路大都蓋着霜水——有無數河流必須穿過，而沿途的融雪也大都凍成了寒冰。那匹跟我們一起的日本戰馬——牠原是特別給我騎的，但我婉言謝絕了，我寧願騎一匹漂亮的栗色小馬，牠能萬無一失地在雪地上找出一條道路——不斷地碰到困難，牠最初完全無法在冰上行走。中國馬是比較安穩得多了：我相信牠們能在玻璃板上馳驅！

但在這種天氣旅行到底是很冷的；當我們到達自己的目的地——一個小小的山村時，大家都感激不盡，我們要在這裏找尋當地的遊擊隊。各要口都有武裝農民守衛着（因為此刻我們的確很靠近前線了）；沿着石子鋪成的街路，在這遊擊隊根據地各種不同的辦公處的門前，都站立着一些穿羊皮褂，帶着中國大刀和自動來福鎗的戰士。遊擊隊司令，一個八路軍的教官，在司令部歡迎我們，他穿着樸素的灰色軍服，戴着服貼的氈帽——山西遊擊隊的制帽。司令部設在一座典型的鄉下農舍裏，怪舒服的。

這時候，晉北遊擊隊的組織已發展到比較進步的階段。現在我們是在戰區了，我發覺本區工作發揮了高度的效能，我對這並不贊異。在我所經過的許多村莊裏，都有遊擊隊被組織起來了，我看見過許多遊擊隊正在操練，實習遊擊戰術。但已經跟敵人接戰，而且已經戰鬥了好幾個月的遊擊隊，我還是第一遭看見。

我向當地遊擊司令探詢本區遊擊隊的組織詳情。他簡單地告訴我他自己的經驗。

「當我們的軍隊最初開到這裏的時候，」他說，「情形真是壞透了。許多老百姓離開了自己的家，逃走了，而有全省性的各種組織如『犧牲大同盟』等，都解體了。日軍已在大多數縣城組織了『維持會』。但在另一方面，日軍燒燬了許多村莊，殺戮了大批老百姓。因此留在村裏的老百姓對於日軍都恨之刺骨。但他們沒有真正的組織，沒有武器。」

「在許多地方，日軍的暴行特別野蠻，老百姓就自動組織小規模的遊擊隊。他們自己只有少數武器，他們設法收集中日兩軍遺留在村莊裏的炸彈和手榴彈。他們自己發明這些武器的用法，他們的戰術有時是非常高妙的。例如在汾陽附近，一小隊日本騎兵開到一個村莊，山西軍隊不敢迎擊，實行退却；但當地遊擊隊却在夜間包圍日軍的營所，爬到鄰近的屋頂上，把炸彈投進日軍的營房，炸死日軍的隊長和大多數士兵。」

「你們現在用什麼方法組織民衆呢？」

「當我們的隊伍從雁門關開到這裏的時候，我們立刻開始調整遊擊隊的行動，改進他們的戰術。首先派組織人員到每個村莊裏去，召開民衆大會，說明抗戰的局勢。我們告訴民衆：我們是怎樣用很小兵力打敗大部日軍的。當他們自己明白這是真理的時候，有許多村民就願意起來組織隊伍，開始獨立作戰。」

「當然，某種政治改造是必要的。在一些還有富戶留着的地方，我們就要求他們捐錢和軍需品。如果村長是地主，不願協助工作，我們就改造鄉公所的機構，使牠變得更民主，一定要民衆自己選舉他們的頭腦。這麼一來，我們大大加強了政治的團結。」

「你對一般地主的印像如何？」我問。因為根據我自己小小的經驗，山西的地主們和商人們是沒有多大希望的。

「他們彼此大不相同；有些是愛國的，救國工作做得很好。例如崞縣附近有一個非常有錢的老地主，日軍驅逐他在偽滿政府裏任職。但實際上，他是贊成中國抗戰的，當我們派組織人員在夜間秘密到達他的村子裏時，他幫他們很多忙。他教導他們怎樣改正南方口音，使他們說話更像山西人，不容易被人發覺或出賣。」

「後來，當我們的隊伍開到他的村莊時，他自己背着大刀（他曾經做過軍人），要加入隊伍。但他年

紀太大了，結果派他的兒子督軍隊和遊擊隊做情報工作。後來他兒子被日軍殺死了；我們把屍首擡到他的家裏時，老頭子並不哭，他說：「這是光榮的死。」

這是統一戰線實際工作的一個好例子。在這遊擊隊的根據地，有一百多個遊擊隊員被組織起來了。我們在裏邊睡覺的房間，有一所真正的武庫，牆上掛着各式武器。有土造的大口徑的老式槍桿，槍口是鐘式的；有新式的自動來福鎗，這是太原兵工廠的出品。在山西特別普遍的武器是一種短銃的自動步鎗，口徑大得可怕，鎗膛內可容四十顆藥彈，我想料這種步鎗不會很準確，但很適宜於短距離的射擊，特別宜於夜襲——這正是遊擊隊所鍾愛的戰鬥。

「你們的藥彈從哪兒來的？」我問。

「一部份當然是從正規軍那裏領來的，」年輕的司令告訴我，「但我們從日軍也奪得不少。這裏附近一支遊擊隊去年十一月間奪獲大批藥彈。」

「忻口一戰之後，有大量藥彈留在附近各村子裏，日軍前來收拾這些藥彈。他們把牠全部裝在卡車裏；但遊擊隊在夜間襲擊，奪獲所有卡車。他們把奪得的藥彈悉數交給八路軍——二十萬發來福鎗彈和七千個炸彈！我們後來就用這些炸彈抵抗日軍的坦克車。」

這活躍着遊擊戰爭的北方區域的一切，使我體得日軍繼續前進的困難。侵略軍向遊擊隊報復的唯

手段，就是燒燬更多的村莊，屠殺更多的居民——這適足以激起鄉民更大的奮勇，加強他們的抗戰決心。

「日軍初到的時候，那個教官告訴我，『他們老是在每個村子裏勒索金錢和軍子雞，往往還要年輕的花姑娘。村人最初不敢抵抗，但現在他們獲得了更多經驗和更大自信，凡是有此種勒索行爲的軍隊，他們都要加以攻擊。下面這個故事說明山西民衆的眞精神。』

原平附近有一個姓李的農民，眼看見大多數家人都被跟日軍同來的蒙古軍隊殘殺了。他祕密跑到最近的八路軍根據地，向他們要來五個手榴彈。他們告訴他怎樣用法，他回到自己的家。

「這時候遊擊隊非常活躍，日軍需要嚮導指引他們走向村莊，使他們可以突擊華軍。李自願引導一隊日兵，替他們出主意。『我走在前面，』他說，『我如果看見中國軍隊，就用一隻手做個信號——你們必須一齊趕到我的後面攻擊他們。』日軍贊同這個主意，他們出發到山裏去。

「李走到一片山坡的頂上，用手做了一個信號，日軍就趕到他的背後。他於是把藏在襯衣裏的手榴彈拿出來，丟了下去。日軍以爲自己中了伏兵，沒有被炸死的都逃走了。」

「那個嚮導以後怎樣呢？」

遊擊隊司令齊笑着：「他從日軍的屍屍獲得四千塊錢和一批武器，把槍們送到我們的旅部。現在他

是八路軍的一個戰鬥員。」

這一類插戲在軍事報告裏是並不重要的。但牠們是每天在華北山裏發生的事情的典型。牠們對於中國的未來是很有意義的指針，因為牠們是中國老百姓的性情行動的代表。自從山西第一支遊擊隊被組成以後，本省的農民羣中就流行着這樣一句話：「日落西山不回頭。」

「西山」當然是山西；日頭就是日本的「朝日。」

三 前線巡禮

當我們在第二天清早離開的時候，裹在霧裏的小村莊宛如幽靈般的虛幻。我們在一口奇妙地結着霜冰的水井旁邊給馬餵水；他們在冰冷的水桶裏貪婪地飲着。這一帶山區是被握在寒冬的鐵掌裏了。

前面鋪着一道山脈，我們當天必須穿過他。左山脚穿了一個窟窿，才進入山路。此路上巉岩石錯落的溪床，溪床活像一道小小的冰川湧現在我們的前面，有結冰的瀑布和綠色的冰條。我們騎馬在這山路上穿了三小時，才重新到出一片廣闊的流域，上邊是一座圍着粉紅色的牆壁的廟宇。從這裏直到太原，都是平坦的道途。

「要兩個鐘頭，」做我們嚮導的班長估計着，「我們才能到達團部。」

團部所在的村莊緊靠在黃土山脚，浴在下午的陽光中，是那麽溫暖和藹。首先映入我們眼簾裏的，是一個經過裝飾的露天講臺。「政治動員」在這裏彷彿很被重視。這裏離鐵路線和那條作爲日軍從太原到北面的唯一交通線的大路只有幾哩路。

「本星期我們已經打了四天仗，」本團的政治委員告訴我，當我們圍坐在火堆旁邊，烘着兩手的時候。「敵人老想佔領這個地方，因爲這裏離鐵路線很近，又因爲我們的遊擊戰在這一帶非常活躍。但打了

四天，他們打够了，他們昨天又退回去了。」

他是剛過二十歲的韓籍青年——倭我後來在本軍所發見的一樣，你越走近前線，你看見個個人的年紀越輕。這個團部有一種學生營的氣象。但在八路軍裏的少年決不比成年人差。

他們告訴我們：日軍最近從太原開了一師團來。我想：他們是來「肅清華軍的殘部」的吧，因為我記起東京無線電廣播員老愛這麼說。「順便請問一聲，」我說，「剛在我們動身以前，日方宣稱七千多名『共產軍』在榆次附近被日軍襲擊，倉皇逃散。這消息也有一點事實的影子嗎？」

這位年輕的軍官哄笑起來。「在這一帶戰線，我們沒有在任何地方集中過一千人。」八路軍的作戰單位甚至不是連而是排。我會去訪問過的那一師人的活動範圍，長達千餘里。但日軍現在正要用他們自己的遊擊戰術攻擊八路軍，彷彿要在北面有所動作，北面正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請在這裏停一、二天，」團部的人們告訴我，「我們要領你去看看太原——從山上看。」但我事前已預定到北面的旅部去，我知道他們在等待我們。我們只能在這裏過一夜。

我們宿在救亡室裏——一個大房間，貼着統一戰線的標語口號。牆壁上貼着中國共產黨「四巨頭」的黑白兩色的畫像——本軍總副司令朱德和彭德懷，軍事委員會正副主席毛澤東和周恩來。但在他們上邊是熟悉的列寧和斯大林的畫像；而孫中山先生的像又在列斯兩氏之上。

我原以為前線的生活是一種斯巴達式（註）的生活，但結果未如所料。晚餐以前，主人先享我們以甜味的煉乳（只有斷過牛乳和糖的人才認識這些東西對於普通歐洲人的重要）甚至還有更大的奇蹟——英國香烟。這牛乳和香烟當然是從日軍那裏奪來的，本團因為接近敵人的交通線，獲得特殊的利益。我發覺團部裏個個人都有一支很漂亮的手電筒，有裝在皮盒子裏的乾電。「這些東西，我們奪得兩卡車，」他們告訴我。

第二天，我們沿着西面幾哩路外的鐵路幹線向北行進，隔在我們和日軍之間的，是一列便於行走的山丘。「這一帶農民都很好地組織起來了，」那個政治委員會這樣告訴我們：他果然沒有說錯。我們沿途到處受到熱情的協助，正如我在陝北所受到的協助一樣。我們經過每個村莊，當地的遊擊隊總要請我們喝茶，因為有這麼多自願的嚮導，我們從不怕迷路。

有一次我們爬上一條隔在兩河流域中間的分水嶺，從山上可以更清楚地眺望着鄉野。西面，雲中山的積雪的山峯堵住了地平線，而北面又是高高的連山。我們向東望過鐵路所在的廣大的山谷，視線直達

（註）意即非常堅苦的生活。

五臺山。五臺山又是一片荒山，八路軍最初在日軍後方設「臨時政府」於此。在這些高高的山脈中間，有無數黃土山，到處被錯綜的山谷和冰凍的溪流截斷。這對於侵略軍是一片致命的鄉野，因為除了貯藏在村內農家的穀類，什麼食糧都沒有，而日軍到處，村人們又帶着自己的糧食逃走。然而侵略軍大都寧願留駐在這大山谷裏，他們不願在這樣危險的地帶冒險作戰。

經過一天舒適的旅行，我們到了一片肥沃的平原，四週圍繞着小山——這是我們離開晉南以來第一次看見的真正的平原。我知道幾個月前，這一帶地方都打過仗，因為我們在曠野上經過一輛日軍的坦克軍的殘骸。第一眼看去，這彷彿是便於坦克軍或馬隊馳驅的鄉野，但實際上這一帶平原有好幾條河流，還有許多堤壩和溝渠到處蜿蜒着。八路軍的步兵竟能阻擋日軍優越的機械化武器，堅守這一帶的陣地。這原因，我開始懂得了。

我們在一個連部裏過夜，這連部設在一所看來相當富裕的農家裏。家主顯然是基督徒，因為牆壁上貼着許多意大利式的石印彩畫。然而他們兩旁又貼着一些非常美麗的中國淫畫，大大毀壞了那些石印畫的效果。我發覺這一區地方到處留着教會活動的顯明的痕跡，我對這很感興趣；而在我們會在那裏度過一夜的遊擊隊根據地，那個端熱茶給我們喝的新兵的短棉衣上，佩着一個很大的銅十字架。他十分莊嚴地告訴我，他是天主教徒，但這跟他服兵役的義務彷彿並不衝突。

這個連的連長看來又不過是個孩子，但他佩着一根日本的自動手鎗，戴着蒙古人的皮帽，帽上綴着一種日本的華北駐屯軍的黃星。本連另一個上級長官是政治委員——一個堅強結實的湖南農民，他由於十一月間雁門關的戰役，一隻手上有三個指頭至今還生着凍瘡。

「那是一場苦仗，」他帶着一種苦澀的回味告訴我。「有好幾天，我們簡直沒有一點吃的東西，沒有火。但這跟『長征』比起來，又算不得什麼了。」

我到處聽到這同樣的故事。這過去的中國紅軍在山西跟日軍作戰時所碰到的一切困難，都不能跟他們在過去戰勝了的困難相比。他們過去的作戰環境難得比現在更好。

連長對我描述他部下一次典型的戰鬥。「在崞縣附近的宏道浦（譯音），」他說，「我們用三排步兵襲擊一百卡車的日軍。我們毀壞了六十輛卡車，殺死二百多個日兵，奪得四十桿來福鎗和兩挺機關鎗。其中有一挺是長距離的高射機關鎗——請你看這。」

他把我領到一個院子裏，那挺高射機關鎗就放在這院子的土臺上——一個十五歲的少年正在用勁地擦着牠。（八路軍的小鬼把大部份空閒的時間都花在洗擦隨手抓到的任何武器上。）在那一次行動中，我們死傷不過二十人，年輕的連長接着說。「但日軍近來小心得多了——我們完全不能引誘他

們前進！他們夜間老是退到設防的城市裏。」

他領我去看看他部下另一部士兵，他們全體都帶着日本的來福鎗。口徑跟中國來福鎗的口徑一樣大小（.300），這樣使從對方奪得的藥彈可以通用於自己的步鎗。但在山西——至少在山西這一部份地方——這種打算對誰最爲有利，不言自明。

這一連人曾經參加襲擊楊明堡日本空軍根據地的有名的行動，當時華軍用手榴彈擊毀二十四架飛機——在那個抗戰階段，只有八路軍有充份膽量和創見實行攻擊。因爲在抗戰的最初幾個月內，全國的軍隊中只有八路軍知道怎樣運用這最有價值的進攻的要素——襲擊。日軍在別的戰線上都用驚人的速度拚命前進（甚至被數量上超過自己的華軍迎擊的時候），而獨在目前的山西，侵略軍的移動却非常謹慎，雖然迎擊他們的只不過幾十名帶着來福鎗和手榴彈的步兵。這證明日軍認識了山西華軍戰術的價值。

「用不着害怕日軍，」那個政治委員向我保證道——他無疑的已向山西這一區域的許多民衆大會作過同樣的保證——「只要你知道怎樣跟他們作戰。」

我懂得他的意思。

四 憶忻口大戰

我們第二天所走的路線是經過忻口的，忻口是太原以北的主要隘口。一九三七年十月間，這裏是華北主要大戰的戰場。

我們小心選擇自己的路線，盡可能地沿着低凹的道路走，因為這一帶山丘也許會被日軍的前哨清楚地望見。我們竟能在白天穿過這一段路，我覺得很驚訝，但昨夜招待過我們的連部派給我們的新護兵們却非常大膽。據他們的意見，敵人決不敢在這一帶地方進攻，因為他們在最近幾星期中受過一些痛苦的經驗。

當我們爬上一個山崗的時候，我看見彷彿是新近掘成的壕溝和工事一類的東西。我們此刻正經過戰場。

「當我們初到這裏的時候，」隊長告訴我，「還有幾百個屍體散在這一帶山地上。我們把他們收拾起來，澆了。」

在忻口大戰中，死了三千人，中日兩軍各半。這次大戰所以值得人注意，不但因為兩軍都遭受重大的損失，同時因為華北日軍第一次在陣地戰中受致命的挫折，這是最猛烈的一次大戰。



野山口忻的戰作隊擊游國中於宜



從日軍奪得的輕口小機關鎗

一九三七年九月最後一個星期內，一部份進攻的日軍已在平型關初次遭受了慘敗。那是一種山地上的運動戰，但她展開了中國抗戰的新局面，防守的軍隊在這裏第一次採用主動的戰術，用積極的進攻的行動回答日軍。在十月間，華軍高級司令由於蔣介石將軍的特別命令和圖錫山將軍衛立煌將軍（山西中央軍總司令）的實際協助，決定在華北實踐持久抗戰的策略。

這一新策略的第一個直接結果，就是中央軍和山西省軍的指揮統一，這新策略在忻口得到光輝的表現。

當戰爭在十月最初幾星期內圍繞着忻口進行的時候，日軍的前鋒部隊已經佔領瞭。她最初也是流動戰；但當華軍集中在山谷兩邊的時候，她立刻發展成陣地戰，同時八路軍在日軍後方和兩側進行游擊戰。此次華軍各部隊合作的密切達到空前的程度。

華方事前已在忻口集中了十萬左右的大軍，這大軍的骨幹就是衛立煌的第十四軍。再加以胡夢麟所率領的兩師中央軍和一些山西軍的部隊。山西軍隊的戰鬥力無疑的比中央軍差，但這一次，他們也表演出輝煌的戰績。

日軍共有兩師團和一旅團，約六萬人，軍備當然比華軍好得多。但打了三星期，日軍毫無進展；不久以後，他們發覺自己陷入了非常困難的處境中。

八路軍已向日軍進攻，還有機會，就切斷日軍的交通線。他們此種戰法在三個主要交通線上都獲得成功——從大同到崞縣的交通線，和通繁、繁靈、靈邱的兩條大路。只有通雁門關的道路尚未被阻，但仍受不斷的襲擊。（中國游擊隊好幾次佔領了雁門關的要隘，但不能固守。）日軍只能在絕大的困難下運輸給養和援兵，有一個時期甚至不得不用飛機輸送藥彈。

在此種情形之下，日軍在忻口大戰中遭受了重大的損失，他們發覺自己碰到了開戰以來最頑強的抵抗。實際上，當時一般形勢是有利於華軍的，因為這一帶山野宜於華軍的作戰方式，而華軍的主帥又開始運用側擊的戰術。

最後另一部份日軍沿正太鐵路飛速地推進，直接威脅太原，這把陷在困難處境裏的日軍救了出來。衛立煌英勇地堅守北面陣地，而防守東面通太原的要道的雜色華軍之放棄陣地，倉皇後退，並不是衛氏的過錯。十一月三日，華軍主力從忻口撤退，搶救太原。但東面防線已告崩潰，這山西的省會是無法保衛了。如果當日東部的鎮鎗——娘子關的守軍更加堅決地防守自己的陣地，則山西的局勢也許會大不相同。但用『如果』來估計過去了的軍事，這是徒然的事情。不過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忻口戰役的軍事和政治的意義。

忻口戰役不但給與日軍（他們在那一時期以為自己在華北作戰毫無足慮，他們相信華方唯一堅

強的抗戰將在華中各省。一個最有名的教訓，使他們認識華北軍隊的戰鬥力，而且給與華北民衆一種最有價值的鼓勵。三星期左右的戰役在現代戰爭中並不算長，但必須注意下一事實：華軍是自動放棄忻口的，華軍的撤退是一種很有規則，很有秩序的撤退，傷亡極少，至少在最初的階段是這樣的。只有在後來，當某些山西軍隊無法統制的時候，才有混亂現象出現，像我在十一月間在通向南面的道路上所看見的。此次日軍的破挫，加強了華方正規軍的自信，特別是刺戟了游擊隊和流動部的發展。當陣地戰正在進行的時候，游擊隊和流動部隊幹了非常有用的工作，他們立刻知道日軍並不足怕。在政治上，情形也大大改進了，正規軍和游擊隊結成了真正的統一戰線。甚至使人喪氣的太原的失陷，也抵不過這些寶貴的教訓。

華軍也受了重大的損失，但郝夢麟軍長也同着士兵在前線陣亡了。隊伍知道他們至少并未被人出賣，像二十九軍在北平之被出賣一樣。他們同時也知道自己損失雖重，但敵軍的損失則更重。

忻口戰役是華北抗戰高潮的標幟，是指示抗戰前途的一個很有意義的吉兆。如果一九三八年四月間台兒莊大戰是中國抗戰第一次大勝仗，則忻口大戰確是她的最不馬虎的試驗品。

你要是穿過這一帶陸寒似的布滿地洞和工事，散滿砲彈和手榴彈的碎片的黃土山，就容易想像出大戰的輪廓。除了大平原外，華北純是山地，還有其他許多同樣宜於防守的陣地。跟着華軍的增強，（當前

的危局正在促使華軍強化，像忻口大戰那樣的插戲，勢將增多，甚至會獲得更大的勝利。

我們一直沿着山路走，這大大加長了我們的路線；但不是也可以望見那片大山谷，內有被日軍佔領的市鎮和公路。當我們到達華軍所在的村莊時，天快黑了，中國國旗勇敢地地在當地游擊隊隊部的屋頂上飄揚。

他們竟預先知道了我們的行蹤，這是我意料不到的事情；但山西的情報工作却做得非常好。我們在一個院子裏受到熱烈後的歡迎，人們正在這裏聚集着各種各樣的武器，有古老的鐵器，也有來福鎗。農家的女郎們也帶着她們特有的活力在這裏參加動員工作（山西一般的婦女原來是很落後的，但在一些來自華北的女學生和其他比較開通的女性的影響之下，她們似乎正從傳統的閨房生活跑出來了。）一個來自北京的文化青年用英語歡迎我，他穿着農民自衛隊的制服。

那天晚上，我們一行人全體睡在一個農家的一張炕上；我們初到時，這裏正響着中國樂班的吹奏聲。那天是一個「好日」，村子裏娶進了一個新娘——我們剛在經過坐在飾着喜彩的轎子裏的新郎，後邊是圍在花轎裏的新娘。但此刻一切又靜下來了，而在整個村子進入睡鄉以前，只有外邊農民巡邏隊不時發出吆喝聲，刺破夜的靜寂。

五 越過日軍的防線

那天早晨，隊長喊醒我們，報告我們惱人的消息。日兵兩千正從原平向西移動，我們要去訪問的那個旅部已於昨夜搬走——沒有誰知道牠到底撈到那裏。現在在路上旅行大概是很危險的。

「我們怎麼辦呢？」

班長聳一聳他那寬闊的肩膀。「還是前進吧，直到我們碰到自己方面的人，請他們領我們到旅部所在地。」事實上，我們也許會首先碰到日兵，這一點彷彿並不使他苦惱。

八路軍從來沒有固定的陣線，如果真有新到日軍在北面活動（我們在三天前聽到這樣的消息），則八路軍大概要在這一帶地區大活動。這樣的想頭激起了我們旅行的興味，我們直到此刻還沒有碰到過比穿過冰凍的河面更大的困難呀！

我們比往常更早出發，當地自衛軍派給我們一個嚮導，領我們到下一個村莊。十二個騎馬的人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很明顯的目標，我們在黃土山的掩蔽下當心地移動着。當嚮導的農民知道每條捷徑，每條山路，要是沒有他，我們在這繞着峽谷和水道的地方簡直沒有辦法。

不久以後，我們開始碰到從東面來的難民——這是一個極慘的小家庭的羣集，一個婦人和兩個孩

子騎在一匹驢子上，大概有一個男子背着一袋穀米跟在後面。他們大多數人都只知道「矮鬼子」來了，這個消息對於他們是够可怕的了。

我們最初走到的那個大村莊彷彿十分平靜，一羣農民坐在太陽光下，吸着長煙管。「請問八路軍在那裏？」我們問。一個發言人在喉嚨裏咕噥了一聲，用旱煙管向北面一指。雖然有一個農民自願領我們去，但他彷彿不很明白確實的地點。據他的示意，大概有「兩三個兵」在附近的村子裏。

我們僅僅走了半里路，就碰到一羣難民，他們極肯定地告訴我們：我們要去訪問的那個村莊裏有日本兵。

在中國，人們慣於得到互相矛盾的消息。我們的嚮導耐心地等待着我們決定主意；他對這個新消息毫不動情，「你意下如何？」吳問我。「我們要冒一冒險嗎？」

我覺得什麼都比走回頭路好；在這一帶山地上旅行是够困難的，我決意不走那樣艱苦的回頭路。「他媽的！」班長堅決地說，「我們就冒一冒險吧！」我們有幸於爬山的馬，萬一有不好的遭遇，我們總能擺脫得了的。

馬槍裝上了子彈，毛瑟槍也裝上了子彈，扳上槍機，我覺得這一切很像銀幕上的情景。我們向東行進，前面是我們的嚮導和兩個斥候。

這是一個清明的冬天的早晨，五台山的山峯構成一條橫過地平線的美妙的美妙。我們小心翼翼地翻過一座小山的山頂，一直到了鐵路的上邊。面前是廣大的平原；我們可以望見原平，一叢黑壓壓的樹木和房屋；還有十多個別的村莊，都被圍在各自的土牆裏。其中有些已被燒成了焦土，籠罩在帶們上邊的藍色煙霧比從幾十家煙突吐出來的炊煙還要多。

實際上，日軍已經燒燬了大路兩邊好幾里地方的村莊；我們剛才碰到的難民之流就是從那些村莊流出來的。從我們所在的地方，可以很清楚地望見一個火車站的白色站屋，那裏有日本兵在，這簡直是可以確信的事。但我們不能停在這裏觀望得太久。

我們這個鎮靜的「農民嚮導」領我們翻過山嶺，到了那個有名的村莊。這裏沒有任何軍事佔領的標幟；只有少數幾個孩子在滑冰，當然有一些豬標和小雞佔領着小小的村街。但當我們到了石造的拱門時，有人向我們送出嚴厲的吆喝，一個穿藍色大衣，帶來鴿槍的兵士突然從門裏走了出來。我們終於找到了八路軍。

我們的嚮導並沒有錯。這裏只有本旅的一個哨所，但他們至少能把我們領到總部。當我們重又深入山地的時候，另一個士兵從高高的岩石（他在這裏守望着山谷）上向我們揮手，指點道路。

現在我們可以往前直進了，因為我們的斥候能從隱蔽在岩崖和草叢中的標幟辨認出我們的路線。

（我發覺八路军有牠自己奧妙的路標，任何彎曲的樹枝或鳳尾草都可以成爲路標的。）這要道路比任何地方都來得難走，但無論如何，我們的旅行不再是盲目的了。

我正在幻想中騎行，隊長突然在前面招呼我：『快！』我們踢着我們的小馬，使牠們奔馳起來，穿過一個山谷的口子，出到鐵路線上。鐵軌向南直通太原，我們正面向着敵人的防線。

我們沿着鐵路向北馳了一會兒，鐵路的一大段已被八路军和當地志願軍破壞了。枕木已被掘了起來，燒燬了，鐵軌也被掘歪了，有些部份還被丟在旁邊。這也許不是很徹底的工作，但目的是達到了。原平和寧縣間的同蒲路完全操在華軍之手，敵軍只能利用忻口和崞縣間的公路。

沿着鐵路馳行的時候，我的馬給與我的困難比日軍給我的還要多。牠老是那樣膽怯，牠的確從沒有看見過一條鐵路；牠看見每處被掘歪了的路軌和每根信號柱，都要害怕，但我們終於走完了堤岸，到了一條多石的山路，雖比剛才的路更加難走，但我的馬却認爲這是牠所熟悉的世界的一部。

我們終於在高聳的山崖腳下的一個小村子裏找到旅部；這裏很像多羅邁特羣山（Dolomites）中的情景。岩面的顏色是天然的粉紅色和藍色，浴在柔和的夕照中，這些小山真是美麗得迷人。這所在堅決守衛下的山上要塞，看來是絕對攻不破的。

在一所農舍外邊，站着一個衛兵，他旁邊是一面旅部的軍旗。我們走進一個小小的院子，一個衰老的

農民正在院子裏餵着一羣羊和山羊。在這正月的氣候，一切家畜都必須養在屋子裏；這種天氣對於那些羔羊是太難受了，其中有些還是在新年裏出生的哩。但我真料不到我們的旅長會住在這樣富於田園味的地方。

頃刻間，我們發覺自己置身於歡迎的羣集中了。「王震同志」本旅的旅長，是一些應驗的瘦長的南方人，兩眼機敏，舉動溫文。參謀長是劉子奇，吳熱情地招呼着兩個北京來的老朋友，他們已在本軍的部隊裏找到了工作。其中一個是女孩子，短髮，穿着八路軍的藍色棉軍服。

「你們來得得時，」旅長愉快地告訴我們。「我們派了一夥人來迎接你們，但你們一定沿着不同的路線走。你們不知道今天和昨天都有戰事發生嗎？」

「我們聽到一些消息——並不十分確實。」

他簡單地告訴我們戰事發生的經過。我們經過忻口的那一天，日軍開始進攻。像往常一樣，華軍首先撤退，企圖誘敵深入山地。但日軍燒了幾個村莊之後，又回到大路上去。

就在那天早晨，大概當我們穿過原平上邊的山地時，又有幾百日軍出發進攻。他們遭受八路軍新成立的一排人的襲擊，大敗而歸。

「這一次，」王旅長告訴我們，「是我們去迎擊他們的。我們的隊伍是新兵，只受過三個月的訓練；但

他們穿着農民服裝，衣服裏暗藏着手槍和手榴彈。他們的領導者是我們的一個連長——他扮成一個商人。他們深入到離日軍一百碼的地方，日軍並不懷疑他們，他們於是突然開起火來。

「日軍遭受完全意外的襲擊，襲擊的時間不到一小時。日軍死傷人數定在一百左右——他們把屍首共裝了三卡車。我們一個排長被殺，六人受傷。」

這對於三百五十九旅是一種振奮人心的「歡迎。」

第九章：游

擊

隊

第九章 遊擊隊

一 旅司令部

我在這旅部裏住了一個星期，前線每天有戰事發生——大都是小接觸，但這一方面使日軍疲於奔命，同時又給山西新兵一種巧妙的訓練。崞縣和原平間的一段路線往往成了戰爭的舞臺。在這兩個市鎮裏，各有數千日軍駐守着，他們正在中間的一個名叫田家莊的小村子裏趕造另一個用重砲防衛的要塞。華方志願兵每夜造襲，日軍大都處在防守的地位。東京無線電廣播員所描繪的『肅清率軍殘部』的畫面，簡直不是使人樂觀的畫面。

這三百五十九旅有牠自己的歷史，這是本旅旅長告訴我的。牠在『大革命』時期由湖南、湖北和江西的農民組成，而以長沙和武漢的工人為骨幹，還有從漢口『白色恐怖』中逃避出來的革命黨員。做政治幹部。牠最初是非正式的流動部隊，沿着湘鄂贛三省邊界活動，當時的戰鬥方式跟牠目前一樣，是一種

遊擊戰。

「我們當時由朱毛直接指揮，」王旅長告訴我，「但那時我們的武器很蹩腳，沒有固定的根據地。我們每次從白軍奪得的來福鎗都送給主力紅軍。直到一九三〇年朱毛到長沙時，我們才被改編為正規紅軍。我們被編為獨立師，在山上建立起根據地，而且有更完備的武裝。」

「長沙一戰之後，我們駐紮在第四方面紅軍和賀龍部之間，跟這兩部較強大的軍隊通力合作。在五次圍剿中，我們每次都參加作戰，慘得很多寶貴經驗。我們糾正了一切鬆懈浪漫的觀念，這些觀念在開頭也許是難免的。因為我們一師人是真正工人階級的部隊，而且在中央委員會指導之下，我們對於突破圍剿的工作是能夠給與幫助的。」

當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四年發表「抗日宣言」，紅軍準備北上的時候，王震的一師編在第六軍團裏，由蕭克指揮。這一軍團就是「長征」的先鋒隊。

「主力紅軍的第一步工作，」王說，「就是衝破江西蘇區週圍的封鎖線。南京軍隊已在蘇區週圍建立起『鐵圍陣線』，一切道路——甚至最小的路——都有白軍防守着。紅軍就在無路可通的處境中行進着。」

「我們奉令首先出發，到了廣西，又奉令回師跟賀龍部聯合。我們在一百天中走了七千里——有時

一天得走一百五十多里，而在作戰的時候，一天走不到十里。但我們終於及時趕到四川邊境與賀龍會合。

『長征時我們由任弼時和蕭克指揮。我們在一九三五年八月間出發，走了二萬多里路後才與甘肅的主力紅軍會合。我們穿過西康的大雪山，在雪山上走了四個多月，天氣是冷極了。我告訴你，山西的生活跟『長征』生活一比，簡直不算什麼。到達陝北以後，我們一直參加統一戰線運動，直接參加抗日戰爭。』

王旅長說這故事的時候，興奮得像個小孩子，有一會兒，他突然離開房間，回來時一手捏着一本紙面的書。這是巴比塞的史太林傳（註）曾被用作照相簿，他一頁一頁翻着，給我看各級紅軍司令官們的污損了的照相和奇奇怪怪的集證照，各種各樣的服裝都有，背景是中國六個省份。

『這都是長征時攝的。』

『你們那時比現在瘦得多了！這是什麼？』

『這是渡過黃河的一幕。那個戴草帽的就是賀龍。這是一種迷人的紀錄：從這些褐色的照片中，我辯認出了（有時是相當困難地）自己曾經會面過的那些軍政領袖，他們近幾月來的形貌是比過去整潔得多了。八路軍既有這樣多樣的經驗，他們比中國其他軍隊更能適應抗日戰爭的新環境，這是無足驚

（註）中譯本題為『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

奇的。恐怕全世界沒有其他軍隊這樣不斷地戰鬥了十年——至於在遼東，牠確是絕無僅有的特別軍隊。

「西安事變解決以後，」王旅長繼續說道，「我們有六個月的休息和訓練，特別研究統一戰線的理論，研究跟友軍合作的問題。甚至苦戰了十年之後，依舊沒有一個士兵想離開軍隊，回老家去。這證明我們軍隊的政治團結的強固。

「我們相信自己在中國蘇維埃運動中的十年苦鬥是我們革命史中燦爛的一章，而同時又相信抗日戰爭的結果將更為燦爛。」

他帶着共產黨人的語調（我現在是熟悉於此種語調了），把他這個旅團的歷史作了一個總結。

「因為本旅有一種堅強的革命理論，因為長官和士兵都有高度的政治意識，所以我們能在極端困難的處境下發展革命的精神，克服一切障礙。因為我們始終是老百姓的軍隊，始終為平民的權利和解放而鬥爭，所以總是獲得老百姓的支持，不管到什麼地方，都能獲得糧食，獲得我們所需要的新兵。

「自從本旅以流動部隊的姿態在湖南成立以後，我們的政治訓練從未間斷過。我們被編為正規軍後，一向設有政治部，從未忽略過我們的政治活動。有了這種軍事經驗和政治訓練的結合，我們就成為真正的革命軍隊，獻身於民族解放鬥爭。」

我覺得王震本人就是他自已理論的優秀的代表。這位三十五歲的司令官十二歲時原是一個鐵路

工人，是從漢口到長沙的鐵路上的火夫。十五歲時，他加入鐵路工會；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他開始在長沙受軍事訓練。國共分家以後，他回到鐵路上來做政治工作，他是目前這個旅團最初的政治教育和組織者。據他說，從那時起，他一直沒有離開這個部隊，除非在受傷的時候。

這在八路軍裏不算是不平常的歷史。但這段歷史告訴我們：不管目前的戰爭給與這三百五十九旅多大的困難，牠的領導權絕不會動搖。我覺得這個旅團的長官和士兵的團結，即使在八路軍裏，也算得是最強固的。

王旅長也跟部下一樣，身穿褪色的藍色棉軍服，但他配着一件文人穿的很神氣的大衣，我在這大衣裏看出北京成衣舖的商標。有一次，我問起這件漂亮的大衣，他告訴我這件衣服的來歷。

他跟八路軍裏大多數珍貴物品一樣，原是一個漢奸（中國社會的奇特的腳色）的所有物。漢奸是中國新的國內敵人，他們代替了那些從前爲中國紅軍所反對的地主們的地位。

狄懷卿（譯音）原是崞縣「第一號紳士」。他是日本留學生，曾在北京政府做過官，一向是華北親日派一份子。他是山西人，退隱回鄉，專向鄉民宣傳中國的衰弱，只有跟日本親善合作，才能強盛起來。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時，他懷着新的熱情，繼續親日宣傳，因爲他在故鄉很有地位，對於當地居民有相當大的影響。八路軍的組織工作人員到崞縣時，公然威脅着他——提出一個新口號：「我們百姓

雖窮，但有充份力量抵抗侵略者。」這句口號後來變爲民衆的格言。

但狄氏依舊固執自己的見解；而在日軍侵入歐西以後，他教導民衆作歡迎日軍的準備。說到這裏，王旅長突然中止了。

「他後來的遭遇如何？」我問。我覺得這是很妙的閒話。

旅長聳起他的眉毛。「他是漢奸，他被鎗斃了。」他兩眼直視着我。「後來我們發覺他剛剛把二十萬塊錢存到銀行裏。」



地山北晉在隊部擊游的軍路八

二 游擊戰爭

我對於八路軍一般的戰略和戰術固然是十分熟悉了，但在這裏前線，也許可能獲得一些關於他們抗日戰爭的實際經驗和由他們發展了的作戰方法的直接知識。這個旅團的經驗是一種典型的經驗。

從他們已經到過的地區看來，可以斷定他們是流動的。他們於九月初旬到達山西時，首先奉令開入河北，沿平漢路一帶實踐遊擊戰爭。但當他們到達河北的時候，日軍已經佔領保定府，開始由雁門關要塞向山西推進。

他們在河北邊境留下一些零星部隊，主力又向西行進，每天走一百多里。有一團人北趨雁門關，雁門關在當時已兩度被八路軍佔領；另一團人開始在忻口北面日軍主力的兩側活動，這裏是當時晉北華軍主力所在地。那時以後，他們一直在流動着，一邊不斷襲擊敵軍的交通線，同時又到處組織遊擊隊和新部隊。

「在雁門關」王旅長坦白地說，「我們沒有取得完全的勝利，因為我們不能完全切斷敵人的交通線。當時平型關和鐵路線都被我軍封鎖了；而通過雁門關的路線是日軍往北的唯一路線；如果我們能把這條路線切斷，則敵軍完全被隔絕了。但我們到達雁門關遲了一點。」

（在這裏指出負責保衛晉北要道的山西省軍的鬥志不堅，也許是最公平的。奉令守衛軍事要地的天鎮的李服膺將軍是典型的例子。李將軍一聽見日軍的砲聲就倉惶退却；他後來以玩命罪被蔣錫山將軍槍斃了。在戰爭發動的最初幾個月，中國舊式軍制的某些缺點是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日軍能在幾個主要的山頂上設防，」王旅長繼續說道，「而且用重兵和砲隊守衛這些防地，因此，我們雖然攻擊一切通過大路的日軍部隊和輜送隊，但到底不能完全阻擋他們。」

「同時，我軍在忻口的抗戰獲得了很大的效果；當時蔣介石將軍嚴令部隊不得退却。郝夢齡將軍就是那時在忻口犧牲了的；我軍士氣非常振奮，我們大大受了他們這種新精神的鼓勵。我們在忻口、北面沿公路一帶的部隊都加倍努力起來，天天進擊；有一個時候，我們在各處固定陣地的正規軍和我們這支從事遊擊戰的部隊取得完全的合作。忻口勝利的戰役，證明在統一指揮下真誠合作的華軍是能幹出驚人的戰績的。」

在跟王震和劉子奇談話的時候，我在腦子裏描出一幅關於他們隊伍作戰方案的清晰的圖畫。特別使我感到興味的是他們怎樣發展了自己有效的戰術，用以對抗佔絕大優勢的敵軍軍備的戰術。

我們必須記得：前中國紅軍的某些部隊固然在內戰中獲得了跟比較新式的武器作戰的經驗，但他

們中有許多人從沒有看見過坦克車——有些在未到山西前還沒有看過一輛機器卡車。他們在目前抗日戰爭中所受到的訓練的第一部份就是使他們熟悉日軍前進的步驟。典型的現代戰爭的程序是這樣的：首先（如果前面有敵軍集中着的話）用飛機大炮去轟炸；接着用坦克車和鐵甲車領導步兵前進，同時用騎兵進攻兩翼。

八路軍發明了許多對付這種優勢武備的法術。在開頭，他們從來不集中自己帶着輕武器的隊伍，却把他們分成許多流動的小隊，不斷襲擊敵軍的兩翼和後方，特別是當敵軍移動的時候。

他們沒有足以抵禦坦克車的有效的大砲，因此他們最初把炸彈（大都是從敵軍奪來的）埋在路下。這些帶着爆炸物的炸彈，在任何重壓下都會爆炸起來；他們就用這種手段毀滅了許多坦克車。但日軍對此種手段的回答是強迫中國農民坐在沉重的牛車裏在軍隊前面探路——這是一種殘暴的作爲，結果犧牲了許多無罪的農民。

中國遊擊隊於是改變他們的戰術：他們改用許多大型炸彈埋在地下，有藥線通到路邊看不見的地方。這個方法在山野上是比較正確而有效，因為這種地方的大路是機械化部隊的唯一可能的路線。

華方正規軍從沂口撤退，日軍佔領太原以後，晉北的戰局爲之一變。日軍不再前進，而以鞏固已得陣地自滿。他們最近又會派隊從太原北進，迎擊八路軍和遊擊隊，這些華軍很少集中一兩千人，在一個地方

的。

這些就是滿洲「關東軍」的「剿匪」戰術。但據我親眼所見，直到今天，他們簡直沒有獲得一點成就。事實上，山西日軍大多數進攻都被華軍粉碎了。

「這裏是個例子，」本旅參謀長告訴我。「我們在山的中央築起形似堅固工事的東西。日軍的偵察機看到這種東西，就向山上大炸特炸地炸了好幾天。我們命令近旁小數兵士分散開來，形同逃走。日機的飛行員一定向長官報告『華軍防線』被炸毀了，華軍部隊逃走了，所以敵方就派了大隊騎兵來肅清殘餘。」

「同時我們主力隊伍一直埋伏在山腳——比日軍所擔心的還要近得多。當他們前進的時候，我們就突擊他們，用機關鎗和手榴彈作短距離的射擊。敵人在退却前受了嚴重的損失。」

長略軍對於此種戰術只有一個報復的方法，就是把鄰近一帶村莊燒得精光。這種舉動證明他們自己的無能，使當地民衆絕不能相信日本對待中國老百姓的『和平的親善』。

我發覺中國遊擊隊愛用的武器不是來福鎗，而是手榴彈。八路軍每個士兵都帶着好幾個手榴彈——往往是很原始的炸彈，但對於短距離的射擊却很有用處。這種手榴彈有一個好處，就是農民志願兵

很容易學會的用法。

據他們說，往往一小隊人僅僅帶着手榴彈出去襲擊。六個人可以帶四十個左右的手榴彈，這個數目很够他們用了。日軍（如果他們也帶手榴彈的話）擲手榴彈往往擲得太早了——有時忘記了拔出保險針，炸彈就不會爆炸；有時擲在爛泥地上，也不會爆炸。這一切戰利品，當然都被遊擊隊收拾去了。

我在八路軍裏到處聽到這同樣的故事：日軍步兵在短距離的戰鬥中力量很弱。在作長距離的射擊時，他們的來福鎗火是很準確的，但他們一碰到突擊，就無法抵抗。對付永不集中，捉摸不定的敵軍，日軍的大砲沒有多大用處。

「目前侵略軍的最大希望，」王旅長告訴我，「就是佔領較大的鄉鎮和肥沃的區域，把我們趕回山裏，使我們無法獲得糧食，不能獲得許多新兵。但事實上，他們只佔領了幾個大城市，志願兵每夜出到平原，走近大路。往往有一個穿着農民服裝的單身人，帶着兩個手榴彈躲藏在路邊，一朝日軍的卡車經過時，他就高高地丟了一個手榴彈，使牠落在卡車（卡車大概駛得很快的）裏，他有充分時間可以逃走。」

像這樣的戰術當然需要堅決高妙的戰士；而遊擊兵，遊擊隊領袖，以及一般的司令，也需要高度的獨創力。但這些必須的品質並不缺少，山西的農民正在證明自己能够勝任。王旅長把當前的情勢作了一個簡明的總結：

「我們已經明顯地證明了，遊擊戰就是對付新式軍隊也是很有效果的。牠跟我們自己的主力軍配合起來，則收效當然特別大；但牠也能獨立進行。」

「我們已憑我們的戰術，指明給華北民衆看，他們能够抵抗日軍，而且取得勝利，不會遭受重大損失——因爲我們老是用極小數人馬攻擊大部敵軍。我們已經證明武器並不是萬能的東西，武器在這樣的地區不一定是決定作用的作戰工具。」

「而且我們已向農民們證明：他們能够從日軍奪取武器和藥彈，如果他們富於機智的話；因此如果必要的話，他們儘可自由行動，武器的缺乏不一定要限制他們行動的範圍。」

「在五個月戰鬥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說到這裏愉快地向本旅的政治部主任點頭——「是：我們已經能够組織好幾千民衆，鼓勵他們，擴大民族抗戰的範圍。這一點到底是抗日戰爭的決定因素。」

山西日軍後方的中國哨兵





劉子奇

三 一個英雄的寫真

這在高山掩蔽下的小村莊裏的生活並不單調。大清早，號聲在冰冷的空中顫動，喚醒我們。這是召集士兵早操的信號。不久以後，屋外的街道就響起軟軟的中國鞋踏在地上的回聲和新兵們的沉重的呼吸。彷彿時刻有人在唱歌。不是行進軍隊的粗厲的斷續的合唱，就是帶着湖南或江西農民調子的單獨的歌聲。黃昏，往往可以聽到中國笛子的淒涼的顫音。

我們跟參謀人員一同吃飯——我知道這是特別爲我烹飪的飯食，有大米飯，米是從日軍那裏奪來的。主人們老是關心地問起我的消化情形，但我覺得一天兩頓好好的中國餐食大大增強了我的健康。

早晨，我們或跟士兵們談話，或去拜訪孩子們的劇團。「小鬼」們也像往常一樣，迷住了我，年紀最小的一個只有十一歲，而且是從貴州隨軍來的。他們在一個十七歲的女學生——她從北平一個中學出來加入八路軍的——的指導下嚴肅地練習着舞蹈。

隨後，我們也許到宣傳部去看看，一個年輕的日本留學生老在忙着整理日文傳單，由農民們（也許夾在水果裏）帶進被敵軍佔領的市鎮裏去。晚上，我們聽着一架絕妙的美國無線電機的廣播。這架無線電機也像飯米一樣，是從日軍那裏奪來的。

在這些活動的友愛的人們中，有一個人彷彿老是跟着某一支隊走的。他名叫劉子奇，本旅參謀長。他很容易親近，因為他的態度非常和藹而爽直。「小鬼」們顯然很敬重他。有一個「小鬼」告訴我：他是「很勇敢」的。

這位年輕長官（他只有三十歲）的體格和有傷疤的面貌很像一個羅馬的鬥士，給人非常清晰而有力的印象。他的注視有一種催眠的神情，即使在屋內也彷彿凝視着遠方似的。他有中國農民的自然威儀，同時又非常嚴肅。

他有一天走進我的房裏，沒有脫下他那首盔似的蒙古騎兵戴的制帽，房內只有吳和我兩個人，我由於突然的衝動，請他告訴我他怎樣加入紅軍的。他點頭答應，沒有中國人那種客氣的推辭，他簡單而直捷地告訴我下面的故事。

他生在湖南東部赤貧的農家，九歲那一年在小學校裏讀了七個月書——這就是他所受的正式教育的全部。十二歲在本村一個鞋匠處做學徒，三年後，他成了一個獨立的鞋匠。一九二六年，他參加革命運動，在一個工會裏當巡察員。國共分家後，他逃到廣州，他在廣州在「工人隊伍中」受着訓練。

他是血膽的「廣暴」的組織者之一。三天的經驗使他畢業成爲革命家。廣暴失敗後，他回到湖南，時

刻閃避着那些知道他的反動地主。他在湖南加入一個流動部隊，這就是三百五十九旅的前身。

他受了短時期的軍事訓練後，就被派到他自己的縣裏做秘密的政治工作，組織了另一支流動部隊。他沒有武器，好容易才從當地一個官宦的家裏拿到兩柄中國式的大刀。他開頭就用這點武器武裝農民們，組織了一支隊伍，不斷地戰鬥了兩年多。他們最精良的武器就是土造的鎗砲和土造的炸彈。

他想起那些年頭不禁發笑起來。「有一個時候，」他說，「我一個月沒有卸下子彈帶；我們從沒有換衣服的機會。有一年的仲冬，我們在山上住了三個月，睡在露天的地上——醒來時發覺我們的被褥蓋滿了雪。國民黨懸賞逮捕我，共有五次之多，賞格很重，任何認識我的人都可以告密的。但我從沒有被人出賣。」

後來他擔任更加重要的軍職——有九十桿來福鎗的「赤衛隊的隊長」。他此後接連升為連長、團長，最後升任彭德懷部紅軍的師參謀長。長征時他是朱德部紅軍的一個團長。「有一次，」他偶然自動告訴我，「我們吃了十五天的草。」

紅軍到達西北時，他在紅軍大學裏讀書——本來可以受到一年的高級訓練，但因前線急需有作戰經驗的軍官，又不得不把他的修業期限縮為八個月。他固然比一般人更年輕時就在紅軍的「學校」裏學會了讀和寫，但他所受的正式教育的期限，當以「紅大時期」為最長。

關於他在目前抗日戰爭中的經驗，他不願意告訴我。但我從別人口中聽得一二。他曾在雁門關附近親率隊伍炸毀一梁很重要的橋，他和部下餓着肚子在山上躲藏了三天，直到達到了他們的目的。還有其他事情，但他的故事已經够完整了。

他曾受傷七次——傷在頭上，腮上，背上。一顆子彈從一邊頰骨打進，從另一邊頰骨穿出。因此他現在只能很困難地由一個鼻孔呼吸。另一次傷在股上，成了殘疾，他當時走了六哩路，才有人給他救護。「我身體一向很強壯，」他誠懇地說（看他那出色的體格，我能够相信他的話），「但我現在爬山不能爬得很快了。」這彷彿是他最大的遺憾。

在世界上任何軍隊裏，這樣的戰鬥紀錄一定會獲得大批勳章。但佩在他身上的唯一的「勳章」就是經歷了十年苦鬥的五角星。「軍長稱讚我的堅忍力，稱讚我領導小隊人馬的才能，」這就是我從他口裏聽到的最近於自誇的語句。

我所以選擇劉子奇的故事，不是爲要褒揚一個人而抹殺其餘的人；同時我的確沒有讚美一切戰爭的念頭。但戰爭的一般野蠻性和由這野蠻性所產生的真正英勇的品性之間不能沒有區別。由理性所賦

與的勇敢依舊是一種美德；這種勇敢是難得的，而且在現代大都是革命的。劉子奇在我看來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像王震一樣，也有一本小小的私人照相簿——一本黑封面的書，他有一次把她遞給我，「你懂得這種文字嗎？」他問我，一邊翻到沒有貼着照片的書頁。

我找到書名，瞥了一眼，這是“*De Urbanitate*”——牧師用的經典。「我想是懂得的。」我回答，開始唸着誇大的拉丁文詞句：

「*Corpus servare mundum non conten, tus, sive enungao, sive tussias, sive spuas, Sine slevnas, ita haec age ut nulli adstant um sis incommodo. Ideo tussiendo vel struendo hntocoun seu sudarium aut manum contra os applicabis, ne salivam, inultus gndem sed illepid us in faciem conver salivam.....*」

這在這個軍隊裏是一種奇異的發見，本軍的某些習慣簡直是侮辱了這本書的作者。「牠裏邊寫些什麼？」劉問。

「牠教你怎樣改善你的禮貌，」我帶着外交家的口吻答。

「是法文嗎？」

『古代的法文，』我說，我只能這樣形容牠。

『哦，』劉在喉嚨裏說着，熟練地向門外吐了一口痰。『很古的書。』他收起這本書，走開了，他的方肩在夜霧的映襯下顯出一道側影。我聽見他在遠處唱道：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四 『和平』和『秩序』

『那兒圍着很大的城牆的就是喇嘛，』旅長說。他把望遠鏡——牠原是一個日本軍官的所有物——給我，使我望得更清楚些。

平原展開在我們的下邊，草在冬天的霧靄中，顯得迷離而且光明。整齊的阡陌把原野劃成了一個棋盤；這裏那裏出現着村莊的正方形的雲集。在那彎彎曲曲的銀帶——濟沱河的彼岸，掩覆着柳林的大路，通向南方。

『如果你有一桿很好的來福鎗，』我說，『很可以從這裏狙擊一下。』我用手勢表明我的意思；通過望遠鏡能够清楚地辨別出進城出城的人像和守兵們的茶褐色的軍服。

旅長點點頭。『日本的來福鎗比我們的好得多，』他說。『現在我們正挑選出自己最好的子彈，用牠們武裝從敵軍驟來的鎗桿。』躲藏在這一帶山上的來福鎗兵，對於越過下邊平原的敵軍是一種絕大的威脅。

雖然彷彿是一片太平景象，但如果把望遠鏡朝着某些村莊的圍牆，則可以看出這些圍牆裏所包含

的，除了被燒燬了的房屋的殘骸，別無所有。這些房屋並不是在戰爭中被毀壞了的，而是被日軍焚燬了的，爲的是報復遊擊隊的夜襲。

「那裏就是我們的目的地，」王旅長說，指點着一個大村莊。「我們軍隊駐在那裏，還有許多遊擊部隊散布在那平原上。」他仔細地把幾條道路察看一下。「準備好了嗎？我們可以走了。」

馬在山脚等待我們，我有一匹黑色的日本大戰馬。如果在平原上碰到什麼危險，大概總能逃得了的。我們此刻所經過的地方至少在敵人的心目中是被佔領區域，而時候又是白天。

不久之後，我們到達華軍的外哨，受到熱烈的歡迎。泥牆上寫滿了漢字的標語，甚至還有紅綠紙旗，寫着「歡迎中國的友人！」和「國際和平陣線萬歲！」這一次，我幸得沒有演說。

我們繼續前進，馳入平原，經過荒蕪的田地（在這戰區裏，去年秋季簡直沒有種下什麼。）一羣一羣的羊和山羊正在平安地啃嚼着可以找到滋養素的東西，大都由小孩子看着。彷彿當地的居民只有孩子們和老人們留在後方。

但依舊有帶着自衛軍臂章的農民，肩上背着老式來福鎗，守衛着村莊的進路。在挖着許多鎗眼的圍牆後邊，我清清楚楚地看見日軍在華北「宣揚文明」的標記。

有少數幾座房子未被踏毀，——這不是由於好意所致，因為就是這些房子也有燒焦了的門柱。這個繁盛的村莊變成了一片純是額垣焦炭的火燒場。每座懷慘的小屋只留着一堆右塊和塵灰，學校被燒燬了。廟宇被燒燬了。在這殺人放火者的手裏，一切房屋都遭到同樣的待遇。

留在村裏的老百姓對於日軍的觀感如何，不問可知。他們在街上圍集在我們的周圍，臉孔骯髒的孩子們和抓着空空的烟袋的老人們。一個頭髮灰白的農民揭開自己的破爛的衣服，叫我們看看被蒙古兵的刺刀造成的傷痕。他很倖運，因為他的性命總算逃出來了，雖然不容易看出性命現在對他還有什麼意義。

他用斷續的言語告訴我們：有些七十歲的老頭子也受到毒刑，他們的手指頭被武士的短刀斬斷。日軍最愛用的方法就是剖腹：一定要完成這個傳統的儀式之後，才肯給對方一顆慈悲的鎗彈，結束他的苦惱。在大多數的場合，彷彿這些暴行都在要錢或要花姑娘不遂之後——這些山西的鄉民聽不懂日軍的要求，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因為雖然蒙古兵講的是中國話，但帶着一種寫兇極惡的聲調，就是跟他們同省的人也聽不懂。

任何戰爭的收穫物都是「暴行」，而覺醒了的西方社會往往把這些「暴行」打些折扣，認為這是

雙方的宣傳作用。但我不能相信這些站在自己家屋的廢墟上的山西樸實的農民也懂得這種奧妙。他們所說的故事含有悲慘懇摯的腔調。

任何人——不管他的皮膚是什麼顏色——一投入現代戰爭的漩渦，都會做出殘忍的舉動。但有一種特別冷血的殘忍，這就是所謂法西斯主義的特質；而日本人甚至在東方諸民族中也算是最看輕人命的。大概就是上述那些因素的綜合，幹出了目前的浩劫。

日本軍閥細心選定了恐怖主義的戰術，轟炸中國不設防城市，受到全世界的譴責，這顯然有法西斯的特質。關於日本軍閥幾年來在滿洲所施用的手段，關於他們認為對付遊擊戰的唯一有效手段的「燒殺」政策，人們所知道的還是太小。中日戰事爆發不久以前，我在日本把某些絕對靠得住的關於滿洲的消息詳細告訴和善的日本友人時，他們很客氣地表示懷疑。「我們軍隊不會幹這種事的，」他們微笑地說。

但他們的軍隊會幹這種事的。現在他們正在把施用於「新興滿洲帝國」的整批報復方法廣泛地施用於中國許多省份。

此種政策，就是把全部鄉村燒成灰燼，藉以肅清「抗日份子」。這對於「匪徒」們難得有直接的影響，因為他們往往在日軍未到以前早已避往山上。但村莊却全被毀滅，免得牠們再成為遊擊活動的根據

地。受犧牲的大都是無助的清白良民。

在這寧縣附近的一帶村莊，我們聽說許多老人逃到山上躲避匪兵，結果都餓死凍死。身強力壯的農民們差不多全體加入了遊擊隊。這樣對侵略者的熱烈仇恨，我以前從沒有聽到過。只有失却一切的人們才有最多東西可以獲得。「如果我們能够保住土地，」一個農民說，「我們有無房子沒有關係。」他們將為他們的田地而作戰，那是毫無問題的。

在這個區域裏，由於遊擊隊的活動，沿公路許多地方的村莊都被燒燬了。而對着村莊的殘跡，我想起東京無線電廣播員的流利的聲音，說晉北怎樣恢復了「和平和秩序。」他們製造了一片廢墟，却名之曰和平。

我們馳回華軍的哨所，接待我們的飯食擺在露天的院子裏了。在這浴着陽光的平原上，甚至正月半的天氣也幾乎是暖和的。農民們已經運來大量的食品——甚至日軍也殺不完山西的豬和雞。但在忻口附近，在侵略軍駐紮了一個月的地方，聽說所有豬羊，都被殺得乾乾淨淨。老百姓對這特別感到苦惱，因為在中國，這一類家畜簡直無法撥移。

日軍在華北所實施的政策將獲得怎樣的後果呢？他們在沿鐵路一帶也許已經恢復了「秩序」，在

幾個大城市裏找到了一批捨不得丟棄大量財產的人們，暫時做他們的傀儡和奴僕。

但日本經濟的性質逼迫這些新起的帝國主義者採用最殘忍的剝削方法。他們必須趕快獲得經濟的補償，否則就要滅亡。這原是現代日本的統治者們把自己國家作為孤注一擲的大賭博。不久以後——像在滿洲一樣——甚至那些正在支助征服者的富商地主也會認識誰是他們的敵人。

至於中國的老百姓，就是在被剝奪了小塊所有物，被燒燬了家屋以前，生活也是十分困苦的老百姓，對於當前的新局面會起怎樣的反應呢？華北農民的政治落後性曾經成為人們的笑料，但戰爭，至少是在上述情形下的戰爭，却大大教育了他們。直到今天，擔任戰爭的先鋒任務的，還是中國的老百姓；新統治者們強迫他們修補道路和鐵路，便於日軍機械化武器的馳驅。

中國的農民也許是無知無識的，但他們對於那些大大影響了他們生活的新因素，却理解得並不遲緩。在最初的突擊中，滿洲三省被奪去了，老百姓們只要憑痛苦的經驗也會知道他們以後的命運是怎樣的。雖然他們事前毫無準備，但滿洲的義勇軍却在敵人壓倒的優勢下，已經戰鬥了五年。

一九三一年以後，華北局勢有了顯著的變化：在許多區域裏，農民們都組織起來，武裝起來了，已經建立了許多遊擊根據地。他們共有兩千萬人。

從我在晉北的見聞看來，就是日本的辯護家們要長期維持「和平」的故事，也是很困難的。



八路軍的新兵第一部份

無家可歸的劫後農民



五 新的長城

旅長離開旅部去視察正在受訓的新兵，吳和我同他走完我們第一段的歸程。我們此次穿過山地，比來時的路線更短，更少曲折，而那個訓練新兵的根據地是我們必經的地方。

二三日來，一直要下雪的樣子，在鉛灰色的天空底下，我們終於到達了隱藏在高山腳下的平原上的一個小小的山裏鎮。從遠處望去，那個鎮好像是荒涼的，但當我們策馬穿過河床的時候，劇團的人員前來歡迎我們。我們像奏凱樂歸一樣湧進城門，攆着飄揚的旗子的少年號兵隊做我們的前導。隊伍裏也有幾個穿制服的女孩子。

在作爲閱兵場的空曠的方場上，一千多新兵排成了行列——這是很活潑的隊伍，全體穿着正規軍的大衣，雖然還沒有來福鎗。他們的司令喊一聲「立正」，旅長就踏上一張搖搖不穩的板桌，發表了一篇長長的演詞。

望着這久歷風霜的棕色陰龐的行列，聚精會神地傾聽着演說，我又不禁想道：這是抗戰中的中國的廣大的後備力量。在平時，這些山西農民和小工匠都在自己的山村裏過着平靜無事的生活。但那種時候已經過去了，跟着日本侵略軍南下的大量戰爭消息，已經發出了一種新的行動號召。

他們在此後的時日中將過着怎樣的生活呢？第十九是非常艱苦的生活，但物質生活的艱苦對於這些中國的農民早已成爲平常家飯。固然有危險，但危險在今天不是絕不能避免的了；如果他們回到各自的鄉村，嚐嚐日軍「文明」的果實，危險決不能更小。這一切，他們都非常明白的。

但他們也會獲得相當的報償。因爲在這支軍隊裏，他們除了游擊戰的技術外，還會學得許多東西。

每個八路軍的部隊——甚至在前線的部隊——每天都得上兩小時講堂。一小時檢討政治，一小時受「文化」教育。那些目不識丁的戰鬥員，先教以新文字，再教以方塊字。他們開始認識世界上別的國家，原被山西的山脈所限制的他們思想上的境界將被擴大到整個的國際舞臺。

他們會漸漸明白他們自己的鬥爭不是一種背城借一的單獨的努力，而是全世界的鬥爭的一部份。他們會認識中國革命在全世界進化過程中的歷史意義。他們的作戰同志不僅是一些老伙伴，還有來自中國每一省份的戰友——像他們自己一樣的工農。他們碰到那些渡過揚子江，北上參加抗日陣線的南方人，就會認識全國同胞有着共同的利害。

士兵俱樂部是八路軍的另一個普遍的特點，他們除了戰鬥的活動外，還在這些俱樂部裏參加十餘種其他活動。這裏有音樂組，體育組，壁報組，戲劇組等等，展開了新的眼界。他們立刻會發覺本軍的長官和士兵間沒有任何社會等級的差別，他們跟自己的長官們在全部戰鬥生活裏都受到同樣的待遇。

這一切（這樣赤裸裸地寫出來，很像徵兵宣傳）都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如果我們記得這些人過去生活是那麼枯燥，記得中國人一向瞧不起當兵的人——大家都認為當兵是市井無賴的最後歸宿。日軍的侵略當然把這一切都改變了。不過直到今天，還沒有有其他中國軍隊能給與自己的新兵這麼多貢獻的。銀是微小的，但生活却很愉快。

那天下午，劇團請我們去看露天演劇。我們坐在曠場上看了三四個鐘頭戲，雪花開始出現了。

寒冷的天氣不能阻止士兵和農民來看戲。我們全體蹲在露天舞臺跟前的地面上，此種舞臺在大多數中國市鎮和較大的村莊的中心點都可以找到，通常是公眾集會的場所。老式的旅隊也往往在這裏歇宿。「橫廟」裏燃起一大堆火，給演員們取暖，因為他們到底是受冷最厲害的一羣。

像往常一樣，孩子們的表演是最出色的，他們的舞蹈獲得熱烈的采聲。我看出細心選出來的劇本都很適宜於這裏的鄉下觀眾；這顯然是一種「通俗」的表演。時常出現的日本軍官的臉老是塗着白粉，活像傳統的中國惡棍；幾個戲都很短，行動很多，連歲皮障的村童們都看得懂，他們擁集在舞臺的前面，或危險地停在近旁樹木赤裸的樹枝上。這是一等的表演，政治的特點是不能抹殺的。

最後是一場「乞丐舞」——這又是一個特點——配合着一首中國的民歌，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蓮花落。這是一首動人的歌曲，你在華北街道上到處可以聽到。

「我們都是沒飯吃的窮朋友。」

這是開頭的一句；於是全體合唱起來。原歌如下：

「我們都是沒飯吃的窮朋友——」

（窮朋友）採枝花兒開，一個一枝蔥花。

我們沿着飢餓道上一同走——

（一同走）兩枝花兒開，花開蔥花落。」

但這隻舊曲已經配上新詞，觀眾很快地就學會了。

「要抗戰的大家一齊來下手」

領頭的唱了這麼一句，全體就合唱出震耳的歌聲：

「所有日本強盜在一起也照不住我們鐵的拳頭」

一小時後，鎮上個個人都唱着這首配着新詞的歌。

雪是一種阻礙，但風却靜下來了；第二天我們又登上歸途。據說路上有散兵，但我們有騎兵護送；他們應該能夠對付他們。王旅長和他的參謀長送我們到鎮的盡頭。

前面是雲中山高聳的山脈，我們必須穿過牠。這已是一片閃耀着白光的世界，而雪還在不斷地下着。

「你不願在這裏再住幾天嗎？」

「本來最願意不過的。但我想回英國去，我還不知道怎麼辦好……」

「你要把關於我們，關於中國的一切告訴英國民眾嗎？」

「我要告訴他們的。這原是我來這裏的目的。」

看看這些熱情的棕色臉龐，看看這莊紮着農民軍的小小的山裏鎮，看看那些在雪地上跟當地孩子們玩耍的「小鬼」，我又不禁想到英國的人們對中日戰爭的認識到底是怎樣的呢？從表面上看，一切彷彿都是不利於中國。北平，上海，南京，青島——外國人最熟悉的一切大城市都落在侵略者的手裏了。

但中華民族的真正力量到底在哪裏呢？不在沿海的大城市，不在省會。牠的確是在這裏，在鄉村裏，市鎮裏，在這裏的農民羣衆中，他們過了許多年無知無識的生活，經歷了許多年的內戰，現在正在自覺的，日益加强的目標下聯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了。

中國的社會單位依然還是鄉村，鄉村將變成抗戰的真正核心。關於這，有許多地方已經表現得很明顯了。因為認識了這些人民的無比的活力，我對於當前戰爭的最後結局，沒有一點懷疑。一個嶄新的中國將從目前艱苦抗戰的暴風雨中產生，這將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中國。

第十章：統一戰線

第十章 統一戰線

一 歸途

當我在山西山嶺間迅速地旅行了幾乎將近一個月，而取道南歸的時候，我覺得我終於是在開始認識華北了。

人們可以像出亡或旅行一樣，在一個地方住上幾個年頭，而並不傾心於那地方，所以在中國儘有少歐洲人士，對於這裏的土地和人民，仍舊是非常地隔膜。但是在參與了一次冬季的雪地中的征程，經歷了死寂的村中的暗夜，又在天明啓程而將整個的生活消磨在路上後，一個人便對這個地方發生了親切之感，甚至比全世界書本中所描寫的境界還更親切。

我深深地感覺到要解釋華北的一切，是非常的困難，即使我本人，也是如此。那裏荒僻的小山的美麗，對於西方人，比起中國的審美家來，更有一種引誘。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讚賞的地方，如果正確而公平地批評起來，那我們勢必借用本書『序幕』中所用的詞句的。如果你問一個熟悉全國的中國人，什麼地方才

是在他本國裏認為最美麗的地方時，他一定說是「蘇杭」——有着南方的景色，湖邊矗立着古塔，以及抽芽的楊柳等等。所有的幸運與不快都已被人忘記。在中國的古畫裏，山石一類的東西，都變成了幻想的崗巒——被畫家的筆刷所柔化而成爲夢幻一般的山嶺。因爲中國藝術的最有涵養的質素就是「恬靜」的意境。

目前中國的這種「恬靜的質素」是完了。「人間天堂的」蘇州和杭州，已經遭了污辱，而南北各區域鎮大部都逃不了空襲的威脅。但是中國在華北的山間，展開了對侵略者的鬥爭，同時也就是這華北幾省的曠野才表現了武裝的中國人民的狀態和性格。華北是一個「硬性」的地方，有着酷暑和嚴冬，空氣非常乾燥，並有着吹過蒙古的含着沙雪的狂飈。你如果要認識這個地方，那你必須在嚴冬，當山石聳起向雪地投着陰影，而清明的陽光在冰結的山崖上照耀的時候，予的觀察，那當兒你可以從那些險峻嚴密的山間，看到一種極爲美麗的景象——這在南方各地是非常少見的。

至於講到華北的人民，雖然他們常常被認爲非常缺乏精神而又對他們目前的統治者的性質非常冷漠，但是現在可以說，日本的侵略，已經完全把這種劣性改變過來了。在往日，華北各省的政治的確非常不良而退化，同時華北人民退讓的性格，的確與他們卓絕的體格及古代軍事的傳統性，非常不配，但是一年來戰爭的經驗已經顯出他們對於一個果敢而決斷的領袖，具有着怎樣神速的反響。同時日軍成那種

殘暴的行動（在他們以為是非常的「目光淺近」）也已經由第八路軍和他的政治組織工作者予以制止了。

在華北的各個城鎮裏，日軍用着他們的機關槍和大刀，誠然可以控制一部畏葸而昏庸的人民，但是在四鄉間，却並不如此。

我記得我們有一次在晚上曾經過某山裏的一個小村落。那時候，太陽已經下山，幾乎已經昏黑了。我們的隊伍在一只守着山谷的廟宇前，停了下來，我們的長官尋覓着村長，因為我們要找尋宿舍過夜。最後這個村長終於出來了，他好像是一個枯萎的稻草人，唇上蓄着下垂的灰色的鬍子，手裏撫弄着一支銅煙管和一只旱烟袋。他用着不信任的語調說，這裏是一個非常窮苦的村莊，所以沒有宿舍可以供給，並表示城鎮離這村莊至多不過四十里。但是當他驚奇地看着我們帶着的那隻騎兵隊裏的大黑馬的時候，他的眼睛睜得非常大。這到底是什麼馬呀？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這種馬的……在他的背後，從四方圍聚攏了一羣孩子，也用着同樣的語氣，表示驚奇。

我們隊伍裏的長官解釋着說：「老同志，這是日本的馬，——我們的軍隊從他們那裏搶到的這種馬，已經很不少了。我們是從前線來的，我們在那裏每大打着日本人。所以我們現在要求的祇是床和屋子讓我們宿夜，我們並不是不照價付錢的……」

這個老人在聽到了這些話後，便立刻卸下了他的冷漠的面容，變得非常的友愛可親了。他表示每一件事都辦得到，隨後他便躡腳着向雪地裏走去。

半小時後，我們已經到達了一間小小的農舍那邊，戰馬已經安置在馬房裏，士兵們都住在樓上。我們點起了火堆，預備晚飯，在水蒸氣蓬蓬的大鏢的四周，我們圍坐着談話，兩個年青的農夫，很熟練地做着「油麵」。不久以後，牛村的人，也都聚擁在庭院中聽我們講話了。

「那些日本鬼子，是什麼樣子的人呢？」一個年青的村民，小聲小氣地問着：「他們是不是象他們的馬一樣地是些大傢伙？」我們隊裏的長官，聽了這個問句後，便開始了一段冗長而複雜的答語，不久以後，我們好像在一個政治會議裏面了。士兵們追述着日軍在北方放火，屠殺以及拉夫等等的慘事……此外更講到了私人家庭所遭受的慘痛的經歷，以及日軍的暴行將中國傳統的家庭尊嚴與以根本損害的故事等。這些簡單的詞句，在這個倖免戰禍的小村裏，無異是第一次散佈了戰爭的恐怖。

第二天早晨，在我們離村啓程之前，那個年邁的村長要求謁見我們隊伍裏的長官，隨身帶着一個戴皮帽的青年，似乎準備跟我們一起啓程的樣子。「我們這個村裏需要一個自衛團的組織」那些人說道：「我想請第八路軍幫助我們。這一個是我的孫子，我是叫他來作你們的嚮導來的。他本身也正希望加入你們的軍隊。如果你們能够派幾個人來教我們怎樣作戰……」

這個隊伍因此便穿過了華北各地的小邱和山谷，成天成晚的走着。

我們到達師部時，賀龍和蕭克都到南方參加軍事會議去了。在我們離去的前一天，賀龍返回了師部，他一路騎行很快，精神也極興奮。『我在洛陽請見了蔣委員長』他告訴我們說：『他是十分的好！』他擔着大柁揹着極口稱讚的神氣。『十分的好！——他是個百分之百的愛國者，我擔心你們是聽到過他對軍官們的訓話的……』過了新年後，當大家竭誠努力解救南京的困難時，軍事當局方面產生了一個顯著的融洽的現象。政治上的合作，在從前固然是並不像理想中那樣的完全，但是現在是有着極快的進步了。

從南方傳來的兩個消息，形成了特別興奮的空氣。『王明回來了。』是在師部聽到的第一個消息。王明是中國共產黨裏公認的最好的理論家之一，他在第三國際是中國代表，並且曾在莫斯科住過很多年頭。所以目前他在漢口的地位是十分惹人注目的。但是尤其使這師部興奮的消息，是說北方的山關乃是蘇聯的飛機和飛機師抵達中國內地的第一個直接的真實地點。

在先我們對於蘇聯飛機的一切，曾經聽到過不少報告，尤其是從無線電聽來的為最多。但是日軍對於這一點的情緒，是非常混雜的。東京方面，看起來似乎對於飛機抵達那裏的消息，極為驚恐，同時，對於他們『拙劣的動作』却又覺得非常喜悅。但是賀龍驕矜地投我一張照片，上面是一個蘇聯的戰士旁邊停

着一架龐大的蘇聯的配置着四個發動機的轟炸機。『在目前的中國，這種飛機的速度，是最快的了，每一架可以容載四十個人。這麼一來，我們現在是在空中與日本飛機周旋了。』

在這一次中日戰爭裏，對於蘇聯給予中國援助的性質和限度，曾經發生過不少誤會。但是在漢口的這種蘇聯飛機以及一部分蘇聯機師和顧問等，却是一個堅強的事實。在中國的空軍裏，有着美國英國意大利等國的飛機，在先前的時候，中國空軍的外籍機師裏包含着美法英及中歐各國的人員的。在許多情形之下，這些外籍人員，在中國尙且不能自己訓練更多的駕駛員的時候，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而已。因為中國所有第一線的受有訓練的駕駛員，在一九三七年的年終多已經殉職的了。所以在目前這次戰事裏，對中國政府最有幫助的，可以說仍然是一般由福根霍森（在戰事發生前曾與蘇聯委員會長合作過好幾年）所領導的德國顧問。

在供給飛機和技術人員與中國政府的時候，（那是純粹在商業的立場上的）蘇聯所表現的祇不過是一個友好的隣國的態度。在任何情形之下，絕不越過國際法的範圍。但是蘇聯對於中國在軍需事業上所供給的限度，曾遭到很荒謬的攻擊的。日本的其宣傳人員曾經誣陷（竟還有一般神志比較清明的中立國的外籍評論家互相響應）說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已經完全「蘇維埃化」並且說蘇聯是暗中接濟着中國以飛機，坦克，以及參謀人員等。

我同第八路軍相處已近五個月，會與牠的好幾個部隊，有過極密切的接觸，但是我從未看見過一枝蘇聯式的步鎗或是機鎗，更不要說什麼大砲，坦克，飛機，和蘇聯人員的蹤跡了。簡單的事實是：這個軍隊是爲爭取生存而戰，他們所能得到的新式鎗械，都是從日軍那裏奪得來的。他們目前所用的步鎗，正是穿過半個中國的長征時所用的步鎗，而他們目前所用的手榴彈，也正是賀龍和林彪的軍隊，在山西阻撓的日軍前進時所用的土製的手榴彈。這個軍隊是鬧着軍需的饑荒，因爲所有中國政府從國外運來的軍用設備，都直接運向漢口，而僅僅分配於主力前線的各個軍隊。

但是第八路軍確會從蘇聯那裏得到過一件東西。（這一點恐怕日軍更難了解。）那就是在世界戰爭中的一種團結的意志，——雖然牠並不能由大量的蘇聯的軍備作輔。賀龍從南方還帶了些東西回來，他偷偷地在拿給我看的時候，放低着喉音信任地絮語着：「你看！王明從莫斯科帶了四個回來，——他送了我一個。」因此我便把那東西靠近亮光的地方去看了看。

那是一個蘇聯二十周成立紀念的紀念章，上面刻着一個恰巧的金葉鏈錶，還用粉紅色的玻璃標着一九一七——一九三七年的日期。像賀龍那樣的「老布爾希維克主義者」對於這東西所示的羨慕，我可以想像得到。因爲我曉得這些共產軍官對於他們自己的「紅星」（紅軍的十年歷史的紀念徽章）是極端寶愛而重視的。這一個玻璃的飾物，是蘇聯度過了二十個艱苦的年頭後的一種紀念，所以牠對於中

國的共產黨，可說是一種「社會主義的祖國」的記號。所以紅軍雖然是最後輪到接受蘇聯軍備接濟的軍隊，然而他們對於蘇聯所表示的忠誠和信仰實在是不會動搖的。

賀龍——他的大無畏的勇氣，好久已經成了中國的傳說——當時看着這顆徽章時，神氣非常興奮。「壞的是，」他嘆息着說：「我竟不敢佩戴這個東西！因為在師部裏，這是僅有的一顆。如果我們戴了之後，其他的同志一定要妒忌我的。」在八路軍裏他受着這樣的威脅，可說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事。

二 基督教徒和共產黨人

由於一個不可記憶的習俗而成的舊曆新年過後，「春」是來到了中國了。當我們行經山西的鄉間而轉往南方去的時候，空氣裏充滿着春意。和煦的陽光開始融解着二月的積雪以及冰凍的山巒。孩子們在大門口圍聚着，仍舊拿着五彩的新年彩帶，高高興興地玩着。田野的工作，正在開始，而整個冬季的景色，也重新獲得了新的生命。雖然戰雲籠罩了半個省份，但是却不能完全打消當地民衆生命的歡愉，以及與地球的黃土一同覺醒的人類的精神。

在那個春天的早晨，我同着彭德懷乘着一輛破舊的運貨車，回到師部裏去。一路上，這頓不知疲勞的長官，對於國際形勢，作着非常詳盡的分析，構成了一個理論說：「法西斯列強」——德意日——由於它們在遠東的「利害的衝突」，即以中國來講，他們是無法謀得相互間真誠的合作的。『在歐洲，這些法西斯主義者，誠然可以攜手，但是在這裏可不能。意大利希望日本南進，可以由此阻礙英法，德國希望日本在北樹立她的威權而向蘇聯進攻，但是德國却懼怕日本會在華中戰敗，更懼怕它本身正在激增着的對華貿易，會被日本奪去。這些物質利益的矛盾，證明比他們的所謂「防共協定」，是更為利害的。』

最後，我們抵達了村莊；彭氏從車上跳了下來，經過了一條似乎為節慶而裝飾過的街道後，引導着我

們到總部去。每一個方向，都懸掛着英、法、德各國文字的歡迎的旗幟和標語。彭德懷簡略地告訴我：『因為目前有好許多外籍人士到這裏了！』

這是我第一次聽得的消息，因為第八路軍中，外籍人士並不怎樣普遍。而這些人，我都非常熟悉。特莉已經回到了漢口，安娜·露易絲·司屈朗（Anna Louise Strong）——中國革命的老朋友——已經從莫斯科回了轉來，而從事於幾個舊組織的恢復，並且曾經好幾次地到過山西，但是她早已已回到南方去了。因此我所認識的碩果僅存的外籍人，祇是伊文斯·下爾遜少校（Major Young F. Carson），卡爾遜少校是一個冒險成性的美國軍官，曾經以軍事偵察員的資格與第八路軍作過一次長途旅行了。但是他——從前常常能得到他片斷的電訊——目前是應該仍舊在五台山的。因此這變成一個深刻的謎了。

除非是第八路軍已經交了新的朋友，否則這一定是『蘇聯派來的顧問。』當我踏進一個石版鋪成的前庭，而左權正在大門口懇切地迎接我的時候，我的好奇心突然被引起了。因為在左權背後，一個高大的外國人站着，穿着一身軟呢的衣服，罩着一件皮大褂。他莊嚴的神態好像已經平定了北冰洋裏的風浪一樣。左權告訴我說：『這是我們的蘇聯同志。』當時我以為他至少是一個政治顧問，但是他在門口把他龐大的身軀挺了一挺，一面用俄語實行自我介紹：『史克伏卓夫，塔斯社記者。』

但是在大廳裏會議桌的首席上，我瞥見一個剛健而熟識的背影。「誰同朱德在一起？」我問。「是其他的幾個『洋人』嗎？」

左權點點頭，他似乎對於他所談的笑話，非常感覺有趣。當我走進了那間陰暗的屋子，而準備向朱總司令致敬的時候，他代我介紹了在場的各個客人。坐在這會議桌子四圍的是——一個瑞士的女記者，一個美國的旅行家，一個白髮的英國女教士，一個武昌教會學校的講師，以及漢口某教堂一個主教的女公子。他們是代表漢口外籍僑民的親善團。他們此行的目的，不僅希望參觀這紅軍隊，同時還帶了銀錢，冬衣，以及各種醫藥用品等，準備救濟在山西山間打遊擊的戰士們。

那是總司令部裏極度熱鬧的一天。這些「外籍朋友」的來到，是非常的偶然，並且他們帶着熱誠的同情心，又冒了戰爭的危險，來訪問這支十年來流亡着的軍隊，因此得到了特別的歡迎。我的衛隊滿意地告訴我說：「國際和平陣線，在中國終究成立了。」

「你現在對於基督教徒的印象怎樣？」當我們吃完了午餐，而站在那一方簡陋的體育場上，等待着下午的歡迎會時，我問左權。當時呈現着一個非常欣快的鄉村景象。山西的平民都圍集在這個曠場上，看着八路軍和當地村童的足球比賽。史克伏卓夫是一個非常敏捷的老手。他的頭頂和射擊的技術，常常從

四周觀衆裏，博得響亮的喝采聲。

這是球場附近，有人在玩籃球，朱德也按例每天參加二小時的這種運動。他雖然年已五十有餘，但是八路軍的籃球隊員，都公認他是一個策路家。當他的計策，得到勝利時，他黝黑而質樸的醜態上所表現的喜悅的印象，是非常顯著的。以一個軍隊裏指揮官的身分而跟村童在多灰的球場上嬉戲，確是一個不很普遍的景象，但在第八路軍裏，這是無足爲奇的。

「這些從漢口來的朋友，都很不錯。」這年青的參謀長回答我說：「從前我們對於在中國的外國教會方面得有各種不同的經驗，而過去的印像也並不良好。然而現在當這些基督教徒來訪問我們而親自觀察了這個所謂「可怕的紅軍」後，情況是怎樣的改變了呀！」

左權繼續又告訴我最近在冀西發生的一樁事件。他說在涞源的縣城裏，意大利的天主教駐着一個教會。日軍第一次攻擊時，便佔領了這個縣城，因此，便按例開始進行「維持會」的組織。除了中國甘作奴隸的富有的鄉紳外，這教會裏的意大利人，由於他們和日軍間友好的關係，便也參加了這種組織。其後來源被八路軍所克復，因此第一件事情，便是搜捕漢奸。但是這些漢奸都逃入了意大利的教會，而意大利的教士竟袒護着他們而拒絕把他們交出。

「試問你們會否用武力逼他們出來呢？」我問他，但是左權嚴重地搖着頭。「我們都知道意大利人

是跟日軍合作的。」他說：「假如我們用武力衝進了外國教堂，他們又要對我們製造所謂「共匪」的流言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向國民政府作了一個報告，當局便向意大利領事館提出抗議。但是我們始終不會擾及那個教堂。」

不過，這次事件是例外的。大都在中國的教會裏的服務人員，鑒於這次侵略戰爭造成中國民間的慘痛的狀況，他們對侵略者的憤怒，並不比中國人民為低。但是由於他們的地位，不能作任何一方的袒護，所以有幾個在中國的教會，不論他們自己的關係如何，都祇能嚴守中立的地位。

「本村的天主教堂怎樣？」當我看到體育場外一個巨大的教堂的屋頂時便問：「唔！他們是很好的。」左權回答我說：「這天主教堂裏的教士是一個比利時人，已經入了中國籍了。他們邀請我們明天去參加他們的大會。」

「你們去不去呢？」

「朱德代表了本軍，已經答應去參加了！」

在這個時候，軍號吹着「集合」的號音。籃球比賽便突然停止。朱德急忙地整理了他的皮衣，並把他那頂舊布帽，拉了拉直。便領導着我們準備舉行民衆大會。

這一次民衆的歡迎大會，是在那好似戶外戲院的廣場上舉行的。在這場的四周，站立着許多的軍士，和握着步槍的衛士。從漢口送來的錢——約有四千元，都是一元的單鈔——在小木檯上堆起一大疊，周圍還有許多羊毛襪牙刷，及醫藥用品等。

所有的外籍訪問者，都登臺演講，那個英國的女教士更說着純粹的湖南方言，因此博得了不斷的掌聲。最後由佛朗西斯·洛滋小姐（Miss Frances Roote）代表着漢口救濟會，正式致贈這些銀錢和用品。在接受這些禮物時，朱德不用第八路軍而用着西北游擊隊的名義，致着謝詞。

「現在我們的軍隊，」他說：「是由國民政府所支持，所以並不需要額外的糧食和衣服。但在本省的北部，那些平民的義勇軍，大部都失去了他們的故居而繼續着他們抗日對侵略者的鬥爭。所以我們現在是爲着「他們」才欣然地從我們漢口的朋友那裏接受這些餽贈。因爲這許多銀錢就是這許多游擊戰士和他們的家庭的糧食，衣服，鞋襪，以及各種最需要的生活用品……華北人民將繼續做這鬥爭，他們目前可以確信他們並不是在孤軍苦戰的形勢下面……」

戰爭的插曲在這些文墨中，可說是輕微的，但是這一次小規模集會裏的含義，却並不如此。恰恰相反，它對於中國一般平民戰士，至少有一種重大的意義，那就是——無論世界各國當局的態度如何，中國的平民，儘可以從各個民主國家的人民裏，找到他們的友人。

三 第五縱隊

在瀾關，受傷的軍士，正在渡黃河。

這一條險惡的河流，彎曲的折轉處，聚着三個省分，也就是中國戰略上重要據點之一。中國有一個古諺說：『能據守瀾關者，即為中國之王。』這城位於黃河的南岸，沿邊被山嶺所截斷，東西的隴海鐵路也穿過瀾關而入山西，沿途隨着渭水，經過一個湫嶺似的河道。北面是山西，南端是河南。河上並無橋樑相接。

我們在深沙上站着遙望那沉重的沙船隨着風向上流駛去，或在山崖附近，在逆風中後退，這許多沙船裏，大部都懸着紅十字的小旗，而裝載着一袋一袋的醫藥用品，正回向山西那邊去。成百個難民，忍耐地站在岸上等待着上船的機會。而一部分難民却在沙丘上擲擲着，陸續地走向這裏來。一隻沙船裝滿後，另外一隻便代替了前一隻的位置。

我們由於軍隊裏發出的通行證，所以在這些醫用的沙船上，得到了一排位子。我旁邊坐着的孩子穿着泥污的制服，陝國處受着鎗傷。他的面色非常黝黑，帶着痛楚的表情。但是他靜靜地對着櫓，眼睛迎着大風，掙不大開。一個頭上綁着紗布的他的朋友，替着屢和他講話。

『覺得怎樣？同志！』那孩子露着白牙微笑了。『早過嶺，倒是風冷得很！』他的朋友聽了這話後，

授了一條棉毯過來。

至於這種中國的傷兵，叫我們怎麼描寫呢？就這個孩子來說吧——他是三十五師傳作編的部下——在他能受到醫療之前，已經走過了半個省分了。沒有嗎啡，沒有麻醉藥……我們可以想像到這個農家孩子在受傷後的一段旅程，是怎樣的一種苦楚。但是竟有成千成萬的傷兵同他一樣，而且有的竟活生生的受苦而死了。

中國軍隊的治療隊，人手是非常地不夠，而設備也非常簡陋。他們全部負責醫藥主力陣線上的中隊軍隊，尙感不足，又怎樣顧得到其他？所以各個省當局的軍隊事實上是沒有軍醫的。在戰爭的第一年裏，軍事當局聽憑受傷兵士死去的事實，已經成爲公開的祕密了。因爲一個兵士的生命是無足輕重的，同時儘管有新兵，可以補充……。

但是這個方策，慢慢地是改進了。在北方，第八路軍已經樹立了一個不同的例子——因爲即使從紅軍的時代起，他們也極端尊重各個戰士的生命的。他們用着不周全而簡陋的設備，多方設法救濟受傷的兵士。當地的平民們也都願意代他們扛擔架，或在隱蔽的村落裏服侍各個受傷的戰士，直到他們可以移向別處時爲止。這一切情形的關鍵，祇是「合作」兩個字，而這次戰事也正在將這兩個字，教導着整個的中國人民。

中國向來是有着某種合作精神的。不過最近幾年來，這種合作精神都傳統地表現在幾個地方當局爲私益而組織的團體。有如家庭間的合作，或村族間的合作等，而鮮有超過這種範圍的。（除了一九二七年革命時代勞動運動的時代。）但是窮人對富人的傳統的合作方法，是比較不同了。這種合作的精神，中國十年來的蘇維埃運動已經證明他是非常真誠的。但是目前一種統一團結的意識，已經在中國的各個社會層第一次產生了。這一點在需要嚴切的前線已經加以證明，而逐漸地同時也展向了後方。任何那個認識「舊中國」的人，對於這種合作的新精神，比起軍事的勝利來，是覺得更爲可貴的。

隴海鐵路的客車，仍舊按時在行駛着。我們能在日軍春季總攻開始，而他們的飛行縱隊達到黃河北岸之前逃出，確是非常幸運的。在這個時候，中國的主力是集中在隴海及津浦兩鐵的交叉點徐州。那裏據東京的無線電廣播員報告，說是「這次戰事的最後的戰場了。」在日軍佔領徐州之前，有好幾件事情還要發生，例如日軍的全軍覆沒等，同時華軍堅守隴海鐵路的勇蹟，對日軍也是一個非常的驚異。

在這個時候，我們正舒服地乘着三等車到鄭州去。當夜在車站附近的中國旅館裏，便找到了一個頂層的房間。雖然我覺得住在有種隣居的地方，不很衛生，但是因爲那時候鄭州不會遭受過空襲，所以我們都覺得可以利用一下。我出外訪問美國浸禮會裏的一個朋友，他們那裏醫院的部分，已經容納了好幾百

個傷兵和平民了。史克伏卓夫因爲要找塔斯社裏的同志，悄悄地離開了此地。但是當那天晚上聚會的時候，這個俄籍新聞記者堅請我們乘第一班車直赴漢口。他的理由是四個字：「第五縱隊。」

鄭州似乎是日本在華中的特務機關的中心地點。她的所以能避免轟炸，實在因爲日軍在這個險要的鐵路交叉點所設的間諜網，實在太大而可貴，所以不能冒險。日本征服中國的謹慎的計劃中，包含一個周密的地下通信組織。這個組織的成績，非常良好，由於中國軍隊裏一部分好細的協助，日本事先可以得到任何軍事行動的消息。中國的反間諜組織，開始得雖慢，但是目前在鄭州，它至少已經開始工作了。

當我們到達鄭州的那天，警務當局已經着手了緝捕的工作。那次提到了幾近五十名間諜，有幾個懷有無線電傳信的裝置。證據既是非常的確鑿，所以這一次緝捕的工作——事先已經準備了好幾個星期——可說是充分的。這一次間諜的失敗，使當時隴海路上的第五縱隊，遭到了打擊，但是這失風的消息，必將洩漏出去，所以日軍的報復也必然很快的。

我們被勸諫後，便乘了第一班車開赴漢口，而在我們離開鄭州後的那天早晨，鄭州便遭到了慘烈的轟炸。附近車站的一帶的地方，所有的建築都炸爲平地而成了一片瓦礫了。但是這不過是使鄭州轉爲平地的序幕而已。

人們常常問，日本怎麼能够找到這許多間諜爲他們工作。而答語也常常是『人言各殊』。雖然人們或許會出賣他們的靈魂，但是普遍地說是不肯爲了金錢而犧牲他們的性命的。然而事情竟有比這還更離奇的。

有一晚，當華軍的飛機順利地轟炸了日軍的陣地，凱旋地降落時，忽然一個手榴彈拋向了那一架首先着落的飛機，機身炸毀後，兩個飛行員也受了傷。這是一個中國人幹的，而他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便沒有機會可以逃命的了（事實上他並不企圖如此）。然則這種自殺的行動，是什麼理由呢？那可說就是因爲同樣的理由，才使偽滿的軍隊，會穿了日軍的制服握了鎗，（雖然並不堅決地握着）而對付他們的同胞的。

偽滿的軍隊裏，每一個軍士非但要他本人的家庭擔保，並且要找許多人作他的聯保，假如這個軍士不服從或違抗日本軍官的命令時，那家庭和保人的性命，就有危險。因爲假如不用這層以他的家庭或保人作爲要挾的辦法，日本是不能得到可靠的中國間諜的。在普遍的中國人裏面，家庭的關係，最爲密切。所以如果要使他們接受國家的觀念，那就必須用新思想和那些蘊育了好幾千年的舊思想相抗爭。而在許多情形之下，新思想一定可以戰勝，而舊意識一定會遭到淘汰。

據一般旁觀的社會學家的觀察，這一次中國戰事裏最有興味的發展，是由於改變了的情勢而引起

的一種新舊思想制度間的衝突。在中國能第一個將別種思想置於家庭觀念之上的，或可以說是共產主義者；因此人們也常常爭論着說，就由於這一點，所以共產主義不能在中國成功。這一個問題僅有未來的發展，方才可以把它解決，而目前任何爭論都是不實的。但是一般共產主義者至少已經表明，由於他們的領導，以及他們部隊間的反響，中國的決心已經非常堅強，而足夠粉碎任何古舊而又愚忠的思想了。同時目前展開在中國民衆面前的一個大問題是：這種「國家民族自由解放」的新思想，究竟是否能在古代遺傳下來的各種矛盾而相反的情緒間，最後獲得它的地位和威權。

四 漢口交響曲

在揚子江及漢水接合處，位於揚子江兩岸的武漢三鎮——漢口、漢陽和武昌——是中國在上海以外第二個工商業的中心。美國的記者形容漢口時，都喜歡說它是「中國的芝加哥」。雖然這個相比並不怎樣確切——或者由於有一個朝着水路的工廠區域就以爲如此，但是漢口與上海間關係的重要，比起芝加哥和紐約來，是不相上下的。

漢口像上海及天津一樣——三個最受國外影響的城市——比較是有一種現代化的景象。沿着埠口，當海潮增漲的時候，列強的巡洋艦碇泊着，而各種西方建築的銀行、寫字間、倉庫、別墅、及領事館等，無異是代表着最近一世紀來西方企業者的紀念碑。漢口一時有過外國租界的分攤辦法，但是在一九三七年時，祇有德國和日本的租界，繼續維持着他們的權力。在漢口，日本租界裏的日僑，早已全數撤退，所以已經由中國人收轉了這個地盤，而在戰時作爲一個便利的軍事根據地了。

因爲當地所有的車輛，已經都被徵發而作了軍用，所以我們坐着一部古舊的運畜車輛，穿過了鐵道邊的曠野，方始抵達漢口。這東站戒備非常森嚴，但是城裏却非常安靜，而民間的日常生活——包括空襲警報在內——也似乎很有秩序的。我對漢口第一個印象很爲良好。這一個城市的確非常配作中國戰時

的首都的。雖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已經遷至長江上遊的重慶辦公，但是漢口仍舊是軍事和政治上的行政中心。蔣委員長在這裏設着他的行營，而各部的高級官員也都已經拋棄了他們南京寬大的辦公處，而不安地住在這個孤寂的公寓裏，甚至還緊鎖着大門。

漢口的居住問題確很嚴重，因為城裏的居民是和莫斯科一樣的擁擠着。我要是沒有美國聖公會洛滋主教誠懇的招待（他的女兒我最近在山西看到）我的起居勢必是非常艱苦的。他應答我住在他的家裏，我在那兒見到了許多同籍的志願醫師和史沫特莉。——她現在是致力於平民的醫藥救濟工作了。這些集合了所有思想的學校而幫助中國的工作，其自由的性質，是當時另外的一種表現。在洛滋主教的家裏，孔祥熙和周恩來常常跑來茶敘。而這種在一個自由教士調解的影響下交換友情和意見的現象，可說是中國年來所不會見到的。

在山間過了好幾個月，重返現代化的城裏的時候，我在先前確是覺得非常刺激的。當時漢口軍法精神的表現已經消失，每一條街上，人們可以看到酒店，及菜館裏都充滿了人，而有幾個外籍飛行員，都把金錢像香檳酒那樣的浪費着（但是俄籍的飛行員却非常嚴謹，不常在公共場所得到）。這不過是在戰爭的緊張狀態裏，由於漢口到底有幾時可守而引起的一種人為的現象。但是假如他們具有確信，那麼漢口的堅守，是絕對有可能性的。

在這個時候，共產黨早已籌得了一個保衛漢口的計劃，那是直接武裝城裏的產業工人（上海以外最大一縣的平民階級）並認為漢口是第二個瑪德里。但是這個計劃，仍舊被某些國民黨官員所反對，因此似乎並無被採用的希望。中國共產黨雖然在漢口有着他們公開的組織，並且發行了他們的機關報，但是仍就常常遭到攻擊。而蔣委員長也會好幾次設法避免這種顯明的摩擦。但是統一陣線，却順利地進行着，而僅有那些熟知內部衝突的全部事實與困難的人，方才可以領略這種成就的價值。

在同一的時期內，戰事的外景，仍舊繼續着。其一部是被爭取制空權的鬥爭所表現。關於這一點，情形與西班牙非常相似，值得提起。

中國不像西班牙政府那樣，事先沒有防範，第一次的遭受空襲，並不是完全沒有準備的。她有着一个小部然而相當是够的第一線飛行員及輕轟炸機，但是日軍飛機的優勢在先前是非常地威脅着，同時中國空軍的戰略又非常拙劣，所以兩者力量的相差是非常懸殊的。在最先幾個的空戰裏，證明中國空軍的戰鬥員比日本為優，但是他們非常造次，有着破壞隊形的危險傾向，而由於駕駛的不慎，在地面上會毀損過無數優秀的飛機。在一九三七年年終的時候，中國的空軍實際上已經無聲無嗅，因此日機竟可以飛至中國如甘肅等省的內地，實施轟炸，而不遭到截擊。

在這種行將崩潰的情形下，中國政府當局便不得不像西班牙一樣，依賴外籍志願兵了。至於中國空軍中的外籍飛行員，——最著名的的是「第十四轟炸隊」——都因為同情中國而戰，同時他們在空中勇敢與有效的成績，是極為顯著的。但是這種制度有一個顯明的弱點，那就是無法將這些外籍的飛行員同樣地置於軍法管理之下。（在西班牙政府軍方面在先前也碰到過這種困難。）至於漢口當局在這一方面的轉機，却同瑪德里一樣，是由於蘇聯飛機的抵達。

這種新飛機的來到，並不僅在中國空軍裏加上了物質上的戰鬥力量，牠同時帶來了無數幹練的技術參謀人員，以及一部確由義勇而參加的蘇聯飛行士。那些蘇聯的駕駛員，跟着他們的飛機，同起同宿，所以在緊急的事件裏，他們常常可以立刻升空應戰。在中國能靠自力訓練第一線的飛行員之前，（目前中國在雲南已經設立了一個大規模的航空訓練學校。）改組後的空軍是至少可以防守幾個機要的城市。而由於一個戰略上顯著的改變後，中國空軍目前在日軍的陣地，是予以完全的利用了。並且中國的陸軍在戰爭的時期裏也第一次得到了他們自己的空軍的協助。

日本對漢口的空襲，幾乎是每天都有的。人們第一次聽得警報後，中國飛機便隨之升空，發出隆隆的機聲。但是這仍然是一種「攔攔後而逃開」的策略，因為中國飛機好久以來，都不敢同日本堅強的空軍相周旋的，但是在某一天忽然發生了一個突然的轉變。

「你顯不願跟我打賭。」這前一天的晚上，一個加拿大的女看護問我。我知道她在外籍飛行員裏是有幾個朋友的。

「怎樣打賭呢？」

「假使日本飛機明天又來，那麼我們至少可以打下十架。」雖然我並不堅信，我却很希望她的話能成爲事實。

下午，警報響了。當時我正向英國領事館走去。所以在這一個避難所的窗戶裏，我們可以作很遠處的眺望。當第二次警報發作時，中國飛機已經早已飛到了空中，正峭直地作着爬升。這一次他們並不逃跑了。三十餘架飛機，神速地繞着圓圈，逐漸沒入了雲端裏。

「轟炸機從那邊來了！」有人這樣說。我立刻看見十二架日本的重轟炸機，排着隊形，從東面飛來。牠們的高度，很是足夠。但是它們上面衛護的飛機，早已受得中國驅逐機的攻擊。日機這一次是失算了，牠們的機數比起中國的來，是三與二之比。

高射砲隊開始發射。爆炸聲是連續的。中國砲隊的射擊目標，不是很好，便是很壞。有一次發着灰烟的砲火，曾很危險地逼近那些飛行緩慢的敵機，但是因爲它們高度很够，所以並不閃避。至於那些戰鬥機，祇能看倒像幾個小黑點樣的東西在空間飛舞着。忽然一隻飛機的銀翼閃了一閃，便迅速地跌了下來，一團

黑煙在雲霄間直降而下……

那些轟炸機已經環繞在飛行場之上。我們等待着炸彈，可是地下的炮隊却不發射了。其後雖然飛機庫尚遠在幾哩之外，而炸彈却一起擲了下來，使我們的房屋，也受了震動。這一次來襲的飛行隊，顯然是不會料到這次戰鬥的，所以它們繼續着向東逃竄而去。「我想今天的空襲是完了吧。」那個灰髮的領事說：「我們吃午飯罷！」

當天晚上，我們得到一個報告。打賭的事是洪恩勝利了：這一次空戰裏，日機果真損失了十五架之多，一架是轟炸機。而華方僅犧牲三架驅逐機而已。這次以後，中國重新在這個部分得到了制空權。而以後數月內，日機襲漢，祇敢在夜間實行了。中國空軍自從這次漢口之戰後，按日擴展着他們的行動，最後竟至發動了一次勇敢而成功的「臺灣空襲」——在日本歷史上第一次領土所受到的轟炸。

不久以後，第十四轟炸隊即經解散。而中國也緩慢地在幾乎不可見的懸殊形勢之下，開始尋覓着自己的力量了。

我在離去漢口之前，便到第八路軍的辦公處裏作最後一次的訪問。這是我個人半年來與這些人物相處後私人的道別。這辦公處位於日本租界的中心，以前是日本祕密機關的大本營。我這一次最後見到

周恩來時，他正坐在一條日本辦的草蓆上。背後牆上有着一個美觀的日本畫。周恩來似乎睡眠非常不足，因為在漢口這些緊張的日子裏，他是忙於重大的交涉工作的，但是他的模樣仍舊似前一樣的和藹而謙恭。

他對於漢口「具體的政治進步」非常樂觀，並且覺得將來如果有什麼危機發生時（有幾個已經可以預料得到了）將不再會比像南京陷落後一樣地嚴重了。「南京是一個轉變的關鍵，」他告訴我：「也就是妥協的最後的機會。但是目前如果漢口失守，却不會有這種情形的。」不過有一件事使周恩來感到困擾的那就是遼東各民主國家的「含糊態度」。

「他們所怕的是你們的民衆，」我提醒他說：「那些英國人十年前始終不會忘記漢口。」但是周恩來堅持着說，他們黨裏的對外政策與國民黨的是不同的。「我們並不是機會主義者，我們深信中國在成功之前，必須與日本帝國主義作長期鬥爭的。在這個時期裏，我們從各個民主列強那裏得到每一種可能的援助，是一件重要的事。同時假如我們得到最後的勝利後，還是需要國外經濟與技術的援助，來復興戰後的新中國的。」

「許多不會解決的懸案，例如治外法權，及不平等條約等，那時候都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決。我們將繼續歡迎國外投資和企業。」

周恩來對於一切所謂共產黨正設法在國民政府壟斷政權，及希望在中國樹立蘇維埃制度的謠傳，統統都予以駁斥。「我們不但在戰時繼續「統一戰線」戰後仍當如此。共產黨對於中國政治及經濟上的見解，是傾向於一個民主國家的建立，此外便沒有其他企圖了。如果有任何威脅政治統一的情形發現，那麼不會是由共產黨所發動的。」

十年以前，共產黨在漢口曾有過公開的組織，而他們的蹤跡，阻止了外籍人士對那裏發生的興趣。但是現在——經過上海的經驗後，並不足以驚奇，——許多外籍人士却痛恨着日人，而歡迎那些共產黨了。外籍人士在中國的一種選擇，並不是由於他們思想的方法，而是由於——與中國進步的政府合作後他們可以得到中國的好感，並可以保持他們舊有的優勢。而同日本合作後，兩者勢必都會失去之故。

出了這個辦公處後，我便和我的衛兵告別，我自從離開延安後，在各處旅程裏，他是始終忠誠地跟着我的。這位姓王的衛兵是要回到他故鄉的山間去了，他背着一條新的皮帶，毛瑟鎗上拖一條紅綵的流蘇。他雖然生長在鄉間，而對於城裏的一切感到刺激，但是在回鄉時，他顯然是很快活的。「漢口很不錯，」他告訴我：「不過我們在山裏打日本人更好。」

我搖了搖他的手，祝他健康，同時我感覺到落不能再見到他時，是非常難受的。「你不想跟我一道到英國去嗎？」我問他，這是在開時，我們常談起的。

他像平時一樣笑了一笑，束起了他那條破舊的褲子說：『你真願意帶我去嗎？』

『當然囉！』

他抓了抓耳朵，把這件事從頭想起。最後，他搖了搖頭說：『我現在不能到英國去……』

『你怕暈船，是不是？』因為這位姓王的衛兵一生所看到的水，祇是揚子江，而海對他仍然是一個神祕的東西。

他用着他十七年來久經忍辱的尊嚴，振奮地說：『我並不怕，但是我現在要保衛華北而華北也需要着我們每一個人……』

五 香港瑣語

從幾朵散亂的浮雲中望去，是一片風色黯澹的海面。孤寂的浪濤毫無遮擋地衝向菲列賓羣島。雲層又掩閉羅來了，巨型的「琴克機」(Junker)很迅速地降落下去。坐在前面的一個座位上，是前任中國駐日大使，正坐立不安着，悠然地搔着他的耳鼓。他是一個怪有味兒的老紳士，穿的是重重的綢袍子，下巴上生着鬍子，很有些像是個著名的戲子。此次他從漢口南來，一路上，隆頭總安置着一本拍紙簿，無聊地描畫着中國的人物。

「快到了，」大使的祕書奉命把那些字紙收拾好了。這老紳士是寫得一手好字的。「我們就要到了。」

這時，雲淡了，那些雲遮掩着華南的山頂，總是半年不散的。羣山外，一叢暗黑的岩堆兀然地聳起着一個青蒼的肩背。這就是所謂「山頂」。飛機在晴明的陽光中飛過一個深藍的港口——這港口是深鎖在陸地和島上砲臺的羣山之間。塢頭那邊，點綴着幾十隻停泊着的船隻，林立着沙船的黃色的帆篷。

軍艦停泊處，有巡洋艦守着港口——這外邊，還有潛水艇的運輸船像一隻野鴨般的浮在水上，周圍更有同類的潛水艇在那裏。

平地上的九龍，好似兵營一樣地平平正正。外面的部份，有屬於「租借地」的青青的稻田，紅色的泥土和牧場。這裏是完全在山岩的暗影之下的光線與色彩的細巧工作。這就是香港——英國在東頭的根據地，中國海的直布羅陀海峽……

香港的特殊意義，以及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這個事實，（像英國，是往往如此看法的）從日本大舉進攻中國以來，便已增進了它的地位。英國在拳亂時期突然獲得了的這個在戰陸上頗為重要的海島根據地，隨着戰事的發生，已經成爲了日益複雜的形勢中的主要因素。香港的企業家，向來是甚至比上海的大班還要不顧到明天的問題的，如今也已受着真誠的刺激，而看透了他們目前的機會和未可逆料的將來了。目前固然是純然的獲利，然而未來就不堪設想了。

在近幾年來，當日本在遠東積極急進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忘掉英帝國主權在日本意氣洋洋的日子所能幹的是些什麼事。站在英國外交大臣祕書地位的巴爾茂斯登的發言，就跟哈利法克斯勳爵的發言不同；英國政治家在那慷慨以慨的十九世紀，就知道他們所需要的是什麼，而往往也就得到了什麼。許多人在英國取得香港的當時，就認爲香港是一種無名的戰爭中的無名的戰利品，現在顯已證明了它確是英國所會實行的最強硬的投資。爲了香港是華南貿易的門戶，且有着全中國海岸線上最優等的深水港，所以在不久之前，這一片不毛的山岩便形成了一個繁榮的殖民地，遠東最大的進口商埠。

在英國統治以來的將近一百年悠長而發旺的歷史中，香港僅受過兩次嚴重的威脅。第一次是在中國的大革命時代，當時廣州領導的海員大罷工會封鎖英國控制的海港，達幾個月之久，終於使這個繁忙的埠頭變成了一個沙漠似的地方。可是等到革命的浪濤消逝之後，香港又透了一口氣甦活過來了……第二次的挑戰，因為公開的機會較少，所以知道內幕的人也就不多。又揭開幕來了。——這也是廣州方面揭開的——因為中國政府在民國廿五年議決將在黃浦珠江上游闢一深水港。中英雙方的大員，在這一決議被宣佈的時候會歡晤於杯盤交錯之間。然而英國很知道，倘若這一決議一旦付之實施，那麼香港的存在根據也就完了。

到了第二年，香港是因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而得救了。可是它的得救，究竟能維持多少時日呢？

當我們經過九龍車站到達渡頭的時候，我就想到，這問題大約正是日本政府當局在這交戰期間常常自己思量着的問題吧。一行列一行列的帆布覆蓋的卡車，塞滿在鐵路支線上；帆布的外表就展示着它的內容。巨大的箱子正等待着裝運出去，其中有許多箱子上都標明是「農業用的機器」。幾百件自動車的車蓋環立在地面上，在相距不很遠的一家工廠內，兩班工人正在輪流交替着加工裝配車身。在煤業碼頭旁邊，有一架最近由中國政府在培爾法斯脫交海輪運來的巨大的水上起重機，剛把二十四個車頭卸

下了。

日本的大砲聲在藍海橋一響，香港便獲得了一種新的生命的契約。黃埔要塞早已死去，上海也被封鎖起來，而日本的巡洋艦却巡邏着中國海岸。但是香港依然是英國的，山頂上還架着大砲（雖然或者沒有像英國所盼望的那麼多。）日本不經宣戰的手續，總還不敢把外國船隻也實施封鎖。從一九三七年夏季以來，軍火、儀器以及各種軍需品，都是像潮水一樣地由香港而轉入中國的。用一句微微的諷刺筆法，那麼我應該指出：在最初的幾個月內，最大的貢獻便都是從日本的歐洲「同盟國」那方面來的。軍火商——尤其是在可以銷售存貨的機會到來時——是非常地富於「國際精神」的吧。

香港繁榮了。當日本的大轟炸有規則地破壞着上海的工業區的時候，英國的海港便成爲中國的唯一海港，因戰爭而獲得畸形的發展。由於歷史的偶然，香港是成爲軍需品的公開海峽了，因此，英屬的香港也就使中國人第一次覺得有用。帶着魯人的外形的山岩，向來在華南一帶被視爲外國統治勢力的象徵，現在却呈現着一種比較友善的外觀了。這樣說來，時間的車輪（以及國際戰爭市場）正帶着復仇而俱來了……

當然，這並不是說香港是在一夜之間就改變了它的性質的。英國援華的程度，依然是根據其貿易公

司的利益而與以嚴格的衡量的情操是情操，遼東商業政策是遼東商業政策，兩者是極少關係，你只要看一看英國資本是取得上海日本人同意的這件事，便可領悟個中的消息。香港當局最後所要干涉的是這個殖民地的華人政治活動的復活。在戰事發生的最初的幾個月間，香港海員工會（當還記得它從前所表現過的力量吧）曾竭力拒運日貨，後來香港政府便立刻毫不猶豫地宣佈海員工會是非法組織，因此而勒令解散。香港還有幾家工廠，曾發生過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在這裏，戰爭中一時繁榮和避難者源源而來的結果，房租已經增價，而食糧也同時飛漲了）竟被迅速鎮壓下去，這自然是印度警察所能幹得成功的事。香港還不會把一九二五年忘掉哩。

然而，在戰爭利潤與殖民地畸形繁榮的筵席之上，有一個幽魂確是令人煩惱的。這就是說：如果日本對香港要有舉動的話，怎麼辦呢？這個思慮，是連香港的夏令匹克式的「山頂寓公」的頭腦也不得不受刺激的一個思慮，雖則他們的頭腦是向不吸收外界的印象。這個思慮，顯已成為英國負責當局目中的夜魔之一種。因為事實極爲明白，香港是守不住的。這只有殖民地自己最能深切地認識。

那年春天，最後一分鐘的瘋狂的戰爭準備的端倪就已經顯現着了。新的大砲已經裝進了舊的砲臺了，義勇自衛軍也廣泛地增加了，而且精神上也已經號召着當地華人的「愛國」的同情心了。高射砲來了，新的潛水艇艦隊也來到了。燈火管制也仿做着「慕尼黑協定」前夜的精緻的先例，在夜間演習起來

了，一切的大演習也都實行了，在這種大演習之中，假想着「敵人」的兩隊陸戰隊，向島上「進攻」，終於被勝利地「擊退」了。一聯隊的印度兵駐紮在九龍，以防守這個租借地的邊境；而在香港本島，英國的常備軍也出現得多起來了。在各方面的外表上看來，這個遠東的直布羅多海峽不像是無設防的。

但是若說香港的實力能够抵抗日本的全線進攻，那是誰也不敢置信的。英國首相在他談及帝國的國防的一次演說中，也曾表示過差不多的意思。他說，遇到大規模戰爭爆發時，英國非「暫時」放棄「某些遠在國外的部份」不可。這句話，在香港並不會喚起多大熱情的衝動。很顯然的，新嘉坡沒有戰鬥艦隊，香港必失。再者，日本並不一定要藉海軍的封鎖方式或海軍陸戰隊的實力，去對香港作正式的進攻，這港口也還是能够使它陷成孤島而在數星期間使全島餓死。

這就是遠東的直布羅多海峽的形勢，這一個島上砲臺，不但已如直布羅多海峽本身一樣，在近幾年來很容易受到攻擊，而且是侵略者的更大的誘餌。富庶的華南貿易的這個進點，早已成爲敵對的帝國主義利害衝突的中心。香港能以自衛的唯一方式——與美國海軍的充分合作——自從英國政府採取了它自定的原則以來，或許已被壓根兒丟掉了。太陽或許永遠不能照射到英帝國，可是一個新的太陽却已經升臨到英國的某些部份了。那個太陽是敵對的，它的光線十分明朗地直射到香港的山頂……

香港——很早就成爲敗落將軍和失意政客의 避難所——已經收容了最優秀的和最惡劣的中國の 亡命客。而在這次戰爭的歲月，香港則已成爲避難富翁的最快樂的聖地。在這裏，上海的商人和銀行家常來住在豪華的旅館中，從軍靜息，同時他們正竭力想把他們損失了的財富彌補一下。至於當地的百萬家財的富人，安閒地不顧到什麼戰爭不戰爭，却儘在拚命打算怎樣構築更新而且更迷人的宮堡。看到這些盛裝的貴人踏進自動車，我便想念到跟我相別了的生長於華北的村野間的農民軍，他們只能從田野裏採摘些棉花（未經藥水製過的）來敷治他們的槍傷。他們是屬於另一個中國的……

這次戰爭，確也已經帶來了一些驚人的變化。有一天，我在香港遇見了上海的流氓巨擘——一個會擁有巨大財產的癡君子。這位下層社會的領袖竟也突變而爲愛國志士了：他的這種情形，正如別一些人的情形一樣，可以看出日本人對於「門戶開放」的一種極大的羞辱。他現在已號召他的整個組織從事於義勇軍運動，他自己則留在香港，指揮一切工作，同時，他部下的暗殺團（他們的行刺手段是值得讚佩的）也已變成了上海的最可敬畏的恐怖份子了。此外，許多可疑的信也同樣地在戰爭中挽救過來了。

在香港，甚至比在漢口還更強烈地使我實感到中國的未來是何等要求着統一戰線的強化和團結。在這無限複雜的社會中的一切不同的階級和成分，有一件事是共通的：他們的利益，無論直接或間接地，都受着日本的威脅。當我和一位在英國海關服務的生活舒適的中年華職員談話的時候，我發見了並不

是個個人都明白這一種威脅的存在。他同意地說，漢口和廣州是十分慘慘的，可是這哪裏有什麼辦法呢？好在中國兵太多，不會感到缺乏的。

「要是日本一旦進攻香港，怎麼辦呢？」我想探一探他的意見。他朗爽地笑了：「英國一定會保護我們的……」

其實，英國是不會保護的，法國和美國也不會這樣做。從一年來的戰爭中，中國人該是已經學習到了這個沉痛的教訓（西班牙的教訓）了；世界上只有一個外國政府，它抱着正式的責任感，在任何條件之下，人們都能信賴着獲得它的援助。

「我們知道我們不能從英國獲得多大的援助。」孫中山夫人在香港的一天早晨，帶着一點諷刺色彩而絕無悲哀氣氛地這樣告訴我。「同時也不能從美國或西歐任何民主國獲得多大的援助。中國或須單獨作戰到底，我們是不怕單獨作戰的。可是有一點，我們却必須要求於貴國的政府的——那就是說：請不要給我們的敵人以幫助。」

我望着海灣的遠處，從林立着的橋樑到獅子山的青峯。廣州就在那遠遠的一端。日本的敢死艦隊或許就在這一瞬間向廣州疾進了；用美國汽油駕駛美國製造的飛機疾進了；北面的一端，就是上海，那邊就

有英國銀行家和日本將軍並肩而坐，磋商所謂「合作」和「恢復原狀」的計劃哩。這兩個帝國，就是如此這般地在它們的末日到來以前促使其自身的毀滅了。

如今，中國最偉大的愛國志士的未亡人，溫靜而又敏感的，靈光明徹的婦女領袖，正好像全中國的一切死者的未亡人似的說着：「我們是強大的，只要我們能找到我們真實的力量。如今，中國是團結而統一了，終於成爲一個國家了。這是中山先生所希望着的，也就是他一生奮身的目標。」

「最後結果，我們是一定勝利的，我們將要在忍苦受難之中獲得我們的勝利……」

尾聲：盲目的侵略家

一 第二年的春天

當我搭着開往美洲去的運貨船重返華北的時候，船到大連，正是櫻花盛開的時節。我正要離開中國了，命運註定這應該是一次平穩的離別，從此可以避開這一塊被戰爭所蹂躪的上海區域了。在和我的若干同伴相處之後，智慧勸告我：不要再涉足於日本的國土了；我除了對日本海岸線投視一瞥以加速度過船上行程而外，更無別的期待了。

然而，命運却註定要使我踏上大連了。我之所以會重遊華北與日本，以及我之所以會重新踏上將近一年前在中國所知道的最後和平的春天所經歷了的征塵，就得感謝「皇軍」的行動。因為這種人工製造的北方海港的狹塢，正擠塞着軍事運輸艦，並有船隻二十艘光景還拋錨在那邊。至少一星期，我們才能够弄碼頭去，——船主惡聲地這樣說着，再隔一個星期，那才可以幹完上貨卸貨的事。他說我們不妨上岸去住旅館。『鸚鵡館』（Petroquet）的女孩子都還漂亮呢……

在大連，這正是櫻花時節，燈彩閃爍於半英里之長的沙灘上，那些鄉愁濃重的日本軍官，逢着春宵，便來到這裏樹枝之下，喝酒，欣賞藝妓的舞蹈。四月，可說是戰爭時期中最殘酷的月份。我正在想：這些穿着灰色軍裝的青年軍人，今宵雖則是舒舒服服地躺在涼快的草場上，但在明年春天到來以前，正不知有多

少個已將長眠地下了啊。我一邊觀望着他們，一邊便憶起了德國詩中如下的敘行：

一株小樹在森林的何處發青，

有誰知情。

一叢玫瑰在那一個花園裏怒放，

有誰說明？

但是精神呀！做想，

你已經是不落空了！

花樹在你的墳頭萌芽，生根！

我不僅想念到這些青年軍人的死亡；並且忽念到這種戰爭對於他們中的其餘的人和對於不幸的後死者將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在日本人的愛好花卉和愛好屠殺之間，存在着極大的矛盾，所以一些僅以旅行家的態度去觀光日本的人，他們總是賞識日本人的愛好花卉，簡直是不相信日本人却也是愛好屠殺的。如果把這些年青的新兵，剛從家庭中出來的，還帶着一副被太陽曬黑了的農民面孔，竟被遣派到另一個國家去奉命進行一個「納粹」挺進隊所不敢進行的工作，如果把這樣的情形提離他們，似乎也不會高興的吧。

關於這一點，以及關於戰時恐怖主義的其他事情，我後來會和南滿鐵路的某名人互相討論過。（如今我既已登岸，與其避免與官方人員接觸，倒不如設法跟他們周旋一下；一切參觀僑滿的新聞記者是必須呈報南滿鐵路當局的。）這位名人，原是一個美國青年，他父親曾在日本政府機關中幹過許多年的工作，他自己則娶了日本妻子，並且十分透澈地吸收了日本人的觀點。禮見這樣一個能够公然談論一樁拂逆民意的事件的外國人，那是很有味兒的，他拚命地使我相信——我也完全誠懇地相信——我自己關於日本的觀念，是全盤錯誤的。

一天晚上，我們和一個日本警官一同吃飯——這在國族主義的國內，並不是一種非凡的佈置，因為如果討論什麼引起爭執的問題時，雙方便都可以獲得庇護者了。我們之間，談到了「中國事件」那時的自由態度真够使我覺得驚異。

我在這裏聽到日軍佔領南京後所施的暴行——這種暴行消息在遼東已經流傳得很廣泛——的一種解釋：據說最先開進中國首都的日軍，是第三等和第四等後備隊，而他們這些中午人在「姦誘婦女」方面，似乎比青年們更放縱。（如果這個解釋不謬，那麼這一定也是對日本家裏生活的一個異樣的詮釋了。）但是日本軍事當局在中國的主要罪狀，決不是伴隨着侵略而發生的紊亂行爲，而是今日已經許多目擊了的，按照着日方預定步驟的，大屠殺和虐待平民的恐怖行爲。這一點，決不是用任何辯護方法所

能解釋的。

『中國人的行爲，』據人家告訴我，『比這種情形還更惡劣得多哩……』接着是關於虐待日本婦女，磨難日本兵士，以及其他類似的詳情細節。『不管別人對我們的軍隊加以什麼惡罵，我們只知道日本兵決不幹那樣的勾當。』

這裏有一種普遍的風傳。我想，關於暴行的事，人總是相信他親自擊的或者證據十分確鑿的事。任何交戰國，雙方都會宣傳着對方的恐怖故事，但是善舉也好，暴行也好，日本人總是比中國具有着更多的機會。而在各自爲戰的復仇行爲（「通州大屠殺」就是其中證據比較確實的一例，）和一個恐怖主義和屠殺民衆的預定政策之間，顯然具有着清楚的區別。這區別是在於一則由於氣憤而殺人，一則是由於蓄意殺人。我曾經聽到人家說中國長官對「通州事件」的所表示的痛悼，並目親過中國當局優待俘虜的政策。日本對於他們在南京的暴行，絲毫不曾表示遺憾，對於已佔領的城市中，數千中國平民所遭的屠殺，（如果是一個紀律嚴明的）日本軍官是應負全部責任的。

我們在許多方面雖則不能同意，然而這次戰爭仍然是非常有用的。當我探出了我要啓程赴北平的觸角時，居然得到了南滿鐵路當局的熱烈贊助——這當然是使我極爲驚奇的事。『我們可以送你一張免費乘車證，』那位宣傳員對我這麼說。『你可有什麼線把它繫在那裏嗎？』他聳聳肩。『我們是只把這

種免費證發給一些可靠的外國記者的。我們的唯一要求，就是請你把你所見所聞的一切真情，描寫出來啊。」很顯然的，他是正希望着日本在北京所幹的毒，能使我獲得一個好印象。

這正是我所夢想不到的一個好機會。我的准許旅行「滿洲國」的護照上的簽名證，將由它自動地當心着了，我就能搭着火車經高麗而達日本，而在橫濱再去搭我那艘輪船，新聞事業的倫理學，大約非犧牲一部分不可。我知道日本是希望我這次寫一篇很好聽的旅行報告。可是專門的倫理學或許比真話更易受犧牲吧。

「多謝您，」我十分真摯地說。「我這次能有機會旅行，我是很高興的……。」

這樣的，我就非常舒適地——自然還覺得有些罪愆——搭坐在瀋陽特別快車的頭等車廂中了。同車中，有一個正在到新京去的意大利法西斯代表保羅西侯爵和他的朋友們怪可憐地無心正式向日人告別了，因為他們的眼皮，由於睡眠不足的原因，顯然已在下垂。在同一個月臺的較高處，一隊白俄的衛兵正在那一個日本軍官那裏聽訓。他們穿著國際干涉主義者精緻的軍服，長長的頭髮，稻草一澆地露出在他們的軍帽下面，看起來好像是漫畫中的蘇維埃內戰時期的反革命派。我猜想他們似乎並不對他們目前的境况感覺到趣味；但他們或許對這事是沒有他們選擇的可能。然而他們在替日軍作戰方面，向來就

勝於偽滿的軍隊。

我總覺得我是一個在敵人的國家旅行的人，坐在我身旁座位上的那個日本軍官把他的手槍解卸下來，掛在一個角落裏；我記得，當我們在查驗一些戰利品的時候，我會經和第八路軍中的一個青年指揮官一同驗看過同類的自動手槍。這手槍的工作成績是不很好的，我們認為它還不及一枝毛瑟槍那樣靈巧。如今我覺得很想對這一位新旅伴，說我對於這一枝槍的感想。

開往瀋陽去的鐵路線，在在都發生着軍事行動。關東軍是負責維持地方秩序的駐屯軍，並且繼續地執行着他們的職守。但是從許多情形上看來，知道他們並不祇在進行「剿匪」的日常工作，鐵路線上的全部橋樑都是複式的，電桿木正在重新裝置，新的鐵道線也正在不斷地開闢。這一切鐵道都直抵蘇聯邊境。在一個戰爭尚在進行的中途，日本却早已在準備着另一個戰爭了……

但這一切決不是平平穩穩地就達得到的。我在這次旅行時，小心翼翼地不想對任何人提起中國事情來，因為外國人在「滿洲國」中，是非常地惹人注目的。但我在瀋陽的當兒，發見行李袋附近有一處清靜的地點，在那裏還發見了一個善於交際的挑夫。我問他最近有幾天內可曾聽到了些中國消息，戰局又如何進行着……我爲了要使我所要表達的用意更清楚些起見，曾用了一句很不客氣批評日軍的話。他原是一個肩膀很闊，面容沉毅的高個子，等到我一提出問話時，他的全部表情都轉變了；驚異和疑

懼交戰起來了。是的，他小心地回答着，他聽到日軍會在山東吃了一次大敗仗。「可就是台兒莊嗎？」我這樣地問。

「台兒莊……」他親熱地用喉音慢吞吞地傳出這一個小鎮的鎮名，這小鎮對於中國人，正像瓜拉拉耶拉，台維埃，愛勃羅河對於西班牙人民一樣地親切，接着他便拋開了疑慮，很迅捷地交談起來。是的，他的確會聽到過這次捷報的，這固然不是說報紙上看來的——「那些」報紙總是登載着日本如何的勝利消息。他自己原是一個「山東人」，他近年來所聽到的最好的消息之一，便是韓復榘的槍斃。山東原是一個極好的作戰區域，同時，「山東人」也都是優秀的戰士——如果一旦被武器起來了的時候。

「那麼，這裏怎樣呢？」我很想探知一點消息。他却搖頭起來；本地的情形實在太糟糕，這裏的中國人都在吃苦頭。突然的，他的臉色像一個孩子般的慌急起來。上星期飛機場肇事發生大火的事，可知道了嗎？「是說瀋陽的飛機場嗎？」當我在大適的時候，我會聽到過一些模糊消息，說是最近會鎮壓了一次軍隊的譁變，並發生了瀋陽大火，當場焚燬飛機四十餘架，肇事原因，似乎還是一個謎。

這位東北的挑夫，在向着這空寂無人的月臺上上下下地東張西望了一番之後，才輕輕地對我說：「也是我們的……」

二 北京在影陰中

在長城和大海相會之處的山海關，我第一次接觸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京偽組織的幾個傀儡正搭上了列車，向中國的古都去作勝利的旅行了。他們躲匿在那日本憲兵加強保護着的一節私人車廂裏面。

我開始稍稍地感到不安了；如果我的朋友游擊隊員是在這一些地段活躍着的話，那或許就算不得是一輛最平安的火車了吧，因為我們向北京的進發，在每個大車站那邊，處處都鋪設着充分的鐵道支線。只要一聽到無情的喇叭聲，我們便以最高的速度把列車開到支線上面去，通過那兩旁（非武裝的）由中國警察站立着的月臺。這些警察背後，常常排列着一行列一列的學童，各人都手執着一面紙旗。——現在已成爲華北行政機構的標誌了！——滿洲國的五色旗，列車只在很短促的時間內停了一下；列車駛經某些車站的時候，便特意把車子駛得緩慢一些，以便使那穿着一身綢袍的新貴，能從容不迫地站到車窗口，去展現他那可尊敬的鬚子。接着，他又突然像鴨子似的縮進車廂，以取得他的安全，而在那些倦容滿面的孩子們演出他們搖旗吶喊表示歡迎的一幕之前，列車又加快了速度駛過去了。

民衆大會是奉命舉行的，所以要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製造出民衆的熱情，就困難得很。偽政府的大員

絕對不出現於大庭廣衆之間，雖說這是可以諒解的事，但終究不能勾引起他們受到民衆歡迎的幻想。這些儀式所給與人們的普遍印象，便是一個可悲的印象；到會者之間，除了些喇叭手或許還能高興一下以外，根本是沒有人了。本來，大多數中國人在發出喇叭聲時，是會聽得很高興的。但我們至少能有把握地準時到達北京了。倘那輛列車是在太陽落山後到達，那就真的很危險了。

每一次返回北京的時候，我對這風塵迷濛的古都的持久長新的美景，總是喚起一陣驚異，而對於它近幾年來所遭受的惡劣命運，總懷着一股新鮮的同情的悲感。可是從去年夏天起，北京却已經大大地改變了。我上次離開北京時，我深感到它是迅速地陷為一落千丈的古都了。這個古都，甚至似乎在等候着征服者的到來了。當我回來時，我却見到它是一個像從前一樣的多智而機密的都市了；它已經不是一個無望的城市了。就是在這乾燥和幻滅氣氛中，愛國的熱情重又萌生起來。而在這些春天裏，北京人的舌尖上，便出現了「游擊隊……」這三個字，這好像私語一般地傳遍了市井之間，而且從街市的角落裏的叫化子口中極端平淡地滑流出來了。

中國軍在第一次潰退後，又重新回來了，現在，已聚集在西山，在熱河的山地中，和沿着通到天津去的公路四周了。當日軍在那年四月中台兒莊大敗後增援山東時，北京城祇有三百個日本駐軍吧了。只要中國軍隊願意要收服它的話，這幾乎是一定能够收服的。可是他們不能長久地據守，而且這些環圍在城牆

四週的流動部隊的威脅，或許比任何直接的襲擊還更大。他們使北京——並且還不止是日軍——一直保持持久的膠着狀態中。

「我所擔心的，」一個外國大使告訴我，「是中國軍隊在克服這城市之後對我們所要幹的事。據一切已發生的事，他們沒有愛護『我們』的必要。」他繼續地下了結論。「你要知道，杉山將軍在台兒莊戰役之後，打從這裏經過，並巡察了整個前線。他決定地說後方的形勢——冀察兩省流動部隊和游擊隊的動員——是非常地危險，所以他們非等到完全徹底肅清他們，日軍怎麼也不能挺進了。他回國後，便向東京作了詳細的報告。

「兵士們的熱血確是高漲極了：他們要爲台兒莊復仇。接着是崎山退出了內關，而坂垣就代替了他的職位。日軍開始向徐州和漢口進攻了。這時，日軍在整個華北，突被減少至最低限度，於是他們的統治區域也就逐漸縮小了。這顯然是游擊隊重建並且強化他們的根據地——雖然還談不到反攻——的一個偉大的機會。在冬天之前，我們還不會有清剿他們的時機呢。」

他的報告得到了充分的證實。在北京我遇見一個正從大半由華人統治着的華北區域——首都設於阜平的「冀察邊區」——旅行回來的美國新聞記者。他形容着一個河北民衆所歡迎的，並被公認爲最好的中國「人民陣線」政府——這一政府正在發展它的幹部，把第八路軍的部隊擴大爲一支足

以發揮實力的流動部隊，正在大規模地組織自衛軍，開設他們自己的工廠和兵工廠，交通、報紙、醫院和農村合作社。隨着日軍第一次侵略，和華方正規軍潰敗，華北人民却恢復了他們的毅力和精神。現在，他們正準備着一種新的抵抗——一種以民衆動員爲基礎，並有着舊日的省防軍所從來沒有的力量和伸縮自如的抵抗。日本倘存心想征服整個華北，那就很可能證明這是一件比他們曾經在一九三七年夏天所遭遇到事態還更可怕的工作。

這是在抗戰一年後的華北情形，這鄉間是武裝了而且堅決的，在這裏，侵略者僅據守着極少數的重要城市，至於它能否控制那作爲這些城市間的聯絡線的鐵路，仍然是一個疑問。日軍在他們初期勝利後所作的首先的工作之一，是構築從北平到熱河的一條新鐵路，這麼一來，這鐵路倘遇到有從東北調遣援軍的必要時，那就很有用處。這條新的鐵路線正是在我到達此地的時候正式通車的。（那時，北京新聞界特別注意的關於通車方面的事，就是：有兩位搭坐第一次列車的外國新聞記者，是因「間諜」罪而遭受了熱河日本指揮官的拘禁，這中間，一位是以親日聞名的英國作家，一位是意大利法西斯份子。）可是這條新鐵路早已被華軍所切斷了；而在其後的幾個月中間，要使它照常通車，差不多成爲了不可能的事。不久以前，甚至連那條通到瀋陽來的幹線——我會在那裏旅行過的——也被嚴重地切斷了。

這一切的中心，就是北京——臨時政府的首都——這首都的權力僅能到達城牆以外極少的哩數。

吧了。首都的本身，是相當平靜的；這裏沒有恐怖的存在，因為日軍認為祇在遭遇着頑強抵抗的地方，才有採用強硬對策以維持『和平』的必要。然而在維新政府以及它的手段方面，却裝着一副故示鎮靜的態度，維新政府並不疑慮到倘使此後一旦得不到日軍的槍刺保護時將會有怎樣的下場。

對於傀儡政權的偽員，誰都表示着深刻的蔑視，他們甚至感覺到如果日本人真的卸下了『華人自治』的面具，事情倒反而簡單得多，因為祇有對於日軍方面，倒在懷恨之餘還表示着某種程度的惡意的尊敬。牽出這些舊時代的卑劣的殘餘份子，來替新政權撐持尊嚴而淵博的場面，其實呢，他們的尊嚴和淵博中已宣告破產，因而反使這個『政府』成了人們的笑話資料。從政治上說來，他們簡直比不足重視的人們還要糟糕；因為他們大多數是跟安福系軍閥勾結着的，而華北的人民也並未忘記北京曾經存在過的最腐化的政府。

日本人所御用的華人的品格的卑劣，儘可以作為日本人在中國的政治和外交失敗的觸目的明證了，在最初的數月間，當北京維新政權開始成立時，日本人忙於奔走，企圖覓得一些好傢伙。他們在華北，首先要找吳佩孚，因為他曾經作過堅強的北方聯軍的主腦，又曾作過英國保護下的人物，而且是一個退休了的軍人，毫無疑問地是一個具有真實才幹和人格的軍人。這次戰事爆發之初，吳將軍正是安靜地作着北平寓公，似乎並不含有避免戰端的企圖。可是對於這次日本人所領導的序曲，吳將軍的答覆是很有意

恩的：

「告訴日本人吧，」他說：「在兩個條件之下，我十分願意擔任你所提議的這個政府的主腦。第一個條件是一切日本軍隊退出中國領土。第二個條件是叫蔣委員長來認可這一次的任命。」

在不多的年頭以前，蔣介石是吳佩孚的死對頭。在南京政府取得最後勝利之前，他們會作過許多次的戰役。然而現在，他被迫地從蘇、浙、皖三省的根據地向揚子江上游撤退，雖說如此，但甚至在一個曾被他一手擊敗的反動的北方軍人看來，蔣介石也還是一個統一了的中國的領袖。中國舊式軍人不為高官厚祿和甘言蜜語所誘惑的這種現象（這是日本人在上海、廣州以及華北各地早已遇到了的事實）或許可說是日本人在異樣的新中國裏面最爲意想不到的了。

真正不過幾天的光陰，就足夠使我看到我所要在北京一看的全部事物了。毫無疑問的——在這裏，一切的條件或許較別處更遠於組織「自治政府」。在這裏，日本軍事的行動也大大地顯得穩和得多，在這裏，民族意識是早已降到最低潮了——侵略者顯然已經失敗於用某種政治運動或獨立制度的方式去創造任何足以使人信從的東西了。在這裏，聯隊組織是存在的，若干種的表面組織也是存在的。華北「經濟建設」和「墾荒」的動人的方案，也已經被擬定了，然而日本要付諸實現，現在還不是時候，一則缺乏資本，以便應用，再則各處農村，亦非日方統治勢力所能及到。歸根結蒂，所謂中國的「維新」政府，至

今是並無希望可說。

同時，北京是活著在敵國統治的暗影之下，就像從前許多年間一樣沒有變更。它自己的時機尙未到來。街頭苦力和人力車夫的全無表情的面部上，既沒有高昂情緒的表現，也沒有辜負了他們從山圍武裝農民那裏學習得來的新的決心。可是希望還是有希望的，跟蘆溝橋事變時期的舊式的虛偽的自信心完全不同的新銳的自信心，也是有的。他們反抗的日子是一定會到來的。

當我勾留在北京的最後一夜，我跟一位友人在一起聽短波無線電。（中國廣播電臺全是短波的，因此，現在凡是在日軍統治區域裏置有無線電的人，都可說是犯法的。）我們曾經竭力想衝破當地的干涉而接受中國內地的報告。然而後來，我們終於聽到了一個華人的聲音，聲音低而促。「喂，喂！」這樣地說着，隨後便聽到了一種幾乎含有絕望意味的聲調：「我聽不清你的話啊！喂，喂，……」

最後，答覆是有了，因為報告者的語音是大聲起來了。「喂，現在，我聽得清你的話了！你回來好了，什麼都明白了，你回來好了……」

這是一座正在對着一架失事的中國飛機交談中的地下電臺。霎時間，在後方進行着的戰爭的壯劇是揭幕了。我的友人隔着無線電機注視我，她的眼框內正充滿着跟那報告者的語音中所含有的一樣情思。

「這裏最糟糕的事往往是——我們隔經了戰爭，而戰爭只在我們之外進行。如今，我們又接觸起來了。北平在我們的軍隊克服之前，或將變成一個廢墟吧，然而無論如何總會是中國的……」

她的話聲，在大約西山外邊的一帶地方的雜亂的槍聲中消失了。

二 帝國的建築師

抗戰一年來的日軍的「大陸政策」達到了什麼樣的程度？關於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在這次中國抗戰運動的嚴重關頭，經滿洲、朝鮮而至日本的旅途中，獲得了很多的資料。因為各種事實都是以驚人的明顯姿態出現了的。

滿洲——這是一九三一年開始向大陸真實侵略的最初的收穫——是日本關東軍的根據地，該軍在平時約有十五萬兵力。這支向華北侵略的急先鋒，是作戰經驗最豐富的，配備最完美的，和參謀人員最優秀的，唯天皇之命是從的軍隊。迄一九三七年為止，關東軍一貫地保持着他自己的半獨立政策，簡言之，這一政策便是日本對於華北及內蒙的軍權之強化，以作將來實行對蘇聯作戰的準備。

一九三七年戰事的第一階段，全由於關東軍參謀部的好戰而起，同時他們最精良的數師團便也參加在內，包括着首先攻佔河北岸的坂垣和土肥原兩師團的「飛行縱隊」。除了這些被調遣的流動部隊以外，關東軍的主力仍留守在偽滿，以被召入伍的最優秀的青年兵來增援。爲了對付華中的繁重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台兒莊戰役爲止），日本主要地就是運用了第二線的後備軍。在那時，日本所能動員的最精銳的進攻兵力，大約三十萬軍隊，便集中在偽滿邊境。

一般的軍略是非常明顯的。他們總希望有一次進攻華中的大勝仗，以便迅速解決中國抗戰（並使日軍戰鬥力的損失減少到最低數目）然後利用其總動員，發動戰事生產的全部工業，日本或將對西伯利亞和濱海省施行好吹噓的「閃電般的襲擊」。這還是遠在一九三八年度的許多明顯的軍事觀察家的意見。一般人都認那一年的春天，正是發動這一猛烈的新軍事行動的適當時機。

日本軍事領袖，要在這次大規模的戰事中間，再來一次像進攻蘇聯那樣重大的工作，這似乎是難能使人相信的吧。可是忘不了的是：日本不能及早地認識它早已失去了在佔領南京後可能迅速解決中國抗戰的機會了，而這既失的機會實在也無法追尋了。中國軍隊在南京的抵抗，使日人非常心折，因此，他們認為在徐州、鄭州或漢口，都不免受到類似的挫折。此外，日本軍界一致深信：蘇聯的陞陞不安的政局，以及由此而生的紅軍中「肅清」事件，都已經把蘇聯的作戰力大大地削弱了。

接着，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蘇聯被捲進遠東戰爭的可能，似乎是不小。日軍之所以增加實力於當時的偽滿，原因即在這裏，此外別無其他解釋。可是，那年春天實際發生的事，却跟我們心頭所猜測的事完全不一樣。

一般地說來，中國抗戰的第一階段——迄南京失陷為止——顯然是日方有利的。可是中國人，在南

京敗退後，兵力集合得非常壯大，在四個月內，即已佔得了在各個主要戰線上大舉反攻的地位。同時，台兒莊戰役——這是日軍全部歷史上曾受到最嚴重慘敗的一役——展開了戰局中的一個全新的階段。日方兩個最精銳的師團的全數殲滅，和直接由此而發生的廣大戰線上的大退却，終於驚醒了日軍的迷夢，他們萬萬不能操「速戰速決」的勝算。更衆多的軍隊，更精良的軍隊，非增至華中的前線不可；然而他們却只能從華北調軍南來。他們當時所提出的「爲台兒莊報仇」和大舉進攻華中的決議——顯然是違背陸軍省的勸說的——表示着日方不得不第一次去抽調它將來對蘇作戰時需用的後備軍了。這同時又表示着日本對西伯利亞的任何進攻行動，也非放棄不可，至少在中國戰事持續着的時候非放棄不可。

這是當我在四月間旅行過偽滿的時期的情勢。幾個師團是開往南方去了，第一線的軍隊也從北方邊境調回去參加對徐州的大進攻。關東軍對於這種情勢的變化所引起的感覺，我們是不難想像得出的。這樣削弱了華北駐軍的力量，在政策路線上是完全不同了，同時，全部軍隊都已陷入了代價必然很貴而戰事却或許未必能就此結束的華中的泥潭中去了。華北的征服工作，還只完成了一半，而日本却又準備以全力來侵入華中（甚至華南）各省了。實際上，大陸政策，如今是陷於一種紛亂的狀態了；其實，連華北是否能不蹈潰敗的運命，也是很成問題的。

華北的重大問題——即中國西北諸省與蘇聯的直接陸路交通問題——仍然未曾加以解決，在這裏，關東軍想從綏遠西進而切斷「紅色西北」的美夢，如今似乎也已破滅了吧。

在戰事爆發的最初數月內，當日軍在華北的直接目標被解釋的時候，綏遠和內蒙方面的日方軍事活動，是不很爲人聽聞的。這裏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日軍最初沿平綏綫相率西進時，會到達過此後從未到達過的最西部。在其後的兩次進攻時期——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和一九三八年的初春——日軍也會繼續進攻過，但規模並不是大的。當第二次進攻時，他們也曾渡黃河而入陝北，可是那一次終於不久就被華軍擊退了。

日軍爲什麼不進逼這個戰略上極關重要的區域呢？當然的，一個回答是日本軍力不是以應付這件工作。這有一個回答是外蒙人民共和國的牽制作用，這一點，是關東軍特別重視的。每一次，達到日軍威脅西北地帶時，外蒙便也發生事端了。一九三七年的那個秋天，外蒙騎兵和機械化部隊就現身出現於綏遠邊境。大約是因爲暗示尙嫌不够吧，所以當日軍進攻包頭（現在尙在華軍手）時，外蒙軍隊便進駐到百靈廟一帶；於是，日軍便也很迅捷地後退了。

外蒙是一個蘇維埃共和國，可並不是全聯那的整個領土中的一部份，它是現世界上最不爲人們所知道，所訪及的國家之一。不過，庫倫和莫斯科之間的軍事關係，却是大家充分明瞭的，至少日本對於這個

人口稀疏的邊區國家的軍火來源也是很清楚的。庫倫有配備着蘇聯所製造的飛機的新式的和訓練完美的空軍實力；這一這批空軍也加入對日作戰，（這單獨作戰是可能的，而不致使蘇聯也捲入戰爭的漩渦）那麼日軍更將遭遇着華北的新軍力；這簡直是對於日本無可異議的制空權上面的一種嚴重的挑戰。

從這些形勢上加以考察，我們便很可以指出日本對華的總侵略所暴露了的日本帝國的總機樞的嚴重危機。日本雖然在表面計劃上表示它很有可能去強化華北，封鎖西北，而逐漸地克服揚子江流域一帶以及華南，但這些初步目標中的任何一點，至今都還未能實現。恰恰相反的，日本倒是着手在做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了——企圖在那真實力量從來不會被它正確估計過而這力量現在還只開始發出一個敵國身上給以致命的打擊。

把遠東戰事視為孤立的這種想頭，是危險而且誤謬的，而在今日看起來，尤其是如此，因為在中國實行最後決戰以前，這次衝突勢已擴大了戰爭範圍了。可是我們也少不得下一個結論：憑着地勢的優越，資源的富裕，以及四萬萬人民的新的統一和新的精神，中國是萬萬不可能被日本征服的。如果這次戰爭是中日雙方都單獨作戰的話，那就不難預測這戰爭的最後一幕。然而，情形是並不如此簡單的。

某些列強正在以任何代價阻止這或將形成的結果——即日本的總崩潰——為遠東方面的主要

任務。某些列強，則早已伸展它的影響，以限制外國對華的援助；而在別一些環境之下，那種影響便很有變成實際幫助日本的可能。中國決不致於成爲阿比西尼亞第二，可是使中國陷入捷克同一運命的企圖，却就很有出現的可能了。

然而那種企圖是終於要失敗的。因爲中國早已在戰鬥中，而且中國人民也很理解着他們戰鬥的目的。中國的負責政府，如今決不會接受任何妥協的解決方式。像今天的中國人似的全民族武裝了的時候，他們即使每戰必敗，但最後的勝利還是有把握的。

四 東京的五一節

最初我簡直不相信這是真實的重逢。我看到了同一件禮服的服裝，看到了同一副慈祥的近視眼……哦，他確然是我的老友「護照」的簽發員，他的神色，比以前更陰鬱而且更漫不在意的樣子。我告訴他說：我們上一次是在前年見面的。

「那麼你可是一向住在中國嗎？」他用着溫順的好奇心問我。我告訴他說是住在香港，覺得這回答是比較安全得多。「真的嗎？」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開始用固有的謹慎態度，絮絮滔滔地談起了關於簽發我的護照的事。甚至當我問及他對於這次戰爭的感想時，他也不願談起。「現在正是日本的艱苦時期，我們必須忍受鉅大的犧牲，這便是他的最後的一點批評。」

「日本的現狀如何呢？」這句問話的意思，他或許是誤解了；自然，他是直白的真誠，絲毫沒有虛偽存在其間。「啊！現在，日本可真美觀啊！可是太糟糕了，——你又要錯過看櫻花的機會了……」他小心地記下了我娘家的姓氏，並指示了我以直通火車站那邊去的道路。

在去年四月間，當我循着曲線形的鐵道沿內海旅行的時候，日本的風景真是美麗啊，說到內海，那是

全世界最賞心的鐵道旅行之一。山脚下，是一片驟然地開過了黃花，紅花，和藍花的樹叢；空氣中充滿了春天的氣息。青色的橘子閃耀在暗色的蘋果中間；在小心經營着的田野中，菜蔬差不多像軍隊的行列一樣，準備裝運到市場上去了。這是和平時期的田野，不是戰爭時期的田野。

風景誠然是美麗的，然而却引起了我內心的反感。因為我在這些恬靜的山間，却看出了另一種田野——本年將全無收成的兵災下的田野，荒蕪的村莊上的化為焦土了的棟柱，死屍堆滿兩岸的城市。這決不是一種娛目的景象，即使這是出之於日本藝術家之手的作品，而他們之中也有不少就是引以自傲的藝術家。

如果這些豐衣足食的搭客，從車窗中窺探出去，不是看和平的城市，而是看荒落得不見人影而只見奇形怪狀的肥犬（在這些日子，中國只有狗是食肥的）的鄉野，同時，三千萬農民正因着避「友軍」而西移，那時候，我不知道搭客們是否還能靜坐在這裏而無動於中嗎？我很想把這幅圖畫——這次戰爭的真實圖畫——帶到這擁擠不堪的車廂中來……

但是我從車廂中拿起一些圖畫雜誌來看的時候，我才知道日本人所見到的只是別一種圖畫而已。這裏的五彩照片，是蘇州和杭州的風景，是日軍在湖上遊樂，是日軍分糖果給兒童們，是中國農民搖太陽旗歡迎「皇軍」。這是一種欺騙，正像三島的和平與繁榮的空氣一樣是一種欺騙。然而瞭解這一種實情

的日本人，究竟能有幾人呢？

我到達東京的日子，正是天皇誕辰。這個節日是舉行了閱兵禮，並且約莫有一百架光景的轟炸機升空飛行。（在同一日，五十架戰鬥機轟炸漢口，這可說是慶祝天皇的另一種方式）東京的市街，遍地是海陸軍旗。我很想追尋出前午我到達這裏時我所知道了的氛圍，那時候七月的戰爭熱狂，正席捲着日本全國。但奇怪的是，街頭並無人來圍看在這裏行軍而過的部隊，甚至孩子們也不會睜起眼睛來望望空中的黑沉沉的飛機隊。在風暴之下的東京，只帶着一種暗澹的或沉澹的冷淡在經營着它的商務。東京正竭力地在把戰爭拋忘，也不希望有什麼轟炸機來喚起戰爭的印象。

我又發現着連一切的報紙都在盡可能地把在華的戰事不予發表；市民也不很關心着戰事，並且一時也沒有什麼勝利消息可以報告出來。於是我突然明瞭了日本宣傳工作上的一種困難，這種困難，是那些竭力把一種大規模的戰爭當作一種純粹「喜變」去從事宣傳的任何政府都不得不遭受的。就名義上說，日本並不是開戰，所以那一些正常的口號，例如「祖國危急了」或「搶救垂危的帝國」這一類的口號，都不適用。恰恰相反，這裏發生的是持續了很久的一個龐煩的「中國事件」；而日本只在設法和中國人民親善，並且在一兩個月以內，即可解決一切……這種宣傳，就是日本人民所受的宣傳，仍然有很多

日本人爲了聊以自慰的原故，也就寧願信以爲眞了。

這種幻想，竟一直保持到台兒莊戰役爲止。可是現在，戰事的挫折才眞的開始顯露了，而那種挫折是日本所不能承認的。許多的手段，用以隱掩事實的真相。我發見着許多在中國戰死的兵士家族，不准洩露戰死的消息，甚至連通知親友也被禁止的。受了重傷的兵士們，就被運往臺灣，偽滿或高麗，却難得有運回日本的。但是這次戰爭是仍在進行中；更多更多的兵士需要補充，同時，更多更多的戰死者不得不相繼宣佈。一種向羣衆欺騙的事，是無法保持到數年之久的，而日本政府的處境，也逐漸困苦起來了。他們若不是向他們的人民講真實話，便不得不繼續進行日益脆薄的虛偽宣傳。

五一節那天，我去參觀了上野公園內所舉行的戰事展覽會。我想，這裏至少是接觸到真實處境的了：對華軍事行動的模樣兒，想來總可以從許多的戰爭圖畫裏表現出來的。事實上，他們也正是竭力求其成爲現實的。這裏有幾架用以轟炸過南京的著名的轟炸機，機身穿透着榴榴殼彈；在轟炸機之旁，就是中國飛機的殘骸。戰爭中的殘剩品和戰利品，是無目的地收集在一起。這裏還有大血戰的精彩節目——南京的戰役，上海的抗鬥，日軍在南京勝利的入城，青島的登陸。燈光的效果也很聰明地佈置着……

然而它的工作，並不比日皇閱兵更多效力。徘徊在修剪得非常整齊的草地上的數千個觀衆，感到興

趣的倒是在於商業展覽方面，在於娛樂團方面，在於湖上遊舟方面，而對於皇軍的威武的表現，却並無多少興趣。至於這次展覽會的政治意義，我認為它也是同樣地失敗的，遍地是太陽旗，覆蓋着卍字旗和意大利國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畫像在每一個帳幕下深鎖着眉頭。我簡直找不出日本人對於「我們英勇的同盟者」的一絲熱情。當我看到一幅巨大的「牆頭畫」中的一個孤寂的學生描繪着蔣介石政權「赤化」的時候，我會呆立了多時。這幅畫的一部份，表示出一架蘇聯的戰鬥機，機身漆着一種鮮豔的革命的赤色，從莫斯科起飛，飛到中途便改變了顏色，而到漢口時，機翼上便有了青天白日的國民黨黨徽……

展覽會上雖則表現着他們的銳敏的感覺，然而日本人却只有所謂勝利的進軍，怎麼也沒法「解決」中國的抗戰。而且——因為皇軍是不能打敗仗的——那正是非這樣表現不可的。可是，很顯然的，日本的大眾是漸生厭倦之感了。

這次戰爭究竟在日本內部發生了些什麼影響呢？表面上，就只是機器油的限制，奢侈品的節約以及減免某些形式的娛樂吧了。從一個短期的旅人看來，這個國家——或至少是這些城市——或許稍稍有些鎮壓的樣子，可是在其他方面，倒還算是正常的。日本的組織戰爭，只有在這樣一個堅實的小國內才有發生效率的可能性。同時，日本人又是組織貧困者的能手。有些人雖則很自信地預言着日本在開戰後的

幾個月內便將使它的國民經濟瀕於破產，然而至今還看不出什麼顯著的經濟破產的標誌。

但是我還記得毛澤東（他或許也正如大多數人所作的關於日本內部情形的正確報告一樣）曾經下過警告，他認為在任何第三國還不會實行對日經濟制裁的情形之下，日本持久的力量是不能被估計得過低的。日本的最大弱點就在於它的軍用材料 and 軍需品，都必須完全仰給於外國。關於這一點，日本是依然削弱如常；不過，當日本還能夠從外國自由輸入原料的時候，似乎還能夠獲得國外借款的時候，這種弱點是不致於暴露出來的。

毛澤東會估計過，日本即使在最不利的形勢之下，最低限度也能支持兩年的戰爭。早熟的經濟崩潰，那是奇蹟，同時也不再是中國人所期望着的了。

然而日本的士氣和民氣的逐漸衰落，却是易於估算的一個因素。關於這點，我會跟一位曾在日本住過多年的外國人討論過。『的確，』他對我說，『一年來的戰爭並不會在表面上浮現過什麼值得注目的不同的景象。入伍運動那是當然的；全國動員會，也是當然的；政治方面，自然也一同緊張起來。但它的最軟弱的一環，就是農民。農民自己的市場價格是固定的，而他們的生活程度却不斷地飛漲，所以他們首先是受到切身的苦痛。城市工人方面，暫時還不算苦，因為軍事工業是非常繁榮的。』

『隨着日本對外貿易的衰落，隨着軍需原料以外的一切進口貨的限制，工業家就無法得意了。於是

幕後的各個不同團體之間，發生了非常緊張的形勢——由此而發生了外交政策的紛歧。但如果通貨膨脹到來時——戰事不停，通貨膨脹是必然到來的——那就或許要形成恐怖了。

「到了那時，我們大家便都要遭受危險。因為本國的危機一經存在，那麼軍事領袖們便什麼都幹，找他的出路了。這就是英國之所以很有理由地害怕日本的道理。」

「然則日本國內的革命，又將怎樣呢？」

他搖搖他的頭。「農民和工人是不會聯合起來的。在這裏日本內部，政府是有防止方法的。不過，有一處確是容易爆發革命的，就是從軍隊中爆發革命。如果軍隊中爆發革命，日本便宣告完結了……」

如果軍隊中爆發革命……在東京火車站上，我看見一支隊的後備軍，應召參加了他們的部隊，正要開赴中國去了。穿武官便服的青年人，佩着彩色的絲帶。這真是告別日本時的最陰慘的一幕。每個新兵，都低着頭站在圍有親友的一小圈子的中央，這時候，這些親友們便吟唱起一曲像輓歌似的離別歌。我瞥見有好幾個人，當歌曲尚未唱畢以前，便先停止了唱歌而溜走了。沒有樂隊，沒有旗幟，也沒有快樂……

我猛憶起這些月臺在一九三七年的七月間是怎樣的一種光景了。許多事情或許都將在戰爭的開始和終結之間發生吧。

五 不是「朝日」了

船掠過運輸軍艦的旁邊，緩緩地駛進了橫濱灣的一片汪洋裏，我們是很知道日本的，可是還沒有瞭解日本的最後的號令，一艘水雷船發着很大的咋咋聲駛過，正有人在那裏拿着望遠鏡眺望我們這個差不多空無一人的甲板，在那明麗的雲煙的高空中，一隊水上飛機正在我們的頭頂上飛旋，太陽射在機翼上，閃爍着一種使海鷗吃驚的眼光，所謂『和合山』（The Mountain of Harmony）的富士山已經把它的沒有裂隙的尖峯隱入霧裏去了。

我們是要離開這一個不幸的國度了——這國度的統治者們先前是自行瘋狂，隨後却受瘋狂的牽制，我早已看出了這個國度裏的人民是怎樣不願地被捲入戰爭的漩渦。我又早已看出了一些日本人民怎樣地反對着使未來的年頭陷於黯淡的這種拚命的冒險行動，『我們把我們的思想』東京的一個年青的學生曾說過，『鎖住在我們的心裏頭，如果這次戰爭不停止，我們就得一直變爲啞子啊』然而，戰爭的悲劇，却是日本方面，如今是沒有回頭的可能了，凡是對戰爭的危險性並不盲目的份子，都只是些沒有權勢的人。

危險性是很大的，可是這正是日本的行動的目標，如果日本能够在中國獲得勝利，能够擊破中國人

民的精神，而且能够替它自己在東亞把一個擁有五萬萬臣民的帝國建立起來的話，那麼全世界或將真的一同做日本一樣的迷夢了。所謂「大日本」(Daï Nippon)就很可能在它那太平洋各島的壘壘上，帶着浩浩自喜的神氣去期望歐洲的分割，同時去聚養一批或將成爲無可征服的有訓練的人力方面的後備軍，這種遠景，很可以震眩任何侵略家的眼目。

這也並不是全然的幻想，有些人，他們妄謂日本在這時發動這種追逐它現在的敵人的戰爭，已經是爲時已晚，其實，他們是忘掉了現在這一個時期，乃是世界再分割的時期，而不是世界初次分割的時期，回頭去看看十九世紀的任何時期，無論英法或是沙俄，假如它有機會可乘的話，都何嘗不會總總於瓜分或是獨吞中國的企圖。我們也不會有任何理由，去想像英法或沙俄的侵略方式會跟日本的侵略方式有多大的差別，日方松井將軍在南京的行動，頗多大膽妄爲的地方，不過，這跟愛爾近公爵的和瓦德西的軍隊從前在北京所幹的樣子，倒也很相同哩。

在遠東和歐洲同樣存在的，並有效地阻止着任何一國去統制這易受損害的中國富源的十九世紀的均勢，是在二十世紀中間粉碎了。這時候，日本趁着西歐列強「勢力不均」，十多年來就在亞洲單獨活動，日本對於那些在中國的權益方面直接受到它的威脅的列強，除收授抗議以外，並不有所畏懼，它不顧別國對它的情感，依然進行它的帝國建設，這種彰明昭著的冒失行動，是曾經熟思密慮的，如果除國際干

涉外不能更有別的方法去阻止日本在中國的行動，那麼，它的軍事領袖自將無所顧忌。

不過，這兒還留下着一個因素，而且那是一個最明顯的因素，是整個日本計劃中所忽視了的因素——中國人民的繼續不斷的抗戰。日本只有在中國放棄這個鬥爭的時候，才能够取得它的勝利，然而呢，中國人民將繼續不斷地抗戰到底。

在一九三七年之前，任何人都還不會抱着十足的信心說這樣的話，但在今日，在日軍所佔了的每個城市，每個鄉鎮，我們可以日益加強地說這樣的話。正因為日本認清了他們的敵對者（中國）的這種新的氣質，才驅使着日本軍人拚着暴力，用迅速佔領重要戰略城市的方法，去縮短戰爭的期限。日軍的佔領一個中國城市，並不是怎樣困難的事，較困難的，是在於日軍的保卒以及利用那個城市，要征服中國各省，要保持所佔各省，且不為敵對的民衆所反對，這種光景，甚至連日本軍官也無法安閑地設想得出的。在中國，在西班牙，這是同樣的問題——人民保衛反法西斯侵略的自由，我們當代最大的問題，是一九三一年首先公開發動的。從歷史的觀點看來，中國已經成爲了爆發世界鬥爭的第一線，此後，在將近十年之間，阿比西尼亞，西班牙，奧地利，捷克，都接連着爆發了出來，在這些連續發生的戰局中，三個國家的戰鬥是早已失陷於侵略者的手掌中去了，留下的只有西班牙和中國，戰鬥尚在持續，西班牙人民，雖然遭受着使人喪氣的軍事敗蹟，却依然堅持抵抗着歐洲法西斯的進攻；縱然軍事敗蹟益發猛烈地加在他們身

上，而使他們終於壓倒下去，他們也在所不管。那麼中國及其五萬萬人民——他們剛正開始理解着民主的意義——的運命，又將被及什麼一個樣子呢？

站在半個地球的對岸的我們之中的一些英國人看起來，前途也許似乎是未可樂觀的。中國的一切海岸線，一切主要的城市，既已入於侵略者之手，那就不啻是處於背城一戰的地步了。好在那個城牆，並不是西班牙那樣的一個被敵人環視着和封鎖着的洋面，它却是亞洲的無窮的內地，在那裏，好多世紀之中曾經是強大帝國的發源地，且有着尚未着手開發的天然資源的富藏，今日的中國，已經退到它古代的邊疆上，即西藏的山地和新疆的沙漠地帶，而在必要時，仍將重把古代歷史上的對外交通線，加以運用，那邊的交通線，能够不致受到任何攻擊，而獲得安全；至少有一條交通線，才能够保證，即使在將來，也是一個軍需的永久來源，這是因為中國——它比西班牙佔着最大優勢之處——跟那並肩而立的世界的一國（指蘇聯——譯者）存在着直接接觸之故。

隨着不很熟知的一幕的少許變動，今日的遠東形勢，主要的是跟我們在行近故鄉時常見到的一幕情形差不多：在獨立民主政府和與此相反的勢力之間的鬥爭，日本的侵略行動，雖則令人寒慄地給予中國以大量的災害與苦難，但在同時，血與火的鍛鍊，却也把中國社會內部的前進力量解放了出來，如果那些力量能得自由演出，那麼，這受難的中國也許就能變化為孫中山當年的理想中的自由民主國家那樣。

的政治機構，然而在日本人民方面，這次戰爭並不會帶來這一類的希望；唯一的幻想，就只是需要更多的犧牲去造成更大的勝利吧了。而況中國未來的最健強的友軍，將是日本人民和軍伍中日益滋生着的一種幻滅之感。

在戰爭的爆發時期和結束時期之間……

當民主勢力是在三大洲取着守勢，而只有和平的敵人們似乎能够勝利地勾結着的現在，這裏是我們大家的崗位，同時，中國的廣大人民——我們西方人不能不認清——是正在爲着我們而戰鬥的，「友邦政府」們會竭盡力量想把他們出賣，例如西班牙人民就會被自命爲「民主」的歐洲政府所出賣，然而中國人民——國際地平線上的若干有希望的烽火中之一支——仍然是征服不了的。

他們終於找到了一條抗戰的道路和引向自由的道路，全世界倘要在今日看一看這悠久的年代中從來不曾知道失敗不失敗的人類努力的精神的最高表現，那就得求之於中國。

「忍受那希望之神所認爲無限的苦難；

寬宥那些死亡或夜色更黑層的罪過；

迎擊那似乎無所不能的強權；

相親相愛，相容相忍，希望那——

希望之神在廢墟上創造理想的東西；

不再改變，不再逡巡，不再追悔……」

這是中國的運命，它有着達成這一目標的力量，在空禿的北方羣山中，在青青的揚子江流域的沿岸，在南國的稻田和雨淋淋的山嶺間，全體武裝的人民，漸漸地發見了它自己的領袖，在跟復興中國的全部力量發生接觸的時候，世界任何國的軍隊都必然將遭到潰敗的運命。

日本是盲目的，當我們的海輪繞過最後的海角時，我這麼感覺着。我望着日本的三島也慢慢地消隱不見了；水上飛機已經飛回它們的根據地去了。兩星期後，過了一片霧濛濛的北海，就是美洲了。

校 後

在忙亂中校完了全書，我重重透一口氣，我終於做完了件使我頭痛的工作！

在我看來，除頭一二章譯文稍嫌生硬外，其餘各章都過得去，特別是許多很少人知道的人名地名，譯者們的確費了不少查考的苦功。累贅晦澀的地方，校者不任意刪改，譯者的心意是應該尊重的。

中日戰爭快兩年了，但公正地描寫這一戰爭的真實的全貌的，似乎只有這麼一本書。那麼中譯本的出版，應該不是沒有意義的吧。

沒有別的話了。細心的讀者是最公平的裁判官！

淡秋，一九三九，五，卅日。

行發報譯日每

譯報



線前北華

平裝一冊售國幣壹元貳角	經售	發行	出版	譯者	作者
	全國各大書局	愛多亞路一一七號 電話八五八七五號 報圖書部	文緣出版社	林光 蔣天 蘇靈 秋濛 黃天 佐峰	英·James M. Bertam

Mei Kh Y-Bao
(The News Digest)
 Published daily by UNIVERSITY PRESS LTD.,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f Hongkong)
 117 Av. Edward VII, Shanghai
 Directors: J. A. E. SANDERS-BATES, N. E. BONNER
 Tel. Nos. 85875 & 18802. Cubles: "Scholaris."

日一廿月一年七廿國民於刊創報本

納鮑·門拿 士裴·司特孫人行發

